

OXFORD

STALIN'S DEFECTORS

How Red Army Soldiers became Hitler's Collaborators, 1941-1945



Курить
разрешается!



MARK EDELE

斯大林的叛逃者

斯大林的叛逃者

红军士兵如何成为希特勒的
合作者,1941-1945

马克·埃德尔

3

英国牛津大克拉伦登街OX2 6DP牛津大学出版社是牛津大学的一个部门。

通过在世界各地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进一步推进其在研究、学术和教育方面追求卓越的目标。牛津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注册商标。

© 马克·埃德尔 2017

作者的精神权利已得到主张

第一版于2017年出版

印象:1

保留所有权利。未经牛津大学出版社事先书面许可,或未经法律明确许可、许可证或与相关复制权组织达成的条款,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复制、存储于检索系统或传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如有任何关于上述范围以外的复制事宜,请发送至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权部门,地址同上。

您不得以任何其他形式传播本作品,并且您必须对任何收购者施加同样的条件

由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美国纽约州纽约市麦迪逊大道 198 号,邮编 10016

英国图书馆出版数据编目
可用数据

国会图书馆控制号:2016959378

ISBN 978-0-19-879815-6

由 CPI Group (UK) Ltd,
Croydon, CR0 4YY 印刷及装订。牛津大学善意提供

第三方网站链接,仅供参考。牛津大学对本作品中引用的任何第三方网站所含资料不承担任何责任。

致安娜和黛布拉

前言

数量空前的红军士兵越过前线,向希特勒的德国国防军投降。二战期间,没有任何一支盟军的战俘(POW)中叛逃者的比例如此之高。与此同时,绝大多数沦为战俘的苏联士兵并非主动投降。同代和后世的历史学家们选取极端的例子,对前线投降得出了影响深远但大多未经证实的结论。他们根据自己的政治观点或对苏联战前生活的理解,要么忽视前线叛逃事件,要么宣称绝大多数苏联战俘投降是因为他们不想为斯大林而战。前线投降与否,成为斯大林主义的“试金石”。

本书首次系统性地研究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大多数俄罗斯人至今仍将1941年至1945年的德苏战争称为“伟大卫国战争”)中前线向德军投降的现象。本书基于德国和苏联的档案资料,以及前线双方已出版和未出版的回忆录、日记和访谈,探究了前线投降的程度、背景、场景、原因、后果以及史学研究。本书旨在促进学术界关于苏联二战经历及其在苏联历史长河中地位的持续讨论。

第一章概述了本研究的问题、来源基础和基本概念框架,并介绍了我们的核心人物之一伊万·斯基蒂奇·科诺诺夫。第二章探讨了前线叛逃的程度,我指的是故意越过前线开小差的行为。

本章主要针对专业历史学家中的怀疑论者而写,对于那些已经确信这一现象意义重大的读者来说,可以放心跳过。他们可以直接跳到探讨苏联士兵在试图叛逃时所面临的障碍的双章(第三章),然后再研究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第四章)。第五章描述了那些跨界的人,而第六章则探究了他们的动机,第六章结束了对叛逃本身的研究。接下来的三章将讲述斯大林叛逃者的命运以及他们在最初行动之后的故事。第七章描述了这些叛逃者所走的各种道路。

战争后期,尤其是与纳粹合作的广泛决定。本书还追踪了他们直至战争结束,最终要么回到苏联,要么流亡世界各地。第八章探讨了他们的故事在战争结束后的走向。这是一次思想史的练习,也是对历史写作史的考察。

第九章探讨苏联战时叛逃对当前关于苏联战争的学术争论的影响。对历史写作的政治性和当前争论的脉络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最后两章。与本书其他部分不同,这两章主要面向专家。

因此,本书将军事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以及史学与思想史融为一体。它重新整合了因专业化而支离破碎的史学写作领域:斯大林主义社会及其不满者的历史、苏联和德国的战争努力、德国占领及其抵抗的历史、合作史、移民史、遣返史以及流亡史。本书不仅为所有这些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也探讨了战后初期苏联流亡者和西方学者之间的讨论。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虽然叛逃在苏联军队中比其他盟军更为普遍,但其动机却错综复杂。促使人们试图跨越前线的最普遍的情绪,是渴望在战争中生存下来。

在那些选择放弃并投降敌人的人们中,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的不满也普遍存在。尽管政治在促使人们叛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很少有人愿意为敌人而战。因此,虽然前线叛逃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斯大林政权缺乏民心,但这并不能证明大多数民众已准备好抵抗,更不用说合作了。长期以来,争论的双方——那些将所有苏联战俘都等同于叛逃者的人,与那些试图淡化这一现象的人——都过分强调了前线叛逃的重要性。相反,最近对苏联占领区和非占领区民众情绪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认为反对希特勒和斯大林政权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本书的研究结果支持这种解释。

五年前,我开始写一篇关于前线叛逃的“小论文”,试图解释我无意中发现的档案证据。这篇论文一直在延伸,直到我最终被迫承认

那是一本短篇小说,不再是长篇论文了。在与这本书抗争的五年里,我的女儿也从蹒跚学步的幼儿长成了小学生。安娜渐渐长大,翻阅着散落在我书房地板、桌子和书架上的关于德苏战争的书籍。她反复抱怨我大学办公室里一张特别可怕的苏联宣传海报:“爸爸 把它拿下来!我不喜欢!”2012年,在西澳大利亚丛林徒步旅行时,当时她3岁,她突然问我一个问题:“爸爸,以前你在俄罗斯的时候 你也杀过人吗?”我对这场战争的痴迷,在女儿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痕迹,远不止平常听到的那些:爸爸躲在办公室里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不是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在花园里捉虫子,在河里或海里游泳,读关于龙的书,或者玩捉迷藏。谢天谢地,安娜仍然相信战争只发生在“旧时代”和“苏联” 那些几乎具有神话地位的时代和地方。

我希望这种战争的遥远感能伴随她一生。我怀着这种精神,将这本书献给她。

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欠安娜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其中最让我感激的是我的妻子黛布拉·麦克杜格尔,她是我的战友,尽管她自己身陷学术的泥沼,却从未抛弃我。我也谨以此书献给她。我的母亲布里吉特·埃黛尔,以及我的公公婆婆卡罗尔和公公大卫·麦克杜格尔,在他们频繁访问北弗里曼特尔期间,以及我在德国和美国进行研究期间,都曾多次在日常生活和照顾孩子方面给予我帮助。

除了家人之外,我还受益于许多机构和个人的专业支持。研究和写作部分得益于西澳大利亚大学研究发展奖(2010年)、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发现项目资助(DP130101215, 2013-15年)、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未来奖学金(FT140101100,2015-19年)以及2015年上半年西澳大利亚大学人文学院的休假。2016年,我在堪培拉担任学术访问学者期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学院提供了办公空间、图书馆使用权和下午茶。我要感谢:杰出研究员兼整篇手稿审阅者 Iva Glisic;我的研究助理 Daria Rudakova 和 Vanessa Sofoulis,她们帮助收集材料; Jürgen Förster 向我介绍了弗莱堡德国军事档案馆的情况;该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员,特别是 Nina Janz,对我的查阅地点提出了建议;Benjamin Haas 的专业帮助让我免去了多次前往

弗莱堡;巴赫梅特夫档案馆馆长塔尼亚·切博塔列夫 (Tanya Chebotarev),感谢她在我纽约期间提供的宝贵帮助;以及美国大英帝国司令部图书馆馆员文森特·斯拉特 (Vincent Slatt)和梅根·刘易斯 (Megan Lewis),感谢他们在我华盛顿进行研究期间提供的支持。本杰明·特罗姆利 (Benjamin Tromly)分享了美国国家档案馆 (NARA)的相关文件副本,而布兰登·谢克特 (Brandon Schechter)也同样慷慨地提供了来自皇家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 (RGASPI)的副本。他们两人都给了我一些未发表的著作供我阅读,这对我帮助很大。当被问及红军前线部队中军官可能占比时,布兰登的回答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

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奥列格·贝达 (Oleg Beyda)和伊戈尔·彼得罗夫 (Igor Petrov)慷慨地分享了他们当时尚未发表的关于科诺诺夫的著作,并向我介绍了一个重要的资料库以及其他我之前不知道的资料。大卫·斯塔赫尔 (David Stahel)帮助我避免了对一个关键数字的误解,并分享了档案笔记,将其置于正确的语境中。埃琳娜·戈沃尔 (Elena Govor)建议我利用新近上线的在线数据库来核对“我的”叛逃者,这最终带来了一些发现。

部分材料的早期尝试已在 2015 年 4 月 24-25 日于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举行的“回家:二战抵抗老兵的经历和叙述以及战后欧洲的重建”会议以及 2015 年 5 月 22 日于西澳大学俄罗斯历史研究小组举行的研讨会上发表。更高级的论文首先在 2015 年纽卡斯尔大学举行的澳大利亚欧洲历史协会 (AAEH) 会议上发表,然后在 2016 年 8 月于堪培拉举行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研讨会和同年 9 月于堪培拉举行的澳大利亚国防学院发表。这篇论文构成了本书若干章节材料发表的基础,题为“非同寻常的人:伊万·尼基季奇·科诺诺夫与 1941-1945 年红军前线叛逃问题”,发表于《澳大利亚政治与历史杂志》第 62 卷,第 62 期。4 (2016)。我要感谢所有参与者提出的问题、评论和批评。尤其要感谢 Roger Markwick 的反馈,他的反馈强化了论点;Oleg Beyda 对我的研究主题的了解也非常宝贵。Sheila Fitzpatrick 的温和反对意见促使我避免了提出一个相当离谱的论点。我 2015 年合作课程的优秀优等生阅读了完整手稿的早期版本,并勇敢地对其内容提出了批评。

其中两位,乔治亚·奥曼 (Georgia Oman)和艾米·普拉西利奥 (Amy Pracilio),在这场令人难忘的研讨会结束后悄悄地递给我几张纸。纸上列着一些愚蠢的错误和打字错误,让我后来免于相当多的尴尬。三位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读者的评论帮助我完善了最终版本。其中一位后来透露了自己的身份,并以奥尔加·库切连科 (Olga Kucherenko)的身份补充了进一步的评论。

Brandon Schechter 和 Benjamin Tromly 也阅读了整份手稿

前言

十一

并提供了极其有用的反馈。Genevieve Earl 在索引创建过程中提供了巨大帮助。

过去十年里,西澳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们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尤其要感谢安德里亚·盖纳 (Andrea Gaynor)、杰里米·马滕斯 (Jeremy Martens)、简·莱登 (Jane Lydon) 和罗伯特·斯图尔特 (Robert Stuart) 的友谊,感谢他们分享八卦、咖啡,或者一些“更烈的酒”,因为这些往往能让人保持清醒。

马克·埃德尔

基辅

2016年11月26日

内容

<u>表格和图表列表</u>	十五
<u>1. 叛逃</u>	1
<u>2. 数字</u>	19
<u>3. 障碍</u>	三十七
<u>4. 场景</u>	59
<u>5. 个人资料</u>	77
<u>6. 动机</u>	95
<u>7. 合作</u>	121
<u>8. 来世</u>	147
<u>9. 含义</u>	165
<u>引用来源列表</u>	179
<u>指数</u>	199

表格和图表列表

2.1. 1942年至1945年的战俘和叛逃者	21
2.2. 被德军俘虏的苏联人（“达林数据”）	23
2.3. 1941-1945 年叛逃者总数估计 战俘份额（千）	31
2.4. 外国军队东部战俘和叛逃者的统计 （Überläufer）,1943 年 7 月至 1945 年 4 月 10 日,整个东线 5.1. 叛 逃者与男性总人口的年龄分布对比 5.2. 叛逃者按世代分布及对比	83
与男性人口整体相比 5.3. 叛逃者的 年龄结构和红军的人口损失 5.4. 与战前人口普查数据相比的叛逃者国籍 5.5. 296 个编号的叛逃者的阶级构成 6.1. 296 个编号的叛逃原因 6.2. 296 个 编号的叛逃者中的积极反斯大林主义者 6.3. 296 个编 号的政治上不满的叛逃者 6.4. 296 个编号的	84
叛逃者中的失败主义者 6.5. 296 个编号的叛逃者中的生存主义 者 6.6. 296 个编号的叛逃者中的集体农庄农户 6.7. 以 德国传单宣传为理由的叛逃者 6.8. 以红军恶劣条 件为理由的叛逃者 6.9. 为了返回占领区的家人而叛 逃 6.10.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俘制度的叛逃者 7.1. 1943-1953 年因叛逃、通敌及相关问题而被捕的情况	85
	86
	88
	111
	112
	114
	115
	115
	116
	117
	117
	118
	118
	141

图表

2.1. 第三装甲集团军战俘中叛逃者的比例（%）	二七七
--------------------------	-----

1

叛逃

我

1941年8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仅两个月后,伊万·尼基季奇·科诺诺夫少校投降了。他战前的职业生涯中,丝毫没有表现出对斯大林政权的绝对忠诚。

不久前,一位上级评价他“忠于列宁-斯大林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这位指挥官“政治上和道德上都稳定”,并且“政治素养高”。他“积极参与党的组织生活”。这位职业共产主义军人曾在芬兰冬季战争(1939-1940年)期间指挥过第436步兵团,自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以来,他曾多次率领该团突围。他肯定非常了解自己的部下,才会做出这个冒险的决定,命令他们停止抵抗,向德军投降。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服从了命令,投降了至少一个营,也许是他所在的整个团,或者只是剩下的部分。让这次叛逃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科诺诺夫不久后就组织了一支由苏联公民(理论上是哥萨克人,但实际上并非总是如此)组成的军事部队。他们自愿加入纳粹阵营,对抗斯大林政府。科诺诺夫的士兵他们自称“科诺诺夫特人”曾在德国国防军、党卫军以及弗拉索夫将军领导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KONR)的各个下属机构中作战。他们主要在德军后方与共产主义敌人交战,这是一场先是针对苏联游击队,随后又针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肮脏战争的一部分。

科诺诺夫自认为是德国人在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斗争中的临时盟友;德国人认为他是通敌者;而苏联人则视他为叛徒。他以“所有哥萨克部队的首领”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战争生涯,并确保战败后不会被遣返回苏联。¹

¹ 有关科诺诺夫案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4章和第7章。大多数现存的记载直接或通过一系列二手资料来源,依赖于科诺诺夫的一位前下属出版的圣徒传:康斯坦丁·切尔卡索夫,科诺诺夫将军(Otvet pered istoriei za odnu popytku),第2卷。(第一卷:墨尔本:Edinienie,1963年;第二卷:慕尼黑:

科诺诺夫为何叛逃到德国?如果我们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其动机是政治性的。作为一名顿河哥萨克人,这位少校感到愤慨,因为他的族人,包括他的家人,都成了受害者。²他总体上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尤其反对斯大林主义。虽然他的自我表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但这一点始终如一。叛逃后的第二天,他向德国审讯员“声明”道:

他希望尽快接管一支部队,参与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斗争。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强烈排斥源于1937年他哥哥和岳父被枪杀,以及政委对军官的持续监视。³

1941年9月,他再次向德国俘虏他的人描述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狂热敌人,布尔什维克主义摧毁了顿河哥萨克人”,⁴而在1944年接受一份针对苏联裔军事合作者的出版物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叛逃前与一名下属的谈话:

我从来就不喜欢苏维埃政权……是时候报复斯大林给人民带来的一切苦难了。我决定把这个团交给德国人……把我们饱受苦难的祖国从屠夫斯大林手中解放出来。

Tipografii I. Bashkirtseva,1965)。一个例外是对该主题的最佳介绍:KM Aleksandrov,“Kononov Ivan Nikitich”,在他的 Ofitserskii korpus armii General-leitnanta AA Vlasova 1944-1945 中。Biograficheskii spravochnik 2nd, rev. edn. (莫斯科:Posev,2009),481-510;另请参见同上, Russkie sellaty Vermakhta. Geroy ili predateli (莫斯科:Eksmo,2005)。对科诺诺夫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和道德的评价同上。

433. 重要的翻译文件发表在 KM Aleksandrov 和 OI Nuzhdin, Novye dokumenty k biografii general-maiora IN Kononova, Russkoe proshloe 12 (2012): 259-79。亚历山德罗夫的作品在俄罗斯引起了相当大的政治争议。例如,参见 A. lu. Plotnikov 和 VV Vasilik, “Vlasovskoe dvizhenie” ili eshche raz ob istorii predatelstva (Na osnove analiza doktorskoj dissertatsii KM Aleksandrova, Klio 1 (109) (2016): 197-202。我自己关于科诺诺夫案的结论总结在“不是一个普通人:伊万·尼基蒂奇·科诺诺夫和红军前线叛逃问题,1941-1945”,《澳大利亚政治与历史杂志》62,第4期(2016年):546-60。

² 关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统治下的哥萨克人的复杂历史,请参阅 Shane 奥罗克,《哥萨克人》(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7年)。

³ lc 3 Pz.划分至 lc XXIV. Pz. 军团 (1941年8月23日),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馆,弗莱堡 (BA-MA) RH 27-3/167,第176页。

⁴ Armeoberkommando 4,lc/AO I:Verhör der Offiziere (Überläufer) Iwan Nikitowitsch Kononow,Major und Kommandeur des 436.Schtz.右边。和 Alexander Jakowlewitsch Nagelmann.Hauptmann 和 Ia der 137. Schtz.分区(6.9.1941),BA-MA RH 22/271,对开页 140-51,此处:140。

⁵ A. Iaganov, V pervoi kazach'ei.奥彻克·沃托罗伊。U Kononovtsev,Na Kazach'em postu: Dvukhnedelnyi obshchekazachii zhurnal 37 (1944年11月1日):11-12,此处:12。

1948年,他写信给流亡历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1887-1966),再次阐述了他改变立场的理由:

在苏联生活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恐怖、贫困和
人民在共产主义统治下遭受的一切侮辱。我坚决
决定选择公开反对共产主义的道路
把我们的祖国从野蛮人、共产主义
由该死的、嗜血的山豺朱加什维利-斯大林领导的土匪。⁶

此后不久,科诺诺夫移民至澳大利亚,在不断升级的
冷战时期,苏联成为前苏联的主要避难所。
为德国人而战。⁷1950年,他与澳大利亚
政府寻求国防职位。遭到拒绝后,他再次尝试
一位名叫 K. Dulschers 的中间人,派了孟席斯总理
一份备忘录,很可能是由科诺诺夫共同撰写的。它
再次将叛逃描述为出于解放他的
祖国脱离“可恶的敌人……共产党”。⁸最后,当
他以前的下属和流亡同志康斯坦丁·切尔卡索夫,
几年前在墨尔本出版了他的传记
合作者之死,他引用了前任“阿塔曼”所说的话
他对红军的背叛 这是由
反对斯大林的暴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恐怖,争取自由
祖国。⁹

关于科诺诺夫叛逃的现有证据表明:

基本事实。¹⁰首先,在发现自己被包围时,科诺诺夫
他的士兵们并没有被德军击溃,而是放弃了他们的
自愿。第二,这次叛逃的部队规模相对较大。第三,
投降是由指挥官下令的,这一命令

⁶ 科诺诺夫致尼古拉耶夫斯基,1948年4月26日,胡佛研究所档案,鲍里斯 I. Nicolaevsky 收藏,盒子 259,文件夹 4,卷轴 220。

⁷ 参见 Mark Aarons 的《庇护所:澳大利亚的纳粹逃犯》(墨尔本:威廉 Heinemann Australia,1989年);同上,《欢迎战犯:澳大利亚,战犯的避难所》《1945年以来的逃亡战犯》(墨尔本:Black Inc.,2001年)。另见:克劳斯·诺伊曼,跨越海洋:澳大利亚对难民的回应。一段历史(科林伍德:Black Inc.,2015年)。尽管人口不多,澳大利亚接收的苏联裔流离失所者数量却是世界第三多。参见 Mark Edele 和 Sheila Fitzpatrick 合著的《流离失所者:从苏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历史》第 12 卷,第 2 期(2015年):7-16,这里:⁹

⁸ K. Dulschers 致孟席斯总理,1950年9月15日;《科农诺夫将军是谁,他的能力是什么》(未注明日期),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NAA),MP742/1,115/1/437:“伊万·尼基蒂奇·科诺诺夫将军”。

⁹ 康斯坦丁·切尔卡索夫,科诺诺夫将军(Otvet pered istoriei za odnu popytku)。汤姆 1 (墨尔本:Edinienie,1963),122-3。

¹⁰ 关于科诺诺夫叛逃的经过,不同的消息来源给出了略有不同的版本。军团最终发挥了作用,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看到的那样。另见 Edele,“不平凡的人”,547-8,对故事的不同版本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大多数人都紧随其后。第四,这位指挥官是斯大林主义精英阶层的一员,拥有丰富的军旅生涯和多年的共产党员经历。第五,他叛逃后不久就组织了一支反苏军事组织,这在当时是违反明确政策的,而且只能在地方上自发组织。¹¹即使不考虑科诺诺夫本人的反斯大林主义主张,整个事件也支持了以下论点:1941年,各种背景的苏联公民对斯大林政权都存在着强烈的不满,而这种反对情绪部分解释了1941年的大规模投降。

二

历史学家最近开始怀疑是否存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势力,转而强调赞同和参与。¹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该如何理解科诺诺夫的行为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将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的叛逃故事宣称为后来的捏造。这会不会是那些为了自保而与德国人合作的人自私自利的辩解?或许如此,但正如我们所见,在1941年至1963年期间,科诺诺夫所讲述的这部分故事没有任何演变:从第一天起,他就声称自己是出于反布尔什维克和反斯大林主义的动机。此外,苏联也流传着基本相同的说法。科诺诺夫的那些没有随他一起被德国俘虏的人讲述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被多次传阅和复述,成为苏联地下组织的口口相传,¹³最终由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古拉格群岛》中广为流传。

¹⁴鉴于这一独立传统的存在,将科诺诺夫本人的版本完全解读为后世的建构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科诺诺夫是超过三分之一的苏联叛逃者中的一员,他们声称政治情绪是他们叛国行为背后的驱动力。为了挽救

¹¹ 对于那些有兴趣建立反斯大林的“俄罗斯”军事力量的人所经历的考验和磨难的经典内部描述,请参见 Wilfried Strik-Strikfeldt, *Gegen Stalin und Hitler: General Wlassow und die russische Freiheitsbewegung* (Mainz: Hase & Koehler Verlag, 1970), 经典的学术论述是亚历山大·达林 (Alexander Dallin) 的《德国在俄罗斯的统治》。

1941-1945: 占领政策研究 (纽约: 圣马丁出版社, 1957 年)。

¹² 请参阅第 8 章。

¹³ 关于 1941 年 8 月返回苏联防线的科诺诺夫的士兵传播消息的情况, 请参见切尔卡索夫的《科诺诺夫将军》, 1:123。

¹⁴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Arhipelag GULag 1918-1956: Opyt khudozhestvennogo issledovaniia, V-VI-VII* (巴黎: YMCA Press, 1975), 32. 索尔仁尼琴有可能看到了切尔卡索夫叙述的走私 (tamizdat) 版本, 这将对相似性的另一种解释。

如果这种解释排除了反对斯大林主义是 1941 年至 1945 年战争期间大规模向德国投降的原因之一,那么,正如本书其余部分所示,大量的证据需要被排除在外。

话虽如此,我们绝不能将像科诺诺夫这样的叛逃者与苏联战俘 (POW)的庞大规模混为一谈。到这场战争结束时,苏联战俘人数已达五六百万。¹⁵尤其是在1941年,德军对他们施以残酷的屠杀和犯罪般的忽视。许多人在被迫行军至后方时丧生,要么是因精疲力竭,要么是被当作掉队者射杀。更多的人死于仓促搭建的集中营,在那里,寒冷、饥饿、暴晒和流行病肆虐。政治官员 (“政委”, politruki)、女兵和犹太人被处决。

正如第八章对文献的详细回顾所示,关于斯大林士兵为何如此多沦为德军战俘,各种猜测层出不穷,学术观点也层出不穷,而且存在某种重复立场的倾向。本书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甚至权威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除了阿隆·施内尔对放弃战斗的诸多原因的详尽论述,以及罗杰·里斯对红军继续战斗的原因的权威论述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¹⁶克里斯蒂安·斯特雷特1978年关于德国国防军如何对待苏联战俘的专著至今仍是评判后世研究的黄金标准,而帕维尔·波利安关于幸存者遣返的研究则为该领域的更多研究铺平了道路,包括我自己的研究。¹⁷然而,本书的主题并非所有苏联士兵,甚至也并非所有战俘,而只是那些放下武器投奔敌人的战俘。¹⁸

¹⁵ 参见第 2 章表 2.2.对于 526 万的较低总数,请参阅“Statistik der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genen in deutschem Gewahrsam”,载于 Deutscher Hand: Dokumente zu Gefangenschaft, Repatriierung und Rehabilitation sowjetischer Soldat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编辑: Rüdiger Overmans、Andreas Hilger 和 Pavel Polian (帕德出生: Ferdinand Schöningh, 2012), 863-5, 此处: 865。有关苏联战俘的不同统计系列的讨论,请参阅第 2 章。

¹⁶ Aron Shneer, *Plen. Sovetskie voennoplennyye v Germanii, 1941-1945* (Moscow and Jerusalem: Mosty kultury, Gesharim, 2005), 112-58; Roger Reese, *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 The Red Army's Military Effectiveness in World War II*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1)。

¹⁷ 克里斯蒂安·斯特雷特 (Christian Streit), 凯恩·卡梅拉登 (Keine Kameraden): 《国防军与战争中的军事行动 1941-1945》, 新版。(波恩: 迪茨, 1997 年); Pavel Polian, *Zhertvy dvukh diktatur: Ostarbaitery i voennoplennyye v tret'em reikhe i ikh repatriatsiia* (莫斯科: Vash Vyor TsIPZ, 1996); 马克·埃德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退伍军人: 威权社会的民众运动, 1941-1991》(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第 5 章。

¹⁸ 有关该主题的初步探讨, 请参阅 Timothy P. Mulligan 的《逃离斯大林格勒: 苏联国民与德国第六集团军》, 《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第 20 卷, 第 4 期 (2007 年): 739-48 页。

毫无疑问,叛逃对于红军来说是一个问题。

正如第二章所示,叛逃者在敌方阵营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不算1941年叛逃的,我们讨论的人数多达数万人。加上战争前半年那些不太确定的数字,叛逃者的数量将上升到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苏联战俘中叛逃者的比例也比最终落入德国手中的任何西方盟军战俘的比例都要高。这一事实需要解释。

本书重构了这个重要少数群体的动机、背景和经历:他们自愿跨越前线,向德国人投降。本书探讨了这些叛逃者的数量、他们在斯大林的战斗部队中所占比例、他们为何叛国、他们是如何叛国的以及之后的命运。本书认为,跨越前线逃兵是一种极端行为,但它不仅揭示了这场战争的真相,也揭示了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社会。¹⁹我们首先在第二章中评估了这一现象的规模。第三章表明,考虑到双方对潜在叛徒设置的巨大障碍,苏联战俘中叛逃者的比例相对较高,这一点尤为重要。第四章展示了这些障碍是如何被克服的,而第五章则勾勒出了这一群体的构成。本书将叛逃者描绘成相当普通的苏联公民。他们存在于所有社会群体中,但下层阶级和少数群体的比例略高。第六章将探讨这些人如何甘冒巨大风险,加入一支由种族灭绝独裁者领导的入侵军队。结合定量和定性证据,本书表明,出于政治动机的叛逃者占了相当大的少数。他们不愿为斯大林政权献身,通常对苏联生活深感失望,因此大多数人并不想与苏联人作战。第二类人则人数略多,他们要么是出于失败主义的驱使,要么是无论如何都要生存下去的意志。这两类人中都有许多人最终与德国人合作,第七章将讲述这一故事,该章讲述了叛逃者成功背叛苏联后遭遇的事件。

叛逃后的命运千差万别,集体的轨迹比穿越前线更难追溯。叛逃者的未来命运也与其他苏联公民的命运重叠。

¹⁹ 我以前曾采用过从极端角度看待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参见马克·埃德尔(Mark Edelle)的《斯大林时期莫斯科的奇怪年轻人:斯蒂利亚吉一家的诞生和生活,1945-1953》,《东欧历史年鉴》50,第1期(2002年):37-61。

落入德国人手中,要么是因为他们被俘于前线,或者因为他们仍然留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德国。因此,叛逃的历史很快就分解成四个其他历史,每个历史都启发了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苏联战俘、20战争期间与德国合作的人、21以及22那些逃避遣返的人最终加入了流离失所者群体 (DPs)。23本章追溯了通过这些相关的历史,再次以伊万·科诺诺夫作为我们不太典型的案例研究阐明了这场战争中以及通过这场战争的各种人生道路。第8章探讨了后来对叛逃的理解争论首先在流亡者之间,然后是在苏联学者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本章将本书与分析 and 辩论可以追溯到战争本身。相比之下,第九章

²⁰ 有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的文献概述,请参阅 Jörg Osterloh 的《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 1941–1945》是《明镜周刊》国家和国际杂志上的《Untersuchungen》。Forschungsüberblick und Bibliographie,第2版,修订版。edn。(德累斯顿:汉娜阿伦特研究所 Totalitarismusforschung eV 和德累斯顿工业大学,1996)。

除了已经引用的 Kirill Aleksandrov 的作品外,例如:凯瑟琳安德烈耶夫·弗拉索夫与俄罗斯解放运动:苏联现实与流亡者理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MI Semiriaga, Kollaboratsionizm: Priroda, tipologiya i proiavleniya v gody Vtoroi Mirovoi voyny (莫斯科:Rosspen, 2000); 马丁·迪恩,《大屠杀中的合作:白俄罗斯和乌克兰,1941–44》(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00年); SI Drobiazko, Pod znamenami vruga: Antisovetskie formirovaniia v sostave germanskikh vooruzhennykh sil 1941–1945 (莫斯科:Ekmo, 2005); 罗尔夫·迪特·穆勒,《国防军阵地:澳大利亚希特勒》 Helfer beim Kreuzzug gegen den Bolschewismus 1941–1945 (美国河畔法兰克福:费舍尔, 2010); 列昂尼德·雷因,《国王与棋子:二战期间白俄罗斯的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 (纽约:Berghahn Books, 2011); 和安吉莉卡·本茨 (Angelika Benz), 《党卫队汉兰格:死亡》 Rolle der Trawniki-Männer im Holocaust (柏林:Metropol Verlag, 2015)。

²² 奥斯特洛的《战争年代》(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一书也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很好的介绍。经典论述是尼古拉·托尔斯泰的《雅尔塔受害者》(伦敦:霍德出版社,1977年)。在相同的传统,但有档案证据:Ulrike Goeken-Haidl, Der Weg zurück: Die Repatriierung sowjetischer Zwangsarbeiter und Kriegsgefangener während u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埃森:Klartext Verlag, 2006)。更平衡的是帕维尔·波利安 (Pavel Polian), 《Deportiert nach所在地: 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 im Dritten Reich und ihre Repatriierung》(慕尼黑和维也纳:奥尔登堡, 2001)。最好的总结概述是 Igor Vasil evich Govorov,

Fil tratsiia sovetskikh repatriantov v 40-e gg. xx 诉 Tseli, metody i itogi, 《世界手册》俄罗斯 49, 没有。2 (2008): 365–82。有关乌克兰的优秀案例研究,请参阅 Katrin Boeckh, 乌克兰的斯大林主义:两个系统的重构

Weltkrieg (威斯巴登:Harrassowitz Verlag, 2007)。

²³ 马克·怀曼,《流离失所者:1945–1951年欧洲的难民》(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0年);迈克·R·马鲁斯,《不受欢迎的人:二十世纪的欧洲难民》

世纪(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安娜·霍利安,《国家社会主义之间》

和苏联共产主义:战后德国的流离失所者(密歇根州安娜堡:大学

密歇根出版社,2011年);杰拉德·丹尼尔·科恩,《战争的后果:欧洲的流离失所者》

《战后秩序》(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Andrew Paul Janco,

《“不情愿”:1940–1951年难民身份的单词革命》,当代

欧洲历史 23 (2014): 429–46。

通过调查这项研究的结果对当前关于苏联社会的辩论的影响,追溯这场辩论在我们今天的演变过程

处于战争状态。

本书颇具意识地综合了多种阐释传统,正如我们将在最后两章中看到的那样。在当代方法论争论的更直接背景下,本书也试图取得平衡。接下来的章节构成了一项双重史学实验。首先,本书试图在苏联历史上“自下而上”地研究军事史。它将斯大林社会平民史学家的兴趣带入战争和军事研究中。²⁴在此过程中,它也将文化史与量化重新结合。²⁵在经济史领域之外,历史统计学,曾经是社会史的支柱,如今已声名狼藉。人们强调现实的数字表征的建构性,并对数字进行解构,以揭示其背后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如何反映历史利益和权力关系。话语分析扩展到数字领域,再加上量化方法培训的日益缺乏,导致人们要么对统计数据不屑一顾,要么有时对量化证据进行严重的误读。许多历史学家拒绝批判性地思考他们的量化假设,并尝试用证据来检验它们,这导致了人们对历史的危机感日益增强。

²⁴ 宣言参见 Wolfram Wette (编辑), *Der Krieg des kleinen Mannes: Eine Militärgeschichte von Unten* (慕尼黑和苏黎世: Piper, 1995)。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前身包括前面引用的里斯的著作,以及诺曼·奈马克的《德国的俄罗斯人:苏联占领区的历史,1945-1949》(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出版社,1995年); ES Seniavskaja, *1941-1945: Frontovoe pokolenie. Istoriko-psichologicheskoe issledovanie* (莫斯科: RAN institut Rossiiskoi istorii, 1995); 参见: 大卫·M·格兰兹 (David M. Glantz), 《巨人重生: 1941-1943 年战争中的红军》(劳伦斯: 堪萨斯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凯瑟琳·梅里代尔 (Catherine Merridale), 《伊万的战争: 1939-1945 年红军的生活与死亡》(纽约: 大都会图书公司, 2006 年); 安娜·克雷洛娃 (Anna Krylova), 《战斗中的苏联女性: 东线暴力史》(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奥尔加·库切连科 (Olga Kucherenko), 《小士兵: 1941-1945 年苏联儿童如何参战》(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Barbara Stelzl-Marx, 《Stalins Soldaten in Österreich: Die Innensicht der sowjetischen Besatzung 1945-1955》(维也纳和慕尼黑: Böhlau Verlag 和 Oldenbourg Verlag, 2012 年); Filip Slaveski, 《苏联对德国的占领: 饥饿、大规模暴力和和平斗争, 1945-1947》(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约亨·赫尔贝克 (Jochen Hellbeck), 《斯大林格勒: 击败第三帝国的城市》(纽约: 公共事务, 2015 年); 或布兰登·谢赫特 (Brandon Schechter), 《国家的锅和士兵的勺子: 红军的口粮》, 载于《饥饿与战争: 二战期间苏联的粮食供应》, 编辑。

温迪·戈德曼 (Wendy Goldman) 和唐纳德·菲尔策 (Donald Filtzer) (布卢明顿: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98-157; 同上, 《政府问题: 1941-1945 年红军的物质文化》(未发表的手稿)。

²⁵ 欲了解文化历史对留守儿童力量的强大影响, 请参阅 Julie K. deGraffenried 的《牺牲童年: 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儿童与苏维埃国家》(劳伦斯: 堪萨斯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文化史,表达了“超越文化转向”的呼吁。²⁶ 本书的论点是,前进的道路之一就是不要放弃文化历史,转向其他东西,而是增强文化通过仔细研究描述性历史统计数据来分析方法。²⁷

从更经验的层面来看,斯大林的《叛逃者》也有助于关于苏联战争努力在苏联社会长期历史中的意义的争论仍在继续。²⁸

一位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记者认为,这场战争是苏联政权。²⁹它是否能够与一个先进的对手?苏联民众会团结起来支持政权的国防?斯大林政权将顺利通过第一场考验,为打败纳粹作出了所有盟友中最大的贡献。³⁰然而,第二点,记录就复杂得多。

事实上,这本书的发现推翻了历史学家的假设相信苏联公民从根本上忠于政权。

本书其余部分分析的数据是否支持那些学者的观点假设像科诺诺夫那样的反对派驱使着斯大林的大多数臣民。就苏联士兵的大规模投降而言,这是一次“全民公决”,正如一个有影响力的史学传统认为,这主要是反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苦难生活。³¹因此,本书的论点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只有少数族裔

²⁶ Victoria E. Bonnell 和 Lynn Hunt 编,《超越文化转向:新方向》社会与文化研究(伯克利、洛杉矶和伦敦: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威廉·H·塞维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和社会转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5年)。

²⁷ Pat Hudson,《数字历史:定量方法简介》(纽约和伦敦:阿诺德,2000年)。

²⁸ 最有用的长期分析是斯蒂芬·洛弗尔的《战争的阴影:俄罗斯和1941年至今的苏联》(牛津:Wiley-Blackwell,2010年)。

²⁹ 尤金·莱昂斯,《我们的秘密盟友:俄罗斯人民》(伦敦:Arco出版社,1954年),第十二章。“战争的严峻考验”这一比喻在四十年后被重新使用。得出与莱昂斯完全相反结论的历史学家:罗伯特·瑟斯顿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的生活与恐怖1934-1941(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第7章。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下面的第8章和第9章。

³⁰ 关于苏联战争努力的总体情况,请参阅埃文·莫德斯基的《东方雷霆:1941-1945年纳粹-苏联战争》(第二版,修订版)(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15年)。《论红色参战的军队,参见梅里代尔的《伊凡战争》。后方:约翰·巴伯和马克哈里森,《苏联后方,1941-1945:苏联社会经济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和纽约:朗文出版社,1991年)。关于战争见维克多·切列帕诺夫,Vlast i voina:斯大林斯基机械化gosudarstvennogo upravleniia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莫斯科:Izvestiia,2006年);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斯大林:《独裁者传记》(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章;希拉·菲茨帕特里克著《论斯大林的团队:苏联政治中的危险岁月》(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章。

³¹ B. Nikolaevskii, Porazhencheskoe dvizhenie 1941-1945 godov i gen. AA 弗拉索夫(第1部分),《Novyi zhurnal XVIII》(1948):209-34,此处:212。

要么从根本上忠诚,要么极力反对。大多数人生活的世界并非两极分化。苏联人在这边,德国人在那边。而是为“我们”保留了第三种立场。大多数苏联民众既不站在“他们”(苏联人)一边,也不站在“他”(德国人)一边,而是评估谁能给他们带来最少的不幸。从根本上说,他们努力生存,正如第六章所示,大多数叛逃者也是如此。³²本书的最后一章基于这一诊断,探讨了它对苏联二战期间忠诚与不忠诚问题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家断言,斯大林政权之所以获得民众的压倒性支持,要么是因为该政权鼓励社会流动性,要么是因为官方意识形态包罗万象,以至于它塑造了普通民众的世界观,以至于他们无法或不愿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架去思考。另一些人则认为,人们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但这种不满情绪并没有转化为彻底的抵抗,因为一方面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另一方面是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战争,除了拿起武器自卫,人们别无选择。

如果我们将故意叛逃置于大规模投降的大背景下,作为不满情绪的一个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一小部分人强烈反对斯大林主义,以至于他们准备拿起武器加入敌人一方。其次,尽管许多人声称自己反对苏联政权,但大多数人并不希望采取这样的行动。第三,跨越前线的最大群体这样做的原因并非狭义的政治原因(第六章)。由于大多数成为战俘的人都处于我们极端案例的两极之间,这项研究支持了那些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生存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意识形态信念的观点。这或许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但并非所有卷入其中的人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

大多数叛逃者与其说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抵抗者、通敌者或叛徒,不如说是斯大林主义的难民:他们除了投降敌人,别无其他摆脱独裁和战争苦难的途径。他们逃往一个种族灭绝的政权,往往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甚至成为其罪行的帮凶,这构成了他们历史的道德模糊性。

³² 有关这场辩论的介绍,请参阅 Mark Edele 的《我们为何而战?》1941-1945年苏联战争努力中的忠诚》,《国际劳工与工人阶级史》第84卷,秋季刊(2013年):第248-268页。关于“我们-他们-他”的结构,请参见同上,《走向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文化史》,《批判:俄罗斯和欧亚历史探索》第15卷,第4期(2014年):第829-835页;以及 Oleg Budnitskii,《伟大的卫国战争与苏联社会:失败主义,1941-1942年》,《批判:俄罗斯和欧亚历史探索》第15卷,第4期(2014年):第767-797页。

三

因此,本分析的核心在于:为何斯大林的士兵在对德战争期间叛逃如此之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探究的现象,如果被调查的对象绝大多数已故,则更难探究。即使他们还活着,他们的记忆也可能受到过去几十年以及他们所处的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为了降低这种风险,本书综合运用了多种资料,其中一些与所涉行为同时发生,另一些则为回顾性资料,以重现那些拒绝为斯大林作战并因此经常协助纳粹的士兵的历史。

第一组记录来自德国档案。叛逃者越过前线后,遭到审讯,以便从这些昔日的敌人身上尽可能多地获取情报。德国人不仅对任何有关敌军的情报感兴趣,包括敌军的部署、武器装备、补给、士气、领导层以及苏联后方的生活;他们还想了解俘虏为何越过前线以及他们是如何越过前线的,以便学习如何最好地鼓励红军士兵投降。

德国审讯记录在重现叛逃过程、穿越前线的障碍和危险以及苏联士兵如何处置他们方面尤其重要(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些记录还能帮助判断叛逃者的社会、种族和年龄特征(第五章),并可作为推测叛逃动机的实证基础(第六章)。然而,解读这些记录需要极其谨慎。正如第三装甲集团军的情报官员在1941年夏天所指出的那样,对俘虏进行审讯可能会产生“错误的印象”,因为这些俘虏在经历了前线常常可怕的经历后,倾向于对苏联政权持强烈批评态度。³³这种危险甚至比这位军官预想的还要大。苏联叛逃者不可避免地会对俘虏者想听到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答案能让他们从此得到最好的待遇做出假设。正如一位特别敏锐的德国士兵在1942年3月所说:“我认为叛逃者说的是我们想听的话,他们编造故事是为了取悦我们。如果他们的

如果这些说法属实,那么所有俄罗斯人早就饿死冻死了。”³⁴

33

Panzergruppe 3Jc, "Lage in Weißrussland,14.7.1941", BA-MA RH 21-3/437,第 311 页,34

埃里希·库比(Erich Kuby),《我的克里格:2129 年塔根》(Mein Krieg)。第三版。(柏林:Aufbau,2010 年),237。

然而,战俘的判断并不总是正确的,而且每个叛逃者都同样擅长文化历史学家所说的“自我塑造”。

35一名情报官员沮丧地指出,战俘更有兴趣谈论让他们个人感动的事情(“情绪、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态度、粮食供应、对经济体系”),而不是提供他们感兴趣的证据。审讯人员最关心的问题(“战术情况的细节”)。如果不加以制止,这位目标明确的德国人抱怨说,囚犯们往往会表现出“无限的叙事”。36此外,正如第六章所示,叛逃者对于动机是什么的问题,绝不总是给出相同的答案。让他们承担跨越界限的巨大风险,而不是,因此,从理论上彻底驳斥这些来源,我收集并阅读了大量的资料,以便获得第一手资料深入了解所调查的现象。

来自德国档案馆的第二组数据是关于

战俘数量,尤其是叛逃者的数量。它们使我们能够重建现象的动态。它们构成了第2章还讨论了它们在更多方面的优势和劣势。这里足以说明战争后期的数据相当不错。然而,1941年正是历史学家们在如何解释投降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最大,数据非常零散毫无意义。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1941年的辩论无法最终解决。37

为了弥补1941年定量数据的缺乏和德国审讯程序的扭曲,我咨询了另外两个几套原始文件。其中一份是苏联审讯记录。在自1943年以来,警方逮捕了数十万人,原因是他们通缉与占领者。38这些调查以令人惊讶的专业水平进行,审判记录包括所有最终定罪的审讯。今天位于俄罗斯安全局(FSB,前身为KGB)的档案,这些文件研究人员无法获得。幸运的是,美国

³⁵ 两种不同的自我塑造方法,请参阅 Sheila Fitzpatrick 的《Tear Off the Face: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身份与冒名顶替》(普林斯顿和牛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及约翰·赫尔贝克的《我心中的革命:写日记》在斯大林统治下》(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

³⁶ 第二十六将军司令部。Armeekorps,“Tätigkeitsbericht Ic,1.6.1941-20.8.1941”,BA-MA RH 24-26/125,对开本 15。

³⁷ 另请参阅关于德国前线宣传的开创性研究,该研究还包括有关统计数据的最详细的现有讨论:Ortwin Buch-bender,《Das tönende Erz: Deutsche Propaganda gegen die Rote Armee im Zweiten Weltkrieg》(斯图加特:Seewald Verlag,1978)。

³⁸ 请参阅第7章。

大屠杀纪念馆博物馆 (USHMM)获得了来自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和中亚地区的数千份案件档案的缩微胶卷版本。这些档案在某种程度上与德军的审讯形成了对比,并花费了大量时间探究一名士兵是如何以及为何越过前线的。与德军的记录一样,这些档案不应被不加批判地解读。然而,它们也同样包含着许多惊喜。

通读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博物馆 (USHMM)保存的全部战争罪审判记录是一项耗时数十年的工作。不仅文件数量数千,每份都长达数百页。此外,许多文件 尤其是对我的项目最有用的审讯记录 都是手写的,这进一步拖慢了研究进度。因此,我不得不构建一个规模更合理的子集。在对这些记录进行了一些粗略的阅读后,我决定重点关注一系列所谓的“特拉夫尼基”(Trawniki)的审判 这些纳粹党卫军辅助人员在波兰同名城镇附近的一个集中营接受训练。大多数特拉夫尼基人在战争初期从战俘营中招募,因此他们对本研究颇具吸引力。

在这里,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他们如何与德国占领政策(大屠杀)中最糟糕的方面合作。³⁹相反,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描述自己最初被德国囚禁的情况。

鉴于这些人后来与纳粹种族灭绝者合作,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们特别积极地跨越前线。事实上,他们的经历展现了两种极端之间的连续性:一方面是被强行抓捕并抵抗,另一方面是主动投敌。战后被起诉的大多数通敌者并没有主动投敌。因此,我阅读这些文件的大部分内容都落到了本书未引用的背景中。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有时这些文件会提供关键信息。

我们能相信斯大林审讯官提供的证据吗?历史学家出于职业利益,有责任确保这些资料的准确性:毕竟,我们依赖历史文献,而希望利用如此庞大且尚未开发的资源,很可能会让评估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然而,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那些被指控犯有战争罪的人至少曾试图歪曲他们的故事,使其符合自己的观点。

³⁹ Konrad Kwiet,《特拉夫尼基》,载沃尔夫冈·本茨编《大屠杀词典》(慕尼黑:CH Beck,2002年),第235-6页;Sergei Kurdryashov,《普通合作者:特拉夫尼基卫队案例》,载柳比卡·埃里克森和马克·埃里克森编《俄罗斯:战争、和平与外交》(伦敦:Weidenfeld and Nicolson,2005年),第226-39页;Peter Black,《最终解决方案的步兵:特拉夫尼基训练营和莱茵哈德行动》,《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第25卷,第1期(2011年):第1-99页;以及Benz,Handlanger。

最少的劣势。投敌是一种罪行：叛国。处以死刑，或者在死刑已经废除的年代已被废除（1947-50年），其中有25年被关押在集中营。我们可以放心地假设嫌疑人可能会编辑他们的账户因此，如果他们有机会的话。即使是在自愿入学的情况下前线穿越时，我们需要保持怀疑态度：没有人能保证供词并非在胁迫下做出，尽管一些历史学家声称没有对嫌疑人施加任何身体压力。⁴⁰他们的最近的研究表明，评估过程得到了加强苏联检察机关的专业化，部分原因在于希望设立国际战争罪法庭。苏联当局知道，大恐怖时期伪造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

在英国或美国法官面前。因此，他们今年做了功课时间。此外，合作如此广泛，战争罪行犯案过程如此公开，因此相对容易找到证人或其他起诉受审人员的证据。斯大林的警察根本没有这次需要虚构犯罪和敌人。他们是真实的，而且已经行动了战争期间却不受惩罚。⁴¹

尽管如此，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嫌疑人受到压力，我们应该小心，不要过分强调这一点。与试验相比在纽伦堡或东京，苏联战争罪审判的被告通常承认了自己的罪行。⁴²仅凭这种情况就足以引起怀疑。此外，这些供词通常是在经过漫长的在监禁期间反复审讯。阅读大量在审判前收集的案件档案中，人们不禁注意到，在一次又一次的审讯中，被告承认的越来越多，收回之前的“谎言”。我们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审讯。协议本身也不能被理解为逐字记录笔录。它们是在审讯结束时起草的，并且他们肯定不会注意到被告是否殴打或其他虐待。⁴³

⁴⁰ 库德里亚绍夫，《普通合作者》。

⁴¹ Dieter Pohl, "Sowjetische Strafverfahren gegen Kollaborateure", in *Bewachung und Ausführung: Alltag der Täter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Lagern*, 编辑:安吉丽卡·本茨和玛丽亚·Vulesica (柏林:Metropol-Verlag, 2011), 101-10; Vanessa Voisin, *L'URSS contre ses* 作品:《L'Épuration soviétique》(1941-1955) (巴黎:索邦大学出版社, 2015)。

⁴² 亚历山大·普鲁辛，《把法西斯罪犯送上绞刑架！》：大屠杀和苏联战争罪审判，1945年12月至1946年2月，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17, no. 1 (2003): 1-30, 此处:15。

⁴³ 有关审讯与礼仪之间关系的详细描述，请参阅梅纳赫姆·贝京，《白夜：一个俄罗斯囚犯的故事》（伦敦：麦克唐纳，1957年），57-9。

此外,有迹象表明,身体压力偶尔

虽然这些可能使证据在(非斯大林主义的)法庭上不被采纳,但这种污染并不一定能排除它们

作为历史证据。仔细研究这些文件样本,比较他们对事件的描述与其他证据不符。研究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

尽管可能遭受酷刑,但事实是一致的。⁴⁴虽然我们不应该

然后仔细阅读这些资料,并尝试比较它们的叙述对于其他来源,如果我们立即否定它们,那就太愚蠢了。

最后一组资料是回忆录 那些确实跨越了

前线,以及那些留在前线的昔日战友们

苏联方面也目睹了叛徒的行径。回忆录是回顾性的

这些记载有时会被历史学家驳斥。批评家们写道,

“就像公交车站的骗子一样值得信赖”。⁴⁵我试图证明

其他地方也认为这是夸大其词。⁴⁶当然,回忆录很容易

由于人类记忆的反复无常、自我审查和审查制度的不稳定性,导致误解。彻头彻尾的谎言和伪造确实存在。大多数情况下,

然而,这些叙述并非伪造,而是歪曲的。使用回忆录

写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由不同的人

人让我们能够弥补个人的不足

叙述。这里使用的一些回忆录是在

苏联解体。其他的则是为抽屉写的

战争与戈尔巴乔夫改革之间的时间,但只出版了

从 1980 年代开始。还有一些是由西方人写的

战后逃离苏联的人。这些作品有时会出版,但更多的时候是以手稿的形式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巴赫梅-特夫档案馆,我在那里查阅了它们。它们可以

其中包括两组采访,一组是针对流离失所者进行的

第二次是在战后西方进行的,⁴⁷

苏联继承国和以色列。⁴⁸如果

如此截然不同的背景和时间段描述了类似的事件

⁴⁴ 戴安娜·杜米特鲁,《苏联战后调查和审判文件分析》及其与大屠杀研究的相关性》,载于《东方大屠杀:当地肇事者》

以及苏联的回应,迈克尔·戴维·福克斯(Michael David-Fox),彼得·霍尔奎斯特(Peter Holquist)和亚历山大·M·马丁(Alexander M. Martin)编(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2014),142-57。

⁴⁵ 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斯大林的愚蠢:二战初期的悲惨十天》

东部战线(波士顿和纽约:霍顿·米夫林公司,2005年),278。

⁴⁶ 马克·埃德尔,《斯大林主义社会 1928-1953》(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章

⁴⁷ 成绩单可在可搜索的数据库中获取:<http://hcl.harvard.edu/collections/hpsss/index.html>。今后,它们将被称为“哈佛苏联社会项目系统”,其中包含时间表、数量和案件编号。

⁴⁸ 文字记录可在 iremember.ru 获取。关于这些采访,请参阅 Seth Bernstein 的文章,“铭记战争,留住苏联:二战数字纪念”

普京的俄罗斯》,《记忆研究》9,第4期(2016年):422-36。

或行为模式,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它们指的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情。此外,将这些来源的图像与基于德国和苏联审讯记录的图像进行对比,也能纠正所有这些图像的扭曲。

我为本书所做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这四类“骨干资料”回忆录、访谈、德国档案文件和苏联战争罪审判记录。相反,我尽可能地扩充了我的资料库。因此,本书会不时参考已出版的前线信件集、日记、官方通讯49、“反苏动乱”的“审查案例”、遣返报告⁵¹,或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Dmitrii Volkogonov)的文件中收录的军事档案文件。苏联军事记录是一个我未能利用的丰富资料来源。虽然波多利斯基的俄罗斯军事档案馆曾正式开放供研究,但现在实际上已不再对外国人开放。在当今的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成为定义国家的神圣⁵⁰神话,这种立场显然对严肃的历史研究产生了不利影响。

四

资料来源是一回事,分析又是另一回事。问题始于词汇的匮乏。英语中没有这个词可以形容本书所探讨的现象:叛逃到敌人那里。

最接近的名词是“defection”和“defector”,它们可以用作“desertion”和“deserter”的同义词,但通常用于描述从共产主义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

牛津英语词典收录了动词“to definitiv” (叛逃)的这种用法,但没有收录其相关名词。为了扩展其含义,我使用这些词来描述“叛逃到敌人那里”,同时限制“deser-tion”、“逃兵”和“to desert”的用法,如果未加其他限定词,则仅限于指离开武装部队进入苏联控制的腹地,或溜走而不向德军投降。

与英语不同,德语和俄语中都有名词来描述本书所说的“叛逃”。它们的字面意思都是

⁴⁹ 包含在多种已出版的合集中,其中最著名的是多卷系列《Russkii Arkhiv/Velikaia Otechestvennaia》,由VA Zolotarev 编辑(莫斯科:Terra,1993-2001年)。此后引用为 RA/VO 并附带卷号。

⁵⁰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GARF),档案 A-461(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院)。

⁵¹ GARF f. R-9526,遣返事务委员会。

翻译过来大致相同。在德语中,自愿越过前线的人被称为“Überläufer”(逃亡者),在俄语中则被称为“perebezhchik”(跑过前线的人)。虽然很难给出明确的定义,但德国人和俄罗斯人似乎都能凭直觉判断哪些人是战俘(Kriegsgefangener,voennoplen-nyi),哪些人是叛徒(动词)。当然,德国人也发展出了一个正式的定义,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该定义试图区分普通战俘和故意叛逃者。

事实上,尽管德国的定义非常明确,但俘虏和叛逃者并不容易区分。如果我们先构建一个理想类型,然后将其与复杂的前线现实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其中的复杂性。其中一个极端是典型的“俘虏”。这类士兵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使用任何可用的冷武器继续战斗,只有在严重丧失行动能力、昏迷或身负致命伤时才会放弃。这种理想类型确实存在,也是苏联领导层向士兵们宣传的典范,但士兵不太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幸存下来。因此,根据定义,大多数成为战俘的人并没有达到这种超人的理想境界。同时,大多数人也不符合典型的“叛逃者”的理想境界。另一个极端情况是,他们或多或少地完全控制了自己的处境,有意识地决定投奔敌人,放下武器,举起双臂,穿过前线。同样,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他们幸存的可能性也并不大,因此,正如第四章所示,这种情况相对罕见。因此,大多数投敌逃兵的状况介于理想的典型俘虏和理想的典型叛逃者之间。

最后需要做出一个区分。叛逃者不一定是“合作者”。虽然有些人自愿越过前线是因为他们想加入德国对抗苏联的战斗,而其他人后来要么自愿要么被迫与德国人合作,但自愿逃兵与与纳粹合作之间的联系并非必然。正如第七章所示,叛逃者在德国集中营中经常与其他战俘一样面临同样致命的生存环境,许多人最终未能幸存。其他人则决心保命,越过战火前线,并将继续努力避免参与任何一方的战争。因此,本书在日益增多的关于苏联公民与德国占领者合作的文献中,只能算作边缘之作。它探讨的是一个相关但相对独立的现象。

五

科诺诺夫确实成为了纳粹的合作者,尽管他本人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把自己定位为与德国暂时结盟的自由战士。纳粹战败后,他试图继续寻找新的盟友。1950年,杜尔舍尔斯将科诺诺夫的履历寄给澳大利亚总理,称其为“唯一能够粉碎、摧毁并推翻克里姆林宫苏联政府的人”。⁵²罗伯特·孟席斯肯定会利用这位伟大的民主人士,为国家应对二战做好准备。随附的备忘录警告说:“大量移民涌入澳大利亚。有必要清除这些人,让他们成为苏联特工。”正是在这种极权主义心态的展现下,“阿塔曼”和他的朋友们宣誓要战斗,“被清洗的群众”随后将“在澳大利亚政府的领导下组织成一个强大的反共集团”。最终,这个“集团”将涵盖“所有斯拉夫人……并立即开始对群众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以应对反苏战争”。⁵³ 53 无论是否冷战,陆军部都不感兴趣。首先,无法确定“这位先生的背景是否如其所称”,因此无法授予安全许可。其次,如果他的故事属实,他对红军的了解也已经过时,“因此价值不大”。陆军部建议,应该将此人留作后备,以备“战事发生时”,届时“可以利用他组织苏联战俘,为解放俄罗斯领土服务”。这个问题关乎政治,其中,对他履历的证实将是一个关键因素”。⁵⁴ 54 如今我们所知,这一天从未到来。无论他和他的朋友们如何评价自己的成就,他的传记最终都是失败和无关紧要的。然而,在1941年8月22日,当他试图通过反对斯大林来创造历史时,他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他当时的言行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为复杂的历史时刻。

本书的任务就是重建科诺诺夫以及许多与他相似和不同的人跨越前线加入希特勒军队的背景。

⁵² 杜尔斯彻斯致孟席斯,1950年9月15日,NAA,MP742/1.115/1/437。

⁵³ “科诺诺夫将军是谁以及他的能力是什么”,同上。

⁵⁴ PH Sinclair,陆军部部长(1951年5月),同上。

2

数字

我

有多少苏联士兵叛逃到德国?文献中充斥着模糊的陈述。“在东线战役的头三周内”，一篇关于德国占领政策的经典论述写道，“德军俘虏了约32.3万名红军士兵,其中包括大量逃兵。”¹有时会给出精确的数字,但没有说明其来源。²一些学者根据个别数据得出结论,叛逃现象在整个战争期间可能在苏联士兵中普遍存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是正确的。³另一些人则竭力降低苏联战俘中“叛徒”的比例。VP·诺莫夫注意到,中央集团军群有36个营地,每个营地关押着约1500名战俘,只有两个营地专门为特权叛逃者群体保留,每个营地收容了200至400人,他得出结论,叛逃到敌方的比例“不超过1.4%到1.5%”。

4我们将会看

到,这个数字太低了,因为将叛逃者与俘虏分开的政策直到1942年才开始实行。即使在1942年之后,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中看到的那样,叛逃者仍然经常被关押在普通战俘营中,

¹ Theo J. Schulte,《德国军队和纳粹在占领俄罗斯的政策》(牛津和纽约: Berg, 1989),187.斜体字是我加的。

² 据约阿希姆·C·费斯特(Joachim C. Fest)称,截至1941年7月11日,“已有近60万名俄国战俘落入德军手中,其中包括7万多名逃兵”。文中未提供脚注。参见他所著《希特勒》(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译,伦敦: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74年),第651页。阿隆·施内尔(Aron Shneer)所著《全苏维埃战争与日耳曼战争》(Plen. Sovetskie voennoplennyye v Germanii, 1941-1945,莫斯科和耶路撒冷:Mosty kultury, Gesharim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指出截至1941年底,叛逃者人数已超过10万人。他的脚注指向BV Sokolov的《Tainy Vtoroi Mirovoi》(莫斯科:Veche, 2001年),第311页,其中正确地指出没有1941年的数据。

³ 克里斯蒂安·哈特曼(Christian Hartmann),《东线国防军:前线和军事腹地》,1941/42.第2版。(慕尼黑:R. Oldenbourg Verlag,2010),550,参考Joachim Hoffmann,“Die Kriegführung aus der Sicht der Sowjetunion”,载于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and 4:Der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编辑。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斯图加特: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83),713-809,此处:727。

⁴ VP Naumov,“Sud ba voennoplennykh i deportirovannykh grazhdan SSSR: Mate-rialy komissii po reabilitatsii zhertv politicheskikh repressii”,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a 2 (1996):91-112,此处:92。

尽管条件优越。而且,即使我们接受这个较低的数字,与国际水平相比,这个比例仍然非常大。

认为人数众多和认为人数较少的人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西方”学者和“俄罗斯”学者。俄罗斯历史学家提供的数字比诺莫夫要高,尽管他们没有说明来源。BV索科洛夫在1991年首次发表在报纸上,后来在2000年的论文集中重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41年的数据缺失,并给出了以下统计数字:1942年下半年有61,000名叛逃者,1943年有24,000名,1944年前三个月有2,200名。他声称没有1945年的数据,但“即使在1945年3月的奥得河,当没有人再怀疑希特勒的失败时,仍有18名苏联士兵叛逃到德军防线”。⁵虽然1945年的统计数据尚可,而且这些数字并不完整,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它们的数量确实比诺莫夫承认的要多得多。

如果诺莫夫和索科洛夫有机会阅读恩斯特·布赫宾德(Ernst Buchbender)关于德国前线宣传的专著,他们就能接触到迄今为止对叛逃问题最详尽的探讨。布赫宾德记录了1941年及之后鼓励叛逃的协同努力,这是“德国在东线宣传的最重要主题”。为了评估其有效性,他详细讨论了1942年的统计数据,这是最早统计出叛逃人数的年份。在其他出版物中,他还补充了1943年和1944年的总数。⁶

与这项研究相反,布赫本德对叛逃者统计数据如何反映苏联方面的情况并不感兴趣。相反,他询问

⁵ BV Sokolov,《俄罗斯合作主义》,载于《第一小世界》(莫斯科:Veche,2001年),第310-23页,此处:311。本文分两部分发表于《独立报》,1991年10月29日和1992年2月20日。此处引用的部分发表于1991年。

⁶ 他给出的1942年5月至12月的死亡人数统计,有“79,769”和“79,319”之分,但未提供来源。Ortwin Buchbender,《十个二等德意志宣传在二战中对抗红军》(斯图加特:Seewald Verlag,1978年),引文71,编号:210,215。1942年的死亡人数统计源于德国陆军宣传部门1943年发布的一份关于传单宣传的报告,该报告按月列出了5月至12月的数据,总计79,319人,不包括7月份的南方集团军群。参见BA-MA RW 4/263。

Buchbender已经在较早的出版物中引用了这些统计数据(总数为“79,319”),该出版物也按月份进行了细分,但仅以非常笼统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背景介绍:Heil Beil! Flugblattpropaganda im Zweiten Weltkrieg:文献和分析(斯图加特:Seewald Verlag,1974年),50,210 n. 87。他还提供了各种数字来衡量几次宣传活动的影响,包括1943年(26,108)和1944年(9,207)的总数:Das tönende Erz, 245, 246, 257。在后来的出版物中,布赫本德重复了他之前写的大部分内容,还引用了(无脚注)1943年和1944年的总数(无脚注)。1944年:《Die Waffe, die auf die Seele zielt: Psychologische Kriegführung 1939-1945》(斯图加特:Motorbuch Verlag, 1983),120-4,编号:120。

表 2.1. 1942-1945 年的战俘和叛逃者

	战俘	叛逃者	脱北者比例 (%)
1942年	1,653,000	79,319	4.80
1943年	565,000	26,108	4.62
1944年	147,493	9,207	6.24
1945年	33,110	2,015	6.09
全部的	2,398,603	116,649	4.86

注:达林 1944 年和 1945 年的战俘人数与 BA-MA 来源列出的人数一致 (东部外国军队),只有他的数字四舍五入到千位。这里的 1945 年数据仅为 1 月 1 日至 4 月 10 日; 1942 年的数据仅为 5 月至 12 月,不包括 7 月南方集团军群的数据。因此, 1942 年的脱北者人数和当年脱北者的比例是下限。

资料来源:1942-1943 年战俘数据:亚历山大·达林,《德国在俄罗斯的统治:1941-1945》。占领政策 (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57 年),427 n. 2; 1942 年叛逃者:BA-MA RW4/264;1943 年叛逃者:BA-MA RH 2/2624,第 2 页,第 42 页;1944-5 年 (战俘和叛逃者):RH 2/1926 和 RH2/2633k。

这些数据不足以得出关于有效性的结论 (并且缺乏其中)是德国宣传努力的一部分。本章利用它们来稍微不同的目的。这是自布赫本德开创性地复制和详细检查统计数据以来最完整的尝试。

德方收集的份额以及绝对数量

苏联叛逃者。1942 年的数据质量相对较好,尽管分类和数据收集方面的一些系统性问题。1941 年,然而,档案中缺少系统性的数据。中央当局没有兴趣收集这些数字,并且在 大锅之战会计工作甚至在单位正常情况下也出现故障 有兴趣区分俘虏和逃兵。我们 可以用几组部分数据、定性描述来弥补, 苏联的估计和其他替代数据。压倒性的证据支持这一结论:1941 年,很大一部分士兵越过了 自愿。即使在战争后期,叛逃者的比例 战俘中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其他情况,徘徊在 在整个过程中保持在 5% 到 6% 之间 (表 2.1)。

二

统计数据和任何资料一样,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它们并非直接且对过去的直接重建,但对某些事情的征兆过去发生过。有人必须决定要计算哪些类别,每个类别中应包含哪些内容,以及应将这些内容组织到哪些子集中数据。历史学家虽然能够操纵一些数字,但

受制于原始数据集的历史建构者。尽管存在诸多困难,历史学家仍会忽视统计数据,后果自负。任何历史学家都不能不进行统计估计(即使这些估计像“许多”、“大多数”或“少数”这样不精确)。除非我们运用现有的数据,尽管它们可能存在问题,否则我们只会重现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

对于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组统计数据:德军俘虏的战俘人数;以及其中逃兵的人数。前一组数据相对来说没有问题,因为尽管后勤保障存在问题,但统计俘虏人数并将这些数据上报给上级指挥部还是相对容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几组数据作为基准来计算其中的逃兵比例。首先,有两个主要的德国系列数据,一组包含在德国总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门东部外国军的持有中,由亚历山大·达林于1957年首次引用。⁷该来源显示战俘人数略低于580万,其中1941年有340万(表2.2)。第二组数据最近由Rüdiger Overmans和Andreas Hilger出版。这是基于不完整的德国国防军统计数据进行的重建,因此总数略低。⁸第三,苏联人自行估算了战俘损失人数。他们的估算低于1941年至1945年德国的两个系列数据,这一差异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少报,另一方面是由于德国习惯将某些平民视为战俘。对我们在此讨论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数据偏向1941年,导致1942年至1945年的总数介于两个德国数字之间。⁹在计算1942年至1945年战俘中叛逃者的比例时,我使用了达林的数据。

⁷ 亚历山大·达林,《德国在俄罗斯的统治:1941-1945》。职业政策研究(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57年),427 n。2,530万,其中1941年为340万。“Statistik der

⁸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genen in deutschem Gewahrsam”,载于德国手Rotarmisten: Dokumente zu Gefangenschaft,Repatriierung und Rehabilitierung sowjetischer Soldat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编辑: Rüdiger Overmans,Andreas Hilger 和 Pavel Polian (帕德博恩:Ferdinand Schöningh,2012),863-5。该表的特点是数据内部极度不连贯;几乎所有总数都是根据部分数据重新计算的。

⁹ 苏军总兵力为455.9万人,其中战争上半年损失了243.59万人。施尼尔,普伦,95-9;苏联数字:96.107。关于被拘留为战俘的平民,例如,参见 V. Samarin, Grazhdanskaia zhizn pod nemetskoi okkupatsiei, 1942-1944, in Svershilos .普里什利 nemtsy! Ideinyi kollaboratsionizm v SSSR v period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编辑: OV Budnitskii (莫斯科:Rosspen,2012),229-319,这里:253。另见 Dieter Pohl, Die Herrschaft der Wehrmacht: Deutsche Militärbesatzung und einheimische Bevölkerung in der Sowjetunion 1941-1944 对差异原因的讨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ischer,2011),201-2。他估计,德国登记的战俘中有15%至20%是平民或红军以外其他机构的成员;同上。240。

表 2.2. 被德军俘虏的苏联人（“达林数据”）

	捕获数量占总数的百分比		累计	增长指数
1941年	3,355,000	58	3,355,000	58
1942年	1,653,000	29	5,008,000	87
1943年	565,000	10	5,573,000	97
1944年	147,000	3	5,720,000	99
1945年	34,000	1	5,754,000	100
全部的	5,754,000	100		

来源:亚历山大·达林,《德国在俄罗斯的统治:1941-1945.占领政策研究》(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57年),427 n. 2。

外国军队东部的产量越高,返回的份额就越小。叛逃者的数量,从而对相对规模做出了更为保守的估计。比使用任何其他基准时更能体现这一现象:4.9%的战俘中叛逃者占比(达林,见表 2.1),而战俘中叛逃者占比为 5.5% (苏联统计)甚至 6.2% (Overmans 和 Hilger)。

叛逃者 (Überläufer)的数量也带来了问题。我们在上一章讨论过,但并不清楚俘虏和逃兵之间的界限往往在于混乱的现实战场。德国军方确实制定了明确的定义:谁应该被算作“优等生”,谁不应该被算作“优等生”,但它留下了充足的解释空间:

要识别叛逃者,关键在于叛逃者的行为方式,明确表明投降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了解德国传单上可能喊出的“密码”。在战斗中或在德国领土内投降的敌军士兵被控制 (Machtbereich)的人不应被理解为叛逃者。¹⁰

这一定义于 1942 年发布,为部队的行动提供指导。1941年,叛逃者和俘虏之间的区别是自发产生的。在地面上,但没有齐心协力收集数据或中央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指导方针。叛逃者往往被视为俘虏并得到相应的待遇。¹¹尽管有大量宣传鼓励叛逃,但敌军并不是注意力。重点是快速、凶猛且成功的战役。

情况从 1942 年开始发生变化,当时行动失败。巴巴罗萨行动要求重新调整战争力量。正如最高

¹⁰ Buchbender, Das tönende Erz, 71. 引用: 9. Jd, Nr. 307/42 呢。(1942年8月28日), BA-MA RH 26-9/90。

¹¹ 布赫本德,《Das tönende Erz》,92。

国防军司令部于 1942 年 3 月 24 日下达了这一命令,可怜的迄今为止,对叛逃者的待遇已经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从

从现在起,每个叛逃者都会收到一张纸条,确认他已经自愿投降,并承诺给予优待。他们将与其他战俘分开,并得到更好的待遇

住宿、食物和工作。¹²这种变化的背景是一次新的、更积极的尝试,利用前线宣传以增加脱北人数。这种努力将军事领导层担心,如果投降的人自愿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他们所享有的优惠待遇承诺。因此,新法规试图建立一个整个自愿自首的特殊制度。¹³

人们希望新的程序能够抵消负面影响
二战期间德军对战俘的野蛮对待
巴巴罗萨。戈培尔在 1942 年 4 月 24 日指出,“布尔什维克”听说过在我们国家,有人被处决、被冻死、受到虐待战俘营,因此害怕被德国监禁。¹⁴
因此,我们发布了新的指示,以便更好地治疗苏联战俘和逃兵待遇的区别以及真正的囚犯。¹⁴第一套指导方针引起了分歧
1942 年 3 月下旬,第二批
4 月 22 日和 24 日。¹⁶试图了解此类活动的效果
需要收集按照
德国的提示,使得战争后期的统计数据相当不错。

然而,分类问题仍然存在。前线部队在决定承认谁是叛逃者方面有很大的自由以及哪些人不应该填写:他们应该填写表格,或者没有表格可以给战俘留下手写便条,确认他已经自首。这张纸是核心文件将苏联战俘归类为叛逃者,因此把他的案子加到“优步”名单里。在现实的前线战斗中,

¹² 国防军上尉,“Behandlung sowj”。克尔·杰夫。(1942 年 3 月 24 日), BA-MA RW 6/272,对开本 3-3 反面。

¹³ 参见 Oberkommando des Heeres,“Behandlung von Überläufern”(1942 年 3 月 7 日), BA-MA RW 6/276,第 11-12 页。

¹⁴ L. P. Lochner (编),《戈培尔日记》(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48 年),132。

¹⁵ 1942 年 3 月 21 日,这些新规定由 21 ID 的 Ic 传递给分区及以下:BA-MA RH 26-21/47,第 45 页。1943 年 5 月 14 日,打印出来的简化版本再次由 21 ID、Ic 向下级部门发送:BA-MA RH 26-21/100,第 342 对开页。

¹⁶ 18 ID (mot),Abt. Ic,“Tätigkeitsbericht Ic,1.1.1942-30.4.1942”,BA-MA RH 26-18/59,Anl. 150。

当然,在

第一章 俘虏与逃兵 极其模糊。

在实践中,携带一张作为通行证的德国传单 (Passierschein) 通常被视为自愿被囚禁的证据。¹⁷

问题是,保留这样的传单是违法的,因此对苏联士兵。“任何捡传单的人都会被枪毙”,叛逃者声称 1941年7月调至第299步兵师第528步枪团。¹⁸

“突击控制阵地,搜寻德国传单”

1941年8月,在前线的另一个区域。“传单持有者凡是得到许可的人,一律枪毙。”¹⁹这种残忍行为已经超出了当地的习俗。斯大林的执行官拉夫连季·贝利亚于1941年8月30日下令逮捕任何持有“法西斯传单”的人,都可以成为前往敌人。²⁰以及中央政治局主席 A. Shcherbakov

红军在1942年8月指出,“阅读和保存法西斯文学”,即使这些传单只是被“当作卷烟纸”,²¹ 等同于‘反革命宣传’罪。

此外,并不是每个能在被捕的那一刻被认定为合法的前线越境者德国士兵。苏联红军士兵在一次战斗后投降。攻击到达德军战壕后,他们通常被归类为正常俘虏:他们不是自己越过界线的,而只是服从命令进攻。²²德国前线士兵也经常拒绝当一群人最初反击时承认投降,但最终放弃了,直观地理解捕获和背叛,这在前面引用的定义中已经形式化了。假设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德国的军事优势该国已被迫投降,因此不具备特殊地位。

¹⁷ 有关德国鼓励叛逃的宣传传单的例子,请参阅 BA-MA RH

21-3/782.18

¹⁸ 299. ID, Gefangenenernehmung (1941年7月14日), BA-MA RH 24-17/171, 第37页。类似报告: Generalkommando XXIII. AK, Ic, 30.7.41, BA-MA RH 24-23/239, 第66页。

¹⁹ 第3装甲集群, Ic: Feindnachrichtenblatt Nr. 18 (8.8.1941), BA-MA RH 26-18/56. 其他案例另请参阅 Hartmann, 《Wehrmacht im Ostkrieg》, 505-6。

²⁰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指令 SSSR NO. 第597章 izmeny Rodine v chastiakh Krasnoi Armii (1941年8月30日), 重印于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sopasnosti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斯博尼克文献。Tom vtoroi, Kniga 1: Nachalo 22 iyunia-31 avgusta 1941 goda (莫斯科: Izdatel'stvo Rus', 2000), 555。

²¹ A. Shcherbakov, 关于在部队中开展敌方宣传的第8号指令, 12 1942年8月, 重印: Glavnye politicheskie Organy Vooruzhennykh sil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1941-1945 gg., 实质性文件 [= RA/VO 卷。17-6 (1-2)] (莫斯科: Terra, 1996年), 159-60, 此处: 160。

²² Dulag 126. AO./Kgf., Betr.: Kdf-Vernehmung, 1943年12月22日, BA-MA RH 20-4/780。

斯大林的叛逃者

因此,德军关于叛逃者的数字存在偏差。然而,偏差体现在一个方面:他们没有动机夸大叛逃者的数量。负责对岸宣传的人(他们可能有动机夸大数量,以显示自己工作的成功)与抓捕战俘并在俘获时对其进行分类的人不同。后者大体上是前线部队,对他们来说,动机显然与这种分类相悖:被认定为逃兵的苏联士兵会得到更好的待遇,与其他战俘分开,获得稀缺的补给,并且比其他人更舒适、更快速地运送。换句话说,他们对已经在恶劣条件下苦苦挣扎的前线士兵来说是一个额外的负担。²³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尤伯劳夫”的德军人数是下限:还有更多人,他们要么计划穿越前线,要么主动寻求穿越,但要么从未成功,要么没有被俘虏者认出来。就像使用德军而非苏军的战俘人数统计一样,这种数据倾向性使得下文计算的战俘比例偏保守,从而避免了第八章所说的“一厢情愿的统计思维”。他们的百分比很可能要高得多。

三

对于量化历史学家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德国数据集中的第二个异常:没有1941年的整体叛逃者数据。并非战争初期没人在意区分,而是没有要求将这些数据上报给上级指挥层。²⁴因此,数据收集工作杂乱无章。虽然各集团军、军或师的记录中都有很多数字,但我找不到一个数据集能够提供连续的、可比较的统计数据,包括战争前半年的数据。即使是通常收集这些数据的前线部队,也很快被苏联投降的庞大规模所淹没。在1941年的激战中,俘虏和逃兵之间的区别——一直以来都有些模糊——完全消失了。

举个例子,第3装甲集团(1942年起:第3装甲集团军)从1942年开始就将战俘人数和叛逃者人数分别列为不同的类别,这使我们能够计算出所占比例

²³ 参见 Oberkommando des Heeres, “Behandlung von Überläufern” (1942年3月7日), BA-MA RW 6/276,第11-12对开页。

²⁴ 例如,请参阅 BA-MA RH 2/2638 中有关1941年战俘人数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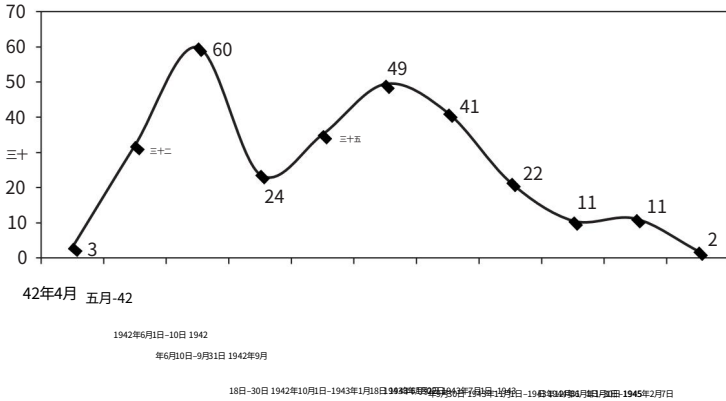


图2.1. 第三装甲集团军战役中叛逃者的比例 (%)

资料来源:BA-MA RH 21-3/779,第 9、16 对开; RH 21-3/780,第 28 对开页; RH 21-3/785,第 42 对开页; RH 21-3/456,第 95 对开页; RH 21-3/476,第 33 对开页; RH 21-3/489,第 39 页; RH 21-3/499,第 49 对开页; RH 21-3/542,第 13 对开页。

后者在所有战役中所占比例较高(见图表 2.1)。然而,1941 年并没有做出这种区分。25 第十七军是另一个例子。作为第

六集团军的一部分,它于 1941 年随南方集团军群进入苏联。在情报官员当年的记录中,提到第一位叛逃者是在 6 月 24 日。从那时起,不断有叛逃者涓涓细流,有时甚至汇成一条溪流。与此同时,消息来源还继续注意到另一个极端:苏联军队其他部分的战斗非常坚决。6 月 25 日,50 名苏联人“举起武器自愿投降”。7 月 5 日,该军官注意到“叛逃者人数增加,他们离开部队向我们走来”,后来提到“66 名叛逃者,部分人带着传单”。第二天出现了“新的叛逃者”,“其中有几个人出示了德国传单,保证善待战俘”。同一天,统计到“33 名叛逃者”。7 月 7 日,第 62 步兵师报告有 14 名叛逃者,陆军军团报告有“52 名叛逃者”;7 月 8 日,第 56 步兵师接收了 17 名自愿战俘,第 62 步兵师第二天接收了 16 名,第三天,由于没有发生战斗,又有 3 人投奔了

²⁵ 我阅读了这个装甲集团军情报官 (Ic) 的全部资料,共计 BA-MA RH 21-3 中的 26 个文件。

斯大林的叛逃者

陆军军团。1941年7月10日上午,情报官员简洁地报告:“没什么可报告的。62名叛逃者。”²⁶我们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要点应该已经很明确了:1941年夏

天,尽管没有中央为此制定的政策,但德国部队确实非常关心叛逃者,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单独报告他们的人数。

此外,这种投降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通常,整个队伍都会投降。然而,与此同时,报告也不断提到艰苦的战斗和顽强的抵抗:士气低落和失败主义与组织严密的抵抗和坚决顽强的战斗并存。²⁷虽然报告中包含了大量数字,但它们通常不报告战俘中叛逃者的比例。典型的是1941年8月11日该军情报官员向陆军司令部提交的报告,其中包含一个毫无意义的统计数据:有“860名战俘和叛逃者”。²⁸同年晚些时候,有时每日报告中会提供叛逃者的比例(从10%到100%不等),但这种报告过于随意,无法得出系统的结论。

在一场大规模的熔炉战中,陆军军团在9月11日至25日之间俘虏了65929名战俘,这种区分已经无法再进行了。²⁹因此,即使在陆军军团和集团军层面,也没有1941年的系统数据,更不用说整个

德国东部战线的数据了。直到1942年,情况才有所改变。当时,大包围圈结束,俘虏的人数减少,并且开始采取一致行动鼓励越线逃兵。到1942年上半年,各集团军开始向其集团军群和“东部外国军”(Fremde Heere Ost,德国军事机构内的中央情报单位)³⁰报告战俘和逃兵的数量,后者负责全年统计,但没有按月细分。³¹东部外国军开始系统地、集中地收集逃兵的数量和比例。

²⁶ 第十七 AK 将军,Abt. Ic: “Der Feldzug gegen die Sowjet-Union (1941)”,BA-MA RH 24-17/155,第 85-223 对开页。

²⁷ 关于失败主义和决心的这种二元性,另见一位德国指挥官的观察:约翰内斯·赫特尔 (Johannes Hürter) (编),《东线的一位德国将军:哥达·海因里希的信件和日记,1941-1942》,克里斯汀·布罗克斯 (Christine Brocks)译 (巴恩斯利:Pen & Sword,2014 年),例如第 73-74 页、第 95-96 页 (1941 年 7 月 30 日、8 月 1 日、8 月 3 日、10 月 23 日)。

²⁸ 第十七 AK 将军,Abt. Ic: “Der Feldzug gegen die Sowjet-Union (1941)”,BA-MA RH 24-17/155,第 85-223 页,页码:92, 97, 127, 128, 129, 133, 134, 135, 216, 29

第十七 AK 将军,Abt. Ic: Der Feldzug gegen die Sowjet-Union (1941 年) (1941 年 8 月 21 日续),BA-MA RH 24-17/156,对开本 65。

³⁰ 例如,Armeoberkommando 9 to Fremde Heere Ost and Heeresgruppe Mitte (Ic),1942 年 6 月 4 日,关于 1942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期间的“Gefangene und Überläufer”,BA-MA RH 2/2639,第 115 页。

³¹ BA-MA RH 2/2624,对开本 1。另请参阅表 2.1。

1943年只有战俘。³²德国军事机构的其他部门早些时候就开始收集数据,这意味着从1942年5月开始,我们就有相当准确且内部一致的数据。³³

四

因此,1941年对于量化历史学家来说仍然是个谜。然而,我们不必沉溺于猜测。前线双方都对这一现象的规模进行了观察。首先,我们有一份关于越过前线的集体逃兵的苏联报告。这份报告肯定低估了实际数字,因为它忽略了个人逃兵,也因为1941年的混乱中,成功越过前线的情况并不总是能引起苏方的注意。这份报告还包括被安全部队或军事指挥部阻止的集体逃兵的数量。因此,与德国数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份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估计逃兵被阻止程度的方法。

根据这份报告,自战争爆发至1941年12月初,西部、西北、南部和西南方面军(即各集团军)内安全部门的特别部门报告了102起集体逃兵事件,涉及1944人;另有159个集团军(共1874名士兵)以及另外2772名个人逃兵被阻止。报告指出,这些数据“不完整”。

三十四

我们可以从这份报告中得出三个结论。首先,成功越过前线的尝试次数至少应该增加相同数量,甚至可能是两倍。正如第三章和第四章更详细地表明的那样,越过前线并非易事。仅仅有叛逃的愿望是不够的。其次,相当一部分逃兵是集体行动——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再次讨论。第三,我们知道1941年至少有1944人越过前线逃兵。这相当于同期德军登记在册的所有战俘的0.06%(见表2.2)。事实上,很可能实际数字要高得多。问题是:高多少?

³² 参见 BA-MA RH 2/2640 中的数据。东部外国军队用于编制这些统计数据的预印统计表自 1943 年 7 月 5 日起生效。例如,参见 BA-MA RH2/2633k 和 RH2/2635k。

³³ 布赫本德,《Das tönende Erz》,207。

³⁴ AG Bezverkhny, SMERSH: Istoricheskie ocherki i arkhivnye dokumenty (莫斯科: Izdatel'stvo Glavarkhiva Moskvy, 2003), 26-7。

1941 年的估计数字在数万到数以百万计。这个范围的下限不太可能是正确的。仅一家宣传公司就声称 1941 年就有 12,000 名叛逃者。³⁵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战役（6月22日至7月3日）的尾声，国防军报告称 4 日有 20,000 名士兵叛逃（übergelaufen）7 月，又有一批 52,000 人被关押，第二天又有一批，36 共占有囚犯的近四分之一。³⁷

如果我们应用战争初期以后的份额。这种方法再次得出了相当保守的猜测，因为反对背叛的动机 1941 年的比例明显低于后来。如表 2.2 所示，自保人员的流失率在 4.6% 至 6.2% 之间 1942 年至 1945 年。以这些百分比为指导，我们必须假设 1941 年至少有 134,000 人（335 万人的 4%），更有可能的是，有 201,000 人（6%）叛逃（见表 2.2）。如果我们取以第 3 装甲集团军的经验为指导，这个数字甚至可能更高。如图 2.1 所示，脱北者的比例在 2% 和 60%，适用于 1941 年囚犯人数，将介于 6.7 万到 200 万之间！³⁸

此类计算假设 1941 年的份额不低于以后的岁月。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前提，我们仍然必须承认，至少数千（来自苏联报告的数字），更有可能是数十数千人（1941 年当地报道）越过前线 1941 年的自愿行为。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假设，即份额很可能至少与后来的水平相当，因此他们的数量更有可能是数十万，不太可能是数百万（详情见表 2.3）。因此，科诺诺夫少校和他的 1941 年，男人并不孤单。

得出叛逃人数众多的结论并非基于一厢情愿

统计思维。它以本地和定性数据为支撑。德语消息来源经常报道大规模叛逃事件。³⁹德国国防军部队注意到他们的俘虏中有相当一部分，有时大多数是志愿者。例如，1941 年 7 月 12 日，德国 299

³⁵ 布赫本德，《Das tönende Erz》，288。

³⁶ 请参阅《Die Wehrmachtberichte 1939-1945》第 3 卷中的 1941 年 7 月 5 日和 7 月 6 日的报道。（慕尼黑：dtv，1985 年），第 1 卷：606.609。

³⁷ 此战俘虏总数 289,874 人。参见 Tagesmeldungen der Heeres-米特集团，1941 年 7 月 8 日，BA-MA RH 19 II/128，第 185 对开页。

³⁸ 对于 1942 年占有很大份额的其他单位，请参阅 Buchbender 的《Das tönende Erz》，210-15。³⁹ 参

见 哈特曼，东战国防军，549-52, 293 n. 309；大卫·斯图尔特·基辅

1941：希特勒的东方霸权之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269。

表 2.3. 1941-1945 年叛逃者总数估计及其占比
战俘 (千人)

叛逃者	数字 (四舍五入至千位)	脱北者占比 1941-1945 年被俘战俘
1942-5年 (表2.1)	117	2%
1942-1945 年和 1941 年最低估计值 (2,000 苏联报告)	119	2%
1942-5 年保守估计	251	4%
1941 年 (1941 年战俘人数的 4% = 134,000 人)		
1942-5 年和中等估计	318	6%
1941 年 (1941 年战俘人数的 6% = 201,000 人)		
1942-1945 年及 1941 年极端估计 (1941 年战俘的 60% = 200 万人)	2,117	37%

资料来源:1941年估计:参见先前重建。1942-1945年叛逃者:表2.1。1941-1945年战俘:
表 2.2。

步兵师写道,“再次,所呈现的最大份额
囚犯们在阅读我们的传单后决定投奔我们。”⁴⁰
7月22日上午,第十七军第一情报官
军团报告称,军团已俘虏了 202 名战俘和 62 名“优步”
(31%)。⁴¹ 1941 年 7 月,国防军宣传报告指出
除了未统计的个人叛逃者外,甚至连营级单位
力量叛逃,由他们的军官领导, 42, 8月, 2日
以及苏联第 60 步兵师第 3 营 共计 1,500 人
部队 一致向德国第四集团军投降。⁴³ 8月 21 日,
一名士兵注意到,“俄国人成群结队地从树林里出来,
投降,昨天有近 500 人”。

正面另一侧的文件证实了这张照片。整体
1941 年 9 月,苏联第 30 集团军司令报告说,有 45 支部队投靠了敌人。⁹
月,在列宁格勒方面军
1941年,三天内有十名士兵叛逃到敌人那里,作为对

⁴⁰ 特遣大队长,299。步兵师,lc, Betr.:Gefangnenvernehmung
(1941 年 7 月 12 日),BA-MA RH 24-17/171,第 31 对开页。

⁴¹ XVII AK,lc 至 AOK 6 (lc/AO),1941 年 7 月 22 日,BA-MA RH 24-17/171,对开页 87。
⁴³ 布赫本德,《Das tönende Erz》,91。同上。92-3。

⁴⁴ 埃里希·库比(Erich Kuby),《我的克里格:Aufzeichnungen aus 2129 Tagen》,第 3 版。(柏林:Aufbau,
2010),179。

⁴⁵ “Donesenie voennogo soвета 30-i armii voennomu sovetu zapadnogo fronta o prichi-
nakh sdachi v plen krasnoarmeitsev” (1941 年 9 月 6 日),发表于 Skrytaia pravda
虚构的。Neizvestnye 文件编辑。PN Knyshevskii (莫斯科:Russkaia Kniga,1992),
267-9,此处:267-8。

斯大林的叛逃者

陆军政委抱怨道。46在苏德前线的另一个地区,一天晚上,有七名士兵投奔了德军,这是一位红军老兵在1995年的回忆录中所记述的。47逃离德军的难民还传播谣言说“我们的军队显然是集体投敌了”。48 1992年接受采访的一位目击者记得,在占领波尔塔瓦地区的一个村庄后不久,一支由数百人组成的红军部队在一名上校的率领下向德军投降,并指出如果他们知道德国人是在“对抗犹太佬和俄罗斯人”(protiv zhidov i moskalei),他们一开始就会待在家里。49因此,种种迹象表明,1941年的叛逃者人数比后来要多。1942年初,德军部队报告称,自11月以来,越过战线的逃兵数量有所下降。50 2002年,一位参与红军反间谍工作的俄罗斯老兵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的战时经历。关于有多少逃兵的问题,他的回答值得长篇大论地引用:

很多!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德军推进的时候。有时,德军会杀死连长,然后整个连队都投奔敌军。派往德军后方的侦察兵小组有时也会投奔敌军。从前沿防御阵地逃跑的情况尤其严重:两名士兵坐在我方阵线前方五十米处,他们感到害怕。他们会商量好一起投奔敌军;或者一个人会杀死自己的战友,独自投奔德军。51

五

归根结底,即使我们做出最保守的假设,关于1941年的量化论点仍然只是推测。然而,1941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却更加清晰。从1942年起,我们拥有德军的可靠数据,包括整个东线战场以及个别部队的的数据。

⁴⁶ Iurii Rubtsov, 《Alter ego Stalina. Kniga sozdana na osnove rassekrechennykh dokumentov iz arkhivnykh fondov》(莫斯科:Zvonnitsa-MG,1999年),第173页。这很可能与Nikita Lomagin在《战争中的士兵:1941-44年列宁格勒战役期间的德国宣传和苏联军队士气》一文中提到的情况相同,该文收录于《卡尔·贝克福斯与东欧研究论文集》第1306页(1998年),第16页(5名士兵于9月19日叛逃,另有5名于9月20日或之后叛逃)。

⁴⁷ 引自 Shneer,Plen,140。

⁴⁸ Inna Konstantinovna Buttler, “Dvadtsat” let nazad. Vospominaniia obyvatel nitsy , 未发表的打字稿,哥伦比亚大学巴赫梅特夫档案,第7页。

⁴⁹ Shneer,Plen,134。 ⁵⁰ 哈特曼,东战国防军,610。

⁵¹ 谢尔盖·奥西波夫,“Smersh otkryvaet tainy”,事实上的争论,不。26 (1131) (六月2002),9。有关叛逃的各种场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4章。

(表2.1,图表2.1)。正如我们上文所述,这些数字必须被视为下限,尽管我们无法确定应该将其增加多少倍才能得出一个切合实际的估计数字。但即使我们从表面上看待这些数字,这些数字也最终表明,越过战线逃兵的人数远超十万,占1942年以来所有战俘人数的至少2%。如果我们将上述1941年的各种估计数字相加,逃兵总数至少会增加到11.7万人(占2%),更有可能在25.1万人到31.8万人之间(分别为4%和6%)。这些是基于非常有限的假设得出的相当保守的估计。它们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的比例范围内变动。1941年的实际情况很可能要极端得多(表2.3)。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接受最保守的估计就足以看出这种现象在其他方面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同样有趣(表2.1)。

毫不奇怪,随着战争的进行,叛逃者的数量不断减少。从1942年的79,000人减少到1943年的仅26,000人,1944年进一步降至10,000人以下,1945年则略高于2,000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1942年之后,人们对红军获胜的怀疑越来越少,这使得叛逃不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很快被苏联方面救回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做出这一选择的可能性。此外,德军目前总体处于撤退状态,这使得叛逃的机会更少。⁵²更令人惊讶的是战俘中叛逃者比例的动态。

鉴于军事形势的变化,人们预计1942年后叛逃者的比例会下降,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叛逃者的比例最初从1942年的4.8%下降到1943年的4.6%。然而,此后,叛逃者的比例却突飞猛进,在1944年和1945年均超过6%。苏联军队的命运变迁并没有导致志愿兵被俘比例的减少。事实上,一旦红军开始在非苏联领土上作战,苏联战俘自愿投降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更细致的分析表明,1944年至1945年的6%是一个平均值,由于叛逃率非常低的时期而向下修正。

在其他时期(例如1944年下半年,或1945年1月和3月),比例更高,达到7%甚至10%(表2.4)。在前线的某些地区,这一比例则相形见绌。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第3装甲集团军报告称,在德军中,叛逃者的比例高达60%。

⁵² 参见第3章和第4章。

斯大林的叛逃者

表 2.4. 外国军队东部战俘和叛逃者 (Überläufer) 统计
1943 年 7 月至 1945 年 4 月 10 日, 整个东线

	7月5日至31日 1943年12月	1月1日至30日 1944年6月	7月1日至31日 1944年12月	一月 1945	二月 1945	三月 1945	1-10 1945年4月
战俘	239,259	79,417	68,076	13,427	10,914	7,574	422
他们之中 叛逃者	14,932	2,675	6,532		565	988	40
%	6	3	10	7	4	7	3

来源: RH 2/1926; 1945 年 4 月 1 日至 10 日的数据: RH2/2633k。

战俘。此外,在11个时期中,有7个时期的战俘人数达到或超过了22% (图表 2.1)。

因此,战争结束后,叛逃仍然是一个大规模的问题,当时“只有一位历史学家曾说,“德国阵营里仍然有傻瓜和狂热分子”。写道,⁵³“看来德国人已经看穿了我们的计划”,一位忠诚的1945年1月14日,红军士兵写道:“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补充道,“叛徒和叛逃者有很多,他们给了他们

离开。⁵⁴这需要军事形势进行非常详细的研究,

制定和实施鼓励叛逃的政策,

以及每个单位当地情况的差异来解释这种动态

足够了。然而,鉴于德国军事档案中的记录残缺不全,这样的研究不太可能实现。有一件事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没有迹象表明军事恢复

红军降低了苏联战俘自愿

选择囚禁。

六

我们可以从本文提供的证据中得出什么结论

章节?有些相当坚定:我们知道,

苏联士兵成为战俘 (3,450 万人中 5.8 人,即 17%)。⁵⁵

战争初期,投降现象尤为普遍。1941年,

每名苏联士兵被俘就有三至四名

⁵³ 伊斯特凡·迪克,《欧洲的审判:合作、抵抗和报复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费城:Westview Press,2015年),27。

⁵⁴ 弗拉基米尔·格尔凡德 (Wladimir Gelfand),《德国日报》1945-1946 (柏林:Aufbau Taschenbuch Verlag,2008),15。

表 2.2 战俘总数;GF Krivosheev,苏联伤亡和战斗

《二十世纪的损失》(伦敦:Greenhill Books,1997年),91 为 3450 万人。

56这一比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罗斯的经验相当。第二次世界大战,57随着战争的持续,死亡人数比被掳走的人数还多被敌人活捉。平均每个苏联战俘有1.5名红军士兵的死亡人数比前线另一边的士兵还要多。58我们还了解,在俘虏中至少有 2% 是自愿的。我们还知道,1942 年至 1945 年间,随着战俘人数下降,越界的趋势增加了,并且出现了局部峰值,高达 100% 的战俘都是叛逃者。

其他结论则更具推测性。关于1941年的争论,特别是,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但定性来源和来自前线双方的当地数据显示,叛逃

1941 年,红军遇到了巨大的问题,而且比接下来几年更普遍。然而,事实是在熔炉之战中,谁自愿过去失败了,既因为简单的后勤原因,也因为区别主动投降和被迫投降之间的界限变得极其模糊。59 1941 年战俘中的绝大多数(截至 12 月中旬为 79%)已被进行了“十三次大围剿”。60

尽管如此,即使我们采取最保守的方法,并且只接受苏联叛逃者人数过低这一不切实际的数字:1944 年 12 月,这些战俘仍占有所有战俘的 0.06%。

1941年 与国际水平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战俘中,只有 0.02% 被归类为逃兵。因此,即使是 1941 年最不可能的最低估计,也仍然是比同类产品更高,更不用说惊人的高

⁵⁶ 1941 年,德国俘虏了 340 万名战俘,而红军俘虏了同期,失踪人数为230万,死亡人数为80万。参见表2.2 以及 Krivosheev,《苏联伤亡》,96 页。

⁵⁷ 反对修正主义史学的论战作者们计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战俘的数量几乎是其三倍比死亡士兵的数量还要多(事实上,他们的数字表明了 2.6 倍):A. lu. Plotnikov 和 VV Vasilik,“Vlasovskoe dvizhenie” ili eshche raz ob istorii predatel'stva (Na osnovе analiza doktorskoj dissertatsii KM Aleksandrova),Klio 1/109 (2016): 196–202。Gatrell 引用的数字也暗示了 3:1 的比例,而 Krivosheev 引用的数字暗示1:1的比例。彼得·加特雷尔,《俄罗斯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经济史》(哈洛:皮尔逊-朗文,2005),246; GF Krivosheev,Rossiia i SSSR v voynakh xx 维卡。Poteri vooruzhennykh sil. Statisticheskoe issledovanie (莫斯科:Olma-Press,2001 年),102。

⁵⁸ 根据 Kri-vosheev 的《苏联伤亡人数:96》(=1.5:1),战争中死亡人数为 680 万人,失踪人数为 450 万人;根据德国统计,战俘人数为 580 万人。表2.2中的核算(=1.2:1)。德苏战线的德国对应情况 270 万人死亡,240 万人战俘(1.1:1)。参见 Rüdiger Overmans,德国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 (慕尼黑:R. Oldenbourg,1999),277;和安德烈亚斯·希尔格,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in der Sowjetunion,1941–1956:Kriegsgefangen- engpolitik,Lageralltag und Erinnerung (埃森:Klartext Verlag,2000),71。

⁵⁹ 请参阅第 4 章。

⁶⁰ 斯塔赫尔,基辅,32岁。

斯大林的叛逃者

1944-1945 年为 6%,甚至出现了更高的局部或暂时峰值。⁶¹总体而言,这场战争中苏联士兵投奔敌方的人数总计至少 117,000,更有可能达到 251,000 或更多(表 2.3)。他们的迁入数量与总迁入数量大致相同
英美士兵逃兵人数:15万。西方盟军

然而,没有投奔敌人,而是叛逃到女友或生命在他们自己的防线后的黑市世界中。⁶²相应数量的苏联逃兵则完全是另一个级别:

150万逃兵、逃避兵役者和掉队者。因此,虽然逃兵,在所有反纳粹部队中,苏联现象的规模是
63此外,只有苏联公民在重大人数跨越界限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敌人;而且只有在苏联战俘中,此类叛逃者占了相当大的少数。本书的其余部分将解释其中的原因。

⁶¹ 哈特曼,国防军东战,727,引用霍夫曼,“Kriegsführung”,728。后者没有提供脚注,但来源(陆军总部报告了战俘人数和1944年和1945年的叛逃者)见 Joachim Hoffmann, *Die Geschichte der Wlassow-Armee* (Freiburg: Verlag Rombach, 1984), 160。

⁶² 查尔斯·格拉斯,《逃兵:二战的隐秘历史》(伦敦:威廉 Collins, 2014), 第九条及各处。

⁶³ GF Krivosheev, “O dezertirstve v Krasnoi Armi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6 (2001):94。

3

障碍

我

囚犯的住宿条件很差,起初,矛盾的是德国传单宣传的承诺 完全不够营养、害怕踩到俄罗斯或德国的地雷以及对家庭成员的报复使许多人不敢叛逃。¹

这份关于跨越边界障碍的总结是由德国第 26 军的情报官员于 1941 年夏天撰写的。

我们应该停下来阅读第 2 章中讨论的统计数据

头脑简单。我们可以真实地假设,广大

大多数苏联士兵继续战斗,只有少数

越过边界逃亡。反对斯大林的“全民公投”失败了;苏联联邦通过了“战争的严峻考验”。然而,正如引文所示,

这样的解释会产生误导。首先,叛逃是

逃避苏联前线服役的最极端方式之一

side.2 逃往苏联腹地是另一种选择,就像征兵一样

逃避。斯大林的安全部门在这次行动中拘留了150万人

在整个战争期间,共有超过 212,000 人被列入

因开小差、脱离部队护送队或

在内陆军区失踪”。⁴罗杰估计,

里斯表示,至少有 440 万苏联人“试图逃避服役或战斗”,

其中包括那些“积极站在敌人一边”的人。 5这

¹ 第二十六届:北天翼军团的鲁斯兰菲尔德祖格军团 vom 20. August 1941 bis 6. Mai 1942 ,BA-MA RH 24-26/278,Anlage 5a,第 4 对开页。

² 参见 Mark Edele 和 Michael Geyer 合著的《例外国家:纳粹苏联战争《暴力体系,1939-1945》,载于《超越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比较》,迈克尔·盖耶和希拉·菲茨帕特里克编(剑桥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大学出版社,2009 年),345-95,此处:383-7。

³ GF Krivosheev,“O dezertirstve v Krasnoi Armii”,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6 (2001):94。

⁴ GF Krivosheev,《二十世纪苏联伤亡和战斗损失》(伦敦:Greenhill Books,1997 年),91。

⁵ 罗杰·里斯,《服役动机:二战中的苏联士兵》(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20 (2007):263-82,此处:270。

斯大林的叛逃者

更大的群体将占这场战争期间所有武装部队（3450万）的13%。⁶当然，即使是这个比例也不包括那些因为其他选择太危险而选择投降的人。⁷德军的统计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试图越过前线但未成功的人数，更不用说考虑过这种行动方案了。最后，许多自认为是叛逃者的人并没有被德军承认。

任何对“叛逃”含义的解读都必须考虑到一个简单却至关重要的事实：投奔敌方并非易事。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写道：“投降是战争中最艰难的行动。”⁸前线本身就是阻碍叛逃的最明显障碍。一支军队在战场上的整个组织都旨在防止敌人在试图攻占敌方阵地的同时突破防线。在德苏前线，运动战与静止堑壕战交替进行。两者都为潜在的叛逃者设置了特定的障碍。

如果前线稳定，双方就会挖掘战壕，用机枪、铁丝网和杀伤人员地雷加固防御工事。克服这些困难既困难又危险。因此，1943年7月，三名试图越过战线的“不太聪明”的叛逃者中，一人在雷区丧生，另一人受伤。三人中只有一人毫发无损地越过了战线。⁹因此，在定点战争期间，叛逃尤其困难。1942年3月，两名偶然携带德国传单（Passierscheine）的战俘被问及为什么他们的战友没有采取同样的行动。他们引用了“从他们的住处到德军防线的距离”，这使得叛逃只有在“遭到袭击”时才成为一种选择。¹⁰但即便如此，对于想要叛逃的人来说，问题还没有结束。

在前进时，放弃尤其危险，因为撤退的敌人很难疏散这些逃兵。逃兵很有可能被俘后被枪杀，或者回到苏军控制区，接受战地法庭审判，然后很快被枪决。因此，叛逃的最佳时机是在撤退期间，尤其是当自己的

⁶ 欲了解总数，请参阅 Krivosheev 的《苏联伤亡和战斗损失》，第 91 页。

⁷ 罗杰·里斯，《斯大林士兵为何战斗：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11 年）。

⁸ Shimon Tzabar，《白旗原则：如何输掉一场战争（以及原因）》，第二版。（纽约：四面墙八扇窗户，2002 年），107。扎巴尔（1926-2007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参加过巴勒斯坦反英游击战的老兵，也参加过以色列在 1948-50 年、1956 年和 1967 年的前三次战争。

⁹ 21 ID, Jc, 致 LIV 总司令部。AK, Betr.: Überläufervernehmung, 1943 年 7 月 7 日, BA-MA RH 26-21/102, 第 765 对开页。

¹⁰ 294. ID, Jc, Vernehmungsbbericht Nr. 206, 1942 年 3 月 3 日, BA-MA RH 24-17/185, 第 155 对开页。

当时的德国阵线组织混乱,运动在短期内逆转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换句话说:1941年,以及某种程度上1942年。相比之下,1943年至1945年持续不断的叛逃事件令人震惊,因为它们发生在德国人普遍逃亡、叛逃风险极高的时期。

跨越前线的难题在叛逃史上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任何考虑投降敌人的士兵都必须跨越这道障碍。这在任何战争中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德苏战争中,障碍比以往更大。这正是本章的主题。本章表明,这场战争的交战双方 有时是自愿的,有时是违背自身判断的 都设置了极高的反叛障碍。试图从苏联越境到德国的成本和风险是巨大的,而当时的人也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无论我们使用1941年最保守的估计(数千人),还是更现实的更高估计(数万甚至数十万),我们都必须将这些数字视为冰山一角。如果我们将1941年至1945年间的叛逃及其不满视为一场支持或反对苏联政权的“全民公投”,我们就需要考虑,这场“投票”的规则是被操纵的,不允许对独裁者说“不”。这一结论使得第二章中讨论的那些本已相当重要的数据更具分量。

二

从战争一开始,苏联方面就对其士兵投奔德国的危险保持警惕。军事和政治领导层对其视为重大威胁的这一情况采取了坚决的反制措施。苏联的策略是将暴行宣传与对叛逃者及其家人的生命和自由的威胁结合起来。

这项政策的首要支柱是信息。“法西斯对战俘的暴行(zverstva)”是宣传人员用来煽动复仇意愿的一系列“事实”。红军政治宣传总局局长列夫·梅赫利斯在总结与德军作战前三周的经验时下达了这样的命令。¹¹ 因此,从战争一开始,

¹¹ Lev Mekhlis, “Direktive GUPP KA voennym sovetam, nachal nikam UPP frontov ob itogakh partiino-politicheskoi raboty za tri nedeli voiny” (1941年7月15日),重印于 Glavnye politicheskije Organy vooruzhennykh sil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1941-1945 Dokumenty i Materialy (莫斯科:Terra,1996), (=RA/VO 17-6 (1-2)), 42-4,引文:43。

尽管苏联将俘虏视为叛国行为,但苏联方面传播了了解苏联战俘遭受的非人道待遇。红色苏联宣传声称,军人遭受“酷刑”、“野蛮杀害”、饿死、枪杀,这并非毫无道理。死亡是更好的选择。捕获不仅因为前者是光荣的,而后者可耻,但也因为囚禁意味着在可怕的死亡。早在1941年7月2日,就有一本名为《法西斯暴行》的小册子向战俘发表的口号是为了帮助宣传;7月12日,“法西斯野蛮人折磨并残忍地杀害战俘”晋升为前线宣传;10月16日,红军《红星报》发表了第一份关于德国战俘营的恐怖。12在官方渠道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刻意开辟了非正式渠道。第一批战俘被救出后,军方审查人员

被命令不得删除关于囚禁恐怖事件的报道他们检查了信件。只有那些有正面描述的信件才会被没收。¹³

苏联宣传机器的协同努力取得了成效。正如第三装甲集群的情报官员在7月份观察到的那样

1941年,苏联的“暴行宣传”非常有效,以至于红军男人们“不愿投降,因为害怕被枪杀”

14尽管如此,叛逃仍然是苏联当局关注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这个问题虽然不太可能

比1941年更常见,并继续保持高水平直到战争结束。因此,德国试图

鼓励它,苏联的反制措施也持续存在。“欺骗性的必须“更果断地揭露敌人的宣传”,

红军总政治部负责人 8月12日

1942. 必须通过信息来激发对敌人的仇恨关于德国人的战争目标和他们的暴行。“具体

例子是为了表明“任何红军

陷入法西斯囚禁的人可能会遭受“酷刑、侮辱、饥饿和不可避免的死亡”,而法西斯囚禁“比死亡更糟糕”。¹⁵

¹² 马克·埃德尔,《不抓俘虏!红军与德国战俘,1941-1943》,现代史杂志 88 (2016): 342-79,此处:367-8。

¹³ 内务人民委员部通告编号002117或1942年9月27日。引用于Z arkhiviv VUChK-GPU-NKVD-KGB 1 (42) (2014): 247。

¹⁴ Panzergruppe 3,lc,“Lage in Weißrußland,14.7.1941”,BA-MA RH 21-3/437,对开页311-12。15 A。

¹⁵ 尔巴科夫,指令号。8.1942年8月12日,《Glavnye politicheskie》重印

Organy vooruzhennykh sil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1941-1945 gg.文件我(莫斯科:Terra,1996年), (=RA/VO 17-6 (1-2)),第159-60页。引文:160。

1944年5月,来自刚从

德国占领军被告知“德国人……会杀死每一个囚犯和叛逃者”。¹⁶

苏联政策的第二项内容是威胁士兵和他们的家人,以及关于这些威胁在军队中经常出现,并且还伴随着暴行故事。投降,如果不是“由战局所致”,长期以来都是非法的。1926年的《俄罗斯刑法》已经威胁到罪犯最高刑罚“枪决并没收财产”,并在与芬兰的冬季战争期间恢复战俘们受到了极其恶劣的对待。¹⁷ 1941年7月16日,国防委员会(也就是斯大林)通过了一项决议向所有士兵宣读,其中威胁要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反对懦夫、恐慌制造者和逃兵。这些人“比敌人更坏”,并被视为“叛徒”。祖国”,即开枪。¹⁸因为这个威胁在上下文中显得空洞红军溃败后,赌注必须增加涉及的士兵。1941年8月16日第270号命令因此惩罚被俘军官的家属,以制造威胁真实的。他们将被逮捕,作为“叛逃者的家属,背叛了他们的祖国”。普通士兵被剥夺了福利付款。¹⁹

投降士兵家属受到威胁

然而,这一决定远早于8月16日。NKGB的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检察官于6月28日已经要求逮捕叛逃者的家人。²⁰这意味着这些人将流放而不是枪毙,但许多报道的威胁更为更严重。“士兵们被告知,德国人会射杀所有俘虏。叛逃者的家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枪杀。

¹⁶ Panzer-Armeeoberkommando 3,lc, Zusammenfassender Bericht von Überläufer-und Gefangenenernehmungen Nr. 15 (23.5.44) ,BA-MA RH 21-3/512,对开页 37 反面。

¹⁷ LG Ivashov 和 AS Emelin, “Nravstvennye i pravovye Problemy plena v Otechestvennoy istori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 1 (1992) :44-9;埃德勒和盖耶,《例外状态》,364。

¹⁸ I. 斯大林,“Postanovlenie GKO SSSR No. GOKO-169ss” (1941年7月16日),重印:1941年上帝编辑。VP Naumov,2卷。(莫斯科:Demokratia,1998),II:472-3。

¹⁹ 最高统帅部订单号270,1941年8月16日,发表于《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9 (1988): 26-8; 这里:28。

²⁰ Prikaz NKGB SSSR.NKVD SSSR 和 Prokuratury SSSR NO. 00246/00833/PR/59ss: “O poriadke privilecheniia k otvetstvennosti izmennikov Rodiny i chlenov ikh semei” ,28 1941年6月,重印于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sopasnosti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内。斯博尼克文献。Tom vtoroi, Kniga 1: Nachalo 22 iyunia–31 avgusta 1941 goda (莫斯科: Izdatel'stvo Rus ,2000) ,114-15。

斯大林的叛逃者

正如第十七军情报官总结他所掌握的信息
1941年6月从战俘那里学到的。²¹已经引用的 Shcherbakov
1942年8月12日的指令要求
敌人将被涂上最鲜艳的颜色,命令
应该每天告诉士兵,叛徒的家人
投敌会受到“压制”。如果士兵恢复健康,
将被以叛国罪审判。²²8月16日之后,枪击威胁(而不是
(而非逮捕)成为报道中反复出现的说法。²³9月,18
摩托化步兵师报告称,“军官和政委威胁
枪杀叛逃者和被俘士兵的亲属。²³苏联档案
材料证实了德国的证据。1941年9月下旬,
波罗的海舰队政治局下令解释
“投奔德国的那些人的家属
并向德国人投降的人将被立即处决
祖国叛徒的家人”。²⁴这些威胁在1941年灾难之后依然存在。1942年4
月,“许多人
囚犯在审讯期间声称,“渴望跨越界限”,
“但他们很担心,因为他们不断受到威胁
处决他们的亲属”。²⁵类似的威胁在8月份也有报道。
1942年26日和1944年2月27日
这些警告并非空穴来风,尽管我们无法确定,因为
目前的知识水平,如果家庭成员确实被处决
1941年演出。当然,也存在镇压行为。斯大林的安全
部门报告称,“根据现有的规范
镇压还延伸到了军人的家属。
1941年7月17日和1942年8月1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要求解释”
2,688名“祖国叛徒”家属被定罪1,292人

²¹ 第十七 AK 将军, Abt. Ic: Zusammenfassender Bericht über
Gefangenen-Vernehmungen (26.-30.6.1941) (1941年7月2日), BA-MA RH 24-17/170,
对开页 100-1, 22 A.

Shcherbakov, 指令号, 8.1942年8月12日, (Glavnye politicheskie) 册印
Organy vooruzhennykh sil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1941-1945 gg. 文件号
(莫斯科: Terra, 1996年), (=RA/VO 17-6 (1-2)), 第159-60页, 引文: 160.

²³ 18. ID (运动), Abt. Ic, Feindnachrichtenblatt Nr. 9 (6.9.1941), BA-MA RH 26-18/57.

²⁴ 尼基塔·洛马金, 《战争中的士兵: 德国宣传与苏联军队士气》
列宁格勒战役期间, 1941-44年, 卡尔·贝克尔在俄罗斯和东欧的论文
研究 1306 (1998), 此处: 15.

²⁵ 18ID (机载), Abt. Ic, Anlagenheft zum Tätigkeitsbericht 1942, 9.1.1942-30.4.42,
BA-MA RH 26-18/60.

²⁵ 18 ID (mot), Ic, “Anlagen zum Tätigkeitsbericht, 1.5.1942-24.8.1942”, BA-MA RH
26-18/62, 第 27 页甲

部队
第 3 装甲部队 Ic, “Zusammenfassender Bericht von Überläufer.”

und Gefangenenvernehmungen (20.2.44), BA-MA RH 21-3/540, 第 110 页。

其中。1942年、1943年和1944年的逮捕统计还包括6,913

“祖国叛徒的家属”。²⁹

然而,如上所述,“镇压”、“逮捕”和“定罪”并没有必然意味着“处决”。1934年6月8日的叛国法已经

已下令将叛徒的直系成年家庭成员

被判处“流放到苏联偏远地区”。³⁰

已经引用了1941年6月28日的NKVD命令,其中也暗示被捕的家庭成员将被流放,而不是枪毙。³¹而国家辩护

1942年6月24日委员会决议还规定

叛徒将被逮捕并流放(ssylka)至偏远地区五年苏联”。³²1942年6月18日的

贝利亚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促成了这项决议,

引用相同的法律行为作为镇压家庭的依据,就像

1941年6月28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命令。³³将军的妻子和岳母

卡恰洛夫 第270号命令中被无理指控叛逃的人,

我们将在第四章看到 被捕并被判处八年徒刑

劳改营。他们没有被枪杀。³⁴同样,斯大林的儿媳

尤利娅于1941年底被关进集中营,此前她

丈夫,独裁者的儿子雅科夫被德国人俘虏。³⁵

²⁹ AG Bezverkhny, SMERSh. Istoricheskie ocherki i arkhivnye dokumenty (莫斯科: Izdatel stvo Glavarkhiva 莫斯科,2003),28。

³⁰ OB Mozokhin, SSSR Statistika repressivnoi deiatel'nosti Organov bezopasnosti (1921-1953)",可在"istoricheskiematerialy"网站上获取: <http://istmat.info/node/255> (2015年8月20日访问)。

³¹ 伊瓦绍夫和埃梅林, "Nravstvennye i pravovye Problemy plena" ,48。

³² Prikaz NKGB SSSR, NKVD SSSR 和 Prokuratury SSSR NO. 00246/00833/PR/59ss: "O poriadke privlecheniia k otvetstvennosti izmennikov Rodiny i chlenov ikh semei" ,28 1941年6月,重印于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sopasnosti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内。斯博尼克文献。Tom vtoroi, Kniga 1: Nachalo 22 iyunia-31 avgusta 1941 goda (莫斯科: Izdatel stvo Rus ,2000),114-15。

³³ I. 斯大林, GKO 决议号。GOKO-1926ss, "O chlenakh semei izmennikov Rodiny (1942年6月24日),在卢比安卡重印:斯大林 i NKVD-NKGB-GUKR SMERSh 。1939年至1946年3月,编辑。V. N Khaustov, VP Naumov 和 NS Plotnikova (莫斯科: Demokratiia,2006),350-1,引文:350。文本也可访问: <http://soldat.ru/doc/gko/text/1926.html> (2015年3月25日访问)。

³⁴ 有关的两项法律行为是中央委员会和 SNK 的决议 1940年12月7日,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第58-1b条。贝利亚的报告列举了根据这些规定,1852人被判刑。另有650个家庭无法找到,要么是因为他们身处敌占区,要么是因为他们失踪在内陆地区。另有45个家庭也受到同样的制裁

因为他们中的一个亲戚在投奔前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

敌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已知有16起此类案件)。其中,迄今为止只有24个家庭

受到“正义”的审判。参见贝利亚1942年6月18日致斯大林的信,转载于《卢比安卡:斯大林在NKVD-NKGB-GUKR "SMERSH",349-50,此处:349。

³⁵ Leonid Reshin 和 VS Stepanov, "Iz foldov voennykh arkhivov: Sud" by general "skie" , Voeno-istoricheskii zhurnal 8 (1993): 20-7,此处:20。

³⁶ 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给朋友的20封信》(伦敦:哈钦森,1967年),172-3。

斯大林的叛逃者

所有这些证据表明,1941年前线宣传人员极有可能只是误传了这项政策,或者士兵误解了他们所听到的内容。无论如何,对于我们今天的讨论而言,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前线士兵如何清晰地理解这项政策:将其视为对亲朋好友的致命威胁。因此,潜在的叛逃者知道其他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威慑力,除非他的家人一开始就居住在被占领土上。

因此,苏联阻止越界的第三大举措是实际实施暴力,而非简单的威胁。这种强制手段的主要渠道是部队指挥官、政治官员(政委, politruki)以及军队内部安全警察的“特别部门”(后来被称为“间谍之死”或SMERSH)。

“采取最严厉的措施防止开小差和叛逃”,第十七军在1941年6月报告。“扔掉步枪的人会被枪毙。”36 8月,第56步兵师也报告了类似的情况,称“如果政委和登记的共产党员不处以决威胁士兵,至少75%的(苏联)士兵会叛逃。那些被发现持有德国传单的人会被枪毙。”37来自前线另一边的消息来源证实,确实发生过因叛逃未遂而被处决的情况。一位回忆录作者回忆起一个惩戒部队中发生过两次“撤退到敌方”的情况。“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他们消灭了叛逃者”(perebeshchika likvidirovali)。38 连长彼得·米特罗法诺维奇·谢别列夫在1941年7月15日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团里大约有二十个人扔掉步枪,爬出战壕,手里拿着白手帕和白布片,显然是撕掉了衬衫,朝德国人跑去。但他们没能投奔法西斯。我们听到四面八方传来“向祖国叛徒开火!”的喊声。我也命令我的战士们也这么做。叛徒们被机枪扫射了。39

同年早些时候,一名苏联军官目睹了两名试图越过边界线的男子被处决。他们在自己的

^{37a} 第十七将军司令部,武装军团,Abt. Ic, “Zusammenfassender Bericht über das Ergebnis der bisherigen Gefangenenvernehmungen (26.6.41)”,BA-MA RH 24-17/ 170,第 63 对开页。

^{37b} 56. ID,lc,第十七将军司令部。Armeekorps,1941 年 8 月 8 日,BA-MA RH 24-17/ 171,对开页 186-186 反面。

^{38a} 弗拉基米尔·戴恩斯(Vladimir Daines),《Shtrafбаты i zagradotriady Krasnoi Armii》(莫斯科:Eksmo,2008),337-39

这封信在 Po obe storony fronta 上转载:Auf beiden Seiten der Front,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nemetskikh sellat 1941-1945 gg (莫斯科:Sol, 1995),153-5,此处:154。

聚集在一起等待早餐的同志们。40 1942年5月,一群
 康复中的士兵被带到附近的树林里,然后返回
 前往前线执行任务。在这里,一场可怕景象正在等待着他们,因为其中一人
 几十年后,人们仍能清晰地记得:

空地中央有两个坑。旁边站着两名士兵
 他们的内衣,大衣披在肩上。还有
 这两个人的脸色和他们的
 汗衫。他们开始向其中一人宣读军方的判决
 法庭:“祖国叛徒,违背誓言……试图叛逃到
 敌人……被判处枪决……”

他们让第一个人跪在坑前。少校纳甘在
 手,走上前去。砰! 他朝他的后脑勺开了一枪。他倒在
 坑 扑通!另一个也一样。……

然后他又转向我们:“进来!唱首歌!”没人唱歌。一片寂静!然而
 他们怎么想打败我们,我们都死死地咬着牙。他喊道:“再来一发!”
 好的,我们跑。但我们不会唱歌!41

处决也可能更加迅速,就像在保卫
 1942年9月下旬,格鲁霍夫市。一群叛逃者试图
 900名新兵的替换计划被师长阻止,
 少将 AZ Akimenko 在 1953 年的回忆录中回忆道:

来自库尔斯克的大量补充部队,约900人
 这些人背叛了我们祖国的利益。仿佛
 指挥部命令,这群人站了起来,扔掉了步枪,举起了
 手……走到敌方坦克旁边…… 我下令
 两个炮兵营向叛徒和敌方坦克开火。作为
 结果,相当多的叛徒被杀或受伤,
 敌军坦克被击溃。42

到 1942 年 4 月,俘虏们报告说“许多人想叛逃,但这不是
 很容易做到,因为政治家和政委特别
 最近有可疑,并密切关注” 。43

⁴⁰ V. Valentinov, “Wie ich “Kollaborateur” wurde”. 打字稿回忆录, c.1952, 巴赫-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 meteff 档案馆, 16-18。

⁴¹ S. Smoliakov, 接受 AA Sotskov 采访 (2013年3月22日), <http://iremember.ru/memoirs/razvedchiki/sotskov-sotskov-aleksey-andreevich/> (2015年7月16日访问)。

⁴² AA Maslov, 《苏联阻击分队是如何使用的?》, 《斯拉夫军事研究》9, 第2期 (1996): 427-35; 此处为430-1, 引用了手稿回忆录摘自俄罗斯军事档案。另见 David M. Glantz, 《巨像重生:

《1941-1943年战争中的红军》(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 2005年), 580-1。

⁴³ 18ID (机载) Abt. Ic, Anlagenheft zum Tätigkeitsbericht 1942, 9.1.1942-30.4.42, BA-MA RH 26-18/60。

这种警惕性带来了回报。正如1941年苏联关于叛逃的报告（已在第二章中引用）所示，截至12月初，苏联不仅登记了102起集体叛逃事件，共计1944人，而且还阻止了4646名苏联士兵越过战线逃亡。⁴⁴虽然苏联的数据低估了成功叛逃的人数，但它们确实显示了有多少人积极阻止“用脚投票”，而且这种阻止并非仅限于战争初期：1943年，当局逮捕了6013名叛逃敌方人员。⁴⁵

三

跨越前线的纯粹军事障碍，加上苏联的反制措施，对叛逃形成了强烈的抑制。这些措施强化了自发的、普遍的、跨文化的观念：叛逃是不光彩的。正如一位前苏联士兵在战后接受美国采访时所说，他是否曾考虑过投奔敌人：

我不想开小差，即使我不喜欢我所处的社会制度。开小差不是什么光荣的行为；我想做一个诚实的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会开小差。诚然，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我内心非常矛盾，我追寻真相，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虽然辛勤劳作，却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生活条件如此恶劣。但我不可能采取开小差这样的行动来做出我的决定。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⁴⁶

正如一位前红军军官在战后接受采访时所说：“那些混蛋根本没资格开小差投敌。如果你想开小差，战前战后都可以。但在军事行动中开小差对其他士兵不公平。”他认为处决这些人“完全合理”。

⁴⁷即使自身生命受到威胁，也不应成为叛逃的理由。受访者自大清洗以来就一直感到受到威胁，但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⁴⁴ Bezverkhnyi, SMERSh, 26-7.

⁴⁵ OB Mozokhin, Statistika represivnoi deiatel'nosti Organov bezopasnosti SSSR (1943 gg.),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 9 (2005): 184-91, 这里: 187. 到 1953 年, 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 40,000 多人, 但其中大多数肯定是后来叛逃的人恢复了。参见第 7 章表 7.1。

⁴⁶ 哈佛大学苏联社会制度研究项目。附表A, 第16卷, 案例323, 第64页。

(男, 33 岁, 乌克兰人) 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

⁴⁷ 哈佛大学苏联社会制度研究项目。附表A, 第5卷, 案例56, 第11页。

(男性, 36 岁, 俄罗斯伟人, 陆军军官。) 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

我担心自己可能会惹上麻烦。我开始觉得,真的足够了,辩方要求清洗,但我自己没有安全感 尽管这不会成为我开小差的理由。我是一名士兵。我已经服役了。
誓言。我必须遵守。如果你是这个政权的敌人,那么你在战斗中投降是没有道理的。⁴⁸

另一名叛逃的俄罗斯人说,“只要我还在服役”战后来西部,“我不能让自己开小差。毕竟我已经政府宣誓”。⁴⁹另一名民主党人回忆起类似的感受 “向1951年接受采访时说:

我当时就看到人们不愿意捍卫这个体制。当时我把德国人视为敌人,并认为必须保卫祖国。我没有投降。我战斗到被捕并因伤寒被捕。
(你怎么看待那些投降的人?)我认为他们是叛徒和懦夫。⁵⁰

事实上,当叛逃者没有与德国其他战俘分开时在集中营里,他们常常因叛国罪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有人愚蠢到向他的战友们宣布“他自己去了协议,叛逃到德国人,然后其他战俘会杀死他一位在德军战俘营中幸存下来的苏联士兵回忆道囚禁。⁵¹即使是坚定的反布尔什维克也将叛逃等同于叛国。⁵²

四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些观点。⁵³值得怀疑的是苏联的一个重要部分普遍蔑视民众认为叛逃者足以让士兵们守规矩,即使有苏联暴行宣传和恐怖活动的支持。然而,

⁴⁸ 同上,第27页。

⁴⁹ 哈佛大学苏联社会制度研究项目。附表A,第26卷,案例517,第4页。

(男,38岁,俄罗斯人,电气工程师。)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

⁵⁰ 哈佛大学苏联社会制度研究项目。附表A,第14卷,案例240,第75页。

(男,27-8岁,俄罗斯名流,学生。)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

⁵¹ G. Koifman,采访 Afroim Aronovich Fraiman (2011年3月25日), <http://iremember.ru/memoirs/pekhotintsi/fracman-afroim-aronovich/> (2019年11月3日访问) 2015年)。

⁵² V. Samarin, “Grazhdanskaia zhizn” pod nemetskoj okkupatsiei, 1942-1944” 载于 “Sver-shilos” :Prishli nemtsy! Ideinyi kollaboratsionizm v SSSR v period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Oleg Budnitskii 编 (莫斯科:Rosspen, 2012年) ,227-318,此处:275。

⁵³ 例如,请参阅《哈佛大学苏联社会制度研究项目》附表B,第11卷,案例485,第4页。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

斯大林的叛逃者

苏联战俘遭受的非人道待遇将再次得到证实，再次由目击者向他们的战友们分享他们的知识。54 “战争初期，数十万人投降”，一位目击者后来回忆道，“但当人们看到德国人所做的一切时，

对红军战士来说，他们说，这个制度是好的还是坏的糟糕，杀死德国人总比被他们杀死要好。” 55

问题始于越过前线。如果叛逃者设法躲避苏联方面的射击，他经常成为德国子弹。“我们的机关枪”，一位特遣队队长格罗斯说道

1941年7月，第299步兵师“立即投入战斗

如果有人现身”，这一事实使得“叛逃风险太大”。

56在

当时，德国对叛逃企图的反应变成了公然的屠杀手无寸铁、明显投降的部队。作为一名前苏联指挥官曾考虑投降，后来

与德国人合作，记得1941年秋天对德国阵地的一次攻击：

前排红军士兵高举双臂奔向德国

他们在战壕里被德军的机枪一排排地扫射。

尽管如此，其他人还是继续向前跑去，并且也举起了手臂。

一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⁵⁷

令他惊恐的是，德国人不仅用机枪扫射了大批向他们冲来的投降部队，还近距离射击了个人

有明显叛逃意图：

当我躺在尸体中间掩护时，我注意到不远处

有人挥舞着白手帕。我转过身去

仔细观察后，我又看到了几个白点。我很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些手帕有时会消失，但后来再次出现。最后，我看到一个男人站起来，走到一个地方

另一条手帕清晰可见。我认出他是我军官之一。他

向另一个人伸出手，扶他起来。然后他解下了他的腰带

用手枪架，举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扔到

地面。然后他们迅速跑向德军战壕。我看到两个

德国士兵从战壕里探出头来，看到这两个人

当他们越来越靠近时，他们的头又慢慢地消失在

⁵⁴ 参见 Edele, 《不抓俘虏》，第 368-9 页。

⁵⁵ 哈佛大学苏联社会制度研究项目，附表 A，第 14 卷，案例 191，第 32 页。
(男，25 岁，莫德文，拖拉机手。)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

⁵⁶ 特遣大队长，299 步兵师，c, Betr.: Gefangenenvernehmung
(1941 年 7 月 12 日)，BA-MA RH 24-17/171，第 31 对开页。

⁵⁷ 瓦伦蒂诺夫，“Wie ich “Kollaborateur” wurde”，11。

战壕……他们让两人靠近不到100米,然后开火。两人都倒在地上。58

一名潜在的叛逃者,实际上发现自己身处前线之间。“如果他白天来,会被自己人射杀;如果他晚上来,会被我们射杀。”一位德国情报官员如此概括1942年初撤退期间的情况。59 1943年8月,一位党卫军军官略带恼怒地注意到了这些子弹的威慑作用:

在“赫尔曼”行动(反游击)中,我们抓获了一名匪徒(即一名苏联游击队员)。在审讯中,他表示,他所在的约200人小组收到了德国的宣传传单,并决定叛逃。当这群人中第一个举着双臂走向德军阵地时,他被击毙。此后,该小组决定战斗到最后一人,因为他们认为传单上的承诺不可信。60

苏联方面有时会利用德军的恐惧心理,故意升级前线冲突,这加剧了德军向投降部队开枪的倾向。1943年初,当侦察兵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卡尔波夫和他的战友们发现,他的部队中叛逃敌军的现象十分普遍时,他们想出了以下解决办法:

黎明前,包括我在内的三名志愿者跳过胸墙,向德军战壕推进。……弗里茨人注意到我们队伍的靠近。“站住!”“站住!”一个德国人命令道,他隐匿在黑暗中。“叛逃者”,也就是我们,举起了双手。我们大喊:“我们向你们走来!我们投降!”与此同时,我们继续高举双手,向德军战壕推进。敌方全体防线都出来迎接他们的“增援部队”。我们又向前走了几步。突然,藏在袖子里的手榴弹飞进了德军战壕。……弗里茨人发出了哀号和呻吟。……这次行动很成功,想要投奔法西斯阵营的人数大大减少。61

苏联军事反情报部门的一份绝密报告中描述了同样的减少叛逃(从而减少信息泄露)的技术

⁵⁸ 瓦伦蒂诺夫,“Wie ich “Kollaborateur” wurde”, 12-13。他对“官员”一词的使用是不合时宜。直到1943年才有“指挥官”这个头衔。

⁵⁹ Panzerarmeoberkommando 3,lc,“登费恩德的宣传”。《Propaganda des Feindes》(1942年1月28日),第53对开页。

⁶⁰ 安全警察和保安部队指挥官 Weißruthenien、党卫军 Sturmabführer Friedlichs (明斯克)致党卫军和警察领袖 Weißruthenien, SS-Gruppenführer v. Gottberg (明斯克), 1943年8月11日, BArch R70 (Sowjetunion)/26,第20页。

⁶¹ 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卡尔波夫回忆录(2011年10月23日出版), <http://ir.emember.ru/memoirs/razvedchiki/karpov-georgiy-ivanovich/> (2015年7月16日访问)。

(SMERSh)1943年6月19日致国防副人民委员VS·阿巴库莫夫的信。⁶²这些都是为了解决这条战线大规模问题而做出的孤注一掷的尝试。1943年4月至6月期间,德军俘获的6360名战俘中,近60%是叛逃者。⁶³那些尽管德军哨兵好战,但设法越过战线的战俘仍然不安全。他们很可能在战线后被击毙,而

不是撤离。第47装甲军司令早在1941年6月30日就向其部队发出命令,抱怨他的士兵经常枪杀“俘虏、叛逃者和逃兵”,这可能会降低敌人投降的意愿。⁶⁴到1942年初,此类事件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德国军事领导层感到有必要尝试缓和局势。一位装甲军司令写道:

过去几个月异常艰苦的战斗导致俘虏寥寥无几。在[德国]军队中,一种观点日益盛行:那些残害德国战俘或将其折磨致死的野蛮俄国士兵不配被俘。这种观点本身很容易理解,但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不利。由于消息不断在民众中传播,俄国领导层和每个俄国士兵都得知,如果他投降或叛逃,将被德军枪决。所有被枪决的俄国士兵被处决的案例,只要被俄国领导层知晓,就会被他们以最持久的方式用于宣传,反复强调每个投降或叛逃的俄国士兵都会失去生命。因此,俄国士兵会战斗到最后一刻,这加剧了我们的抵抗,也使战斗更加艰难……[因此]我坚决禁止枪决投降或叛逃的俄国士兵……我确实理解看守和疏散这些囚犯给我们的部队带来的困难……但出于自身利益,他们必须接受。

顺便说一句,我们作为一个具有高尚文化的民族,即使在与一个缺乏文化、被最低级和最卑劣的本能所统治的民族作斗争时,也不能让自己陷入无文化(Unkultur)和野蛮状态。⁶⁵

⁶² 部分转载于“Ognennaia duga”:Kurskaia bitva Glazami Lubianki,编辑。AT Zhadobin,VV Markovchin 和 VS Khristoforov (莫斯科: Moskovskie Uchebniki,2003) ,25-8。

⁶³ 蒂莫西·P·穆里根,《间谍、密码和“Zitadelle” :情报和战争》库尔斯克,1943年》,当代史杂志 22,第2期(1987年) :235-60,此处:245。

⁶⁴ Ortwin Buchbender,《Das tönende Erz:Deutsche Propaganda gegen die Rote Armee im Zweiten Weltkrieg》(斯图加特:Seewald Verlag,1978) ,104。

⁶⁵ XXXVIII 将军。Pz.军团,由 Oberst (?) Kempf 下令,1942年2月12日,BA-MA RH 27-3/181,第2页。

德国指挥官试图缓和局势,但其种族主义傲慢却贯穿始终,其结果好坏参半。⁶⁶ 据一位苏联叛逃者称,到1942年底,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他声称,许多红军士兵渴望向德国人投降,但又感到害怕,因为德国步兵会向任何人开火,即使是那些举着手的人。他本人也在光天化日之下叛逃,当时他举着双臂,结果被一名德国机枪手击中手部和腿部。他略带讽刺地评论了德国鼓励叛逃的做法。他指出,最好的反叛宣传就是苏联叛逃者躺在战线之间的尸体。政委们利用了这些尸体,召集所有部队,并指出如果他们考虑叛逃,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⁶⁷

然而,像这个人一样,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向敌人投降(表2.3)。如果他们成功投降,他们将面临德国战俘营的全部恐怖。1941年,叛逃者大体上与他们非自愿的同伴有着同样的致命命运,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七章中再次讨论。我们感兴趣的并非实际发生了什么,而是苏联的潜在叛逃者能够了解自己的未来。正如我们所见,他们可以亲眼目睹前线的枪击事件。被俘后发生的事情无法直接观察,但却是常识。到1941年8月底,大量关于德国对战俘暴行的故事已在苏联方面口口相传。那些逃脱囚禁并越过战线返回苏联领土的士兵可以证实,报纸上报道的内容确有其事。⁶⁸ 他们的故事进一步口口相传,由此产生的谣言最终被官方的暴行宣传所利用,正如一位被俘的红军士兵在11月向德军汇报的那样。⁶⁹ 到1942年1月,了解德方战俘可能遭遇的后果已成为阻止叛逃的强大威慑力量。正如一位被俘的苏联指挥官所报告的那样:

⁶⁶ 克里斯蒂安·哈特曼 (Christian Hartmann),《东线国防军:前线和军事腹地》,1941/42年,第2版。(慕尼黑:R. Oldenbourg Verlag,2010)。关于升级和降级的循环,另请参阅马克·埃德勒 (Mark Edele),“向敌人学习?”《德苏战争的纠缠历史,1941-1945》,载于《极权主义独裁:新历史》,编辑: Daniela Baratieri, Mark Edele 和 Giuseppe Finaldi (伦敦:Routledge,2014),190-211。

⁶⁷ 第二十八将军司令部。AK.Ic.Betr:Überläuferaussage,1942年12月10日,BA-MA RH 26-21/77,对开本110。

⁶⁸ 参见匿名作者,《罗迪努斯和大林》,未发表的回忆录,打字稿(1951年),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赫伯特档案馆,119-20,69

3. 装甲师,Bericht. Behandlung der Überläufer und Gefangenen,1942年11月17日,BA-MA RH 27-3/185,第48页。

关于哈尔科夫战俘营里发生的事情的谣言对叛逃计划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尉问道,哈尔科夫战俘营里每天有50到70人死亡,这是真的吗?他也并不真的相信德国人不会枪杀俄罗斯军官。⁷⁰

当然,这些并非谣言。德国人确实或多或少自发地枪杀了战俘。直到1942年,官方政策还包括消灭政治官员(以及此后仍是目标的犹太人和女兵)。而集中营的条件构成了严重的战争罪行。⁷¹对我们在此讨论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些条件极大地阻碍了战俘的叛逃。“想到我们的战俘在德国集中营里被饿死,真是令人痛苦不堪,”一位苏联军官在1942年告诉英国记者亚历山大·沃斯。

“但是,从政治上讲,德国人正在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这话说得真可怕;但通过虐待和饿死我们的战俘,德国人是在帮助我们。”⁷²德国军事领导人确实明白,对在德军统治下命运的恐惧让苏联士

兵保持了秩序。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几天后,指挥系统就收到报告称,对被枪击的恐惧阻碍了投降。⁷³到1942年8月,这种洞见被明确地制定为一项政策建议。

增加叛逃人数的第二个武器是战俘营良好且人道的条件,尤其是良好且人道的待遇。关于战俘营条件的消息通过不受控制的渠道在敌方战线传播开来。最好的做法是经过仔细检查后慷慨释放大量战俘。其中99%的人不会再次拿起武器对抗德军,而是会积极参加所在村庄对抗游击队的战斗,而且,他们还会成为一支重要且急需的劳动力。最后……

⁷⁰ “Gefangeneinvernahme (21.1.42)”, BA-MA RH 24-17/185, 第 56 对开页。

⁷¹ 克里斯蒂安·哈特曼 (Christian Hartmann), 《大众化的大众? 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 im “Unternehmen Barbarossa”: Aus dem Tagebuch eines deutschen Lagerkommandanten》, in *Der deutsche Krieg im Osten 1941–1944. Facetten einer Grenzüberschreitung*, 编辑: Christian Hartmann, Johannes Hürter, Peter Lieb 和 Dieter Pohl (慕尼黑: R. Oldenbourg Verlag, 2009), 307–67。

⁷² Alexander Werth, 《1941–1945 年的俄罗斯战争》, 第二版 (纽约: Carroll & Graf, 2000 年), 第 422 页。

⁷³ 一些例子 (按时间顺序) 参见: 299, ID, IC, Betr. :Gefangenenvernehmung (1941 年 7 月 12 日), BA-MA RH 24-17/1871, 第 30 页; Hauptmann und Lagerführer [姓名难以辨认], Dulag 172 (z. Zt. Zwiabel), Vernehmung von Kriegsgefangenen, 1941 年 7 月 19 日, BA-MA RH 24-17/171, 第 65 页; 第十七将军司令部, 武装军团, Abt. IC, “Zusammenfassender Bericht über das Ergebnis der bisherigen Gefangenenvernehmungen (26.6.41)”, BA-MA RH 24-17/170, 第 63 对开页。

组建志愿部队（与德国人并肩作战）将有助于
这可能是宣传这一行为（Tatsachenpropaganda）的最佳形式。⁷⁴

虽然该计划的各个方面将作为
德国人继续调整策略以应对
战争的命运，他们总是在意识形态上保持着拼凑的状态
发动灭绝战争。⁷⁵

五

如此多的红军士兵跨越红军防线，确实令人惊叹，
鉴于苏联的威胁、无处不在的暴行宣传、广泛的
向试图越过边界叛逃的人开枪，这绝对令人震惊，
德国战俘营的残酷条件，以及
在官方沟通渠道之外了解这些情况，
这有助于验证媒体的说法。士兵们是如何决定
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投奔敌人？

他们是否克服了跨越前线所带来的疑虑和恐惧？

当然，很多人根本没能克服这些困难。各种各样的障碍

让他们相信战斗比叛逃更好。我们已经

见过一个例子，当一名叛逃者试图越过边界时被枪杀，集体叛逃变成了坚决的抵抗。

这不是

举个例子。再次引用苏联指挥官和未来的纳粹
曾经考虑叛逃但后来躺在尸体后面的通敌者
在战场上，目睹了对投降部队的蓄意谋杀：

“我没想到德国人会向那些试图
向他们投降，双臂高举过头顶”，他记得他的
“苦恼”反应：⁷⁶

德国枪手在尸体间寻找还活着的人，
以便射杀那些自愿成为俘虏的人。
他们难道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真是苦涩
让我认识到，我所驳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是谎言
确实符合事实！我的求生本能被唤醒了
甚至可能更多的是怨恨或愤怒（Bösheit）。我不想
如此轻易地放弃我的生命，我向自己保证，我不会去
被囚禁！我要战斗！⁷⁷

⁷⁴ 3. 装甲师, Abt. Ic., "Betr.: 登费恩德的宣传, 19.8.1942", BA-MA
RH 27-3/181, 对开本 9-2 反面-9-3。

⁷⁵ 参见 Edele 和 Geyer 的《例外状态》。

⁷⁶ 瓦伦蒂诺夫, "Wie ich "Kollaborateur" wurde", 12。

⁷⁷ 同上。13. "Bösheit" 原文如此, 应该是 "博谢特"。

这样的商议足以令人心碎,多年后仍清晰可见。它们可能导致各种结果。另一本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回忆录,详细重现了1942年2月作者与一位前线战友之间的争吵。他们都抱有失败主义的态度,不愿战斗。他们尤其不愿死。他们都觉得自己必死无疑,因此彼此之间没什么可隐瞒的。我们不必相信这场对话就是如此发生的。时间过去太久,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对话者是否真实存在。但即使我们仅仅将其视为内心对话的重现,它也揭示了那些想要叛逃的人所经历的种种挣扎。

他们权衡了所有证据,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该投奔德国人吗?“但他们会饿死在那里。”但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吗?真的能相信报纸上“这些捏造的谎言”(basni)吗?毕竟,德国人虐待战俘是极其愚蠢的。那只会助长敌人的气焰!因此,报纸上写的内容肯定不是真的。但还有那些真正从德国战俘营归来的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真的可信吗?嗯,也许他们只是个案?相信这是德国人的政策是不合逻辑的。而且,肯定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关进最糟糕的集中营!⁷⁸

同年晚些时候,也就是三月,这位匿名作者又一次讨论了叛逃的问题。他们再次权衡了各种选择:留在前线意味着为“人民的敌人”(即布尔什维克)服务,而越过前线则意味着转向另一种“邪恶”;留在前线意味着几乎必死无疑,而叛逃意味着几乎必死无疑,死在德国战俘营里。不过,也许只有不合格的战俘才会受到德国人的虐待?也许带上毕业证书就能获得更好的待遇?德国人肯定对合格工人的帮助感兴趣吧?说不定,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机会与苏联人作战了?

当这些潜在的叛逃者下定决心真正尝试越过边境时,他们也考虑到了苏联方面对其家人的威胁。他们决定,为了避免亲人受害,他们需要确保没有人看到他们叛逃。他们希望被算作失踪人员,而不是被当作逃兵投奔德国。他们还赌一把,如果他们不引起什么大丑闻,就不会有人举报他们叛逃,因为如果他们承认自己有三名叛逃者,他们的上级可能会被追究责任,并威胁要判处他们入伍。

⁷⁸ 匿名,“V boiakh za Rodinu”,147-8。

士兵们已经投奔敌人了。这次尝试失败了,但在1942年,这位回忆录作者与两位同志再次尝试。他们再次他们仔细考虑了各种选择,并再次决定尝试一下。⁷⁹

鉴于我们对德国战争方式的了解,以及当代人都知道,这样的决定可能显得疯狂。然而,关于德国人在二战中对苏联战俘所做的事情的信息

对那些在战壕里摸索着该做什么的人来说,特别是对苏联来说,这并不是完全直接的。

他们周围流传的关于敌人的知识是相互矛盾的,充满了问号。虽然有很多

战争初期德国人残暴行为的证据

来自官方媒体,并且总是受到大量

苏联公民的怀疑态度。此外,还有反作用

(而且事实证明,这些信息是误导性的)。

虚假信息来源之一是曾在德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囚禁,是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经历

现实。然而,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糟糕的例子也

这与德国战俘营里关押苏联战俘的情况完全不同

1941.80此外,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往往更糟糕:回到

被战争、内战和饥荒摧毁的国家;只有缓慢而

斯大林革命前 20 世纪 20 年代生活的初步正常化

从上而下,去富农化、集体化、再次饥荒和

大恐怖在 20 世纪末再次使生活陷入灾难。

因此,回想起来,在德国集中营的岁月似乎并没有那么糟糕

所有。那些在前苏联时期与德国人有过交集的年长男性

战争有时会怀疑他们所听到的关于德国暴行的说法,并且

告诉他们的同志们不要害怕被俘。一旦德国情报部门

当苏联从俘虏那里得知这一现象后,它立即将这句话纳入了旨在鼓励叛逃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中。⁸¹

⁷⁹ 同上,193-4.206-7.233-4。

⁸⁰ 罗伯特·杰克逊,《囚徒,1914-18》(伦敦和纽约:劳特利奇,1989年)
乌塔·欣茨(Uta Hinz),《大战争中的大战争:1914-1921年德国的 Kriegsgefangenschaft》
(埃森:Klartext Verlag,2006年);Heather Jones,《缺失的范式?军事囚禁》
和战俘,1914-18年,《移民与少数民族》26,第1/2期(2008年):19-48;
OS Nagornaia,Drugoi voennyi opyt:Rossiskie voennoplennye Pervoi mirovoi voiny v
Germanii (1914-1922)(莫斯科:Novyi khronograf,2010);约书亚·桑伯恩(Joshua A. Sanborn),《帝国
《启示录: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罗斯帝国的毁灭》(牛津:牛津
大学出版社,2014),第133-7页。有些人确实记得他们所经历的不人道行为
相当清楚。参见约翰内斯·杜·恩斯塔德(Johannes Due Enstad)的《德国占领下的苏联公民:生活,
1941-1944年俄罗斯西北部的死亡与权力》,博士论文,奥斯陆大学,2013年,
54-5。

⁸¹ 第3装甲集团军,IC,《宣传报告(1942.10.15)》,BA-MA RH
21-3/454,第11页。

尽管历史学家普遍误判,认为参加过两次战争的人都是一个不小的群体

红军是由十月革命后出生的青年组成的。⁸²

虽然我们没有按年龄组划分的详细征兵统计数据,但有几个

有很好的替代者。在这场战争中,苏联的伤亡人数不少于

超过 14% 的人在战斗中牺牲时年龄超过 40 岁

德国人;⁸³在那些曾被战时征兵并在 1946 年仍然活着的男性中,28% 属于这样的一代人:

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⁸⁴

回忆第一世界相对温和的囚禁

战争也在家庭内部传播,这暴露出更大的

人数比老兵的情况要多

是唯一的船只。“我叛逃了,因为我的父亲已经

一名士兵说,“在德国被俘期间”。⁸⁵父亲们经常被引用:

“战俘不怕德军”,第 298 步兵团报告

1941 年 8 月,师被夸张地称为“因为他们的

父亲们非常享受在德国被囚禁的生活。”⁸⁶ 1943 年

叛逃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俘虏,

在那里受到良好的待遇。这位兄弟向他的兄弟姐妹建议“他会

如果被部署到德国前线,他就应该叛逃”。⁸⁷其他人则引用了他们的

表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他们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承诺

体面的待遇可以帮助反苏士兵下定决心:

“叛逃者不会为那些毁了他生活的人而战”,正如

157 步兵师记录了其中一位士兵的理由。“他知道

1918 年起的德国人。”⁸⁸ 家庭关系将苏联战俘分为

第 93 步兵师的情报官员声称,有两个小组。

那些有亲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俘的人并不相信

苏联宣传德国暴行;那些没有这样的家庭的人

背景“坚忍地等待着他们的处决”。⁸⁹ 同样,德国传单

⁸² 马克·埃德尔,《我们为何而战?》苏联战争努力中的忠诚

194-1945,《国际劳工与工人阶级历史》第 84 卷,秋季刊(2013 年):248-68,此处:255-8,83 同上。

²⁵⁷。

⁸⁴

马克·埃德尔,《苏联老兵作为权利群体,1945-1955》,《斯拉夫评论》65,第 1 期(2006):111-37,此处:115。

⁸⁵ 18ID (机载),Abt. Ic, Anlagenheft zum Tätigkeitsbericht 1942, 9.1.1942-30.4.42, BA-MA RH 26-18/60。

⁸⁶

298 ID,1941 年 8 月 1 日,BA-MA RH 24-17/171,对开本 149 背面。

⁸⁷

Panzerarmeoberkommando 3,lc,“Zusammenstellung von Gefangenen- und Überläuferaussagen (7.4.43)”,BA-MA RH 21-3/472,第 46 页。

⁸⁸

第 3 装甲部队,lc,“Zusammenfassender Bericht von Überläufer-”

und Gefangenenvernehmungen (20.2.44),BA-MA RH 21-3/540,第 109 页。

⁸⁹

93. ID,lc, Tätigkeits- und Erfahrungsbericht (不晚于 1942 年 5 月 6 日),BA-MA RH 24-26/132。

宣传在故事记忆的情况下最为成功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言论强化了敌人的承诺，
破坏了苏联方面的鼓动。⁹⁰

另一个关于德国战俘营情况的信息来源是解放区的人口。一名战俘
声称

他不相信苏联的暴行宣传，因为当地人
他曾与人交谈过“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⁹¹这个特殊的
士兵是个例外，尽管他并不是唯一一个。⁹²总的来说，
红军战士从他们解放的民众身上学到的是
相反：德国人掠夺、抢劫、强奸和杀戮。⁹³

六

德国和苏联的行动和反应共同造成了极其
强烈的反对投降的动机。到1942年初，他们已经变得强硬起来
进入一个不鼓励叛逃的体系。在一篇德国
政治官员：

维亚斯玛大锅之战期间，传单的效果很好。
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更加残酷的
对政委的监督使得保存传单和
叛逃。还有传说，囚犯们正在遭受
营地里饥荒。。我们的撤退让叛逃变得更加困难
敌人。⁹⁴

鉴于此，上文讨论的 1942 年的数字
章节简直令人震惊。它们表明，只有温和的
重新配置战俘政策（即，结束大规模死亡
集中营）加上坚决的宣传努力和
战争结果不明朗，足以让数以万计的人

背叛祖国，投奔敌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的岁月里，战争的最终
结果却不那么
并且毫无疑问，红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而
德国种族灭绝战争几乎变得无法忽视，

⁹⁰ 18ID (机载), Abt. Ic, Anlagenheft zum Tätigkeitsbericht 1942, 9.1.1942-30.4.42, BA-MA RH 26-18/60.

⁹¹ Panzerarmeoberkommando 3, Ic, Zusammenstellung von Gefangenen- und Überläuferaussagen (24.6.43), BA-MA RH 21-3/472, 第 74 页。

⁹² 另一个例子，参见 296. Inf. Ic 分部，“Anlage zu Gefangenen-Vernehmungsergebnis” 编号。352 和 343, 1943 年 10 月 13 日, BA-MA RH 26-296/107。

⁹³ 参见 Edele 和 Geyer, 《例外状态》，第 390 页。

⁹⁴ Panzerarmeoberkommando 3, Ic, “登费恩德的宣传” 宣传 Feindes (1942 年 1 月 28 日), 第 52-3 对开页。

1943年叛逃者人数仍达数万人,1944年则达数千人。

考虑到苏联士兵加入德军阵线所面临的巨大障碍,德苏战俘中叛逃者的总比例至少是德军西线战俘的三倍,而西线的叛逃条件要低得多,这一事实也值得深思。显然,相当一部分人不仅不愿为斯大林政权而战,而且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脱离这个政权。

4

场景

我

这本书以伊凡·尼基蒂奇·科诺诺夫的故事开始,他下令他的团在自愿越过前线之前投降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为祖国解放而斗争。据他的传记作者说,团级叛逃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二战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叛逃”。¹专业历史学家也指出,这是“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叛逃”。²并且此类事件中“最重要的一集”。³通常被认为“独特”,⁴这并不是混乱的上半年发生的唯一一起此类事件战争。一位精通俄语的德国参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巴巴罗萨行动的最初几周里,“整个部队投降,有时自愿与德军作战。⁵在比亚韦斯托克和明斯克的双重战役中,“12.89、和 103 个步兵师投奔德国,作为标准待遇
6 1941 年 7 月,国防军宣传报告指出
“除了不计其数的叛逃者,甚至连营级单位力量被抛弃,由他们的军官团结和领导”,8月,苏联第60步兵师第2营和第3营 总计

¹ 康斯坦丁·切尔卡索夫,科诺诺夫将军 (Otvety pered istoriei za odnu popytku) (墨尔本:Edinienie, 1963), 140。

² Aron Shneer, Plen: Sovetskie voennoplennyye v Germanii, 1941–1945 (莫斯科和耶路撒冷:《莫斯特文化》, Gesharim, 2005), 144。

³ SI Drobiazko, Pod znamenami vraga. Antisovetskie formirovaniia v sostave Germanskikh vooruzhennykh sil. 1941–1945 (莫斯科: Eksmo, 2005), 52。

⁴ “Der geschlossene Übertritt einer Einheit dieser Größenordnung war einzigartig”。Franz W. Seidler, “Kononow, Iwan Nikitisch”, 载于他的 Die Kollaboration 1939–1945 (慕尼黑和柏林: Herbig, 1995), 290–2, 此处: 290。

⁵ 威尔弗里德·斯特里克·斯特里克费尔特、斯大林和希特勒: 瓦索将军和俄罗斯 Freiheitsbewegung (美因茨: Hase & Koehler Verlag, 1970), 17–19。

⁶ 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 (Andreas Hillgruber) 和格哈德·胡默尔钦 (Gerhard Hümmelchen), 《Chronik》。1939 年 9 月 1 日 1941 年 12 月 31 日, 载于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Wehrmachtsführungsstab) 1940–1945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Bernhard & Graefe, 1961–5), 卷。1: 1940/1941 年, 1149–243, 此处: 1217。

1,500 名士兵 一致向德国第四集团军投降。⁷ “我们一位德国将军在给其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见过整个公司都叛逃。”妻子。⁸ 1992 年接受采访的一位目击者回忆道

在占领波尔塔瓦地区的一个村庄后不久,红军的一个部队数百名陆军士兵在一名上校的带领下投降

1942 年,高加索前线传来整个营级部队叛逃,“由营长领导”。¹⁰最后,许多红军老兵回忆被包围的红军小队投降的情景
爱沙尼亚步枪兵团在 1891 年冬季的 Velikie Luki 战役中
1942年3月11日

还有报道称,有大批部队试图投降,但失败了
因为德国人不会接受叛逃者的条件:

当我们落入德国人手中时,我们的将军转向德国人,
然后他建议他投降我们整个部队,但德国人不要
解除我们的武装,转而用我们来对付苏联。(你认为你的部队会
(你们会同意吗?)我知道80%的人会同意。当时的气氛是这样的
那时,人们感觉自己被命运抛弃了,苏联当局
对士兵的虐待和忽视负有责任。……但是
德国人只是回答“Verrueckt”[原文如此,即 verrückt,“疯狂”]。¹²

部队的有组织叛逃不仅需要
前线另一侧的德国领导人。他们可能
只有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愿望一致的情况下,
罗杰·里斯指出,对军队的自我认同
在红军中很少发生。典型的初级群体

⁷ 奥特温·布赫本德 (Ortwin Buchbender), 《Das tönende Erz: Deutsche Propaganda gegen die Rote Armee im Zweiten Weltkrieg》(斯图加特:Seewald Verlag,1978) ,91, 92-3。

⁸ 戈特哈德·海因里希 (Gotthard Heinrich), 1941 年 8 月 9 日写给妻子的信,载于《德国作家约翰内斯·赫特 (Johannes Hürter)》
东线将军:哥达·海因里希的信件和日记,1941-1942 年
跨。克里斯汀·布洛克斯 (巴恩斯利:笔与剑,2014) ,76。

⁹ Shneer, Plen, 134。

¹⁰ 约阿希姆·霍夫曼 (Joachim Hoffmann), 高加索 1942/43 年:德国之声与东方之声
Sowjetunion (弗莱堡:Rombach Verlag,1991) ,387 (两个案例) ;另外三个案例,其中
没有提到指挥官是否也叛逃:406,415;一个团的情况
由其指挥官领导:407人。

¹¹ Ilia Vershinin, 采访 Ivan Iakovlevich Lisetskii (2012 年 4 月 1 日) ;Karl Petrovich
Villemson (2013 年 3 月 26 日) ;Koppel Isaakovich Svitskii (2013 年 10 月 12 日) ;Arnold Konstantinovich Meri (2006 年 7 月 18 日) ;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瓦加诺夫 (2011 年 8 月 31 日) ;井里
帕夫洛维奇·奥兰 (2013 年 10 月 7 日) ; <http://iremember.ru/memoirs/pekhotintsi/lisetskii-ivan-yakovlevich/>; <http://iremember.ru/memoirs/pekhotintsi/villemson-karl-petrovich/>; <http://iremember.ru/memoirs/pekhotintsi/svitskiy-svitskiy-koppel-isaakovich-itskhakovich/>; <http://iremember.ru/memoirs/pekhotintsi/meri-arnold-konstantinovich/>; <http://iremember.ru/memoirs/minometchiki/vaganov-nikolay-gerasimovich/>; <http://iremember.ru/memoirs/nkvd-i-smersh/aland-uri-pavlovich/> (2015 年 11 月 4 日访问) 。

¹² 哈佛大学苏联社会制度研究项目。附表A,第20卷,案例395,第47页。
(男,33岁,伟大的俄罗斯人,画家。)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

前线的生活只需要五名或更少的战友就能维持,这种低于部队级别的社会融合“是以牺牲整个军事组织的凝聚力为代价的”。

+三

正是这种自发的集体经常一起叛逃,尤其是在1941年之后。例如,1941年8月27日,来自第903步枪团的五名白俄罗斯人一起离开前线,投奔了德国人,四天后,十四名侦察兵也加入了进来。¹⁴ 1942年和1943年,334名叛逃到德国第296步兵师的人中,超过一半(179人,占54%)是集体叛逃的。

这些部队的规模恰好符合里斯对红军主要部队规模的假设:47个双人小组,15个三人小组,5个四人小组,以及各一个五人、七人和八人小组。¹⁵然而,从1941年开始,我们收到了一些并非基于现有军事单位的更大规模部队的报告。在第三章中,我们遇到了一支900人的部队,他们是新近增援的部队,他们的叛逃计划被己方炮火挫败。另一支200人的部队则幸运得多。在一名西伯利亚人的带领下,这些人一路杀向德军防线。当苏联政委试图阻止他们时,这些潜在的叛逃者“杀死了他们,然后继续前进”。¹⁶

二

团体叛逃的门槛更高,因为他们需要内部协调行动,这使得有志于叛国的人面临更高的风险。例如,1942年8月6日,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佩罗夫因企图叛国而被枪决。他们的案件档案莫名其妙地被收录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博物馆的苏联战争罪审判档案中,档案中对事件的经过有两种说法。¹⁷

^{+三} 罗杰·里斯,《斯大林士兵为何战斗:红军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11年),216-27,引文:226。

¹⁴ “Donesenie voennogo soveta 30-i armii voennomu sovetu zapadnogo fronta o prichinakh sdachi v plen krasnoarmeytsev” (1941年9月6日),TsAMO f. 208,同上。2524,d. 2。474-5,重印:弗拉基米尔·巴特舍夫,弗拉索夫:Opyt literaturnogo issledovaniia. Chasti 1-3,第二版。edn。 (法兰克福:Literaturnyi evropeets,2005),136-17,此处:136。

¹⁵ 根据对三个文件中报告的334起案件的分析:BA-MA RH 26-296/97

(1942),102 (1943),107 (1943)。

¹⁶

卡雷尔·伯克霍夫(Karel C. Berkhofer),《绝望的收获:纳粹统治下乌克兰的生与死》(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贝纳普出版社,2004年),12-13。17 Ugolovnoe delo

马利诺夫斯基讲了一个故事。他当时担任一支小部队的指挥官,受命阻止叛逃。他采取了检察官所谓的“挑衅手段”来考验部下们的勇气。五月初,一名士兵发现了一张德国传单,并把它读给了其他几名士兵听。马利诺夫斯基也参与其中,参与了随后的谈话,谈论在德国战俘营里可以过上多么幸福的生活。他的下属随后请他组织他们的越狱行动。

为了找出还有谁可能叛国,马利诺夫斯基又探听了其他人的情况,并从其中一人那里得知,他的两个兄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俘虏,并报告说德国集中营里的生活很好。在确定了所有愿意叛逃的人后,马利诺夫斯基将他们逮捕。根据他的说法,这些人随后密谋将整个计划嫁祸于他,以报复他们的被拘留。

其他四名被告的审讯记录和法庭证词对事件的描述略有不同。在另一种说法中,马利诺夫斯基是叛逃企图的幕后推手,他积极消除部下对指挥官的恐惧,强调红军生活多么艰苦,并指出自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为他的家人在德占区,因此不受苏联法律的管辖(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这个版本中,指挥官有时还会劝说不愿意的下属,直到行动失败后才对整个行动进行谴责。为了保住性命,他声称自己只是想清除部下中的叛徒。第50集团军的军事法庭认为这种说法更可信,判处马利诺夫斯基及其一名同伙死刑,另有三人被判处8至10年监禁。

我们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确定事情的真相。马利诺夫斯基 一位平民 在组织士兵叛逃时是否扮演了某种角色?或者,他是否真的试图与他们一起越过边界,并在叛逃失败后开始充当士兵叛国行为的受害者?无论如何,无论哪种说法都表明,组织哪怕只有五人的叛逃小组是多么危险。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仅到1941年12月,苏联安全部门就阻止了159次集体越过边界投敌的企图,涉及1874名士兵。¹⁸那么,科诺诺夫是如何带领他的整个部队越过边界的呢?首先,这位指挥官带领的叛逃小组的规模存在一些疑问。他可能只带了一名……

¹⁸ AG Bezverkhnyi, SMERSh: Istoricheskie ocherki i arkhivnye dokumenty (莫斯科: Izdatel'stvo Glavarkhiva Moskv, 2003), 26-7。

营,19尽管考虑到一开始的灾难性伤亡水平
这场战争中,作为最了解这场战争的历史学家,
案例指出,“到 1941 年 8 月 22 日,436 步枪的实际尺寸
团级降至营级”。²⁰尽管如此,即使是一个营
数百人 这将是相当壮观的。你不能简单地行军
一支这样的部队向敌军阵线挥舞着白手帕。此外,
我们不能简单地命令他们全部叛逃,因为
忠诚的军队也持有武器,可以射杀叛徒。最后,
叛逃的背景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科诺诺夫本人²¹和他的传记作者
²²都对这个问题含糊其辞,但科诺诺夫的部队
在做出投降决定时确实被包围了;
因此,这也可能是绝望的军事形势所致。
然而,科诺诺夫之前就去过那里,并且在六七月已经
至少,他
不得不决定不再尝试一次。

关于科诺诺夫的这个叛逃过程,我们几个说法

军团发生了。²⁴有些比其他的更可信。亚历山大
索尔仁尼琴的演绎必须反映出这个故事在
苏联地下、古拉格以及低声交谈中
在知识分子中。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位指挥官激励他的士兵
跟随他越过界线:

当时的气氛是这样的:1941 年 8 月 22 日,
第 436 步兵团的科诺诺夫少校公开告诉他的团,他
投奔德国人,加入解放军
推翻斯大林。他邀请所有人,只要他们愿意。不仅
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整个团都跟随他!²⁵

科诺诺夫如何向

“他的军团”在这个叙述中仍然有些不清楚,但他后来
下属、流亡澳大利亚的同志、多产的圣徒传记作者声称

¹⁹ 波兹尼亚科夫致尼古拉耶夫斯基,1948 年 6 月 6 日,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鲍里斯

I. Njcolaeovsky 收藏,盒子 259,文件夹 4,卷轴 220。

²⁰ KM Aleksandrov, “Kononov Ivan Nikitich”, 在他的 Ofiterskii korpus armii General-leitenanta AA Vlasova 1944–1945: Biograficheskii spravocchnik 2nd, rev. 中。edn. (莫斯科: Posev, 2009), 481–510; 此处: 493.504 n. 30。

²¹ 科诺诺夫致尼古拉耶夫斯基,1948 年 4 月 26 日,胡佛研究所档案,鲍里斯

I. Njcolaeovsky 收藏,盒子 259,文件夹 4,卷轴 220。

²² 切尔卡索夫,科诺诺夫将军,1:120-3。

²³ 亚历山德罗夫,《科诺诺夫·伊万·尼基蒂奇》,492-3。

²⁴ 另见马克·埃德勒,《不是一个普通人:伊万·尼基蒂奇·科诺诺夫和 1941-1945 年红军前线叛逃问题》,《澳大利亚军事杂志》
政治与历史,62,第4期 (2016) :546-60。

²⁵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Aleksandr Solzhenitsyn) Arkhipelag GULag 1918–1956: Opyt khudozhestvennogo issledovaniia, VI–VII (巴黎: YMCA Press, 1975) ,32。

这场演讲发挥了重要作用。康斯坦丁·切尔卡索夫 (Konstantin Cherkassov)并未亲眼目睹这一幕,他描述了一位英雄人物在完全掌控局势的情况下实施一项长期计划的过程。据此记载,科诺诺夫利用其部队在撤退的第155步兵师后卫的位置,将他的团与其他苏军部队拉开距离。随后,他派一名军官送信给德军;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命令军官们开会,会议周围都是他知道可以信赖的部队。他阐述了叛逃并反抗斯大林的计划,并承诺为那些不愿追随他的人提供安全保障。不出所料,没有人愿意留下。

接下来,科诺诺夫召集了他的士兵并向他们通报了这一计划,再次获得了普遍的赞誉。²⁶切尔卡索夫

的叙述比索尔仁尼琴的叙述具有更丰富的实证内容。

我们需要强调两个方面:该部队与苏军其他部队失去了联系;科诺诺夫非常惧怕他的同僚,因此派部队包围了会议现场。我们不必相信科诺诺夫主动制造了该团的包围圈,但包围本身才是关键所在。只有当与苏联军事政治权力结构的联系被切断后,整个部队的叛逃(无论是预谋的还是自发的)才有可能实现;正因如此,1941年总体上是部队叛逃的一年。其次,即使在包围圈内,来自效忠派部队的威胁依然存在,只有巧妙地部署兵力才能确保叛逃者的安全。

索尔仁尼琴和切尔卡索夫都是在征得官兵同意后才结束叙述的。两人都没有解释,一旦决定跨越前线,整个部队将如何行动。

科诺诺夫在接受一份由战争期间的军事合作者制作并为其服务的报纸的采访时,报道了这个故事的这一方面。采访还提供了更多关于与军官们进行决定性会谈的过程的细节。根据对事件的描述,直到该部队与其他部队的联系被切断后,科诺诺夫才将他的计划透露给了他的一位最亲密的同僚,随后他派这位同僚前往德国,就投降的细节进行谈判。这一描述模糊了针对军官们的武装威胁的重要性,并忽略了会议被武装部队包围的事实。然而,它确实提到了团政委此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是被科诺诺夫或其同僚杀害,还是逃跑了,目前尚不清楚,但主要领导人的失踪

²⁶ 切尔卡索夫,科诺诺夫将军,1:120-3。

共产党代表是科诺诺夫叛逃之谜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报告还指出了—个重要的细节：会议结束时，科诺诺夫命令他的军官们交出武器，然后让他们卸下武器，返回部队，命令他们将步枪架在胸墙上，等候德军。科诺诺夫本人是唯一保留手枪的军官。记录中没有提到他试图征求部队的同意。在集结的部队面前，没有激烈的反斯大林主义演讲，也没有对领导人的热情欢呼。事实上，在与军官们会面后，科诺诺夫根本没有与普通士兵接触，而是和其他十名军官一起等待，直到他被告知德军在树林边缘等着他。他和他的下属指挥官（人数似乎已减少到三人）一起前往指定地点，向德军投降。他们告诉他，他的团已经顺利投降。²⁷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科诺诺夫得到了一小队指挥官和一些武装部队的支持，他们可以阻止任何可能对领导层叛逃和普通士兵投降的抵抗。虽然科诺诺夫和他的三名同僚直接与德军交锋，但该团的其他成员则遵从命令，在敌军靠近时投降。由于此次投降是在消灭被包围的苏军部队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德军并未将该部队的行为视为叛逃，而只是将领导层的自愿投降归类为叛逃。²⁸

三

显然，要使整个部队在其指挥官的领导下叛逃，必须同时满足—组独特的情况：军事单位需要

²⁷ A. Iaganov, V pervoi kazach ei: Ocherk vtoroi. U Kononovtsev „Na Kazach em postu. 《国民自卫队》第37期（1944年11月1日）：11-12（其中提到科诺诺夫与十名指挥官—起等待德军，但没有说明有多少人—起抵达投降地点）。关于同伴人数，请参见开头的“3”。

Panzer-Div./Ic, “Verhör des Majors Kononow Kommandeur des 436. SR/155 SD”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弗莱堡, 德国 (BA-MA) (BA-MA) RH27-3/ 170, 第 73-5 对开页, 此处: 第 75 对开页。

²⁸ 这一版本解释了为什么第一份审讯记录中只提到了三名同谋叛逃者——参见第27号注释。伊戈尔·彼得罗夫和奥列格·贝达提出的另一种解释是，他们仅关注德军的审讯报告，并得出结论，认为科诺诺夫确实没有率领他的团越过苏联。参见他们撰写的《苏联》，收录于大卫·斯塔赫尔编著《加入希特勒的十字军东征：欧洲国家与苏联入侵，1941》（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即将于2017年出版）。

仍然能够发挥作用,没有瓦解到无法传达命令或无法执行命令的程度;它必须由一位对苏联政权怀有怨恨并愿意与纳粹同流合污的指挥官领导;部队内部的忠诚力量需要相当弱,强制忠诚的正式手段(政委、政治特遣队、特别科室)需要被摧毁或至少被削弱;负责的指挥官需要得到下属和至少一些人的支持,以使用武力消灭那些可能反对这一行动的人;最后,必须有机会跨越前线,必须能够与德国国防军进行谈判,德国同行必须愿意接受叛逃,而不是称这种想法为“疯狂的”(verrückt)。

所有这些情况在1941年8月22日科诺诺夫叛逃事件中都存在。根据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出的分类,这次叛逃可以归类为一次相当纯粹的集体叛逃。它包含两种理想类型来指导我们的分析:叛逃者和俘虏。前者是积极尝试跨越前线并执行计划的人;后者是战斗到最后一刻,仅在身体无法继续抵抗时被俘的士兵。

1941年的许多集体叛逃事件相当接近理想情况,因为这些团体的成员需要协调行动,从而做出叛逃还是继续抵抗的决定。但即便如此,情况也往往不那么明确。1941年的许多集体叛逃事件甚至比科诺诺夫的案例更加模糊。1941年,一群群掉队者在前进的德军后方徘徊。他们不确定是应该投降,还是试图返回自己的防线,还是躲藏起来,其中一人在一位讲俄语的德国参谋人员接近他们时放弃了。²⁹这些人并没有主动寻找叛逃的机会,但一旦机会出现,他们就会迅速抓住。

在1941年的前线现实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摇摆不定、机会主义和两面下注的现象。以乌克兰人阿尔卡季·瓦西里耶维奇·布克利耶夫为例。他出生于1913年,是乌克兰中部一个农民的儿子。1920年,他早年丧父,但一直和母亲一起住在自家的独立宅基地(khutor)里,直到1930年。同年,他逃离集体化,搬到顿河畔罗斯托夫,在那里开始在一家砖厂工作,最终成为一名会计。他结婚了,拥有自己的房子,是一个有三个儿子的居家男人,战后他回到了他们身边。他从1936年开始定期接受军事训练,1940年被派去参加预备役指挥官的培训课程。

²⁹ 威尔弗里德·斯特里克·斯特里克费尔特(Wilfried Strik-Strikfeldt),《斯大林与希特勒:将军 Wlassow und die russische Freiheitsbewegung》(美因茨:Hase & Koehler Verlag,1970年),16。

毕业后,布克瑞耶夫在驻扎在别尔季切夫镇的一个步枪师服役,担任过多个初级指挥职务,直到1941年7月。³⁰

在那灾难性的一年的7月4日,他被德军俘虏。战争伊始,他的部队就一直驻扎在乌克兰文尼察地区的防御阵地。6月27日起,他的师向扬波尔(Yampil)市发起战斗撤退。他们在城南挖掘战壕,但很快便被包围。他试图突围并抵达苏军防线时被捕。战后,一名安全官员对他进行了审讯,试图查明他是“被俘”(popal v plen)还是“投敌”(sdal sia v plen)。

阿尔卡季·瓦西里耶维奇被问及为何不抵抗俘虏?他回答说:“我们无法抵抗敌军,因为我们没有武器。”武器在哪里?他有一把没有弹药的手枪,在被捕前不久,他把枪连同军官证和一张地图一起扔掉了。审讯者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他准备投降?答案是否定的。布克列耶夫从未打算投降敌人。他扔掉这些东西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虽然苏联官员认为这无异于叛国,但这些决定却相当理性。作为一名指挥官,布克瑞耶夫一旦被捕,必然会被枪毙。虽然德国的处决令(“政委令”)只适用于政治官员,但在红军内部,人们通常认为所有指挥官都将被处决。³¹因此,通过摆脱军衔标志、地图、手枪、证件来掩盖自己的身份,是一种明智的生存策略。如果没有弹药,手枪根本派不上用场,而一个不那么多疑的政府甚至可能会赞扬在这种情况下销毁地图,因为这种行为可以防止对手获取有用的情报。这些预防措施并非直接表明投敌意图,而是可以被视为一种防范最坏情况的保险措施。同时,它们也使布克瑞耶夫失去了理想典型意义上的俘虏资格,即苏联人要求其士兵成为的那种英雄。相反,这个人显然渴望活下去,无论战争与否。

³⁰ 布克瑞耶夫的故事是根据苏联安全机构创建的战争罪审判档案(编号为USHMM RG-06.025*12)重建的。我特别查阅了他的逮捕问卷(anketa)、苏联当局的几份审讯记录(1950年10月30日、1950年12月19日、1951年1月8日、1951年1月25日)、起诉书(obvinitel'noe zakliuchenie,1951年8月)以及法庭开庭记录(1951年11月3日至5日)。为了尽量减少脚注,我仅引用了本档案中未包含的补充材料。

³¹ 参见马克·埃德尔(Mark Edele)的《不抓俘虏:红军和德国战俘,1941-1943》,《现代史杂志》88(2016):342-79,此处:368。

因此,布克瑞耶夫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边缘叛逃案例,在我们的分类中更接近于俘虏。他所代表的那种情况——最终放弃的掉队者——在1941年很普遍。这种情形逐渐演变成更积极的投降尝试。哈萨克斯坦人T·O·萨吉托夫的情况更进一步。1941年夏天,他的步兵团被困在众多德军炮火中的一个炮火堆里。7月21日,正如他的战后起诉文件所述,他被德军“意外俘虏”。德国国防军审讯了他,并派他回去,任务是在战友中鼓动叛逃。他成功地重新融入部队,没有引起怀疑,但仅仅几天后,在7月23日至24日夜,他利用值班时间擅离职守。这一次,并非偶然:他是自愿投奔德军的。³²

四

正如萨吉托夫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叛逃的那一刻需要放在这些人的长期轨迹中去理解。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M.,一位农民出身的俄罗斯工人,出生于1919年,在一次突击队行动中叛逃,目的是抓捕“舌头”(苏联人称之为“舌头”):那些为了情报目的而接受审讯的囚犯。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投奔德国人,这只是他战争生涯中的一个瞬间,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称之为“生存主义者”。1941年,他在维亚兹马附近被德军俘虏,亲眼目睹了德国国防军临时战俘营的恐怖。1950年,他在慕尼黑担任摄影记者时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在这座战俘营里,他整整十七天没吃东西,他清楚地记得那些被俘士兵的手和脸都变黑了,还有他们死了多少人。年轻的士兵似乎还能活得久一些,但他觉得,如果自己在这个战俘营里待得太久,必死无疑。于是,他干脆逃出了战俘营。他对这次逃亡毫不在意,他说“我别无选择,无论如何都会死,所以我就冒险离开了。”³³

³² 参见他的战争罪审判记录,USHMM RG-74.001,文件夹 5。关于德国将自愿俘虏送回自己的战线以鼓动叛逃的策略,请参见 Franz W. Seidler, *Fahrenflucht: Der Soldat zwischen Eid und Gewissen* (慕尼黑: Herbig, 1993), 111; 和 “Spravka o faktakh izmeny rodine v chastiakh deistvuiushchei Krasnoi Armii” (1942年7月15日), RGASPI f. 17, 同前。125.d. 85, 伊利诺伊州。58-9。

³³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M. 为笔名。访谈记录未注明其姓名。哈佛大学苏联社会制度项目,附表A,第2卷,案例20,第17-18页。(男,31岁,俄罗斯裔美国人,金属车床工人。)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回到了父母的村庄,该村庄现已被德国占领,他在那里平静地生活了一年半。

1943年,战争再次降临到他头上。红军解放他的村庄时,他患上了斑疹伤寒,这使他无法像其他许多村民一样做出选择:与其等待苏联人,不如跟随德军撤退。即便我们现在知道,按照苏联的标准,对1939年以前的领土进行重新苏维埃化相对来说较为谨慎,但促使他逃亡的恐惧并非毫无道理。³⁴很快,内务人民委员部就围捕了“所有剩下的18岁至50岁之间的人,这次是8人”。他们被押送到另一个村庄,在那里进行了24小时的“过滤”。在一次不时受到暴力威胁的审讯后,他被释放,只得到一句“好吧,我们会带你回去,但你必须通过为红军战斗来赎罪。”他因在村里过着平静的生活而受到惩罚。他被告知应该加入游击队,但他否认自己曾有过这样的机会:他住的地方附近没有游击队。由于这一疏忽,他被送往一个惩戒部队,接受在德军后方执行任务的训练。

至少,他受过训练,即使“训练”这个词或许只是他所经历的委婉说法:训练非常严格,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很多方面的情况都和集中营

里差不多。他想不出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条件了,他们睡的床只是木板,每天的定量是六百克面包、两块糖、用嫩三叶草熬成的汤……而且他们没有茶。

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准备,他们被派往前线。他的部队装备简陋,而且“非常饥饿”,因此被派往前线:工兵清理了苏军战壕前的地雷,大队继续执行任务。他们遭遇了大批装备精良的德军;他们的指挥官突然失踪;大队解散了。

当他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时,他懂几句德语,对德国人说:“同志,别开枪。”他们让他站起来,然后他就被抓了。他不想再回去(在劳教所)承受必死的命运,而且他也觉得有可能逃脱德国人的追捕。

毕竟,他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³⁵

³⁴ 关于逃离红军回归以及与德国人一起撤离(驱逐)的情况,请参阅马克·埃德尔(Mark Edele)的《二战作为流离失所的历史:以苏联为例》,《澳大利亚历史》第12卷,第2期(2015年):17-40页,此处:36-8页。关于苏联回归后发生的事情,请参阅瓦内萨·沃辛(Vanessa Voisin)的《苏联反对叛乱:苏联净化(1941-1955)》。(巴黎:索邦大学出版社,2015年)。

³⁵ 哈佛大学苏联社会制度研究项目。附表A,第2卷,案例20,第18-23页。

五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叛逃是战时传记中合乎逻辑的一步,这段传记充斥着双方的胁迫,以及他为了在这场磨难中生存下来的决心。另一位叛逃者的战时经历进一步说明了叛逃如何融入更广泛的生存主义选择之中。档案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简称他为伊万吧。³⁶他的故事开始于一家传染病医院,当时他正在那里从一种不知名的疾病中康复。康复后,他于1943年2月被送回军队。通常情况下,他会和其他几名康复中的士兵一起行军,这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减少逃兵的方法。³⁷但伊万是一名滑雪教练,他原来的滑雪营需要他,所以他独自一人前往,带着医院的行军令 (spravka),上面列出了他所在的部队和他必须到达的时间(三天),但没有列出部队的具体位置。正是这种保密措施让伊万得以自由行动七十二小时,最终他潜逃至莫斯科。他先是跳上了一列货运列车,然后又没买票,转乘了一列客运列车。途中,他的证件被多次检查,但无人问津。只要他的行军令期限未到,他只需说他的部队部署在莫斯科地区,巡逻队就会放行。就这样,他成功抵达莫斯科。抵达后,站台已被安保人员包围,以确保没有合法证件的人无法潜入首都。伊万的行军令再次保护了他,他安全通过了检查。他将在莫斯科非法停留一年。

如果没有强大的帮手,在极权主义的苏联首都,谁也藏不住。伊万很快就找到了这样的庇护所,而且他找到的显然是电影院。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战争遗孀,她把他带回了家。她将成为他众多同居女性中的第一个。起初,他假装休假,考虑到他几个月前在前线的工资都带了过来,他也能为家庭收入做出很大贡献。很快,

³⁶ Abw. Kdo. 103 至 Ic/AO,1944 年 4 月 23 日 :BA-MA RW 49/615,文件 C。

³⁷ 从军医院到部队途中开小差的情况屡见不鲜,以至于军方领导层直到1944年才下令对遣返部队的士兵进行更严格的管控。参见瓦西里耶夫斯基元帅1944年5月30日第0150号命令第7段,转载于RA/VO第13/2卷(3),第290-2页,此处:第292页。

然而,他的资金耗尽了:在莫斯科,没有配给卡,每天需要200到300卢布。此外,鉴于他需要定期躲避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巡逻,而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控制私人住宅,以检查像伊万这样的非法移民,他的伙伴们一定已经清楚,他并非伪装的那个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继续为他提供住处和食物。考虑到后方饥荒的状况,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牺牲。³⁸然而,到了1944年1月,他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他需要找到谋生之道。他已经从事非法贸易,于是决定前往塔什干,据说那里可以“获得”稀缺商品,然后他计划将这些商品在莫斯科的黑市上出售。一位与他结识的残疾

退伍军人给了他一张空白的行军令,另一位熟人——一位打字员——帮他填写了。他凭借这份文件设法弄到了一张火车票,平安抵达塔什干,在那里待了四天,然后返回首都。³⁹伊万的运气在1944年2月28日走到了尽头。潜逃近一年后,他在莫斯科街头被众多巡逻队之一拦下。由于他伪造的行军令已经过期,他被逮捕,被控逃兵罪,并被送往维捷布斯克附近的一个惩戒营。在这里,他抓住了第一个机会投奔了德国人。

这一举措与他前一年的行为一致:显然,伊凡对参加斯大林战争毫无兴趣;劳役部队的生活极其危险,他很可能希望通过越过前线来保全自己。⁴⁰我们将在第五章了解到,他的这一假设是错误的。

在伊万或谢尔盖这样的案例中,叛逃并非预谋行为,而是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不断累积选择的结果。尤其是在德军后方的散兵游勇,往往首先会试图回家。费多尔·P.是一位长期担任营政委的党员,他的部队于1942年6月在一次大火中被摧毁后,他在德军后方徘徊了20天。他试图步行返回家乡。由于对自己能否成功感到绝望,他试图

³⁸ 关于民用粮食供应,请参阅威廉·莫斯科夫(William Moskoff)的《苦难的面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粮食供应》(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以及温迪·Z·戈德曼(Wendy Z. Goldman)和唐纳德·菲尔策(Donald Filtzer)编的《饥饿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粮食供应》(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15年)。

³⁹ 有关战争年代黑市普遍性的资料,请参阅Julie Hessler的《苏联贸易社会史:贸易政策、零售实践和消费,1917-1953》(普林斯顿和牛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9-89页。

⁴⁰ 关于惩戒部队的生活,请参阅Vladimir Daines的《红军的惩戒部队》(莫斯科:Eksmo,2008年);以及Alex Statiev的《红军中的惩戒部队》,《欧洲-亚洲研究》第62卷,第5期(2010年):721-47页。

他决定放弃之前,在树林里躲了四十八个小时,才最终决定放弃。由于极度饥饿,他离开藏身处寻找德军哨兵,扔掉枪,投降了。⁴¹费奥多尔·P很幸运:那年早些时候,原本会立即处决他的政委命令被暂时搁置。⁴²

六

费奥多尔·P只需离开藏身的树林即可叛逃;科诺诺夫和他的士兵被包围,可以引诱德军前来,而德军一旦前来,他们无需抵抗;萨吉托夫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因为他在防线薄弱的前线担任警卫,得以潜逃;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则在己方协助下越过前线执行突击任务。他们被德军俘虏的途径,在纯粹的叛逃和理想化的俘虏之间,处于不同的阶段。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叛逃之前,他们都以某种方式克服了阻碍士兵穿越前线的各种障碍。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有些人利用了他们掌握的技术。飞行员可以随飞机叛逃,尽管关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叛逃的指控是错误的:德国人会利用政治局委员子女叛逃来宣传。⁴³事实上,在这些精锐部队中,空中越线逃兵相对罕见:从1943年初到1944年4月初

⁴¹

¹⁸ ID (mot) Jc, "Anlagen zum Tätigkeitsbericht.1.5.1942-24.8.1942" ,BA-MA RH 26-18/62, 42马克·埃德勒,《向敌人学习?《德苏战争的纠缠历史,1941-1945》,载于《极权主义独裁:新历史》。

编

辑: Daniela Baratterri, Mark Edlele 和 Giuseppe Finaldi (伦敦:Routledge,2014) ,190-211,此处:199。

⁴³

有关该指控,请参阅“Vnuchka Nikity Khrushcheva podala v sud na Pervyi kanal za ochernenie otsa”,<http://www.newsru.com/> (2008年8月7日访问),<http://www.newsru.com/russia/07aug2008/hrushev.html> (2016年8月16日访问)。俄罗斯维基百科(vi-kipediia)也将所谓的叛逃报道为飞行员死亡的“不同版本”,但并未予以认可。https://ru.wikipedia.org/wiki/Хрущёв,_Леонид_Никитович (2016年6月23日访问)。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赫鲁晓夫是在战斗中阵亡的。参见,例如,VA Torchinov 和 AM Leontiuk, Vokrug Stalina: Istoriko-biograficheskii spravochnik (圣彼得堡: Filologicheskii fakul tet Sankt-Peterburgskogo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 2000), 519-20;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纽约:Vintage Books, 2003年), 453; 希拉·菲茨帕特里克 (Sheila Fitzpatrick), 《论斯大林的团队:苏联政治中危险生活的岁月》(墨尔本:墨尔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165。

威廉·陶布曼在《赫鲁晓夫:他和他的时代》(纽约:WW·诺顿出版社, 2003年)一书中指出,德国人会利用列昂尼德进行宣传,第157-158页。有关列昂尼德记忆的有力辩护,请参阅尼娜·L·赫鲁晓娃的《失落的赫鲁晓夫:俄罗斯心灵的古拉格之旅》(野马出版社:泰特出版社, 2014年)。

次年,此类案件有 86 起。44 坦克提供了另一个机会,但这里最著名的装甲车叛逃故事再次成为一个神话。它实际上是基于斯大林对证据的误读。第 28 集团军司令弗拉基米尔·亚科夫列维奇·卡恰洛夫中将于 1941 年 8 月在其部队被包围时莫名其妙地失踪。8 月 11 日,一名军事检察官报告说,8 月 5 日,将军发现了一份鼓励投降的德国传单。他大声读给他的军官们听,并询问是否有人需要印在传单上的通行证,这张通行证保证叛逃者安全通行。站在附近的人以为这是个玩笑,但也反驳说他们队伍里没有叛徒。“在这种情况下,它对我来说很有用”,指挥官宣称,并将传单放在口袋里以备将来使用。这也是一个玩笑。然而,当他弄来一辆坦克,驶向前线,从此杳无音讯时,这些话开始在他的下属听来不祥。谣言很快传到了调查机构,说这位将军确实叛逃到了德国人。卡恰洛夫失踪前行为的目击者受到了讯问,调查结果报告被上报上级指挥系统。45 斯大林勃然大怒,在 8 月 16 日的第 270 号命令中点名批评了卡恰洛夫:

第 28 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中将连同其指挥部一起被包围,却表现出怯懦,向德国法西斯投降。卡恰洛夫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部突破了包围圈,卡恰洛夫集团军各部队奋力杀出重围,但卡恰洛夫中将却选择投降,选择投敌。⁴⁶

这个故事妙趣横生,尤其是那些命令中未提及的细节:将军阅读德军传单,与下属调侃,以及在驾驶坦克叛逃前开玩笑说这东西可能有用。不难想象,德国人一定为他们的“敌中宣传”取得如此惊人的效果而兴奋不已。

然而,德国人并不高兴,因为这个故事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错的。首先,传单事件和卡恰洛夫的

⁴⁴ “Bericht der Amtsgruppe für Wehrmachtpropaganda” (1944 年 4 月 27 日),重印于 Buchbender, Das tönende Erz, 330-2, 此处: 331。

⁴⁵ 波姆。glavnogo voennogo Prokurora Krasnoi Armii, Rozenblat 至 Glavn. 沃恩。Prokuror KA: “Dokladnaia zapiska” (1941 年 8 月 11 日)。Dmitrii Antonovich Volkogonov 论文,手稿部,国会图书馆,华盛顿特区,容器 6,卷轴 4。

⁴⁶ 最高统帅部订单号 270, 1941 年 8 月 16 日,发表于《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第 1 期。9, 1988, 26-8; 这里: 27。

失踪发生在8月4日。到5日,将军已经死了。正如一份德国报告指出的那样,他在战斗中阵亡。他的坦克试图突破孤立无援的第145师,被炮火全歼。火灾。战后,斯大林的国家安全部门采访了当地居民,确认将军阵亡。他被安葬在一座墓地中。

五号墓。⁴⁷

这是斯大林“恶意”的体现,他“想为自己的军队转嫁罪责”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斯摩棱斯克的失败是他个人的错误还是他下属军事指挥官的错误”?⁴⁸毫无疑问。

然而,考虑到他收到的信息,独裁者可能相信卡恰洛夫有罪是可以原谅的。确实有案例坦克协助叛逃。1942年8月,第16装甲师报告称,“1辆T-34坦克叛逃(übergefahren)。连同其

俄罗斯机组人员加入了我们的进攻,摧毁了两辆敌方坦克。

大约在同一时间,第三摩托化步兵师登记了两个T-34的情况就是如此,其乘员也将火炮转向苏联方面。⁴⁹这种情况一定特别令人震惊,因为坦克部队是精锐部队之一,由特别忠诚的苏联青年。⁵⁰

还有报道称,指挥官驾驶坦克叛逃,就像当局怀疑卡恰洛夫所做的那样。一名幸存者记得1942年初在德国被包围的三个月以下条款:

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这三个月的噩梦。突然间,我们的营政委失踪了。他的尸体至今仍未找到……第一个叛逃者(perebezhchiki)出现在叛逃到德国人开始了。有一件事特别令人震惊。我们修复了一个坦克,收集了二十多枚炮弹,用其他机器。我们的连长是一名共产党员和干部连长,拿了这辆坦克。他把坦克开进了白雪皑皑的原野……然后消失后,德军未发一枪就投降了。⁵¹

⁴⁷ Leonid Reshin 和 VS Stepanov, “Iz foldov voennykh arkhivov: 将军的南方” - 天空, Voен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 8 (1993) :20-7.

⁴⁸ 亚历山大·A·马斯洛夫,《阵亡的苏联将军:在战斗中阵亡的苏联将领》1941-1945 (伦敦:弗兰坎克斯,1998年),17.

⁴⁹ 奥特温·布赫本德和霍斯特·舒赫,《Die Waffe, die auf die Seele zielt: 心理学》Kriegführung 1939-1945 (斯图加特: Motorbuch Verlag, 1983), 121.

⁵⁰ 欲了解这些精锐部队及其战争的独特视角,请参阅安娜·克里洛娃(Anna Krylova)的《苏联战斗中的女性:东线暴力史》(剑桥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

⁵¹ Grigori Koifman, 2006年10月17日采访 Mikhail Kusilevich Badanes, <http://iremember.ru/memoirs/tankisti/badanes-mikhail-kusilevich/> (2015年6月18日访问)。

坦克或飞机等高科技设备是投奔敌人的绝佳方式,但它们并不是跨越前线的必需品。

当德军推进、苏军撤退时,只要从军队中开小差躲起来,等待德军就足够了。如果德军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迅速赶来,平民可以指出最佳的潜入地点,然后按照他们的建议,找到另一边的德军部队,然后投降。⁵²

七

因此,情况多种多样。一些叛逃者是作为有组织的整队逃兵而来的;更多的人是以小规模队伍而来的;还有大约同样多的人是单独而来的。只需让前线过去就可以轻易越过,这在1941年是一个特别可行的选择,但在战争后期也有可能;其他人则利用前线的漏洞,利用飞机或坦克越过前线,或者在被派去参加进攻或突击行动后潜逃。

一些关于叛逃的描述让人联想到一幅近乎田园诗般的画面,比如那位被击落的飞行员看到两名德国士兵在篝火旁取暖。他走近他们,站在他们旁边,一开始一言不发,享受着火焰的光芒。德国人不理会他。然后他摘下手枪递给他们,用蹩脚的德语询问师部在哪里。根据德军对此事略带恼怒的汇报,他不得不“强行”爬上“兰瑟”战车,他们才会注意到他的叛逃行为。⁵³其他叙述 其中一些已经被叙述过 集中讲述了如何逃避双方施加的暴力,这些叙述既可以归类为逃离前线的叙述,也可以归类为叛逃的叙述。

然而,很多时候,这种逃亡本身就是一个暴力过程。

我们已经指出,科诺诺夫的叛逃至少依赖于对其军官的暴力威胁、包围他与军官的会面以及在此过程中没收他们的武器。我们还指出,该团政委的不明原因失踪可能比记录中描述的更加险恶。如果真的有一名潜在的叛徒消灭了政委,在这场战争史上并非罕见事件。鉴于苏联的协同努力

⁵² 绿色荧光蛋白 B. XVII AK, Vernehmungsbericht, 11.2.42, BA-MA RH 24-17/299, 第 43 对开。

⁵³ 21.ID, Abt. Ic, Nr. 1154/42 geh., Feindnachrichtenblatt Nr. 2, 格海姆, 1942 年 11 月 11 日, BA-MA RH 26-21/75, 对开本 472。

迫使士兵继续战斗,个人叛逃和

小团体经常依靠暴力来化解来自指挥官或政治官员的威胁。一位指挥官后来讲述了他的

士兵们割断了政客的喉咙后潜入树林,

促使“血泉”涌向天堂。⁵⁴德国对叛逃者的汇报充斥着指挥官在执行任务时被枪杀的故事。

试图阻止叛逃;⁵⁵处决政治家⁵⁶和指挥官,以自卫为由;⁵⁷谋杀共产党员

派去执行任务的成员负责监视(必要时

用枪管)对忠诚度存疑的指挥官进行打击;⁵⁸或清算

不愿意叛逃的同志。⁵⁹有时,

一个人的手臂随意地指向一名警官的方向,同时向

向他提出了叛逃计划。⁶⁰恶毒地殴打苏联代表

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也会被授予权力,直到他们停止抵抗。⁶¹但通常情

况下,指挥官、政治家、哨兵,或者仅仅是忠诚的军官和

试图阻止叛逃的士兵被杀害。⁶²

⁵⁴ V. Valentinov, “Wie ich Kollaborateur wurde” 打字稿回忆录,1952年,Bakhme-苔赫档案,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收藏,第23页。

⁵⁵ 第十七AK将军,Abt. Ic: Zusammenfassender Bericht über

Gefangenen-Vernehmungen (26.-30.6.1941) (1941年7月2日),BA-MA RH 24-17/170,对开本101。

⁵⁶ 第二十六将军司令部。Armeekorps, “Tätigkeitsbericht Ic,1.6.1941-20.8.1941”, BA-MA RH 24-26/125,对开本15。

⁵⁷ 299. ID.Ic.Betr.:Gefangenenvernehmung (1941年7月12日),BA-MA RH 24-17/1871,对开本30。

⁵⁸ 党卫军第8步兵团(机动部队),Abt. Ic,Vernehmungsniederschrift,1941年8月18日,BA-MA RH 24-17/172,对开本11-12,此处:12。

⁵⁹ 18.ID (mot),Abt. Ic,Tätigkeitsbericht Ic,1.5.1942-31.12.1942,BA-MA RH 26-18/61.60

⁶⁰ Reese,《斯大林的士兵为何战斗》,87。

⁶¹ Vernehmungsbericht,1941年11月21日,BA-MA RH 24-17/173,第84对开页。

⁶² Shneer,Plen,142;Reese,《斯大林的士兵为何战斗》,168;Daines,《Shtrafbaty》,154。

5

个人资料

我

那些冒着巨大风险跨越前线的人是谁？

他们代表了苏联广大民众吗？1941年8月22日那位引人注目的叛逃者伊万·尼基季奇·科诺诺夫又有多大的代表性呢？

红军叛逃者广泛代表了苏联社会。我所说的“广泛代表”并非指叛逃者的整体社会学、世代和种族构成与其所属人群之间存在精确的统计相关性。考虑到红军的俄罗斯血统和男性成分比总体人口更多，而且只从特定年龄段招募，筛选出非常年轻和非常年长的男性，这种关系极不可能存在。同样明显的是，非俄罗斯民族、老年人群和劳动阶级比其他人群更容易叛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非斯拉夫人构成了叛逃者的大多数。相反，自愿越过前线的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年轻的俄罗斯男性。此外，在那些背叛斯大林政权的人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任何可以想象的苏联男性人口的代表。因此，虽然叛逃者明显偏向特定的少数群体，但他们来自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换句话说，他们是相当普通的苏联公民。

相比之下，科诺诺夫则不然：他的社会学特征远不及统计上的中间值。¹科诺诺夫之所以普通，是因为他是一名男性——就像绝大多数脱北

者一样。在五年间对各种资料进行广泛研究后，我竟然没有找到任何一位女性脱北者的例子。这种缺失无法用军队中女性人数不足来解释，因为军队中有多达80万女性服役。原因另有其他。部分原因是女性士兵的自我选择，因为她们更年轻，更信奉共产主义，

¹ 另见马克·埃德勒，“不是一个普通人：伊万·尼基季奇·科诺诺夫和红军前线叛逃问题，1941-1945”，《澳大利亚政治与历史杂志》62，第1期。4（2016），546-60。

她们比普通红军士兵更适应城市生活,也更有斗志,所有这些特质都降低了她们叛逃的可能性。她们大多担任支援角色,因此叛逃的机会比前线任务更少。此外,女兵在德军手中可能遭受的残酷对待,以及德军士兵不太可能将女战俘视为叛逃者,也是其他因素。²

二

德国的报告让我们初步了解了这些叛逃者的身份。巴巴罗萨行动失败后,德军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比最初预想的更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危机导致德国重新调整了战争策略,从闪电战转向了长期的消耗战。³在此背景下,德国军官开始对苏联叛逃者的构成更加感兴趣,试图研究如何削弱红军的战斗力。1942年11月,第3装甲师的情报官员将他们分为四类:

1. 所谓“不可靠的民族部落”(Volksstämme)的成员,主要来自高加索地区,由于在苏联时期遭受的恶劣待遇,他们决心一有机会就叛逃。他们希望德国军队能够解放他们的家园,让他们摆脱布尔什维克的奴役。

² 有关这些数字的讨论,请参阅 Mark Edele 的《二战中的苏联老兵:威权社会中的民众运动,1941-1991》(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页。关于红军女性的经典口述历史是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战争中女人面孔》,由 Keith Hammond 和 Lyudmila Lezhneva 译(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8年)。最近,这个话题又重新受到关注。请参阅 Anna Krylova 的《战斗中的苏联女性:东线暴力史》(剑桥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Roger Reese 的《斯大林的士兵为何战斗:红军在二战中的军事效力》(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章和第12章;罗杰·D·马克威克(Roger D. Markwick)和尤丽迪丝·卡多纳(Euridice Cardona),《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线的苏联妇女》(Houndmills: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2年)。

³ Christian Hartmann,《东方战区的国防军:1941/42年的前线 and 军事腹地》,第二版(慕尼黑:R. Oldenbourg Verlag,2010年);Mark Edele 和 Michael Geyer,《例外国家:1939-1945年的纳粹-苏联战争暴力体系》,载 Michael Geyer 和 Sheila Fitzpatrick 主编《超越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比较》(剑桥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5-95页;以及 Mark Edele,《向敌人学习?1941-1945年德苏战争的纠葛历史》,载 Daniela Baratieri, Mark Edele 和 Giuseppe Finaldi (伦敦:Routledge,2014),190-211。

2. 那些传记上有政治污点的人,迟早会
必须面对严厉的惩罚,因此宁愿被囚禁也不愿
命运掌握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手中。
3. 红军士兵宁愿被俘,也不愿
目前的情况是,由于部队待遇差(饥饿,
虐待、监视、死刑威胁等)。
4. 红军士兵因不断失败而厌倦战争
以及苏联的损失。特别是当他们的家园已经
在德国的控制下,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到家人身边
以及和平劳动。他们也希望及时
重新分配私有财产,这是德国宣传
已承诺。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析并没有将苏联叛逃者视为
特定的社会群体。除第一子类别外,
这种描述反而侧重于叛逃的具体原因:被政权迫害、红军恶劣的生活
条件,或

失败主义是由德国将保留
占上风,解散集体农场,分配土地。⁵

就社会学概况而言,第四个群体隐性地从集体农民中招募自己,作
为唯一的“私有财产”

德国人承诺“重新分配”的是集体土地。⁶

考虑到 1942 年德国控制的地区,这个群体将
也有大量乌克兰人。其他军官明确表达了这些观点,将乌克兰人也列
入了有问题的民族,并将叛逃者牢牢地定位在苏联的农业人口中。

⁴ 3. 装甲师, Bericht. Behandlung der Überläufer und Gefangnen, 17.11.1942, BA-MA RH 27-3/185, 对开页 48-48 反面。

⁵ 有关叛逃动机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6 章。

⁶ 关于德国土地改革的承诺,请参见国防军司令迪特·波尔 (Dieter Pohl):

1941-1944 年德国军事联盟中的德国军事和部队管理

(法兰克福:S. Fischer, 2011), 141-4, 297-9。区域

这些承诺兑现的程度各不相同。比较卡雷尔·C·伯克霍夫,

绝望的收获:纳粹统治下的乌克兰的生与死(剑桥和伦敦: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第 5 章, 以及 Wendy Lower, 纳粹

帝国建设与乌克兰大屠杀(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

Carolina Press, 2005 年), 114-117; 与 Johannes Due Enstad 合著,《德国统治下的苏联公民》,

职业:1941-1944 年俄罗斯西北部的生活、死亡和权力》, 大学博士论文

奥斯陆, 2013 年, 第 156-164 页。波罗的海国家尚未实行集体化, 是一个特殊案例。参见杰弗里·斯温,《斯

大林与希特勒之间:阶级战争与种族》

《德维纳河上的战争, 1940-46》(伦敦和纽约:RoutledgeCurzon, 2004 年); 埃琳娜

Zubkova, 《Pribaltika i Kreml . 1940-1953》(莫斯科:Rosspen, 2008 年), 165-8; 以及 Alexander

Statiev, 《苏联在西部边境的反叛乱》(剑桥和纽约: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第 2.3.5 章。

1941年,第十七军情报官员指出,直到6月29日叛逃者“大部分是乌克兰人”,而在这一天“我们观察到高加索人和格鲁吉亚人也首次参加了此次活动。^{7英寸}
1942年关于迄今为止所获得经验的报告,第93步兵师写道:

乌克兰人是叛逃者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征服乌克兰和加强宣传。此外,大多数叛逃者要么是农业工人(Landarbeiter),要么是农民的儿子,他们的父母在集体化之前就拥有土地。他们有自然不喜欢布尔什维克政权。另一部分叛逃者由有犯罪前科或前囚犯和囚犯劳改营。⁸

来自前线另一边的消息来源也假设了叛逃者。1941年7月17日,朱可夫注意到有人从前波兰领土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犯有“大规模叛逃和背叛祖国”罪。⁹米哈伊尔曾在高加索地区作战的列文报告说,非俄罗斯军队(natsmeny)和家庭被剥夺富农的农民特别容易叛逃。¹⁰根据主要政治

红军管理部门表示,近80%的叛逃者来自1942年初,普里莫斯克军队的成员来自“非俄罗斯民族”: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列兹金人、亚美尼亚人和乌克兰人被单独列出11行政首脑报告称,8月份1942年,鞑靼人投敌事件有22起。列宁格勒前线的哈萨克斯坦士兵;12名爱沙尼亚红军士兵被根据苏联的报告,1941年8月,双方展开了数以千计的战争。¹³9月,第30集团军司令报告称,“重大向德国人投降的人中有一部分是红军士兵

⁷ 第十七AK将军,Abt. Ic: Zusammenfassender Bericht über Gefangenen-Vernehmungen (26.-30.6.1941) (1941年7月2日),BA-MA RH 24-17/170, 对开本100-1.8

93. ID, Ic, Tätigkeits- und Erfahrungsbericht (不晚于1942年5月6日),BA-MA RH 24-26/132。

⁹ RA-VO 23-12 (1):Generalnyi shtab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文件我物质上。1941上帝(莫斯科:Terra,1998年),90。

¹⁰ G. Koifman,采访 Mikhail Borisovich Levin (2009年12月6日), <http://iremember.ru/memoirs/pekhotintsi/levin-mikhail-borisovich/> (2016年6月23日访问)。

¹¹ “Spravka o faktakh izmeny rodine v chastikh deistviushchei Krasnoi Armii” (7月15日) 1942年),RGASPI f. 17,op. 125,d. 85,ll. 58-9,此处:58。

¹² 谢尔巴科夫报告,RGAPSP f. 88,同前。1.d. 967,伊利诺伊州16-25,此处:1。20。

¹³ 史蒂文·马多克斯,《Prestupleniia i nakazanie: karatelnye otriady v Leningradskoi》州,1941-1944年gg (见SSSR vo Vtoroi Mirovoi voine. Okkupatsiia, kholokost. 斯大林主义, Oleg Budnitskii 编(莫斯科:Rosspen,2014年),26-48,此处:32-3。

白俄罗斯国籍,其家人居住在德国占领区”。

14

1942年,苏联开始针对非斯拉夫军人开展特别宣传活动,这些人热衷于各种逃避战斗的方式

包括叛逃 被视为一项重大责任。¹⁵

因此,德国和苏联的资料都表明了历史学家们

通常认为:典型的叛逃者有一个独特的形象

以及忠诚的苏联士兵。作为苏联战争研究的领军学者动机是:

无论是年轻人、城市人、工人阶级还是学生,俄罗斯人更有可能坚持坚持战斗并保持动力。老一代人、非俄罗斯人和农民更有可能在短期内选择退出战争,或者长期来看,士气较低。¹⁶

三

和当代德国分析师一样,罗杰·里斯也达到了这些结论基本上是通过印象派的方法得出的:他读了很多尽可能多地利用定性资料来形成定量方面的概念这段历史。他几乎没有选择。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目前还没有关于苏联叛逃德国人的完整统计数据,现存的数据并未提供该团体的概况。

缺乏数据是历史学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对于一个更大的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我们更依赖其他人的数字创造的。历史人物通常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因此,比后来的解释者和他们制作的统计数据更往往无法回答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然而,我们完全依赖于预先生成的数字。历史学家可以他们的来源进行量化分析,在新文化兴起之前历史作为主导范式曾经如此做到这一点,以至于批评者们理所当然地感到愤慨。现在是时候恢复这种方法了。

我们不需要复杂的定量技术来测试 Reese 假设。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就可以了:叛逃者的比例是多少

¹⁴ “Donesenie voennogo soveta 30-i armii voennomu sovetu zapadnogo fronta o prichi-nakh sdachi v plen krasnoarmeitsev” (1941年9月6日),TsAMO f. 208,同上。2524,d。2、二。474-5,重印:弗拉基米尔·巴特舍夫,弗拉索夫:Opyt literaturnogo issledovaniia.查斯蒂 1-3,第二,修订版。edn。(法兰克福:Literaturnyi evropeets,2005),136-17,此处:136。

¹⁵ 布兰登·谢克特,《人民的指示》:伟大卫国战争的本土化“非俄罗斯人”之间的战争》,Ab Imperio 3 (2012):109-33。

¹⁶ 里斯,《斯大林的士兵为何战斗》,253。

¹⁷ 托尼·朱特,《身着皇家紫色服装的小丑:社会历史与历史学家》,《历史》研讨会期刊,7 (1979):66-94,此处:74。

俄罗斯人是怎样的?少数民族在苏联社会中占比几何?他们的年龄构成如何?最后,这种集体形象与总体男性人口相比如何?

然而,这些问题又将我们抛回了去哪里寻找数据来解答这些问题的难题。我查阅了德国军事档案,从上至下,直至师级,试图找到任何有助于解答这一问题的资料。但最终没有成功。接下来,我试图找到一个能够提供定性数据的军事单位,以便进行定量分析。我需要一个能够持续、长期、详细地报告越过前线的叛逃者情况的单位,以便描绘出这群叛逃者的集体形象。我最终选择了第296步兵师,因为该师的情报官(德国军事术语为“1c”)在1942年4月至1943年12月期间采访了334名叛逃者,并对他们进行了逐一记录。¹⁸在此期间,他的师与中央集团军群作战,更具体地说,是在奥廖尔与第二装甲集团军作战,之后于1943年9月被调至戈梅利和博布鲁伊斯克的第九集团军。¹⁹1c记录的信息包括叛逃日期、叛逃者的姓名、出生年份和地点、婚姻状况、国籍和职业。有时,他会记录叛逃者的总体印象(“聪明”、“不聪明”),或记录士兵是文盲、不会说俄语或穆斯林的事实。他总是问叛逃者为什么决定越界,这些信息我们将在第六章进一步分析。

随着叛逃者资料库的不断扩展,军官在处理叛逃者方面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查询也越来越频繁。一些最基本的资料于1942年5月开始浮现,但直到4月才标准化到足以进行定量分析。国籍直到6月下旬才成为一个统一的类别,尽管有时可以借助姓名和出生地进行重建。

我将这些信息录入数据库,然后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列于表5.1至5.5。表5.1和5.2总结了叛逃者的年龄结构。表5.1按出生年份比较了叛逃至第296步兵师的叛逃者比例,并与1939年人口普查的男性总人口进行了比较。

¹⁸ 这些报告包含在三个文件中:BA-MA RH 26-296/97 (1942)、102 (1943)、107 (1943)。更早的零散报告 (RH 26-296/93)由于不够规范,无法量化,因此未收录于此。

¹⁹ Georg Tessin, 《Verbände und Truppen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und Waffen-SS im Zweiten Weltkrieg 1939–1945》(奥斯纳布吕克:Biblio Verlag,1974年),卷。9:296,此处:296。

表 5.1. 脱北者与男性总人口的年龄分布

出生年	叛逃者百分比 (样本量:334)	近似 1939年的年龄	这些年龄段的男性占 1939年人口普查 (N=42.2 百万)	差异指数 (叛逃者百分比% 人口普查)
1893	0.3	46	1.5	1.2
1894	0.0	45	1.8	1.8
1895	1.2	44	1.6	0.4
1896	2.1	43	1.8	0.3
1897	2.7	42	2.0	0.7
1898	4.2	41	1.7	2.5
1899	4.2	40	2.3	1.9
1900	3.9	39	2.1	1.8
1901	2.1	38	3.0	0.9
1902	3.0	37	2.0	1.0
1903	2.7	36	2.7	0.0
1904	3.9	35	3.0	0.9
1905	3.3	34	3.0	0.3
1906	3.0	33	3.1	0.1
1907	5.4	32	3.5	1.9
1908	4.8	31	3.1	1.7
1909	3.6	30	3.7	0.1
1910	3.6	29	3.2	0.4
1911	4.5	28	4.2	0.3
1912	4.2	27	3.7	0.5
1913	3.0	26	4.1	1.1
1914	2.4	25	4.0	1.6
1915	2.7	24	4.0	1.3
1916	2.1	23	3.4	1.3
1917	2.1	22	2.9	0.8
1918	2.7	21	2.5	0.2
1919	3.6	20	3.6	0.0
1920	2.4	19	2.8	0.4
1921	2.1	18	3.3	1.2
1922	2.7	17	3.3	0.6
1923	5.1	16	3.8	1.3
1924	5.1	15	4.4	0.7
1925	1.5	14	4.8	3.3
全部的	100.0		100.0	

注:296 ID 的脱北者数据仅包括出生年份,而不是确切的生日。因此,无法计算1939年人口普查时的确切年龄。使用的替代年龄是“1939减去出生年份”,这是一个相当接近的近似值。叛逃者比例与他们的出生年份占总人口的比例计算为“叛逃者百分比减去1939年人口普查;正数表示叛逃者在其年龄组中占比过高,负数表示代表性不足。

人口普查数据来源:“Vsesoiuznaia perepis”naseleniia 1939 goda.塔布利察 f. 11. 沃兹拉斯特诺伊索斯塔夫 naseleniia.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RGAE), f. 1562,op. 336,d. 604,复制于:
http://demoscope.ru/weekly/ssp/sng_age_39.php?reg=0&gor=3&Submit=OK (2015年6月9日访问)。

最右边的列表示两者之间的差异系列。如果叛逃者中某一出生年份的比例与出生年份男性的比例,这个数字应该为零。如果积极的一面是,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在脱北者中比1939年15至46岁男性中;如果结果为阴性,则该出生的叛逃者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比例普遍偏低。我称之为列“差异指数”。

四

我们样本中的老年男性是否比年轻人更容易叛逃?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可以寻找一个相关性年龄和差异指数之间。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并且男性年龄越大,叛逃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关性应该很强。我们发现的却是一种积极但薄弱的关系。因此,男性年龄越大,叛逃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统计异常值太多,不足以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²⁰

第二个测试涉及根据三个粗略的

世代:上个世纪出生的人、1900年出生的人以及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1917年以后出生的人。

那么,这两个年龄较大的群体最有可能叛逃,假设1917年以后出生的人在苏联政权的忠诚度更高。表5.2给出了这一结果分组。它表明,事实上,从布尔什维克

表 5.2. 不同世代的叛逃者分布及与男性人口整体

出生年	叛逃者 % (N=334)	1939年男性人口, % (N=4220万)	差异指数 (叛逃者百分比/人口普查百分比)
1893-9	14.7	12.7	2.0
1900-16	58.1	55.9	2.2
1917-25	27.2	31.5	4.2
	100.0	100.0	

来源及注:如表5.1

²⁰

如果假设成立,相关系数(r)应该为正,并且趋近于1。实际上,两组数字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是同样强。当 $r = 0.3$ 时,我们发现正相关,但相关性相当弱。即使我们排除44至46岁,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叛逃, r 仅上升至0.5,仍然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

表5.3 红军叛逃人员年龄结构及人口损失

年龄	叛逃者 (%;N=334)	红军人口损失 (1941-1945年;%)	不同之处
20岁或以下	13.5	18.0	4.5
21-30岁	26.6	39.5	12.9
31-40岁	38.3	28.5	9.8
41-50岁	21.6	13.0	8.6
50岁以上	0.0	1.0	1.0
全部的	100.0	100.0	

注:296 ID 的叛逃者数据包括确切的叛逃日期,但只有年份出生,因此,无法计算确切年龄。使用的替代方法是“叛逃年份减去出生年份”。相当接近的近似值。人口流失和叛逃者之间的“差异”是按叛逃人数百分比减去人口损失百分比;正数表示叛逃人数多于死亡人数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负数意味着死亡人数多于叛逃人数。

人口损失来源:GF Krivosheev、Poteri vooruzhennykh sil SSSR、Liudskie poteri SSSR v 时期/toroi morovoi voiny. Sbornik statei (圣彼得堡,1995年),78。

革命后最不可能叛逃,而老一代人则在脱北者中占比过高。这一结论也得到了我们拥有详细数据的一个大型单元的年龄细分。1945年初,第60集团军的人员占总人数的41.5%。革命后出生的男性和女性,相比之下,只有31.5%

在我们的样本中,叛逃者中也有这样的情况。²¹

表5.3比较了死亡人数和至少通过逃向敌人,他们暂时保住了性命。²²它进一步证实了年轻男性更有可能战斗的论点死亡,而年纪大的人更愿意放弃:战争死难者中,30岁以下的比例高于叛逃者,而30岁以上的人则相反。脱北者中没有50岁以上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们通常担任支援他们在前线后方担任职务,这使得叛逃变得极其困难。

²¹ 根据第60军的组成统计报告计算得出(截至1月1日)1945),发表于“Rassekrechennyye dokumenty TsAMO ob osvobodzhdenii kontslageria” Osventsim, Fishki网(2015年1月27日), http://cdn.fishki.net/upload/post/201501/27/1404604/7_18.jpg (访问日期:2016年7月27日)。红军出生年份统计尚未解密,而且近期也不太可能解密。我们确实知道1890年至1927年之间出生的男性被动员参军战争,但其确切份额仍不清楚。有关此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Mark Edele的“什么苏联战争努力中的忠诚,1941-1945”,国际劳工组织及《工人阶级历史》第84卷,秋季号(2013):248-68,此处:255-8。

²² 与表5.1和5.2一样,该表依赖于每个战争开始时,叛逃者只需从1941年减去出生年份即可,这一程序没有必要,因为我们没有确切的出生日期,只有每个叛逃者的出生年份。

表 5.4. 脱北者的国籍与战前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

国籍	已知国籍 叛逃者 (%;N=246)	1939 年人口普查中的百分比	不同之处
俄语	55.3	58.4	3.1
乌克兰	19.1	16.5	2.6
哈萨克斯坦	8.1	1.8	6.3
白俄罗斯	4.9	3.1	1.8
乌兹别克语	4.1	2.8	1.3
鞑靼人	2.8	2.5	0.3
楚瓦什人	2.0	0.8	1.2
吉尔吉斯斯坦	0.8	0.5	0.3
亚美尼亚语	0.8	1.3	0.5
极	0.4	0.4	0.0
立陶宛语	0.4	0.02	0.4
德语	0.4	0.8	0.4
布里亚特	0.4	0.13	0.3
阿塞拜疆	0.4	1.3	0.9

注:脱北者国籍数据仅包括国籍为已知。脱北者国籍份额的差异是通过“脱北者”计算的减去人口普查数据。此列中的正数表示过度代表,负数表示代表性不足。需要注意的是,1939 年的人口普查是在苏联向西扩张之前进行的。联盟;人口普查数据指的是男性和女性。

1939 年人口普查数据来源:Vsesoiuznaia perepis naseleniia 1939 goda:Osnovnye itogi (莫斯科: Nauka,1992),57-8。

然而,同一张表还显示,

其中 30 人占第 296 步兵师所有叛逃人员的 40%,而二十多岁的男性则超过四分之一。因此,虽然年轻男性叛逃的可能性较小,但仍能找到很多年轻人那些宁愿叛国也不愿战斗至死的人。

关于国籍,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叛逃者(表 5.4)。最大的群体是俄罗斯人,他们也是 1939 年人口普查中最大的人口群体,其次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然而,俄罗斯人的代表性不足,仅为 56% (而人口普查中为 58%)。这一差异掩盖了更大的差距,因为俄罗斯人在红军中的比例过高。²³比例最高的群体是

²³ 68% 的动员参军人员来自俄罗斯共和国,19% 的人口都穿上了军大衣。当然,并非所有俄罗斯族人都是如此,但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如此(资料来源使用的术语是 Rossiane 而不是 Russkie,而且 68% 已经排除了因撤离而新来的人)。比较数字为:乌克兰 13%,白俄罗斯 12%,中亚各共和国以及外高加索地区。参见 GF Krivosheev 和 MF Filimoshin, "Poteri vooruzhennykh sil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in

我们的样本是哈萨克人,其次是乌克兰人。这两个群体在1932-3年饥荒期间,他们遭受了特别严重的打击。集体化。其他非斯拉夫人,如乌兹别克人和楚瓦什人,在我们的案例研究的叛逃者中也占了很大比例。

五

对叛逃者进行阶级分析在方法论上比

国籍或年龄的调查。²⁴尽管如此,叛逃者的基本社会分布可以概括如下:

表 5.5 显示,最大的群体是集体农庄农户,38%。鉴于 1939 年人口普查将 42% 的苏联男性人口作为集体农民,这将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惊讶的是,代表人数严重不足。²⁵相反,根据这些数据,更有可能叛逃的社会群体是工人阶级,包括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工人和工匠占37%

Naselenie Rossii v XX veke: Istoricheskie ocherki. 汤姆 2. 1940-1959 (莫斯科:罗斯彭, 2001), 19-39, 此处:33-4。

²⁴ 德国审讯记录列出了这名士兵的职业,从而类型学太复杂了。为了创建更广泛的分组,我将每个职业分配到一个更大的类别。使用苏联的分类法(工人 rabochii; 集体农民 kolkhoznik; 白领工人 sluzhashchii),但除了集体农庄主之外,这种将职业分配给社会类别的做法远非简单明了。该协议包括一个单独的“农业劳动者”类别,既可以指国营农场的工人,也可以作为集体农民的同义词。由于来源不明,我决定将该术语保留为单独的类别。同样,“工人”在苏联的分类中,既包括没有任何技能的人,也包括高度在工业领域工作的熟练工匠。相比之下,在德国的分类中,一个人究竟是熟练的产业工人还是工匠,总是一目了然。“铁匠”(Schmied)一个熟练的工业金属工人,还是一个照顾马匹的乡村工匠?这取决于在上下文中,Schlosser 可以指熟练的金属工人、钳工、锁匠或机械师再次在行业内或行业外工作。与其在每个案例中都进行猜测,不如从经验上来说,更谨慎的做法是将他们归入一个描述熟练工匠的类别。在工业领域或其他地方工作的人员(“熟练工人或工匠”)。鉴于苏联贸易结构,很可能其中许多(但不是全部)会被描述在苏联人口普查中,工人被描述为“工人”(rabochie)。德国资料中的“产业工人”,我将他们归入“产业工人”。其余类别相对简单,白领专业人士主要对应于苏联的“sluzhashchie”,而职业军人则很少。

不重要。我最初也创建了“政治精英”类别,但在案例研究中遇到一个案例。

²⁵ 然而,如果我们假设“农业工人”是集体的同义词农民,份额就会上升到恰好这个比例。所以即使在这些条件下集体农庄的代表人数并没有过多。事实上,可能存在代表性不足,因为免征兵令主要针对技术工人和必要的白领人员,导致红军的农民成分比整个人口还要多。

表 5.5. 296 ID 的叛逃者类别构成

班级	数字	% (N=334)
集体农庄农户	128	38.3
熟练工人或工匠	120	35.9
专业的	32	9.6
产业工人	28	8.4
农业工人	12	3.6
未知	12	3.6
职业军人	2	0.6

在人口普查中,叛逃者的比例为 44%。²⁶因此与 Reese 的假设相反 各种类型的工人都相当严重过度代表。最后,10% 的专业人士相比之下,人口普查中白领雇员的比例为 18%,这一群体在叛徒中所占比例严重不足。²⁷

疑问依然存在。集体农庄代表人数不足可能是苏联和德国类别不兼容的结果。

我归类为“技术工人或工匠”的许多人可能他们是乡村工匠,因此也是集体农民。²⁸如果我们加上股份表 5.5 中所有蓝领和农业劳动力(集体农庄、技术工人或工匠、产业工人、农业工人)

总计为 86%。相比之下,集体农民、工人和工匠在人口普查中的比例:这些群体比白领员工更有可能投奔德国和专业人士。

大多数叛逃者都是普通士兵,或者“红军男性”(德语:Rotarmisten;俄语:krasnoarmeitsy),在我们的案例研究。只有 8% 是军官,其中初级军官和高级军官各占一半。军官(中尉等)和士官(中士)。从 1945 年第 60 军的组成,这一份额这将是军官人数严重不足的问题:这条前线该部队有 13% 的军官,加上 25% 的士官。²⁹如果

²⁶ 为了计算叛逃者中工人阶级的代表性,我们需要平衡两组数据的不同类别。如果我们加上人口普查中34%的“一方面是“城镇和乡村”和 3% 的工匠 (kustari),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叛逃者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广泛地类似的类别。

²⁷ 对于人口普查数据:Vsесоiuznaia perepis naseleniia 1939 goda. Osnovnye itogi (莫斯科: Nauka,1992),94。

²⁸ n.23 中的例子中的 Schmied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²⁹ 根据第 60 军的组成统计报告计算得出(截至 1 月 1 日)

1945年)。

尽管这些数字几乎代表了红军的整体构成,但它们表明,虽然享有特权的苏联人确实叛逃,但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比那些不那么幸运的同龄人要小。

尽管如此,在叛逃者中,很容易找到斯大林中产阶级中地位相当高的人。例如叶夫根尼·斯捷潘诺维奇·彼得罗夫,他生前是一名电影制片人,军衔为中尉,曾担任营副官,后于1942年8月20日叛逃至德国。30最引人注目的或许还是科诺诺夫,他是红军少校,团长,也是一名长期的职业军人。

他是斯大林社会中特权阶层的一员,在战前,他似乎是一个完全融入斯大林主义的臣民,但一旦有机会,他就会变成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战士。³¹

六

因此,我们的案例研究部分证实并部分限定了里斯的假设。首先是确认:年轻士兵、专业人员和俄罗斯人叛逃的可能性较小;老一辈和非俄罗斯人则表现出相反的倾向。同时,我们的数据集无法证明集体农民特别可能叛逃到敌人手中,或者工人更忠于苏联方面。它可以显示的是,非特权和受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比特权白领阶级更有可能投奔德国;同样,普通士兵的叛逃频率也高于指挥官。最后,我们的数据为这一假设添加了一个重要的限定:虽然有些群体比其他群体叛逃的可能性更小,但这些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仍然占自愿投奔德国的人群的很大一部分。其中俄罗斯人占55%,36%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10%的人是专业人士,8%的人拥有更高的职位。

这项对334名叛逃至296步兵师的人员的定量分析,仅比里斯的开创性研究更进了一步。显然,我们数据集中的334名叛逃人员既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也不是随机样本——这是定量分析的黄金标准。

³⁰ BA-MA RH 26-296/97。我们将在第六章再次遇到他。

³¹ 关于军事阶层,请参阅马克·冯·哈根(Mark von Hagen)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士兵:红军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1917-1930》(伊萨卡和伦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年);以及罗杰·里斯(Roger Reese)的《红色指挥官:苏联陆军军官团的社会史,1918-1991》(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05年)。

分析。因此,统计纯粹主义者可能会忽略这些数据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案例研究是否反映了整体那些投奔德国的人的构成。然而,鉴于德国资料的零散性,这种分析在很多方面都

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然而,我们可以将这种量化与对更广泛的来源基础的更具印象主义的解读结合起来,就像 Reese 的分析风格一样,但重点略有不同。与其试图建立整体模式 Reese 已经做到了,我们只是通过量化案例研究进行了一些限定 我们可以专门寻找统计异常值。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进一步细化了我们的

叛逃者是谁的形象,并保护我们避免误解统计中间部分代表了历史现实的复杂性。³²

同样,科诺诺夫,这位杰出的苏联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战时之路 从斯大林的中产阶级成员到“万国之首”哥萨克军队与纳粹并肩作战 这已经足够令人震惊了,但还有更令人困惑的情况。理查德·T出生于1920年,但泽。³³两年后,他的父母(可能是共产党员)搬到苏联后,理查德在列宁格勒长大,在那里他的1941年,围城开始时,他的父母饿死了。他是否能逃脱类似的命运仍不清楚,但他一定是在时间,并于1942年被征召入伍 斯大林的军队不相信德国公民能够保卫他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塔什干服役期间,他设法“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他自称是拉脱维亚人,后来加入了正规军。1942年4月,他被派往前线,7月叛逃至德国国防军。第79步兵师承认他是德国人,他很快就成为一名机枪组组长。1943年1月,他晋升到下士。

1942年10月19日,德国第79步兵师抵达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并被投入到与苏联守军。不到一个月,进攻方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地位和生命而战,一旦第六军队被反攻的苏军包围。理查德·T·德军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了下来,这是德军的第一次大灾难,并且1943年2月1日,他跟随营长被俘。他们被分成大约200名战俘的队伍押送离去。

³² 罗杰·里斯 (Roger Reese)在其他地方也使用过这种方法。参见他的《十位犹太红军老兵》卫国战争:寻找神话代表士兵的故事》

《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第27卷,第3期(2014年):420-429。

³³ BA-MA RH 24-17/300,第45-6对开页。

在那些瘦弱的幸存者中,情况非常糟糕,许多人在行军途中倒下,被随行部队射杀。走了40公里后,他的队伍只剩下40人。局势非常混乱,T设法换下制服,加入了附近一队刚被红军解救的苏联战俘。

然而,这些红军士兵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被关进了沃罗涅日附近的集中营,遭到“过滤”。

过滤并非(至今仍可见)通往处决或古拉格的必经之路。截至1944年10月1日,接受过此项筛选的前战俘中,70%重新入伍红军,另有5%被送往杀伤力极强的“突击营”,只有3%被捕。³⁴然而,对T来说,过滤确实危险重重。毕竟,他犯有逃兵、身份欺诈、叛逃、叛国和越狱罪。一旦被发现,他将面临死刑。然而,以一种档案资料中未曾解释的方式,他再次成功逃脱,逃离了过滤营,向西行进,直奔顿河。他身穿苏军军装,被当作逃兵逮捕,但很快,红军普遍存在的兵力短缺问题就让他不得不接受惩罚。一个被描述为“苏联动员的流沙性质”的例子是,他没有被指控,而是与其他三十名掉队者一起,向部署在卡缅斯克的红军部队行进。在这里,他成了彼得霍夫的弗拉基米尔·洛格维诺夫。³⁵

如同前辈理查德·T.在德意志国防军中一样,弗拉基米尔·洛格维诺夫向红军证明了自己是一名能干的士兵。不久,他被调往近卫第二集团军第72近卫步枪团团部,最终晋升为高级中士。1943年7月底,他所在的师渡过了米乌斯河。8月1日德军反攻期间,他再次开小差,在部队撤退时躲在掩体里。他负伤,但最终向德军投降。弗拉基米尔·洛格维诺夫再次改名为理查德·T.,被送往德军第294师的野战医院。8月3日,一名情报官员在那里对他进行了询问。他的后续命运无人知晓。

这个关于连环叛逃者、逃兵、骗子和生存大师的故事,很可能有些地方为了审讯者方便而被夸大了。然而,整体发展轨迹相当合理。苏联的战争行动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迁移为标志。许多人被驱逐、逮捕、逃亡,

³⁴ Edele, 苏联退伍军人, 116, 表 5.1。

³⁵ 参见 Edele 和 Geyer, 《例外状态》, 第 394 页。

返回、撤离、重新撤离并自行转移

自愿被动员进入战争工业或军队,只是为了逃避再次,战争年代典型的苏联公民可以被描述为作为一个“流离失所者”,实际上是一个“游牧民”。³⁶国家对全力防御的这些年里,人口相当谨慎并依赖严厉的警务措施,而不是任何现代的治国方略。³⁷许多人从这个日益扩大的漏洞中溜走了随意的监控系统。从国家拘留所逃脱的就像重新夺回一样普遍。仅在1941年,就有超过10,000人逃脱从古拉格释放了38人,1942年上半年又释放了4,200多人。³⁹在整个战争期间,有超过20万人被列入叛逃后,军事当局将其列为“未找到”,有些人与部队失散,或者干脆在内陆失踪。⁴⁰其他人则重返国家,继续为战争出力。仅在1943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围捕了近一百万士兵和平民红军前进的防线,其中许多是撤退的士兵非法、与部队失去联系或被德国俘虏。超过30万平民逃离国防工厂、逃离监禁、逃避兵役等罪行。⁴¹上半年截至1944年,共有超过148,000名劳工逃兵被逮捕并受审。⁴²整个战争期间,共有150万军队逃兵和征兵逃犯又被安全部门抓获。⁴³

³⁶ 马克·埃德尔,《作为“吉普赛人”的新苏联人:游牧、战争和边缘性》斯大林时代的区域: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区域研究3,第2期(2014年):285-307;同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流离失所的历史:以苏联为例”,澳大利亚历史12,第2期(2015年):17-40。

³⁷ 参见 Mark Edele 和 Filip Slaveski 合著的《来自底层的暴力:解释针对1943-1947年苏联太空中的平民》,《欧洲-亚洲研究》68,第6期(2016年):1020-35;特别是1022-5。

³⁸ OV Khlevniuk,《古拉格的历史:从集体化到大恐怖》(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8页。

³⁹ 1942年12月31日之前的古拉格内部统计数据,位于 Istorii stalinskogo gulaga. Konets 1920-khpervaia polovina 1950-kh godov. Tom 1:Massovyie repressii v SSSR,编辑。N. Werth 和 SV Mironenko (莫斯科:Rosspen,2004年),86-8,此处:88。

⁴⁰ GF Krivosheev,《二十世纪苏联伤亡和战斗损失》(伦敦:Greenhill Books,1997年),91。

⁴¹ 贝利亚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1944年1月8日,卢比安卡:斯大林 i NKVD-NKGB-GUKR Smersk 1939-mart 1946,编辑。VN 哈斯托夫等人。(莫斯科:Demokratiia,2006年),406-9,此处:406-7。

⁴² 国家检察官 M. lu. Raginskii 致中央委员会 MA Shamberg 的信,1945年1月27日,《Istorii stalinskogo gulaga》重印。Konets 1920-khpervaia polovina 1950-kh 戈多夫:汤姆 1,449-51,此处:449。

⁴³ GF Krivosheev,“O dezertirstv v Krasnoi Armii”,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6 (2001):94。

七

这种环境可以被那些想要

在斯大林和希特勒战争的间隙进行他们自己的战斗。⁴⁴

改变一个人的身份,从一种动员组织中脱离出来加入另一种动员组织,以及非法旅行,都是很常见的事。

对于那些认为自己至少暂时与苏联结盟的人来说就像理查德·T·科诺诺夫和伊万·科诺诺夫等人一样,

纳粹。⁴⁵我们遇到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战时例子

上一章的传记:我们称之为“伊万”的滑雪教练,

1943年2月逃兵,与一群战争寡妇生活在一起

在莫斯科伪造证件前往塔什干进行黑市旅行,

回国后被捕,被关进惩戒营,并叛逃到

德国人,这是我们离开时他战时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

讲述这个故事可能意味着在德国被俘的幸福结局,这是

这当然是叛逃者所希望的。然而,他却大错特错。

当德国审讯人员问他叛逃的动机时,他

回答说他是“半犹太人”。他还补充说,因此他被人憎恨

被俄罗斯人接受,但不被犹太人接受。⁴⁶ 档案文件

无法评论他的后续命运,但毫无疑问他是被

他以为这些德国人会把他从俄国人手中救出来

和犹太人。在苏联,

“纯”犹太人和“混血”犹太人之间的大屠杀失去了其

相关性和所谓的混血儿也像其他人一样被执行。⁴⁷

这位“半犹太人”的悲剧,他认为自己叛逃到

国防军令人叹为观止。它体现了复杂的决策过程

个人发现自己身处这样的环境。⁴⁸

令人不安的是,这个人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案例。⁴⁹犹太人

⁴⁴ 另请参阅 Timothy P. Mulligan 的《逃离斯大林格勒:苏联国民与德国第六集团军》,《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20,第4期(2007年):739-48。

⁴⁵ 参见亚当·布罗纳的《我的反纳粹战争:红军中的一名犹太士兵》

(塔斯卡卢萨:阿拉巴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⁴⁶ Abw. Kdo. 103 至 Ic/AO,1944年4月23日:BA-MA RW 49/615,文件 C。

⁴⁷ 伊扎克·阿拉德,《苏联大屠杀》(耶路撒冷:亚德瓦谢姆,2009年),

359-70, 518, 530。此规则也存在一些地方例外。参见 Daria Rudakova,《苏联

二战期间乌克兰被占领区民间与德国人的合作》,博士论文,

西澳大利亚大学,正在进行中,第3章。关于混血儿的命运

另请参阅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的《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

灭绝(纽约:HarperPerennial,2007年),344。

⁴⁸ 有关此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6章。

⁴⁹ 当然,更多的人正确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并“极其激烈地”战斗

并尽一切努力避免被俘。” Kiril Feferman,《“犹太人的战争”:态度》

1940-41年苏联犹太士兵和军官对苏联的态度》,《斯拉夫杂志》

军事研究 27,第4期(2014年):574-90;此处:587。

士兵确实叛逃了,正如1941年第18摩托化步兵师⁵⁰报告中简洁的注释所表明的那样:

“7.8……2名叛逃者……这些叛逃者是犹太人,他们叛逃是因为政委威胁他们,如果他们无功而返,就将他们处决。”⁵⁰报告同样没有提到这些不幸者的下落,但很有可能是德国人在审讯后立即将他们枪杀,或者在将他们移交给别动队之后。另一个名叫莱金的犹太人也想在德国人那里碰碰运气,他在被自己人救回后幸免于难,结果却被当作叛徒枪杀了。⁵¹

八

那么,谁是“典型的叛逃者”呢?从量化的角度来思考典型性,有三种方法。首先,我们可以简单地将最大的群体视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叛逃者”应该是一位三十多岁的俄罗斯集体农庄农。其次,我们可以将典型视为占比最高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叛逃者”应该是一位四十出头的哈萨克工人阶级(出生于1898年)。第三,我们可以将常态视为统计上的中间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典型的越过前线的逃兵应该出生于1909年(中位数)或1910年(平均值)。

无论我们选择这三种类型中的哪一种,很显然它们只是统计上的抽象概念,而非真实的历史事件。越过前线的逃兵群体远比任何单一的群体所能表达的要复杂得多。我们对一个案例研究(1942年和1943年加入德国第296步兵师的334名逃兵)进行了详细的定量描述,并结合了其他统计异常值案例,表明我们不能将数字上的典型值(无论如何定义)作为所有逃兵的描述。虽然年轻人和俄罗斯人更倾向于死亡而不是叛逃,但自愿向德国人屈服的人中,最多的仍然是俄罗斯人,其中40%的人年龄在30岁或以下。我们甚至发现了犹太逃兵,他们是误解自己真实选择的极其可怕的例子。现在是时候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更详细地探讨这些普通苏联男子做出越过前线这一决定背后的动机了。

⁵⁰ 18. 步兵师 (mot.) Jc, “Tätigkeitsbericht vom 26.5.-31.12.1941” ,BA-MA RH 26-18/55,原文下划线。这些案例与公认的智慧背道而驰。参见阿拉德,《大屠杀》,377-8。

⁵¹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希什卡诺夫回忆录(2014年12月20日), <http://iremember.ru/memoirs/nkvd-i-smersh/shishkanov-aleksey-mikhaylovich/> (2015年9月10日访问)。

6

动机

我

1941年夏秋之际,红军一名中尉试图向德国侵略者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他认为这代表了普遍的民意。我们不知道此人的姓名、年龄、国籍,也不知道他是自愿投奔德军还是被俘,以及他后来的遭遇。他可能是俄罗斯人,我们知道他在战前在一家医院担任行政人员,月薪200卢布,他的妻子是一名护士,月薪100卢布。这些薪水微薄,远低于平均月薪(1940年为339卢布),这反映了苏联医疗保健行业普遍较低的薪酬(255卢布)。我们知道他曾试图与前线德方一侧第一个战俘收容点的一名军官交谈,但没有翻译。于是他坐下来,将自己的观点写下来,希望能够帮助祖国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¹

这位中尉的报告是“致参战的德国军队参谋部”,并在开篇就宣称:“我们深受侮辱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已经等待这场战争十年了。”他将第一次战争恐慌追溯到1931年,当时在集体化灾难和日本入侵满洲之后,人们对战争的希望高涨。²集体农庄

消灭了整个经济体系中的牲畜,摧毁了农业及其机械,消灭了数百甚至数千名我们最优秀的农民。人们被禁止祈祷,所有祈祷场所和

¹ 该信函的德文翻译包含在 Generalkommando XXIII Armee-korps, Ic, Anlagen zum TB (7-10月1941), BA-MA RH 24-23/239, folio 59中。有关1940年平均月薪的信息,请参阅《Sovetskaja zhizn 1945-1953》编辑中的第184号文件。

E. Iu Zubkova, LP Kozheleva, GA Kuznetsova, AI Miniuk 和 LA Rogovaia (莫斯科:Rosspen, 2003), 501-2。

² 关于战争谣言,请参阅 Mark Edele 的《斯大林主义社会 1928-1953》(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 152-4。

教堂被毁。这一切都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

下一波战争希望出现在1936年,由西班牙内战引发的谣言引发,这场战争在苏联媒体上被广泛报道,并成为苏联文化更广泛的关注点。³这场战争令人失望,1938-1939年与日本在东部未宣战的边境战争,以及1939-1940年的芬兰冬季战争也同样令人失望。“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我们帝国的政权。”然而,当前的战争却有所不同。这位中尉希望这场战争能给他的国家带来“政治变革”,以及“彻底驱逐和摧毁共产主义……这才是最重要的,”他宣称。

他随后总结了战前初期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满。首先是恐怖统治。“从1936年到1940年的过去四年里,我们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把数万甚至数十万工人和农民投入监狱。”其次是1940年严苛的劳动法。“在过去的几年里,工人和雇员即使迟到二十分钟,也会立即被关进监狱。”第三是集体农庄的困境,他们每天要在田里辛苦劳作十六个小时,才能登记一个劳动日。尽管如此辛勤劳作,他们却在冬天吃不饱饭。“总的来说,人们对这种制度和这种缺乏秩序的情况感到不满,”他断言道。

工人和农民尤其不满,像他这样的雇员也深受其害。他和妻子的工资仅够为一家三口购买足够的面包。油脂或其他物品也超出了他的预算。“生活,”他总结道,“简直无法忍受。”随后,他谈到了军队中的情绪。新入伍的士兵,尤其是35至50岁的男性,不想打仗。他们坐在战壕里,试图避免被德军炮弹击中。他们没有开枪。士兵们脏兮兮、营养不良、疲惫不堪、精疲力竭。装备齐全后,由于虚弱和装备的重量,他们几乎无法再移动。他们几乎没有休息,也没有足够的食物。政治官员试图将德军俘虏的画面涂成深色,以使他们保持秩序。

对于斯大林主义历史学家来说,这个人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集体化带来了可怕的困境,随之而来的饥荒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即使在重大粮食危机结束后,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仍然极其艰难。大清洗不仅使精英阶层成为受害者,

³ 卡尔·施洛格尔,《恐怖与创伤:莫斯科 1937 年》(慕尼黑:卡尔·汉瑟出版社,2008 年),136-52;卡特琳娜·克拉克,莫斯科。《第四罗马:斯大林主义、世界主义和苏联文化的演变 1931-1941》(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 年),242-75。

但只有在“大规模行动”追捕涉嫌不忠诚的普通公民时,苏联才真正“伟大”。1940年的劳动法极其严苛,以至于—位历史学家将苏联社会描述为“—座强迫劳动营”。

4因此,中尉的信看起来不像是为了从新统治者那里获得好处而进行的自我塑造行为,而更像一个终于看到—线希望的人发自内心的呐喊。

也许,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这个可怕的政权会被推翻?

在信的结尾,他再次谈到了对政治变革的渴望:

全体人民、农民、工人和众多职员都在等待着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政府将被推翻,骑在我们脖子上、吸着工人和农民鲜血的共产党将被消灭。

二

当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将1941年的大规模投降视为反对苏联政权的“全民公投”。5这封信,如同科诺诺夫的叛逃以及为德军继续作战—样,似乎证实了他们的观点。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同样表明,民众不满导致大规模叛逃的假设并非毫无根据。尽管苏联士兵面临着极大的阻碍,但仍有数量惊人的士兵自愿投奔敌方。这种现象在欧洲二战的参战国中十分罕见。正如第五章所述,这些叛逃者来自各行各业,广泛代表了苏联社会,即使

⁴ 参见唐纳德·菲尔策 (Donald Filtzer) 著《苏联工人与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现代苏联生产关系的形成,1928-1941》(纽约州阿蒙克:ME Sharpe 出版社,1986年);同上,《原子化、“分子化”和减弱的团结:斯大林统治下工人对国家镇压的反应》,载布里吉特·斯图德 (Brigitte Studer) 编《斯大林主义主体:苏联和共产国际中的个人与制度,1929-1953》(苏黎世:Chronos 出版社,2006年),第99-116页;希拉·菲茨帕特里克 (Sheila Fitzpatrick) 著《斯大林时代的农民:集体化后俄罗斯农村的抵抗与生存》(纽约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琳恩·维奥拉 (Lynne Viola) 著《斯大林统治下的农民造反派:集体化与农民抵抗文化》(纽约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Sheila Fitzpatrick,《日常斯大林主义:非常时期的平凡生活: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俄国》(纽约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Jeffrey J. Rossman,《斯大林下的工人抵抗:车间的阶级与革命》(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Rolf Binner, Bernd Bonwetsch 和 Marc Junge,《Massenmord und Lagerhaft:其他大恐怖的历史》(柏林:Akademie,2009年);Karel C. Berkhoff,《祖国危在旦夕:二战期间的苏联宣传》(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章(引文为章节标题)。

⁵ 请参阅第8章。

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具代表性。本章基于迄今为止的分析,探讨了促使苏联士兵越过前线的动机。是什么样的政治情绪促使他们决定叛逃?这些情绪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更广泛持有的观点?民意难以衡量。总的来说,如果我们试图了解普通民众的想法和感受,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参考的。上述信件在细节和表达复杂情感的能力方面非常出

色。这封信出自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之手,而红军中的许多人则远没有那么博学,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盲。⁶他们留下的书面记录很少,他们的声音往往只能通过其他更有权势、更能表达自己观点的人的著作以扭曲的方式被听到。然而,历史学家仍然对斯大林统治下普通民众的观点感兴趣,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利用警方和共产党关于“民众情绪”的报告、法庭和检察官的记录、日记或回忆录来更深入地了解民意。这些资料各有各的问题,都需要仔细批判地阅读。它们都无法为了解过去提供一扇完美的窗户。⁸然而,历史学家可以选择使用它们。

⁶ 我使用“政治情绪”而非“意识形态”一词,是为了表明这些动机的模糊性和情绪化本质。我更喜欢用“情绪”而非“心情”,因为前者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稳定,而后者则暗示其转瞬即逝。关于“心情”,请参阅理查德·比德拉克(Richard Bidlack)的《苏德战争第一年列宁格勒的政治情绪》,《俄罗斯评论》第59卷(2000年):96-113页;以及根纳季·博尔迪乌戈夫(Gennadi Bordiugov)的《未被占领的苏联的民众情绪:战争期间的延续与变化》,载于《人民战争:苏联对二战的反应》(第1999卷)。

罗伯特·W·瑟斯顿和伯恩德·邦韦奇(厄巴纳和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4-70页。我使用复数而非单数,因为当时并没有统一的“民意”(vox populi),而是各种“民意”。参见埃德尔,《斯大林主义社会》,第六章。

⁷ 1937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显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中,文盲率相当高。参见VB Zhiromskaia和Iu. A. Poliakov编,《1937年战争中的文盲:Obshchie itogi.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莫斯科:Rosspen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男女),第114页(男性);第116页(女性)。

⁸ 有关民意辩论的重要贡献,请参阅Alex Inkeles和Raymond Bauer合著的《苏联公民:极权社会中的日常生活》(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Sarah Davies合著的《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的民意:恐怖、宣传和异议,1934-1941》(剑桥、纽约和墨尔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Lesley A. Rimmel合著的《斯大林统治下的列宁格勒的斯沃德基和民意》,《俄罗斯世界报》第40卷,第1-2期(1999年):217-234页;Jochen Hellbeck合著的《我心中的革命:在斯大林统治下写的日记》(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凯瑟琳·梅里代尔,《伊凡战争:红军的生与死,1939-1945》(纽约:大都会图书,2006年);奥兰多·菲吉斯,《耳语者: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的私生活》(纽约:大都会图书,2007年);保罗·科纳(主编),《极权主义政权中的流行观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蒂莫西·约翰斯顿,《成为苏联人:斯大林统治下的身份、谣言和日常生活 1939-1953》(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谢尔盖·普洛基,《血的呼唤:政府宣传和公众对

谨慎地,或者干脆排除普通民众的观点问题界限。⁹

本章探讨的是前者。它建立在一种方法论之上,该方法论旨在探讨战后复员士兵的政治情绪。

2006 年的论文中,我利用国家检察官审查“反苏骚乱”案件的记录,重建了现有的政治观点万花筒

斯大林战争老兵。我发现各种各样的观点,而且很少

这在战后年代是无法想象的。¹⁰在这里,我使用了一个有点

由各种来源组成的不同数据集 来自士兵的日记

到德国俘虏的审讯记录和回忆录 到

类似的结局。鉴于这里感兴趣的不是

整个红军,更不用说苏联社会,而只包括那些

叛逃到德国,最合理的起点是审讯

德国军队提供的记录。当叛逃者被询问时

情报人员经常询问他们为何越过

前线。他们的回答构成了本章的核心内容。¹¹

我用其他更独特的记录来补充这个来源基础,例如

作为前线日记,或脱北者的回忆录。分析这一来源

在此基础上,本章建立了苏联

叛逃者。第二步,我超越了这种简单的定性分析

并尝试估算某些观点出现的频率

举行。

第二步的来源基础是收集询问

向 296 人报告了 334 名叛逃者

1942 年和 1943 年的步兵师,已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使用。

我根据所开发的类型学对本样本中的答案进行了分类

在本章第一部分,然后分析了它们的频率。

结果数据如表 6.1 至 6.10 所示。

本章提供的分析再次表明了脱欧派的多样性。这表明,如果我们将脱欧视为一场全民公投,那么它就是

《苏联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俄罗斯世界手册》52,第 1 期。2-3 (2011):293-319;

布里吉德·奥基夫,《新苏联吉普赛人:早期的国籍、表演和自我》

苏联(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13 年);约翰内斯·杜·恩斯塔德《苏联》

德国占领下的公民:俄罗斯西北部的生活、死亡和权力

1941-1944, 博士论文,奥斯陆大学,2013 年;以及罗伯特·戴尔(Robert Dale)的《复员老兵》

摘自《斯大林晚期的列宁格勒:从士兵到平民》(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学术出版社,2015 年)。

⁹ 关于普通人的想法并不重要的论点,请参阅斯蒂芬

科特金,《磁力山:作为一种文明的斯大林主义》(伯克利、洛杉矶和伦敦: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5 章。

¹⁰ 马克·埃德尔,《不仅仅是斯大林主义者:胜利者的政治情感》

1945-1953, 《斯大林晚期俄罗斯.重建与再造之间的社会》,主编。

Julijane Fürst (伦敦和纽约:劳特利奇,2006 年),167-91。

¹¹ 有关来源批评,请参阅第 1 章。

其目的并非针对斯大林主义,而是为了其他目的。¹²非常少数苏联士兵越过边界,与

德国人(尽管许多人最终还是成为了德国人)。¹³因此,前线的大多数逃兵首先应该被视为

逃离苏联生活、苏联政权和这场战争的难民。

三

促使叛逃决定的最基本情绪是“生存主义”。

它代表着不惜一切代价逃避死亡的意志。“我自愿投降”，

一名前红军士兵在1941年8月放弃抵抗后宣称

他的团队被包围在德军防线后方，“因为我害怕

被杀。”¹⁴投降是那些

不管有没有战争,我们都不想死。“我们的部队遭到了重炮的攻击

一名被苏联军事情报部门重新抓获后接受审讯的前士兵解释说,“他们

遭受了火灾,并造成了数人伤亡。他们的目标是拯救

我们的生活,我和另外两个人,我现在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跑了

逃兵们躲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当被德国人发现时

在那里的军队,他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投降了。¹⁵

偶尔,叛逃也是在一个人的生命面临直接危险时发生的,比如当一次明显的自杀式袭击即将发生时

¹⁶或者,正如一位脱北者所说,当抵抗“毫无用处”时。¹⁷这样的

当被强大的敌人包围时,绝望感尤其普遍

力量,这是1941年普遍的经历。¹⁸“因为我看不到

为了逃离包围圈”,一名士兵回忆道,“我把步枪留在了当地的

并自愿向德国人投降。”¹⁹

¹² 我所说的“斯大林主义”不是一种政治理想类型,而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社会在斯大林执政期间。详见我的《斯大林主义协会 1928-1953》(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¹³ 有关合作,请参阅第7章。

¹⁴ 法庭会议记录,1944年10月21日,USHMM RG-31.018,卷15,案例5542,第1卷:156-68,此处:159。

¹⁵ 审讯记录,1944年9月8日,USHMM RG-31.018,卷15,案例5542,卷。3:84-98,此处:84,例如

¹⁶ 21。ID,lc 某 Generalkommando XXVIII. AK, Betr. Überläuferaussage, 1942年5月12日,BA-MA RH 26-21/77,第42对开页。

¹⁷ 审讯记录,1952年6月30日,USHMM RG-31.018,卷15,案例5542,卷。2:22-4 这里:23。

¹⁸ 参见第四章。F. Drozdov 还发现,在撤退和进步与军事命运同步。Obshchestvennyye nastroyeniia v Krasnoi Armii v nachal'nyi period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博士论文, Lobachevskii 下诺夫哥罗德国立大学,2004年。

¹⁹ 审讯记录,1948年5月11日,USHMM RG-31.018,卷3,案例1794:14-21,这里:15。

苏联第 186 步兵师的一名政治官员在 1941 年关于其部队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上级的虐待,尤其是在纪律松懈的非精锐步兵部队中普遍存在的虐待,也可能引发叛逃的决定。

在一次[前线]视察中,团长阿克谢涅夫少校发现战壕挖错了位置。小组长声称,战壕的位置是排长指定的。少校随即拿起一支步枪,用枪托猛击小组长两枪。小组长愤慨地回答说,他已经参加过三次战争,却从未被任何人击中过。阿克谢涅夫少校下令解除该小组长的武装,并将他带到营部,调往另一个部队。然而,这项命令并未执行,黄昏时分,这六个人失踪了。²⁰

战争初期,两名士兵试图躲避战斗,干脆躺在灌木丛中不开枪,结果他们的指挥官用手枪威胁他们。“这名战俘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于是迅速开枪打死了上尉,”德国翻译总结其中一名战俘的供词。“之后,他带着几名战友叛逃到我们这边。”²¹

因此,苏联指挥官的暴行本意是加强纪律,迫使人们继续战斗,却往往适得其反。²²对生命漠不关心,导致那些渴望生存的人常常做出绝望的决定。一个例子就是,一名勤务兵趁上司午睡时玩弄了他的枪。手枪走火,致其上司重伤。“由于D.预料到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并被枪决,尤其是他们之前已经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张德军传单,所以他决定逃跑”,德军的审讯报告总结了他们的理由。²³即使是精锐士兵、志愿者和共青团员也难免会陷入生存主义的泥潭。维克多·K. 正是我们最期望能够践行苏联理想的士兵:

²⁰ 第 23 军总司令部,IC,“186 年政治报告”。

Sch. Div. (1941 年,德语翻译),BA-MA RH 24-23/239,对开本 26。

²¹ 299. ID,IC,Betr.:Gefangenenernehmung (12.7.1941),BA-MA RH 24-17/1871,第 30 页。

²² 罗杰·里斯 (Roger Reese)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斯大林的士兵为何战斗: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效力》(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68 页。

²³ 306. ID,IC,Vernehmung eines Angehörigen der 3. GSD. (Ordonnanz des stellvertr. Divisionskdr. übergelaufen am Nachmittag des 12.8.43 in Gegend Jessaulowka (13.8.1943),BA-MA RH 24-17/210,此处:对开页 116-116reverse。

思想坚定、斗志昂扬、最终甘于奉献的战士。24 K. 是青年团成员,自愿参加伞兵作战。1941年夏,150名训练有素的士兵夜间空降后方,协助围捕并撤离被包围的第二突击集团军的残部。维克托是12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他们在1941年8月7日至8日夜间从300米高空跳伞。他们安全落地,并成功集合。

每人配备一支自动步枪,备有300发子弹、两枚手榴弹和400克炸药。他们携带了足够15天的口粮。然而,正如这场战争中空降行动中常见的情况一样,他们无法与其他部队汇合,也无法找到他们被派去救援的人员。到9月中旬,尽管采集了浆果和蘑菇,他们的食物还是断绝了。饥饿难耐且无法完成任务的他们决定返回己方。情况迅速恶化。9月15日,一名士兵叛逃至德军。在逃亡途中,他向队伍投掷了一枚手榴弹,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至于他的战友开枪将其击毙。后来,幸存者被卷入与德军的交火。他们又损失了三人。在继续行军的过程中,他们开枪打死了一名伤员,因为他太累了,无法继续前进。维克多·K也疲惫不堪、饥肠辘辘、惊恐万分。他认为自己将是下一个被处决的人。

为了自救,他潜逃并投降了德国人。²⁵请注意,饥饿是这一事件的核心问题,这不仅仅是后方作战部队面

临的问题。在一个和平时期饱受粮食短缺,甚至有时发生饥荒的国家,为民众提供粮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²⁶红军在粮食供应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这种优势地位并不能阻止粮食短缺,而短缺往往是由后勤和运输问题造成的,尤其是

²⁴ 关于这一理想,请参阅约亨·赫尔贝克(Jochen Hellbeck)的《引导》(Einführung),载于约亨·赫尔贝克主编的《斯大林格勒议定书:东线暴力史》(法兰克福:S. Fischer,2012年),第9-108页,此处:第61-6页。另请参阅安娜·克雷洛娃(Anna Krylova)的《战斗中的苏联女性:东线暴力史》(剑桥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以及罗杰·D·马克威克(Roger D. Markwick)和尤丽迪丝·卡多纳(Euridice Cardona)的《二战前线的苏联女性》(Houndmills: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2012年)。关于这类士兵构成苏联抵抗力量的核心,请参阅里斯(Reese)的《斯大林士兵为何战斗》(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第312页及各处。

²⁵ 21 ID,lc an Generalkommando XXVIII AK,BETR.:Aussage eines Fallschirmspringers,28.9.1942,BA-MA RH 26-21/73,第60页。

²⁶ 威廉·莫斯科夫(William Moskoff),《苦难的面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粮食供应》(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以及温迪·Z·戈德曼(Wendy Z. Goldman)和唐纳德·菲尔策(Donald Filtzer)编,《饥饿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粮食供应》(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15年)。

战争初期。27食物短缺导致的沮丧情绪常常引发叛逃。正如一份德国报告简明扼要地指出的那样：

即使考虑到俄罗斯士兵的不苛刻的性格，供给不足，在很多情况下是导致叛逃的原因。主要主食是面包。。脂肪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补偿。。通过特殊的糖配给。无论如何，当被问及[关于供应]糖除面包外，它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8

三四天没吃东西的士兵常常觉得敌人可能会拯救他们免于饥饿，29这是一种因果关系。饥饿和叛逃之间，双方都心知肚明。当军队补给基地距离前线太远，食物无法送达，红军最高政治管理当局负责人1月份指出1943年，一个师的“情绪”急剧下降，开小差的现象也随之而来。与此同时，德国人早就注意到，一旦补给得到改善，

苏联叛逃者的数量减少了。31讽刺的是，1941年苏联士兵在前线自己这边可能正在挨饿；然而，在德国的拘留所里，他们注定会饿死。32

四

本章开头写信的中尉所表达的情感比简单的生存主义要复杂一些。

这里使用的“失败主义”指的是不愿意战斗，由于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动机或出于敌意最常见的情况是，这只是一种负面态度

²⁷ 大卫·M·格兰兹，《巨人重生：战争中的红军，1941-1943》（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05年），555-60；Reese，《斯大林的士兵为何战斗》，213-14。

²⁸ 93. ID, Ic, Tätigkeits- und Erfahrungsbericht（不晚于1942年5月6日），BA-MA RH 24-26/132,29有关

²⁹ 1941年、1942年和1943年各一个的例子，请参阅299, ID, Ic, Betr. : Gefangenenernehmung（1941年7月12日），BA-MA RH 24-17/1871,第30对开页；21 ID, Ic和IAK将军，BETR. :Gefangenenernehmung（31.3.1942），BA-MA RH 26-21/47,第154对开页；Generalkommando Janschke,7.3.43,Betr. :Überläufer-Vernehmung, BA-MA RH 26-221/76,Anlage 20。

³⁰ 政治政治委员会的宣传
Upravlennii Krasnoi Armii（1943年1月16日），RGAPI f. 88,同前。1.d. 958,伊利诺伊州1-17,此处:3。

³¹ 第二十六条。陆军天翼军团的俄罗斯陆军军团
Nord vom 20. August 1941 bis 6. Mai 1942 ,BA-MA RH 24-26/278,Anlage 5a,第4对开页。

³² 请参阅第7章。

³³ 关于失败主义，另请参阅奥列格·布德尼茨基的《伟大的卫国战争和苏联社会》：失败主义，1941-42'，《批判：俄罗斯和欧亚历史探索》15,第4期（2014）：767-97。

情绪、缺乏动力、有点沮丧或失望的状态。正如一位政治官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孩子”也就是他负责的被包围的士兵“不想打仗。我也不想。”他补充道。“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想因为鬼知道的原因而死去某种原因。”³⁴

在汇报情况时,叛逃者经常表达类似的观点:“他叛逃是因为他不想为共产党而战。”³⁵就像在这个例子中,失败主义可能会演变成反布尔什维主义:不想为共产主义而战。然而,这种政治内容并非必要的。“不想打仗”是早期叛逃者给出的简洁理由。为他的行为付出。³⁶五月下旬,一名男子来到德国1942年,当面临加入反游击队组织这一选择时,他拒绝了。他说道:“他叛逃是因为他最终想停止战斗。”³⁷

厌倦战争是人们经常引用的叛逃理由。³⁸1943年夏天越过边界的士兵说,他们“厌倦了战争,并认为战争继续下去对俄罗斯来说是没有希望的”。³⁸家人住在被占领土的士兵往往只是想回家。³⁹“他说他的家人住在罗斯托夫地区,他厌倦了战争”,作为集体农庄叛逃者的审讯者1942年12月的案件档案中记录了这一情况。⁴⁰

许多自愿投降的人并没有战斗的动力斯大林或苏联政权。他们往往不想与之抗争也一样。这个立场也许可以用一个连环逃兵来最好地概括,一个几乎不识字的乌克兰集体农民,出生于1915年。他投降了1941年9月被交给德国人,然后逃离战俘营并返回被占领区的村庄,在那里生活,似乎没有受到骚扰,直到1944年。返回的苏联人将他征召入伍

³⁴ 在 Politruks 范围内的通知书上设置
Leutnants, welches einem Partisanen abgenommen wurde (8月23日翻译)
1941) ,BA-MA RH 21-3/743,第3对开页。

³⁵ 列兵,1902年出生于沃罗涅日,工人,1942年8月12日叛逃],18岁,身份证(永久居民),lc,
“Anlagen zum Tätigkeitsbericht,1.5.1942-24.8.1942” ,BA-MA RH 26-18/62。

³⁶ 第十七军团于1941年6月26日叛逃。武装军团,Abt. Ic,Berichte
aus Gefangenenernehmungen,BA-MA RH 24-17/170,第54页。

³⁷ 18 ID(mot),lc,“Anlagen zum Tätigkeitsbericht,1.5.1942-24.8.1942” ,BA-MA RH
26-18/62,38

21 ID,lc,致 LIV 总司令部。AK, Betr.:Überläufervernehmung,1943年7月7日,
BA-MA RH 26-21/102,第765对开页。

³⁸ 苏联还注意到,来自被占领区的普通士兵
那些投向敌人的人中的领土。参见“Spravka o faktakh izmeny rodine”
v chastiaxh deistvuiushchei Krasnoi Armii (1942年7月15日) ,RGASPI f. 17,同前。125.d. 85,伊利诺伊州。
58-9;此处:58。

⁴⁰ 21. ID,lc 是第28总指挥部。AK, Betr.: Überläufersaussage, 5.12.1942,
BA-MA RH 26-21/77,对开本42。

同年4月加入红军,10月开小差,被抓进劳改营,1945年1月受伤。

在医院里,他说出了那些话,这些话最终会让他因“反苏煽动”而被判刑,但这实际上只是表达了他对自己在世界上地位的看法。这个地位并非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大战的任何一方,而是在场外的某个地方:“我说,我们为什么而战?如果希特勒和……斯大林能出来打一架就好了。胜利者,他的政府也应该获得胜利。人民不应该被卷入这场战争,被推向毁灭。”⁴¹

五

通常,叛逃者的动机远比简单的生存主义或失败主义更为复杂。或者更确切地说,生存主义和失败主义可能会压倒对家乡的热爱、对报复的恐惧、生命和肢体的危险以及对德国战俘营未来命运的焦虑,因为正如本章开头的作者简明扼要地指出的那样,人们普遍缺乏对这个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使数百万人受害的体制的忠诚。⁴²失败主义、生存主义以及对所遭受的忽视和虐待的厌恶,常常与政治上的不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促使叛逃的强烈情绪组合,正如战后采访所表明的那样。⁴³德国战时审讯报告也对叛逃动机和决策过程的复杂性进行了类似的描述:

过去两周,补给极其糟糕。[苏联人与德国人一样,都在应对春季无路状况,这使得部队的补给十分困难,ME]例如,在叛逃前一天,他们只得到了150克面包和一勺酸菜。部队的情绪尤其低落,许多人想要叛逃,但这并不容易,因为最近政治家和政委们特别多疑,并且高度关注。叛逃的最终诱因是一位德国人。

⁴¹ 有关反苏运动的审查案件,GARF A-461,op. 1,d. 1820,l. 2, 11。

关于战争期间的世界观,另请参阅 Mark Edele 的《走向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文化史》,《批判:俄罗斯和欧亚历史探索》第15卷,第4期(2014年):829-35,此处:834。

⁴² 有关该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Mark Edele 的《“我们为何而战?”苏联战争努力中的忠诚度,1941-1945》,《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历史》84,号。

秋季(2013):248-68。

⁴³ 例如:哈佛大学关于苏联社会制度的研究项目,附表B,第7卷,案例71,尤其是第12-15页。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

传单,他们一起阅读。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
宣布将分配土地。⁴⁴

政治上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几个主要问题上。⁴⁵其中一个是被政权迫害,这种经历通常由叛逃者本人或叛逃者他的家人。1941年的一名叛逃者声称“他不想和共产党有任何关系,因为共产党枪杀了他的父亲1918年”。⁴⁶另一位在1942年写道,他的父亲被布尔什维克和他本人大概是因为歧视反对“人民公敌”的儿子晋升机会渺茫。⁴⁷1943年,另一名红军士兵提到了他的牛被没收,他因试图抵抗这种盗窃。“因此,他不再想为这个政府。”⁴⁸脱北者普遍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制度,特别是集体农庄。“对共产主义和集体农庄的艰苦生活”是1月份提到的一个原因。⁴⁹但整个短缺经济体系也是导致不满,因为这位行政人员出身的中尉无法显然,他不仅能买得起面包,还能养活家人。当然,这两个导致不满的原因经济体系以及恐怖袭击的迫害这些往往相伴而生。

囚犯们深信,迟早整个军队都会缺陷,因为没有一个人红军士兵知道他应该为何而战。绝大多数红军士兵都是集体农场工人,所有人都对苏联政权怀有敌意,因为它没收了他们的私人财产。大多数红军战士的父亲都被流放了,要么被杀害,要么生活在赤贫之中。抵抗仍在继续,但处在极度恐怖的环境中。⁵⁰

⁴⁴ Gefangenenernehmung, 1942年4月25日, 18 ID (mot) , Abt. Ic, Anlagenheft zum Tätigkeitsbericht 1942.9.1.1942-30.4.42, BA-MA RH 26-18/60.

⁴⁵ 参见奥列格·赫列夫纽克 (Oleg Khlevniuk) 对斯大林政权不满原因的总结: 斯大林:《独裁者新传》(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2015年), 322-5, 46

⁴⁶ 296. 部门, Ic, Gefangenenernehmungsergebnisse, 25.8.41, BA-MA RH 24-17/172, 对开本 73 背面。

⁴⁷ 21. 步兵师, Abt. Ic Generalkommando XXVIII AK, Überläuferaus-sage, 1942年12月31日, BA-MA RH 26-21/78, 第 193 页。

⁴⁸ 第十七将军司令部。AK, 阿伯特。 Ic, Vernehmungsbericht Nr. 46, 7.8.43, BA-MA RH 24-17/210, 对开本 107 背面。

⁴⁹ 21. 步兵师, Abt. Ic, 第 28 将军司令部。AK, Überläufer-aussage (3.1.1943), BA-MA RH 26-21/78, 第 217 页。

⁵⁰ Stimmungsbericht, 27.7.41, Überläufer am 26. VII. 41, 巴马 RH 24-17/171, 对开本 117。

甚至列宁格勒市民因战争而遭受的饥荒

德国的封锁和对侵略者的仇恨的一个可能原因 可以归咎于斯大林政权,因为它引发了一系列

受害情况:

他声称自己叛逃的原因是他的父亲早已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对者。他感觉自己一直被跟踪和监视。他觉得自己的生命不再安全。这位叛逃者还报告说,1942年列宁格勒有许多人饿死。他自己的亲戚中就有八人饿死。
51

六

政治上的不满最终演变成积极的反斯大林主义。我所说的“反斯大林主义”不仅仅是指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感,更是一种分析,无论这种分析多么粗略,都表明了谁应该受到谴责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1942年的一份审讯报告写道:“这名叛逃者声称是出于信念而叛逃的。他想加入德国军队,尤其对参与打击游击队的战斗感兴趣。他声称在站岗放哨时杀死了一名政治犯。”斯大林主义常常是愿意与苏联方面作战的基础,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与德国人的合作(并非所有合作都出于反斯大林主义的动机)。反斯大林主义的一种普遍表现形式是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的结合。在这种世界观下,压迫的群体,而“犹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犹太佬” zhidy)则是压迫者。“俄罗斯人民”是被一位红军士兵在1941年11月23日于列宁格勒前线的日记中写道,其中一篇包含了这种观点。他写道:“犹太人”曾“折磨”俄罗斯人民,结果他们“面目可憎”。二十四年来,“政治领导人”一直对俄罗斯人民撒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德国人虐待囚犯,也不相信他们想要征服斯拉夫民族”。

⁵¹ 21 ID,lc,Kdo 将军。LIV AK, Betr.:Überläuferraussage,1943 年 4 月 5 日,BA-MA RH 26-21/98,第 9 对开。

⁵² Gefangenenernehmung,27.5.42,18 ID (mot) lc, Anlagen zum Tätigkeitsbericht, 1.5.1942-24.8.1942 ,BA-MA RH 26-18/62。

⁵³ 关于动机,请参阅谢尔盖·库尔德里亚绍夫(Sergei Kurdryashov)的《普通合作者:特拉夫尼基卫队案例》,载《俄罗斯:战争、和平与外交》,柳比卡·埃里克森(Ljubica Erickson)和马克·埃里克森(Mark Erickson)编(伦敦:魏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2005年),第226-39页。

⁵⁴ 德国军事情报部门获得的红军士兵日记(德国翻译,原文不在文件中),BA-MA RH 19 III/444,对开本 239-46,此处:对开本 240。

叛逃者在接受审讯后,要求能够提供

陈述:

他宣称:250万西伯利亚战俘欢迎德国人。他进一步报道称,他于1941年参加了西伯利亚的某种245人参与叛乱。他们袭击了一支[士兵]队伍,并夺走了他们的武器,然后他们领导了一场持续两周的游击战。他们想战斗反对苏联和犹太人。整个运动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却没有领导力。

现在许多来自西伯利亚的前囚犯参军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罪犯,而是政治犯。这些政治犯会叛逃,一旦他们有机会。⁵⁵

其他俄罗斯叛逃者也同样表示,他们“不想打仗为犹太人而战”或与“犹太军队”一起。⁵⁶

这种世界观也有乌克兰版本,乌克兰人

受到“犹太佬和俄罗斯佬”(moskali)的压迫,用早期叛逃者群体。⁵⁷一些乌克兰人因此越过前线因为他们不想捍卫“共产党政府和

犹太人的⁵⁸ 或者为“犹太人和政委”而战。⁵⁹乌克兰

俄语版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一世界

战争、革命和内战。许多观察家认为

这些情绪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越来越流行。⁶⁰他们

表达了对布尔什维克统治作为帝国主义形式的理解,

这是居住在莫斯科的外来人制定的规则。这些外来人可能是“犹太人”。

他们可能是“俄罗斯人”。也可能是“政委”。中央

然而,情绪是一样的:一些险恶的人主宰着生活

把普通人关进集中营,强迫他们

进入集体农场,让他们死于一场不属于他们的战争。

⁵⁵ 21. ID,lc,1943年7月27日,BA-MA RH 26-21/102,对开本920。

⁵⁶ 262. 信息。lc 部门,Überläufervernehmung Nr. 8,1942年11月17日;步兵军团ment 482,Vernehmung eines Überläufers,7.9.1942 均为 BA-MA FC-35-16-P。

⁵⁷ 引自 Aron Shneer, Plen: Sovetskie voennoplennye v Germanii, 1941-1945 (莫斯科和耶路撒冷:Mosty kultury,Gesharim,2005) ,134。

⁵⁸ 296 ID,lc,Anlagenband zum TB lc,1.4.1942-8.12.1942。 BA-MA RH 26-296/97。

⁵⁹ 251 (mot) ,lc,Vernehmung von 2 Überläufern (1942年9月) ,BA-MA FC-35-

16-第60页

GV Kostyrchenko,V plenu u krasnogo faraona (莫斯科: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1994年);同上,Tainaia politika Stalina. Vlast i 反犹太主义 (莫斯科: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2001年);阿米尔·韦纳,《理解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命运 (普林斯顿和牛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1) ,219-22,293-4;Mark Edele,“向敌人学习?纠缠的历史

德苏战争,1941-1945 ,载于《极权独裁:新历史》

Daniela Barattieri,Mark Edele 和 Giuseppe Finaldi (伦敦:Routledge,2014年) 190-211;此处:194-5。

因此,民族情绪与对斯大林主义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反对深深交织在一起,而这些制度深受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的侵害。一位来自阿塞拜疆的列兹金人表达了这种情绪,他于1942年10月叛逃,声称自己“对俄罗斯人充满了仇恨,因为他们把集体农庄制度带到了高加索地区的人民”。他请求抓捕他的人给他一支步枪,把他送上前线,“这样我就可以射杀几个俄罗斯布尔什维克”。⁶¹

一位来自高加索的乌克兰人,一位出生于1918年的熟练金属工人,除了亲身经历苏维埃政权之外,对其他一无所知,也同样对苏维埃政权抱有敌意,并准备与之抗争。他这样做的原因,既有对斯大林社会主义不满的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

从青年时代起,他在苏联的生活就很艰苦。当学徒时,他总是吃不饱饭;当助手时,他挣得微薄,几乎买不起衣服。由于没有在基辅警察局登记,他被判入狱。由于越狱失败,他被判处五年监禁,并被送往摩尔曼斯克强制劳动。

他再次试图逃跑,但被抓获并身负重伤。他一直在思考如何逃离苏联的苦难。

德国的宣传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尽管受到严厉的惩罚,撕碎的传单仍被保存并传播。他希望手持武器,为祖国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统治中解放出来而战。⁶²

因此,这个政权的敌人并非仅仅来自俄罗斯以外的边缘地区,或来自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国家新占领的边境地区。他们也并非仅仅来自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层。即使是斯大林的精英成员也可能感到疏远,不仅投奔德国人,甚至自愿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服务,正如我们在科诺诺夫少校的案例中已经看到的那样。另一个例子是叶夫根尼·斯捷潘诺维奇·彼得罗夫。⁶³他出生于1903年,1918年至1921年在辛比尔斯克的一家业余剧院担任演员和导演,之后于1924年至1925年在莫斯科接受了他所选择的职业的正式培训。

1925年,他成为重要杂志《Kino》的记者和革命电影人协会(Ассотсиат-сиа ревoлюционныкх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стов)的高级官员,同时也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⁶¹ 25 ID, IC, Vernehmung eines Überläufers, 1942年, BA-MA FC-35-16-P.

⁶² 294. ID Abt. IC, Vernehmungbericht Nr. 87, 1943年5月10日, BA-MA RH 24-17/210, 对开本38背面, 63这不是假名, 因为这是一个公众人物。

他曾在多家电影公司担任导演。1934年,他成为莫斯科著名的技术电影制片厂 (Mostekhfilm) 的导演,拍摄纪录片和教育片。总而言之,他并非名人,而是斯大林主义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在帝国最令人向往的城市——莫斯科——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百科全书关于他名字的条目声称他“死于卫国战争时期”,64一份苏联档案文件则将他列为1942年8月20日“失踪”(propal bez vesti)。65然而,就在当天,一位与他同名、同年、同职业的男子投奔了德国。当被问及叛逃原因时,他的回答比大多数人都更详细。审讯他的人总结如下:

这位叛逃者声称自己出于血统、教育背景和信仰原因对苏联体制怀有敌意。在苏俄担任电影导演期间,这种信念更加坚定。因此,早在战前,他就曾考虑离开苏俄,但机会直到战争期间才出现。他希望通过在德国国防军服役,找到一条途径,成为一名反对苏联政权的宣传员。66

我们无法百分之百确定此人就是在斯大林电影界成就卓著(虽非辉煌)的叶夫根尼·斯捷潘诺维奇·彼得罗夫。但职业、姓名和出生年份的巧合,使得此人很可能就是叶夫根尼·斯捷潘诺维奇。叶夫根尼·斯捷潘诺维奇在社会地位(斯大林的中产阶级)、军衔(中尉)、军衔(营副官)以及国籍(俄罗斯人)方面都属于统计学上的异常值,但在年龄方面则相对少见(他出生于1903年)。67他的反布尔什维克观点是否同样非典型?

七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次参考1942年和1943年296步兵师的334名叛逃者。同样,我们不能简单地使用原始数据,而需要首先对其进行分类和解释,以便

⁶⁴ <http://www.kino-teatr.ru/kino/director/sov/297018/bio/> (2015年4月2日访问)。该资料称其出生地为下诺夫哥罗德,但带有疑问。德国审讯报告则称其出生地为“莫斯科”(BA-MA RH 26-296/97)。

⁶⁵ “Prikaz glavnogo upravleniia formirovaniia i ukomplektovaniia voisk Krasnoi Armii,第22号。”(1943年1月7日),TsAMO f. 56,同前。12220,同前。84,湖。21日,来自https://pamyat-naroda.ru/heroes/memorial-chelovek_prikaz9350222/ (2016年8月11日访问)。

⁶⁶ BA-MA RH 26-296/97。

⁶⁷ 请参阅第4章。

表 6.1. 叛逃至 296 ID 的原因

原因	% (N=334)
生存主义	8.7
失败主义	33.5
政治不满	34.4
积极反斯大林主义	1.2
德国宣传	19.5
红军的生活条件	17.1
渴望回到家人身边	12.3
第一次世界大战待遇的记忆	3.0

可量化。审讯官使用了一份基本的问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他没有规定答案。因此，虽然由于存在重复的响应，符号并不完全标准化。为了进行定量分析，我们需要将

回答更广泛的类别。除了概述的四种情绪之外，除了上述的生存主义、失败主义、政治不满和积极的反斯大林主义之外，我还使用了几个更具体的原因，这些原因经常出现：

德国的宣传旨在鼓励叛逃，生活条件红军，回到被占领区的家人身边的愿望，以及在德国被俘的积极经历的记忆。第一次世界大战（表 6.1）。有些案例被分配到多个类别，因为有时一种广泛的情绪与一个或多个具体原因。也有案例表明没有

可以打勾，因为报告没有提到任何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比这里感兴趣的要多。例如，我没有对一名士兵给人一种“精神病患者”的印象，并且已经战前在精神病院待过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可以从审讯官困惑地说道。⁶⁸

这四个具体原因在方法论上并不复杂，因为它们直接体现在审讯报告中。四大主题然而，情绪不可避免地涉及一定程度的解释。我把任何对自己或他人的恐惧表达都归类为“生存主义者”。对自己生命得救感到如释重负。“失败主义”在所有情况下都存在。报告指出“没有战斗意愿”（Keine Kampflust），这再次相对简单。然而，有些情况下，分类会更加复杂。有些例子介于

类别。一个特别复杂的划分是决定何时声明表达了政治动机，或者当政治变得“活跃”时

⁶⁸ BA-MA RH 26-296/107 [数据库中的案件 331]。

反斯大林主义”。我认为“政治上的不满”可以通过以下言论来表达：比如“对苏联体制或其任何子系统不满”，例如集体农场。如果除了“没有”的标记外，还存在这些标记“战斗欲望”，我将这句话归类为政治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失败主义者。我还将所有讲述个人或家庭迫害的案例都归入这一类别。最后，我仅在政治上的不满与……相结合的情况下，才将“积极反斯大林主义”的陈述归类为“积极反斯大林主义”。表达了与苏联方面作战的愿望。结果分类总结于表6.1中。

审讯中最常见的叛逃原因

失败主义和政治不满是主要原因，各占 34%（表 6.1）。

一小部分人声称纯粹是出于生存主义动机（9%）

只有 1% 的活跃反斯大林主义者表示他们希望站在德国一边举起武器。失败主义和生存主义并存构成多数案件，紧随其后的是两个政治团体，

他们构成了实质性的少数派。只有 20% 的人声称自己受到德国宣传的影响，而类似群体（17%）则认为红军士兵的恶劣生活条件。12%

跨越前线，前往被占领土与家人团聚。

因此，叶夫根尼·斯捷潘诺维奇 就像伊万·科诺诺夫和其他活跃的反斯大林主义者一样 在表达帮助的愿望方面，是一个统计上的异常值。

导致苏联政权垮台，因为他在社会学

概况。表 6.2 总结了我们的关于四个活跃

叛逃到第296步兵师的反斯大林主义者。他们

没有什么共同点，从二十出头开始

叛逃（#175）到三十出头（#321），然后到三十多岁后期

四十多岁（#91，#327）。他们包括初级军官和军衔

表 6.2. 叛逃至 296 ID 的反斯大林主义者

#	日期 出生	日期 叛逃	国籍	职业 出生	秩
91	1903年8月20日 1942		俄语	莫斯科电影 导演	中尉
175	1919	5月10日 1942	无日期	奥廖尔 地区 拖拉机 司机和 养蜂人	红军人
321	1912	10月12日 1943	亚美尼亚语	理发师	红军人， 以前是第一 中尉
327	1900	11月17日 1943	俄语	集体 农民	红军人

和档案士兵、斯大林主义精英和集体农民成员、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仔细观察他们的人生故事,也会发现他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叶夫根尼·斯捷潘诺维奇·彼得罗夫(#91)在斯大林统治下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而其他三人却没有。最终让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只是他们错误地认为德国人是来把他们的人民从斯大林主义中拯救出来的,并且他们渴望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175号并没有声称自己之前受到该政权的迫害,但他相信德国“不是在与俄罗斯人民作战,而是想要解放他们”。因此,他“随时准备与布尔什维克和游击队作战”。

相比之下,312号则

被派往“西伯利亚,因为十年来政治上不可靠”。

他“对苏维埃政权不满,希望加入亚美尼亚自由军团,参与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祖国的事”⁷⁰最后,327号是一个连续的通敌者,他最初可能只是因为情况所迫而投靠了错误的一方。他没有报告之前与苏维埃政权的任何冲突,曾在德国占领的一个村庄担任长官。当德国国防军西进时,他和妻子跟随而去,而他的儿子已经作为一支通敌部队的成员撤离。不久,红军追上了这对夫妇,他们被捕了。当他的妻子在审讯中试图为他辩护时,她被枪杀了,而他则被移交给了惩戒部队。他决定在第一个可能的情况下叛逃,“为了保住性命,并与儿子一起对抗布尔什维克”。⁷¹虽然积极的反斯大林主义者是少数,但他们却隐藏在更大的政治不满公民群体(34%)之中。

表6.3按年龄、国籍和社会阶层对这一群体进行了细分,并将其与所有投奔第296步兵师的叛逃者群体进行了比较。这一比较表明,总体而言,国籍并不能很好地预测政治动机是否会导致叛逃。例外是哈萨克人,他们很可能声称自己是出于政治原因;乌克兰人则较少声称自己是出于政治原因。这两个民族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强制集体化和随之而来的饥荒中遭受了不成比例的苦难。⁷²年龄是一个更好的预测因素。出生于19世纪的人最有可能公开承认自己投奔敌人的政治原因,而出生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年份或之后的人最不可能公开承认这一点。最有趣的可能是政治叛逃者的阶级构成:最

⁶⁹ BA-MA RH 26-296/97.

⁷⁰ BA-MA RH 26-296/107.

⁷¹ 同上。

⁷² 乔治·O·利伯(George O. Liber),《全面战争与现代乌克兰的形成,1914-1954》(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章。

表 6.3. 政治上不满的叛逃者 (296 ID)

类别	% (N=115) 占有类别的比例	
	叛逃者 (%;N=335)	
1900年之前出生	18.3	14.7
出生于1900年至1916年	59.1	58.1
1917年以后出生	22.6	27.2
俄语	41.7	40.7
乌克兰	16.5	13.8
哈萨克斯坦	12.2	6.0
白俄罗斯	3.5	3.6
乌兹别克语	0.9	3.0
鞑靼人	0.9	2.1
楚瓦什人	1.7	1.5
立陶宛语	0.9	0.3
专业人士	14.8	9.6
熟练工人或工匠	30.4	35.9
产业工人	11.3	8.4
农业工人	3.5	3.6
集体农庄	36.5	38.3

可能对政治持开放态度的群体是专业人士,而集体农民和技术工人则不太可能这样做。

失败主义者则呈现出一幅略有不同的图景(表6.4)。

革命后出生的人最有可能认为没有理由

而世纪之交之前出生的人最不可能

在这一群体中。这一发现削弱了那些在

苏联的情况更忠诚,教化程度更高,因此更

可能会为社会主义而战。相反,这种社会化培养了很大一部分

受到所谓的“惰性”的折磨。⁷³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

鞑靼人更有可能是失败主义者,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家园被德国人占

领,也许是因为在日益

在“俄罗斯化”的苏联,他们感觉不再像在家一样。⁷⁴职业军人,技术熟练

工人和那些在集体农场之外从事农业职业的人比其他阶层更有可能

成为失败主义者。

惰性的积极版本是生存主义:试图保存

自己的生命,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表6.5)。

⁷³ 乔治·菲舍尔,《苏联反对斯大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案例研究》(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4-7页。有关此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8章。

⁷⁴ 戴维·布兰登伯格,《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斯大林主义大众文化及其形成》

现代俄罗斯民族认同,1931-1956(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哈佛大学大学出版社,2002年)。

表 6.4. 叛逃至 296 ID 的失败主义者

类别	% (N=112)	在所有类别中所占的份额 叛逃者 (%;N=335)
1900年之前出生	11.6	14.7
出生于1900年至1916年	57.1	58.1
1917年以后出生	31.3	27.2
俄语	40.2	40.7
乌克兰	15.2	13.8
哈萨克斯坦	3.6	6.0
白俄罗斯	6.3	3.6
乌兹别克语	2.7	3.0
鞑靼人	4.5	2.1
楚瓦什人	0.9	1.5
专业人士	6.3	9.6
职业军人	1.8	0.6
熟练工人或工匠	42.0	35.9
产业工人	7.1	8.4
农业工人	4.5	3.6
集体农庄	36.6	38.3

表 6.5. 叛逃至 296 ID 的幸存者

类别	% (N=28)	在所有类别中所占的份额 叛逃者 (%;N=335)
1900年之前出生	10.7	14.7
出生于1900年至1916年	60.7	58.1
1917年以后出生	28.6	27.2
俄语	75.0	40.7
乌克兰	10.7	13.8
白俄罗斯	3.6	3.6
亚美尼亚语	3.6	
楚瓦什人	3.6	1.5
专业人士	7.1	9.6
熟练工人或工匠	39.3	35.9
产业工人	10.7	8.4
农业工人	3.6	3.6
集体农庄	28.6	38.3

生存主义者与失败主义者截然不同:他们最常见于世纪之交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出生的一代革命。生命周期阶段可能蕴含着这种模式的线索:最年轻的群体,他们的人生还很长,占比过高那些试图自救的人;相比之下,最年长的群体

表 6.6. 296 个州的叛逃农民中的集体农庄农户

	集体中的百分比 农民 (N=128)	类别份额 所有脱北者 (N=334)
生存主义	6.3	8.7
失败主义	32.0	33.5
政治不满	32.8	34.4
积极反斯大林主义	0.8	1.2
前四类小计	71.9	77.8
传单宣传	22.7	19.5
红军的生活条件	17.2	17.1
渴望回到家人身边	13.3	12.3
第一次世界大战待遇的记忆	3.9	3
第二四类小计	57.0	51.9

严重缺乏代表性。1900-16 年的代表性也过高。这群人正值人生中期,有工作有家庭。事实上,而表 6.5 中描述的 39% 的生存主义者不是已婚,其中大多数 (十一人中有七人)单身汉来自最年轻的群体。

正如我们在表 6.2 至 6.5 中看到的那样,集体农庄在四个主要群体中的代表性都不足,这四个群体是由相对抽象的情绪——生存主义、失败主义、政治不满和积极的反斯大林主义。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集体农庄不仅构成了苏联战斗力量的绝大多数,而且叛逃至第 296 步兵团的最大群体 (占 38%) 分裂。因此,看来大多数集体农庄叛逃者并没有给出容易归类到这四个类别之一的答案。表 6.6 证实了这一假设:在四个更“抽象”的类别中,表格上半部分的方框强调了集体农庄代表性不足,总共有 72% 的人给出了可分类的答案是肯定的,而整个群体的答案是 78%。在底部表格的一半 (方框下方)这种趋势是相反的,农民更有可能给出“具体”的理由,例如德国的传单宣传,红军的生活条件,回到家人身边的愿望,占领区,或对德国战俘待遇的记忆,第一次世界大战。57% 的受访者给出了这些理由。集体农庄农民的比例为 52%,而所有叛逃农民的比例为第 296 步兵师。

表 6.7 至 6.10 提供了有关以下人员概况的更多详细信息:出于这些更具体的原因而叛逃。人们因为不能再在红军中杀人而叛逃。年龄越年轻,抱怨越多。其次,中亚人

表 6.7. 以德国传单宣传为理由的叛逃者

类别	与引用者分享 德国宣传 叛逃原因 (%;N=65)	类别份额 所有叛逃者 (%;N=335)
1900年之前出生	26.2	14.7
出生于1900年至1916年	53.8	58.1
1917年以后出生	20.0	27.2
俄语	44.6	40.7
乌克兰	12.3	13.8
白俄罗斯	1.5	3.6
楚瓦什人	3.1	1.5
乌兹别克语	3.1	3.0
鞑靼人	1.5	2.1
专业人士	10.8	9.6
熟练工人或工匠	29.2	35.9
产业工人	10.8	8.4
农业工人	4.6	3.6
集体农庄	44.6	38.3

表 6.8. 以红军条件恶劣为理由的叛逃者

类别	在抗议者中 红色的生活条件 军队是…… (%;N=57)	在所有类别中所占的份额 叛逃者 (%;N=335)
1900年之前出生	7.0	14.7
出生于1900年至1916年	59.6	58.1
1917年以后出生	33.3	27.2
俄语	38.6	40.7
乌克兰	8.8	13.8
白俄罗斯	1.8	3.6
楚瓦什人	1.8	1.5
乌兹别克语	7.0	3.0
哈萨克斯坦	12.3	6.0
专业人士	8.8	9.6
熟练工人或工匠	33.3	35.9
产业工人	10.5	8.4
农业工人	1.8	3.6
集体农庄	38.6	38.3

(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极有可能因此而叛逃。他们被那些通常由斯拉夫人组成的军官视为极其糟糕的士兵,因此,他们的日子一定比别人更难过。他们经常也难以与上级沟通,因为他们的俄语

表 6.9. 为了返回被占领土的家人而叛逃

	那些为了 回到家人身边 是... (%;N=41)	类别份额 所有叛逃者 (%;N=335)
1900年之前出生	19.5	14.7
出生于1900年至1916年	51.2	58.1
1917年以后出生	29.3	27.2
俄语	24.4	40.7
乌克兰	34.1	13.8
白俄罗斯	9.8	3.6
专业人士	12.2	9.6
熟练工人或工匠	24.4	35.9
产业工人	4.9	8.4
农业工人	17.1	3.6
集体农庄	41.5	38.3

表 6.10. 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俘政权的叛逃者

	在政治上不满的人中 叛逃者是... (%;N=10)	在所有类别中所占的份额 叛逃者 (%;N=335)
1900年之前出生	30	14.7
出生于1900年至1916年	40	58.1
1917年以后出生	30	27.2
俄语	70	40.7
专业人士	10	9.6
熟练工人或工匠	30	35.9
集体农庄	50	38.3

往往很穷。表 6.9 显示,无论是高龄人口还是低龄人口想回到自己的村庄和家人身边。考虑到在德国占领下,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这一类别中,西方人的比例过高,而俄罗斯人的比例过低。表 6.10 显示,俄罗斯老集体农庄最有可能怀念德国人对待战俘的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根据这一记忆采取行动。

75

阿列克谢·贝祖戈尔尼 (Aleksei Bezugolnyi) oborony Kavkaza v 1942 g. , 《后苏联社会权力机构杂志》,10 (2009) ,2009 年 12 月 7 日在线, <http://pipss.revues.org/3724> (2009 年 6 月 27 日访问) 2015 年);里斯,《斯大林士兵为何战斗》,第 248-50 页;布兰登·谢克特,《“人民的指示”:在“非俄罗斯人”本土化卫国战争》,Ab Imperio 3 (2012): 109-33.

八

叛逃的原因多种多样,从简单的生存主义到积极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一而足。最常见的是失败主义和一种消极的政治不满情绪,这种不满并非源于对抗苏联的愿望政权。对斯大林统治下生活的厌恶很少升级到叛逃者表示愿意拿起武器反抗他的政权。

许多叛逃者最终加入了与军事合作的行列德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初都不愿意合作,而是来自一个不值得为之奋斗的可怕政权的难民。⁷⁶

他们越界了,走向了更加卑鄙的独裁统治,往往会成为其罪行的同谋,这是其悲剧的一部分故事。在此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344名脱北者中只有5人当被问及为什么

已经越界了。鉴于众所周知德国人

发动对犹太人的战争,并且考虑到未被占领的苏联境内普遍存在的反犹太主义情绪,这一事实本身就很不起了。⁷⁷

334 给出的脱欧原因的量化分析

1942 年加入第 296 步兵师的苏联士兵

1943 年的研究还表明,关于生存机会的计算结果如下

与政治一样重要。事实上,从统计数据来看,前者略微比后者更重要的是:生存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 42% 的多数,而政治上不满和积极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则位居第二,略低于 36% (表 6.1)。集体

农民更有可能列举具体的叛逃原因和失败主义

与政治不满一样普遍。这一发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历史学家把苏德战争视为一场意识形态之战

在与政策制定者和

双方都推崇极权主义暴力 没有抓住叛逃的要点

对于很大一部分人来说。⁷⁸ 只有大约

1% 的人认为他们的选择是争取或战斗

反对斯大林政权。科诺诺夫在这方面确实非常出色。

⁷⁶ 有关协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7 章。

⁷⁷ 关于苏联战争期间的反犹太主义,另见 Sheila Fitzpatrick 的《重新审视 20 世纪 40 年代苏联的“犹太问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外后果,在 Jan Randa 博士后续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在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中,关于“大屠杀和苏联”,犹太人大屠杀

中心,Elsternwick (墨尔本),2015 年 5 月 27 日至 28 日。

⁷⁸ 参见 Mark Edele 和 Michael Geyer 的《例外国家:纳粹-苏联战争

《暴力体系,1939-1945》,载于《超越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比较》,迈克尔·盖耶和希拉·菲茨帕特里克编 (剑桥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大学出版社,2009), 345-95。

7

合作

我

伊万·科诺诺夫在德国队的日子过得相当轻松
前线。第二天,他被反情报人员审讯。
他被俘后被送往斯摩棱斯克的德国陆军总部
并于 1941 年 9 月 6 日再次接受第四集团军司令部情报官的审讯。根据这些汇报,
德国人提取了一份关于
红军前任司令员。然后他被派去,
不是去战俘营,而是去鲍里索夫的军官疗养院,以便
从最近经历的“巨大精神紧张”中恢复过来。¹

科诺诺夫的处理方式非常特别,体现了壮观的自然
他的叛逃。特权待遇似乎也延伸到了
科诺诺夫的人。科诺诺夫的官方历史

声称那些没有被纳入德国方面新成立的合作者部队的人被释放到德国控制的

2这种做法与德国

释放德意志族人、拉脱维亚族人、立陶宛族人、爱沙尼亚族人等
来自高加索和乌克兰的人可以返回家园与他们的

占领区的家庭。截至1942年1月,共有280,108名战俘
已被释放,其中绝大多数是乌克兰人。³

¹ 3. Panzer-Div./Ic, Verhör des Majors Kononow - Kommandeur des 436. SR/155 SD ,BA-MA RH27-3/170,对开页 73-5; Armeoberkommando 4,Ic/AO I, Verhör der
办公室 (Überläufer) Iwan Nikitowitsch Kononow, Major und Kommandeur des 436.
施茨。 Rgt. Alexander Jakowlewitsch Nagelmann. Hauptmann 和 Ia der 137. Schtz.
师。(1941年9月6日), BA-MA RH22/271,第 140-51 对开页; A. Iaganov, V pervoi
哈扎奇伊。奥彻克·沃托罗伊。 U Kononovtsev ,Na Kazach em postu: Dvukhnedel nyi
obshcheka-zachii zhurnal 37 (1944年11月1日), 11-12; 此处: 12. 8月23日的审讯
协议已在 KM Aleksandrov 和 OI Nuzhdin, Novye 中以俄语发布
General-Majora IN Kononova 的传记文献, Russkoe proshloe 12 (2012):

259-79。 2康斯坦

丁

² 切尔卡索夫,科诺诺夫将军 (Otvety na istorii za odnu popytku)

(墨尔本: Edinienie, 1963), 卷。 1:126。

³ 约翰·加勒德,《苏联纳粹大屠杀:新开篇的解读》

俄罗斯档案馆,《东欧犹太事务》25,第 2 期 (1995 年) :3-40; 此处 :9.36。

但这种宽大处理只针对少数幸运儿。大多数叛逃者战争的上半年 可能是渡海人数最多的时期 与其他数百万苏联战俘一样受到对待 德国军队制造了。4在犹太人和政委被带走后 并被枪杀,其余的人被带离前线,通常是 相当于死亡行军。G. Bukhantsov,早期 试图逃脱德国战俘营失败后 大锅讲述了每天被迫行军50至60公里的经历, 秋雨,在露天度过的夜晚。二十一 他们连续行军数日,却几乎没有食物供应。 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远处有一个集结营地。 前线,战俘们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骷髅。直到现在, 在德国被俘的三个星期里,苏联士兵没有得到食物。这 虐待不仅仅是由于缺乏物资和犯罪贫困 组织。种族优越感也导致了 对囚犯的虐待。掉队者被处决,那些试图

与被殴打的俘虏交谈,那些试图从溪流中喝水的人或 从路边的田里捡了一些谷物。当地妇女 试图给囚犯喂食的人遭到袭击。5

当这些不幸的人到达 营地通常只不过是铁丝网围栏,他们在里面挖洞 在地里,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工具,希望 逃离恶劣天气的侵袭。即使在准备更充分的营地, 营养不良和斑疹伤寒猖獗。营地人员暴力, 往往是因为士兵们不堪重负 面对如此庞大的人数,他们所能想到的只是“敲门” 用橡胶警棍打倒人,或者命令他们被枪毙”,一位温文尔雅的神学家 变成了集中营看守,他向他的 妻子。6一名来自立陶宛的犹太强迫劳动者在夏天观察到 1941年,德国人带来了俄罗斯战俘,这太可怕了

战争期间,总共有约一百万人获释:Christian Streit.Keine Kameraden: Die Wehrmacht und die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genen 1941-1945 (波恩:迪茨, 1997),第244页。有关此政策的更多详情,另请参阅 Klaus Jochen Arnold 的《德国国防军》 和 Besatzungspolitik in den besetzten Gebieten der Sowjetunion.战争与战争 《Unternehmen Barbarossa》中的Radikalisierung (柏林:Dunker & Humblot,2005),334-7。

⁴ 请参阅第2章。

⁵ G. Bukhantsov,无标题回忆录,打字稿,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收藏馆巴赫梅特夫档案馆,7-10。

⁶

康拉德·H·贾劳施 (Konrad H. Jarausch) 和克劳斯·乔亨·阿诺德 (Klaus Jochen Arnold) (编),《Das stille Sterben》。。。 , Feldpost-briefe von Konrad Jarausch aus Polen und Russland 1939-1942 (帕德博恩:斐迪南 Schöningh,2008),第329页 (1941年10月25日的信)。他已经报告了类似的事情 1941年8月:293。

看看他们。他们互相倚靠着，因为饥饿而肿胀。
然后他们就杀了他们。”⁷

布汉索夫这样描述他的第一个集中营：

在被德国囚禁三周后，我们在这里收到了第一批食物。
用陈麸皮和水混合而成，每人四分之一升。这
苦涩的东西堵在喉咙里。但即使是这种东西，也不是每天都能发出来。
每天都要面对，但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的那一份。每天都要逃避
尝试变得更加常见，通常以受害者的死亡而告终
谁尝试过呢？每个人都清楚，在这样的食物和生活条件下，
开阔的天空下，没有人能长久。“莫吉廖夫”这个名字似乎
一个预兆：[营地]将成为我们共同的坟墓[俄语：mogila]。
那些开始表达对德国不满的人和德国支持者之间开始爆发争斗，他们解释说

在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一切都具有军事必要性。

最终以德国支持者的胜利而告终，而绝大多数

囚犯们默默地观看……⁸

这种灾难性的情况是由于

德国最高指挥部。国防军原本预计会做出许多
战争第一阶段的战俘人数比实际人数多，但并没有
付出了很多努力去准备它们。⁹

如果竞选开始时情况很糟糕，那么

巴巴罗萨在秋冬季节遇到了困难，这简直是一场噩梦。

现在，因疾病、寒冷和营养不良而死亡的情况变得猖獗，¹⁰

叛逃者越来越绝望。“希特勒承诺给我们面包和好东西

一位四个孩子的父亲向一位德国军官悲痛地抱怨道，

“现在我们自愿叛逃后都死了。”

340万战俘中的¹¹

截至 1942 年 2 月 1 日，共有 130 至 190 万人死亡或

谋杀，死亡率高达 56%。¹²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⁷ 采访 Chana Bederis (1980年3月9日)，威廉·E·维纳口述历史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图书馆：最近苏联移民的口述历史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多洛特犹太分部。访谈记录，¹³。

⁸ 布汉佐夫回忆录，10-11。

⁹ 克里斯蒂安·格拉赫 (Christian Gerlach)，《国防军指挥：Vergleichende》
Betrachtungen am Beispiel der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genen，in Verbrechen der Wehr-
macht: Bilanz einer Debatte, 编辑。克里斯蒂安·哈特曼等人。(慕尼黑: CH Beck, 2005)，
40-9, 特别是。41-2, 还有 Streit, Keine Kameraden。

¹⁰ 克里斯蒂安·哈特曼 (Christian Hartmann)，“大众还是大众？” Sowjetische Kriegs-
gefangene im “Unternehmen Barbarossa”。Aus dem Tagebuch eines deutschen Lagerkom-
mandanten，in Der deutsche Krieg im Osten 1941-1944: Facetten einer Grenzüberschreitung,
Christian Hartmann, Johannes Hürter, Peter Lieb 和 Dieter Pohl 编 (慕尼黑: Oldenbourg Verlag,
2009 年)，307-67。

¹¹ Konrad Jarausch, 1942 年 1 月 10 日的信，载于 Das Stille Sterben, 364-5, 此处: 365。

¹²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zum Verbleib der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
genen vom 2. September 1944”，德文 Rotarmisten 重印: Dokumente zu

有多少名死者以及多少名幸存者叛逃者。

同样,我们只能猜测他们中有多少人后悔自己的愚蠢行为决定放弃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转而支持希特勒的军队。

1941年末巴巴罗萨危机之后,战争转向

自1942年以来,由于人员减员,战俘营的条件稍微好了一些。死亡人数减少了,因为现在人们听到了那些警官的声音

他们认为让战俘活着符合德国国防军的军事利益,剥削他们的劳动,并鼓励叛逃。这种重新校准战争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果1941年大约有56%的人死亡,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一比例可能下降到43%

与国际水平相比,死亡人数仍然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比1941年的情况有所改善。¹³

二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从1942年开始,

对脱北者实行优惠待遇,以帮助

鼓励越过前线逃兵。现在,逃兵可以被转移到特别营地,¹⁴并且在战俘营中,他们可以

获得单独的营房,有时位于铁丝网外面。¹⁵他们的饮食比普通战俘要好。¹⁶

在这个新政权下,叛逃者还有三条出路:

他们可以在优越的条件下留在营地,他们可以

Gefangenschaft, Repatriierung und Rehabilitation sowjetischer Soldat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编辑:吕迪格·奥弗曼斯·安德烈亚斯·希尔格和帕维尔·波利安(帕德博恩:费迪南德·施翁宁,2012),第314-18页,此处:314。资料来源列出了1,340,000人死亡,540,000“其他损失”,包括“移交给SD”。较大的数字假设后者在从国防军营地转移后被枪杀。“其他损失”不包括获释人员和逃亡人员分别列在不同的栏目中。

¹³ 这些数字并非定论。参见 Christian Hartmann 的《德国国防军在东方战争中》:《前线与军事腹地》1941/42年,第2版。(慕尼黑:R. Oldenbourg Verlag, 2010), 568 n. 3。其他可用数据估计该比例高达63%。与此同时,被关押在日本的盟军战俘死亡率为27%,德国战俘在苏联拘留所中,这一比例为15%,而在西方德国集中营中,这一比例仅为4-5%。百分比。马克·埃德尔,《不俘虏:红军和德国战俘》,1941-1943,《现代史杂志》88(2016):342-79,此处:375-6。

¹⁴ 副总统 Naumov, “Sud ba voennoplennykh i deportirovannykh grazhdan SSSR: Materialy komissii po reabilitatsii zhertv politicheskikh repressii”, 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2 (1996): 91-112, 此处:92。

¹⁵ 1943年罗兹空军营报道:A. Drabkin 采访 Nikolai Timofeevich Smol skii (2008年11月21日) <http://iremember.ru/memoirs/letchiki-bombardirov/smolskiy-nikolay-timofeevich/> (2015年8月21日访问)。

¹⁶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伊尔琴科 (Mikhail Alekseevich Ilchenko) 的回忆录 (2010年11月29日), <http://iremember.ru/memoirs/letno-tekh-sostav/ilchenko-mikhail-alekseevich/> (2015年8月21日访问)。

被释放为德国人工作,或者他们可以自愿成为军事合作者。17事实上,后者的道路对他们来说是敞开的从竞选活动开始就差不多了。无论他们是叛逃者不管怎样,1941年幸存下来的苏联战俘中有很大一部分因为他们与德国人合作。

泄露的信息,以确定“合作”是否是描述与希特勒军队或其他占领当局合作的正确词语。各种各样的已经提出了替代术语,试图对各种与敌人的和解形式做出更精细的区分。这个词

想要强调动机的作者们完全避免了这一点往往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生存主义者,或者对这个概念带有政治污名。这个讨论有点太技术上来说,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一方面,大多数为德国服务的叛逃者在一些军队或警察部门能力,这显然是帮助和教唆敌人的一个例子。被占领期间的许多平民行为,比起其他行为,更不能被归类为合作。其次,我们在这里使用这个词并非贬义,而仅仅是描述意义:对我们来说,合作者是帮助敌人的人通过在被占领者的军队、警察或行政部门服役来为战争做出贡献(无论他或她选择这样做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18

如此多的前红军士兵与希特勒合作,

令人惊讶的是,并不是因为所有苏联公民都忠诚,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臣民,而是因为希特勒有非常明确的政策关于军事合作。“绝不允许任何人

但德国人却带着武器,他从前线提出了请求

1941年7月。元首说,“不是斯拉夫人,不是捷克人,不是哥萨克人或乌克兰人都不能被信任拥有武器。即使它可能“在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获得军事援助似乎更容易,但

“错误”,并将对德国产生负面影响。19 1942年4月5日,他在一次晚餐谈话中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

借鉴哈布斯堡帝国与波兰或

他总结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军队的组成

¹⁷ 凯特尔元帅和蔡茨勒将军向元首致敬
8.6.1943 auf dem Berghof, 编辑。乔治·费舍尔,《现代史杂志》23,第1期。1 (1951):58-71,此处:63。

¹⁸ 这场辩论的两个微妙的介绍是伊斯特凡·迪克(Istvan Deak)的《欧洲的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合作、抵抗和报复》(费城:Westview Press,2015年);以及Timothy Brook,《合作:日本特工与当地精英在战时中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

¹⁹ 《Aktenvermerk (16.7.1941)》,转载于《审判主要战犯》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1945年11月14日-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IMT,1949),第XXXVIII卷:86-94,此处:88。

正是这些人被允许为帝国而战
国家部队后来成为“叛乱的旗手”。²⁰

希特勒是对的：那些愿意加入德国阵营的人是为了他们的
我们有自己的理由，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²¹与此同时，
然而，他对军事合作的敌意，显示出他对经验现实的极大漠视。4月11日，元
首再次在晚宴上
对占领区治安管理制定了极不切实际的指导方针：

历史表明，所有允许其臣民进行
军方这样做已经为自己的垮台做好了准备。。。所以我们不要
当地民兵或当地警察。只有德国军队才能承担整个被占领的俄罗斯地区维护法律和秩序的
唯一责任。
领土... ²²

当希特勒说出这些话时，
被占领的苏联领土由数十万
武装合作者。东部的军事领导人，尽管面临重重压力，
从竞选一开始，就开始寻求前任的帮助
红军士兵从战役初期就开始了。到1942年初，
可能有 200,000 人，不包括大约 33,000 名当地警察
(Schutzmannschaften)，²³在这方面，更现实的是海因里希
希姆莱已下令在 1941 年 7 月开始招募。²⁴大多数
军事合作者担任辅助角色 司机、马夫、
厨师、翻译等 但其他人被允许参战。²⁵
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反叛乱力量试图
遏制广大被占领腹地日益增长的党派威胁
是由现在侍奉新主人的苏联公民组成的。²⁶

²⁰ 《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44 年的私人谈话》，HR Trevor-Roper 编，第二版
edn. (伦敦：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3 年) ,404。

²¹ 奥列格·贝达 (Oleg Beyda) 对参加德国战争的白人逃亡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努力。参见他的《“弗兰格尔军队的铁十字勋章”：俄罗斯移民作为翻译
德国国防军》，《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27 (2014) :430-448。

²² 希特勒的餐桌谈话,425-6。

²³ 亚历山大·达林，《德国在俄罗斯的统治：占领政策研究》，第二版，修订版。
edn. (博尔德：Westview Press, 1981 年) ,536;马丁·迪恩，《大屠杀中的合作》：
《1941-44 年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方警察的罪行》(纽约：圣马丁出版社)
出版社,2000) ,60。

²⁴ 温迪·洛尔，《纳粹帝国的建立和乌克兰的大屠杀》(教堂山：
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5年) ,90。

²⁵ 例如，1941 年 7 月 29 日，第 298 步兵师报告说：“叛逃者战斗
在我们这边，受伤了。” BA-MA RH 24-17 / 155,对开本 195。

²⁶ 例如，1941 年 12 月，内务人民委员会报告逮捕了一名叛逃者，
指挥过一支反击击队部队。转载于 Lubianka v dni bitvy za Moskvu: Po
rassekrechennym dokumentam FSB RF,编辑。VK 维诺格拉多夫 (莫斯科：Zvonnitsa,2002) ,
397-9,此处：399。

科诺诺夫就是其中之一。在鲍里索夫军官疗养院舒缓了紧张的神经后,这位少校开始重建他的部队,希望能帮助俄罗斯摆脱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尽管希特勒明确表示反对,但他还是被允许这样做,这说明当时的状况比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其德国表亲)混乱得多。

科诺诺夫后来的上司弗拉索夫将军曾惊讶地告诉他的上司:在苏联,没人敢反对斯大林的明确指示,如果他们敢反对,就会被逼上绝路。相比之下,德国军官却经常违抗上级命令,并且活了下来。

27

科诺诺夫的德国对话者是马克斯·冯·申肯多夫将军(1875-1943年),中央集团军群后方地区指挥官。

无论怎样,申肯多夫都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团长,下令枪杀人质,以报复游击队袭击他的部队;1918年德国革命后,他坚信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非战败,而是被社会民主党“从背后捅刀子”。他是一位典型的反犹太主义者,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质上是“犹太的”,并于1933年加入纳粹党。1941年,他被任命负责中央集团军群后方的反游击战争,并监督了针对平民的极其残酷的战争。他严格执行政委命令,并与党卫军合作进行大屠杀,他认为这是“平定”行动的一部分。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位意识形态专家,更是德国军事机构的代表:他拥抱一切看似有利于战争事业的行动,无论是烧毁村庄,还是试图赢得民心。(与大多数德国军人一样,他前者总是比后者更擅长。)他了解元首对在德军服役的俄国人的意愿,但他也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来遏制日益增长的游击队威胁。如果军事需要,德国军官们既可以围绕元首行事,也可以迎合他。²⁸

^{27b} 威尔弗里德·斯特里克·斯特里克菲尔德(Wilfried Strik-Strikfeldt),《斯大林与希特勒:将军 Wlassow und die Russische Freiheitsbewegung》(美因茨:Hase & Koehler Verlag,1970年),109。

^{28a} 关于申肯多夫,请参阅埃克哈德·迈耶-杜廷多夫(Ekkehard Meyer-Düttingdorf),“陆军马克斯·冯·申肯多夫将军”,载于《希特勒军事精英:68 Lebensläufe》,第2版。编辑,编辑。Gerd R. Ueberschär(达姆施塔特:WBG,2011),481-8;Jörn Hasenclever,《国防军和 Besatzungspolitik in der Sowjetunion:Die Befehlshaber der rückwärtigen Heeresgebiete 1941-1943》(帕德博恩:Schöningh,2010),73-95,474-522。关于德国军队的犯罪行为,其动机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本身,而是出于军事上“必要”的务实承诺,请参见Jörg Friedrich,《Das Gesetz des Krieges:Das deutsche Heer in Rußland 1941 bis 1945. Der Prozeß gegen das 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慕尼黑和苏黎世:Piper,1993);和杰夫·卢瑟福,《战争与种族灭绝》

因此,申肯多夫允许组建一支俄罗斯军团来作战站在他那边,但告诉科诺诺夫不要称其为“俄罗斯”,而要称其为“哥萨克”,可能对元首来说更容易接受。²⁹这种实用主义继续当俄罗斯战俘被登记为“未来哥萨克人”时,有人认为,在过去,哥萨克人也是从

各斯拉夫民族都对自由和战斗生活感兴趣。³⁰

科诺诺夫招募红军战俘加入军队,附近的营地,包括莫吉廖夫的“墓地营地”,那里的恐怖情况已经描述。³¹最近从现在开始

1941年秋天,叛逃者科诺诺夫的历史与苏联战俘的历史以及

苏联公民与德国人合作。一方面,这些人组成他部队的人往往不是叛逃者,而是普通的、饥饿的战俘;³²另一方面,科诺诺夫试图打自己的战争反对斯大林的军事行动与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军事合作越来越难以区分。

科诺诺夫向他的传记作者讲述了他如何申肯多夫亲自说服他,武装的必要性俄罗斯解放运动,然后,在他叛逃后一周内,开始招募志愿者。科诺诺夫负责这个账户,先是向德国将军发表精彩演讲,然后又向他的同胞,然后面试每一位候选人,并招募只有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到1941年9月19日,他的部队已经完成并宣誓;训练一直持续到10月26日,并参加了第一次战斗几天后,即10月28日。³³

在1944年的报道中,他向一位为哥萨克人写作的前线记者讲述了在为德国人服务期间,科诺诺夫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他曾留在在鲍里索夫疗养院待了“大约一个月”,正在康复。在此期间时间也就是八月或九月的某个时候他写了一篇他“参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的愿望被送往德军指挥部。³⁴10月,他收到了申肯多夫的回复,

东线:德国步兵的战争,1941-1944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

²⁹ 切尔卡索夫,科诺诺夫将军,卷。1:124-5。 ³⁰ 同上,129。

³¹ 新西伯利亚地区联合国人民委员部对汉斯·里特贝格的审讯记录,2月6日1946年3月6日,重印于Leonid Reshin, “Kazaki”so svastikoi ,Rodina 2 (1993):70-9,这里:73。

³²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并不是所有在战俘营里被招募的人都加入了该部队对苏联统治的厌恶。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一个逃离非人道统治的机会。这些营地的条件很好,吃得也比较好。”列昂尼德·雷因,《国王与卒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白俄罗斯的合作(纽约和牛津:伯格汉出版社,2013),291。

³³ 切尔卡索夫,科诺诺夫将军,卷。1:125-31,130-3,135-8。

电报,然后才开始组织他的部队。³⁴

这一说法与档案证据更加吻合,档案证据表明

科诺诺夫于 9 月 6 日接受第四军情报部门的审讯

1941 年,当时他正忙于招募战士

为了反布尔什维克事业。³⁵此外,即使根据圣徒传记,中央集团军群组建该部队的命令也只是在

9 月 19 日,即叛逃约一个月后,再次

与 1944 年的记载相符。³⁶ 1944 年的另一份德国记载

科诺诺夫部队的组建命令日期为 10 月 28 日, 37

申肯多夫的日记还记录了

1942 年 10 月下旬,科诺诺夫本人也于 1948 年

10 月 28 日为该团的成立日期。³⁹格拉夫·汉斯

里特贝格是科诺诺夫的德国经纪人,在接受

斯大林战后的安全部门也声称他第一次见到

科诺诺夫当天在申肯多夫总部。据

据他所说,直到那时,将军才下令组建

哥萨克部队。据里特伯格说,科诺诺夫只是开始招募

此后,到 1941 年 11 月 9 日,已从

战俘营。赫尔穆特·冯·潘维茨 (Helmuth von Pannwitz),科诺诺夫后来在 XV 中的上级

哥萨克军团也把“1941年底”定为

40 无论如何,在希特勒之前,在愚蠢的

哥萨克人是东哥特人的后裔,允许使用

1942 年 4 月 15 日,哥萨克人作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盟友。⁴¹

³⁴ 亚历山大·伊加诺夫 (Aleksandr Iganov), 《V pervoi kazach'ei: Ocherk tretiei》,波尔科夫尼克·科诺诺夫,Na 哈萨克斯坦邮政: Dvukhnedel'nyi obshchekazachii zhurnal 38 (1944 年 11 月 15 日): 11-12; 此处: 11。

³⁵ Armeeeoberkommando 4,lc/AO I, Verhör der Offiziere (Überläufer) Iwan Nikitowitsch Kononow, Major und Kommandeute des 436. Schtz. 亚历山大·雅科勒维奇右翼 Nagelmann, Hauptmann und Ia der 137. Schtz. 师。(1941 年 9 月 6 日), BA-MA RH22/271, 对开本 140-51。

³⁶ 切尔卡索夫,科诺诺夫将军,卷。1:131。

³⁷ 就是这样,一切都是这样的。。。Oberst Kononow und seine Donkosaken, 报纸剪报 (1944 年), 来源不明 (可能是 Kosakenruf)。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斯坦尼斯拉夫·A·奥斯基收藏, 盒子 4, 文件夹“维罗维蒂察“KKK”1945 年 3 月 29 日”。

³⁸ KM Aleksandrov, “Kononov Ivan Nikitich”, 载于 Ofiterskii korpus armii General-Leitenanta AA Vlasova 1944-1945: Biograficheskii spravocnik, 编辑。亚历山大·罗夫 (莫斯科: Posev, 2009), 491-510, 此处: 504 n. 35。10 月 23 日或 28 日是在陆军总部第一次下令允许组建哥萨克部队之前 (11 月 16 日 1941 年)。希特勒直到 1942 年 4 月 15 日才允许哥萨克人参与战斗。参见达尔, 德国在俄罗斯的统治, 538, 299。

³⁹ 科诺诺夫致尼古拉耶夫斯基, 1948 年 4 月 26 日, 胡佛研究所档案, 鲍里斯 I. Nicolaevsky 收藏, 盒子 259, 文件夹 4, 卷轴 220。

⁴⁰ Reshin, “Kazaki‘so svastiki” 73, 75。

⁴¹ SI Drobiazko, EN Evseeva, D. Zhdanov, LA Mozhaeva, AV Okorokov, Ja. L. Pisaevskaia, DV Tiurin, Ju. S. Tsurganov, EA Shirokova and AE Iashlavskii,

无论该部队的具体组建日期如何,显然其完成时间远晚于传记中所描述的时间,而且科诺诺夫受到德国同行的束缚,远比他在战后向切尔卡索夫透露的要严重得多。现有资料揭示了战后神秘事件背后的真相,揭示了从红军部队组建一支合作部队是多么复杂。那些想要将俄罗斯人民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解放者”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他们是一小部分叛逃者 或许以为他们只需跨越红军防线,向德国人敬礼,宣布他们愿意作为盟友与他们并肩作战,共同对抗斯大林,然后转身向红军开枪即可。实际上,他们更有可能被关进战俘营,饿死,或者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寻求当地指挥官提供的任何合作机会。正如一位同情反斯大林主义叛逃者思想的德国军官在其回忆录中所述,在巴巴罗萨行动的最初几周,苏联军官及其士兵投奔德军并立即要求将枪口转向东方的情况“数不胜数”。“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德国人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将他们送往战俘营。”

四二

如果科诺诺夫希望通过与希特勒军队暂时结盟,帮助“解放”祖国,从而为自己赢得荣誉,那他一定会失望。事实证明,他越过前线不仅犯了错误的职业错误。1941年看似不可想象的事情,在1943年变成了现实:不可战胜的德国国防军被击溃,被迫撤退,并逐渐放弃其占领的一切,留下一片种族灭绝的焦土。此外,德国人不允许科诺诺夫的部队像他希望的那样在前线与红军直接作战。相反,他们与“游击队”在后方作战,这支队伍可能指躲藏在树林里手无寸铁的犹太人,也可能指成群的红军散兵和为躲避德军掠夺农村劳动力和粮食而逃亡的当地人,也可能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指挥严密的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突击队员,他们空降或潜入前线后方,扰乱德军后方秩序、收集情报、惩罚通敌者。⁴³至少,科诺诺夫派在战争初期确实参与了战斗,这与更著名的弗拉索夫将军(最初并非叛逃者,而是战俘营自愿加入的通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后者

俄罗斯的名字是: Mezhdru Rossiei i Stalinyu. Rossiiskaia emgratsiia i Vtoraia Mirovaia vojna (莫斯科: RGGU, 2004年), 255。

⁴² 斯特里克-斯特里克费尔特,《斯大林与希特勒》,18-19。

⁴³ 亚历山大·戈贡,《斯大林突击队:乌克兰游击队 1941-1944》,第2版。edn。(莫斯科:Rosspen, 2012年)。

作为一名政治家撰写宣言,44科诺诺夫
他在德国反叛乱行动中获得了军事荣耀。他的第102哥萨克部队(名称各异,
营,后来成为第 600 哥萨克营,然后是第 600
哥萨克军团)参加了

白俄罗斯:《班贝格》(1942年3月至4月)、《鹰》(1942年7月至8月)
“闪电”(1942年9月至10月),极其血腥的事件,涉及射击平民
(通常是妇女和儿童)和灼热的

村庄里的人是否确实是党派支持者。45
一位曾在科诺诺夫部队附近服役的合作者对这位少校在此期间的
军事记录给出了非常公正的评价。他报告说
在他的回忆录中,少校的团“以技能而闻名
战斗和对游击队的残酷报复以及可耻的
对待民众的方式”。他补充道,“哥萨克人夺走了一切
来自人口”。⁴⁶

1943年,科诺诺夫的部队成为第十五哥萨克军的一部分,
由冯·潘维茨指挥。这次重组发生在
惨败后,德国的命运进一步恶化
在斯大林格勒。军事合作者叛逃回苏联
崛起。作为回应,希特勒,他从来不喜欢军事
合作,下令将这些部队撤出东线

1943年秋天。到1944年1月,向西方的转移
完整的 除了一些重大例外。47 1943年9月初,当科诺诺夫和其他
哥萨克领导人得知这一调动消息时,
抗议并设法获得继续与共产党斗争的许可
这次是在南斯拉夫。48进入这个新的
冯·潘维茨指挥的哥萨克部队,据他自己承认,

⁴⁴ 凯瑟琳·安德烈耶夫,《弗拉索夫与俄罗斯解放运动:苏联现实与
流亡者理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在他第一次审问中
1945年5月25日,苏联军事情报局(SMERSH)发布了弗拉索夫确实声称他
“我自愿臣服”(sdalsia .. dobrovol'no v plen)。参见
弗拉索夫将军的审讯协议:istoriia弗拉索夫将军:istoriia predatel'stva,卷。2。
第一本书:iz sledstvennogo dela AA Vlasova,编辑。AN Artizov 和 VS Khristoforov
(莫斯科:Rosspen,2015),15-38,此处:15。然而,这句话必须被看作
比喻,因为德国对他被捕的报道非常明确:他被逮捕了
当地人,并被移交给德国人。参见同上卷1:民族主义项目“行动”
Wlassow ,84-5。

⁴⁵ 亚历山德罗夫,《科诺诺夫·伊万·尼基蒂奇》,493-4;绳、国王和卒,
292-3, 46

⁴⁶ Vladimir Rydin, "K istorii osvoboditel'noi bor'by narodov Rossii"(1949),概述
弗拉索夫:istoriia predatel'stva,卷。2.2:iz sledstvennogo dela AA Vlasova,380-91,此处:381。

⁴⁷ Strik-Strikfeldt,《斯大林与希特勒》,174,178,181。另见 Dallin,《德国统治》
在俄罗斯,582-4。

⁴⁸ 切尔卡索夫,科诺诺夫,卷。1:185-8。

“抢劫民众……烧毁他们的房屋,强奸妇女,
当遇到最温和的抵抗时,就会杀死民众。49在这样的背景下,科诺诺夫继续了
他的职业生涯。他结束了他的战争
作为弗拉索夫将军武装部队中所有哥萨克部队的首领
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力量 (VS
KONR,俗称“俄罗斯解放军”,简称ROA),
德国人在最后一刻试图做最聪明的人
国防军军官们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征召苏联民众中的反斯大林主义力量投入
战斗。

科诺诺夫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案例,但他对德国国防军的支持
战争远非个例。很少有人意识到军事
合作者是为了德国的战争努力。一位苏联老兵估计
1943年初在斯大林格勒俘虏的战俘中,近十分之一曾是
红军士兵。到同年9月,苏联红军士兵总数
身穿德国制服的公民人数已达到80万至
100万,51而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的军事人数上升到160万
警察、军队、党卫军等的辅助人员。52人们也常常忘记,
苏联出身的军事合作者中,人数最多的并非来自
波罗的海国家(12%)、乌克兰(16%)或高加索地区(18%),
但来自俄罗斯(51%)。53他们与希特勒军队的合作是
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俄罗斯志愿者在各种军事行动中的帮助
一位军事历史学家写道,“如果德军
至少从转折点开始,无法在东方进行战争
斯大林格勒以后。”54

三

德国国防军并不是唯一一个寻求
武装苏联公民进行血腥的劳动。党卫军也需要援助

⁴⁹ Reshin, “Kazaki” so svastikoi”, 77.

⁵⁰ G. Koifman, 采访 Iosif Mironovich Lampolskiy (2006年7月19日) <http://remember.ru/memoirs/tankisti/yampolskiy-iosif-mironovich/> (2015年8月7日访问)。

⁵¹ 安德烈耶夫,弗拉索夫,56岁。

⁵² 罗尔夫·迪特·穆勒,《国防军阵地:希特勒的帮助》

“Kreuzzug gegen den Bolschewismus”1941-1945 (法兰克福:Fischer,2010),242。

伊戈尔·埃尔莫洛夫 (Igor Ermolov)和斯大林娜 (Tri goda bez Stalina)的数字较低 (1-150万)。奥库帕齐亚:
Sovetskie grazhdane mezhdru natsistami i bol'shevikami 1941-1944 (莫斯科:Tsentropoligraf,
2010),8。

⁵³ 马克·埃德尔,《我们为何而战?》苏联战争努力中的忠诚
1941-1945',《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历史》84 (2013):248-68;此处:

259,表4。54 Müller,
《国防军阵线》,226。

在自己的战役中：反犹战争。55协助希特勒刽子手的人之一是阿尔卡季·瓦西里耶维奇·布克瑞耶夫，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提到过他。56他是如何在德国战俘营噩梦般的环境中幸存下来的，我们不得而知。审讯人员没有逼迫他详述自己的遭遇，也没有解释他是如何活下来的。

在第一次审讯中，他略过了自己是如何抵达第一个战俘营的整个过程。但考虑到这个战俘营位于波兰的海乌姆，而他被俘地点距离该城市东南方向至少500公里，他所遭受的苦难一定与布汉佐夫不相上下。他的档案同样没有提及他在战俘营度过的时光。在第一次审讯中，他只提到在加入党卫军之前在这里待了四五个月。几乎没有理由相信那里的条件比其他地方更好。考虑到这是整个战争期间战俘死亡率最高的时期，当10月底或11月初有人提供离开战俘营的途径时，他一定松了一口气。

身穿黑色制服的德国军官们给予了救赎。

布克瑞耶夫描述了典型的程序，“这些军官从120到150名立正站着的战俘中挑选出11名身体健康的乌克兰人，其中包括我，并命令我们上前。”被选中的人被押送到指挥官办公室，军官们在那里提议他们加入党卫军。“我们同意了，并于当天前往特拉夫尼基（波兰）定居点的党卫军训练营。”当时，布克瑞耶夫和他的十名战友并不知情，他们加入了最臭名昭著的非德国施暴者：“特拉夫尼基人”，大屠杀的步兵。57在这些通敌者中，布克瑞耶夫并非完全不典型，他们是这场战争中德国犯下的最可怕罪行之一。特拉夫尼基人绝大多数是前苏联公民，其中大多数是斯拉夫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布克列耶夫和苏联

⁵⁵ 露西·达维多维奇（Lucy Dawidowicz）的术语。参见她所著《反犹战争，1933-1945》（第10版）。（纽约：Bantam Books，1986年）。

⁵⁶ 他的生平资料来源于他的战争罪审判记录，USHMM RG-06.025*12。更多详情，请参阅第四章第30号注释。

⁵⁷ 关于招募特拉夫尼基卫队的“标准程序”，请参见 Sergei Kudryashov 的《普通合作者：特拉夫尼基卫队案例》，载于《俄罗斯：战争、和平与外交。纪念约翰·埃里克森的论文集》，Ljubica Erickson 和 Mark Erickson 编（伦敦：Weidenfeld and Nicolson，2005年），第226-39页；此处：第230页；另见：David Alan Rich 的《莱因哈德的步兵：苏联战利品文件和调查记录作为资料来源》，载于《铭记未来：种族灭绝时代的大屠杀》，V. John Roth 和 Elisabeth Maxwell 编（贝辛斯托克：Palgrave Macmillan，2001年），第688-701页；此处：690。最深入的探讨是彼得·布莱克（Peter Black）的《最终解决方案中的步兵：特拉夫尼基训练营和莱因哈德行动》，载《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第25卷第1期（2011年）：1-99页；以及安吉莉卡·本茨（Angelika Benz）的《党卫军的仆人：大屠杀中的特拉夫尼基人》（柏林：都市出版社，2015年）。关于招募程序的变化，请参见上文第70-8页。

德国人（当时的行话是Volksdeutsche）是其中最主要的族群，但也有波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鞑靼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布克瑞耶夫出生于1913年，是这个群体中年龄较大的人之一，该群体主要招募18至28岁的人群；他受过七年教育，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之一：据我们所知，即使所有人都都在一定程度上识字，也没有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⁵⁸

布克瑞耶夫如今所在的营地原本是党卫军的训练场，位于特拉夫尼基附近的树林中，距离波兰城镇卢布林约35公里。1941年9月至1944年6月期间，教官和学员都为了躲避步步逼近的红军的追击而撤离，近5000名卫兵（Schutzmannschaften）在这里接受了党卫军残酷的训练。

毕业后，他们参与了反游击行动，包括对华沙犹太区起义的清算，以及“莱茵哈德行动”（该行动曾灭绝了前波兰“总督辖区”的170万犹太人），这些行动往往极其残忍。特拉夫尼基人曾在所有主要的灭绝营服役：贝乌热茨、索比堡、特雷布林卡、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⁵⁹

像布克瑞耶夫这样的人对纳粹大屠杀至关重要，正如像科诺诺夫这样的人对德国战争努力的延续至关重要一样。“如果没有这些辅助人员，”研究该群体的权威专家写道，“德国人既不可能进行种族灭绝，也不可能对受害者进行贪婪的剥削。根本没有足够的德国人……来执行纳粹的人口政策，同时还要与世界其他地区作战。”特拉夫尼基人参与了“莱茵哈德行动”，他们“帮助造成了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约28%的人员伤亡”。⁶⁰

同样，如果没有当地合作者，被占领土的民政事务也难以运转。从底层村庄到顶层地区，大部分行政事务都掌握在“长老”、“市长”和“区长”手中。这些民间合作者是从当地居民中招募的，但由于战争期间人员流动性大、流离失所，这些人有时也是前苏联士兵。

⁵⁸ Kudryashov, 《普通合作者》, 232。这种集体肖像的一个略微变体是 Benz, Handlanger, 48-9。

⁵⁹ Kudryashov, 《普通合作者》, 第 227、229、231、232 页; Konrad Kwiet, 《Traw-niki》, 载沃尔夫冈·本茨编《大屠杀词典》(慕尼黑: CH Beck, 2002 年), 第 235-6 页; Yitzhak Arad, 《苏联大屠杀》(耶路撒冷: Yad Vashem, 2009 年), 第 274、585 页注 3; 以及 Black, 《步兵》; Benz, Handlanger, 第 65-6 页。
⁶⁰ 布莱克, 《步兵》, 43, 44。

向德国人投降的人。⁶¹一个例子是四个人,阿列克谢·约瑟夫·维奇·克拉斯诺佩尔·费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维尔纳·伊万·亚科夫列维奇·奥罗比和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莫兹戈沃伊,他们都在战争开始时叛逃。1941年,他们从德国战俘营获释,搬到基辅地区的一个村庄,随后在占领者手下担任各种民事职务,帮助追捕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逮捕或抢劫散兵游勇,围捕逃离德国劳工动员的人。⁶²其他人,如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科里年科,则在被占领土担任警察。

他于1911年出生于乌克兰普雷列斯特诺耶村,父亲是“中农”。1941年,他投奔了德国。占领者允许他返回家乡,他自愿担任警察,参与处决了11名游击队员,并因其“功绩”荣获铁十字勋章。1943年,他随德国国防军退伍。

1945年11月,他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到1946年初,他已被列入已知叛徒的通缉名单。⁶³

布克瑞耶夫在特拉夫尼基集中营待了多久尚不完全清楚。

在不同的审讯中,他声称自己于1942年1月或5月毕业,苏联当局在起诉书和后来的法庭判决中也接受了后者的日期。这些警卫的训练通常持续两到三个月,但也可能长达半年,就像布克瑞耶夫的案例一样。他的军衔比大多数人都高,以高级警卫身份毕业,并被任命为组长。他学习了如何拆卸、清洁和组装德国步枪,参加了普鲁士的训练,熟悉了德国的规章制度,大概还学习了与他所负责的“工作”相关的其他方面。

通常,训练包括在劳改营的守卫职责以及搜查、逮捕、反游击行动和围捕平民的指导。

这些新“技能”也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当时 Wachmänner

⁶¹ 关于“本土”行政管理,参见Lower,《纳粹帝国建设》,第50-2页;以及Johannes Due Enstad,《德国占领下的苏联公民:1941-1944年俄罗斯西北部的生活、死亡和权力》,博士论文,奥斯陆大学,2013年,第219-27页。关于民间合作者,另见Daria Rudakova,《二战期间苏联民间与德国在被占领乌克兰的合作》,博士论文,西澳大利亚大学,正在进行中。关于这场战争中流离失所的程度,参见Mark Edele,《二战作为流离失所的历史:以苏联为例》,《澳大利亚历史》第12卷,第2期(2015年):第17-40页。

⁶² 请参阅他们的战后案件档案,USHMM RG-31.018,卷2,案件57656。

⁶³ 乌克兰国家安全副政委 D. Esipenko,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军事审查部 1945 年第 4 季度 (1946 年 2 月 5 日)工作报告,转载于 arkhiviv VUChK-GPU-NKVD-KGB。Naukovii i 文献杂志第 1 号/142 (2014): 306-14,此处:308。有关乌克兰合作主义警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Alexander Prusin, Ukrainiskaia politsiia i kholokost v General'nom okruge Kiev, 1941-1943: deistviia i motivatsii, Kholokost i suchastnist : Studii v乌克兰与斯维蒂,1 (2007) :31-59。

接受训练的人员被派去将当地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或参加游击队追捕。⁶⁴他还接受了德语的一些基础训练,并接受了意识形态灌输。受训人员被直接告知,犹太“种族”将被“毁灭”。

65

与大约三分之一的“特拉夫尼基人”同胞不同,布克瑞耶夫没有逃离党卫军的服役。⁶⁶他没有逃避参与德国的罪行,而是坚持了下来。完成训练后,这位新晋的党卫军辅助人员被派往卢布林服役。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和他的下属们将训练付诸实践。他们协助在卢布林地区的犹太人家乡围捕犹太人,并将他们押送至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这些“犹太行动”极其暴力。

任何轻微的抵抗都会遭到枪托的袭击。

掉队者被枪杀。布克瑞耶夫承认曾亲自参与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但最初并未扣动扳机。他还承认曾守卫将犹太人从马伊达内克运往奥斯维辛的火车。从运牲畜的车厢里可以听到受害者乞求面包和水的尖叫声,但警卫确保在列车停靠期间无人靠近提供帮助。布克瑞耶夫没有提及抵达时有多少人死亡。1942年的某个时候 他的故事前后不一,提到时间可能是从春天到八月底或九月初 他被派回特拉夫尼基,接受前往卢布林以西约120公里的拉多姆的命令。在这里,他再次担任“犹太行动”的组长,再次参与殴打受害者和枪杀掉队者。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他经常帮助将犹太人押送到当地的集中营,或用运牲畜的车厢将他们转移到“某个德国灭绝营”。他再次殴打受害者,或者让下属殴打他们。他还在琴斯托霍瓦(1942年9月和10月)、彼得库夫特雷布纳尔斯基(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托马舒夫(1943年1月至2月下旬)和拉多姆(1943年2月下旬至12月)服役,强迫犹太人进入隔都,然后从那里将他们围捕起来,运送到死亡集中营。在审讯下,他很快承认了殴打和抢劫犹太人财产的罪行,但最终还承认了更多罪行:他的小队参加了托马舒夫的一次枪击行动,最初是向凶手运送弹药,但当他的上级在屠杀的第二天发现幸存者时,他们命令布克瑞耶夫处决他们。他服从了,向每个受害者一男一女开了两枪。1944年夏天 在不同的采访中,他记得不同的月份,有一次是8月,

⁶⁴ Rich,《莱因哈特的步兵》,691。

⁶⁵ Kudryashov,《普通合作者》,230-1;Benz,Handlanger,79-80。

⁶⁶ 同上,11,91。

另一次是在六月 他躲过了推进的红军,来到了德国。
他继续在党卫军服役,现在在集中营里,“名字
我已记不起来了。”

四

军事和警察合作者在德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苏联士兵对纳粹德国的屠杀感到震惊和愤怒。如果

一名老兵回忆说,被捕的叛徒不会受到“

多考虑”(s nimi ... ne tseremonilis”)。67事实上,“弗拉索夫人”

(vlasovtsy),苏联人这样称呼所有军事合作者,无论他们是否

确实是 KONR 部队的一部分,但往往无法幸存。

“我们当场就把他们射杀了”,一位战斗老兵回忆道。68当然

德国战俘有时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历史学家

高估了此类案件的发生频率,正如新的研究表明的那样。69

对自己阵营的叛徒投靠

然而,德国人往往势不可挡。弗拉索夫斯基被绑住了

绕在他们的脖子上,然后把它们固定在枪管上,

慢慢地举起来勒死叛徒;70或者称重

用石头砸下去,然后从悬崖上扔进海里。71在通往

另一位老兵回忆说,柏林路边的树木

奇怪的水果:“每棵苹果树上都挂着几个人,周围挂着牌子

他们的脖子上写着:“背叛祖国”。’ 72

科诺诺夫和布克瑞耶夫都避免了这种命运。战争结束时,

新任命的“哥萨克部队总司令”走遍了

饱受战争蹂躏的东欧,寻找他的指挥官弗拉索夫。无论

他确实试图找到他,或者只是利用他的任务让自己

稀缺,尚不清楚。一位前下属在1964年声称,在最后

⁶⁷ G. Koifman,采访 Iosif Mironovich Iampol'skii (2006年7月19日) <http://iremember.ru/memoirs/tankisti/yampolskiy-iosif-mironovich/> (2015年8月7日访问)。

关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结束时被俘的通告者处决,请参阅

另见安东尼·比弗 (Antony Beevor),《斯大林格勒》(伦敦:企鹅出版社,1998年),第384-5页。

⁶⁸ G. Koifman,采访 Anatolii Mikhailovich Barash (2011年8月26日) <http://iremember.ru/memoirs/tankisti/barash-anatolii-mikhaylovich/> (2015年8月7日访问)。参见

另见 N. Chobanu, Nikolai Nikolaevich Borisov 的采访 (2015年2月14日) <http://iremember.ru/memoirs/tankisti/borisov-nikolay-nikolaevich/> (2015年8月7日访问)。

⁶⁹ Edele,《不俘虏俘虏》。

⁷⁰ G. Koifman,采访 Ion Lazarevich Degen (2007年3月12日) <http://iremember.ru/memoirs/tankisti/degen-ion-lazarevich/> (2015年8月7日访问)。

⁷¹ 科伊夫曼,采访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巴拉什。

⁷² S. Smoliakov,采访 Grigorii Sergeevich Kornev (2014年12月30日) <http://iremember.ru/memoirs/samokhodchiki/kornev-grigoriy-sergeevich/> (访问日期:2019年8月18日 2015年)。

战争结束后,科诺诺夫收拾行李逃跑了,留下他的官员们对命运的变化无常感到不安。⁷³另一位证人证实,总部1945年5月3日,科诺诺夫派人去寻找弗拉索夫,并接受有关投降。⁷⁴起义爆发时,科诺诺夫被安置在布拉格(5-8五月),另一名目击者证实,哥萨克领导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穿着平民服装”。⁷⁵无论如何,到德国投降时,他已经到达奥地利,然后在美国地区“合法化”自己职业,在慕尼黑附近定居。看来他是1946年或1947年被美国人逮捕,但很快被释放。⁷⁶1948年,我们仍然发现他在巴伐利亚,以假名生活(“当然不在民主党阵营中”),抱怨自己物质条件差,乞讨“美国包裹”的民主党人中关系较好的人收到了。⁷⁷他带着家人 科诺诺夫在明斯克结婚1942年,妻子和女儿在勃兰登堡度过了战争的尾声和柏林,然后加入巴伐利亚的家族之主。⁷⁸1945年,一个儿子出生于德国。与此同时,他的前指挥官被引渡到苏联,在闭门法庭上因叛国罪被判处绞刑。1946年夏天,他和他的几名军官一起。⁷⁹如果他遣返后,科诺诺夫和其他哥萨克人一样,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1947年1月底被处决的领导人。⁸⁰

⁷³ 参见 VK Ganusowsky 写给 KS Cherkassov (圣徒传作者)的信,8 1964年3月,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斯坦尼斯拉夫·A·奥斯基收藏,盒子4,文件夹“有关科诺诺夫的信件”。

⁷⁴ 弗拉索夫将军对 AN Sevast'ianov 的审讯协议(1946年3月21日):《Istoriia predatel'stva》,卷.2.2: Iz sledstvennogo dela AA Vlasova,260-71,此处:268。
⁷⁵ Vospominaniia kapitana ROA RL Antonova ob uchastii 1-i divizion ROA v boevykh deistviakh v Prage,弗拉索夫将军:Istoriia predatel'stva,卷.2.2: 雪橇 AA Vlasova,353-60,此处:359。

⁷⁶ 亚历山德罗夫,“科诺夫·伊万·尼基蒂奇”,499。
⁷⁷ 科诺诺夫致尼古拉耶夫斯基,1948年4月26日,胡佛研究所档案,鲍里斯 I. Nicolaevsky 收藏,盒子259,文件夹4,卷轴220。

⁷⁸ 亚历山德罗夫,俄罗斯士兵,450。
⁷⁹ 1946年7月23日政治局决议:应判处弗拉索夫和其他十一人在封闭法庭上绞死。开庭日期应为1946年7月30日,一旦判决已经执行,公众应该通过报纸了解情况。转载于卢比安卡:斯大林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Mart 1946-Mart 1953,编辑。VN Khaustov,Naumov 副总裁,以及NS Plotnikova (莫斯科:Demokratiia,2007),20-1。苏联读者被告知8月2日判决和绞刑:“Soobshchenie Voennoi Kollegii Verkhovnogo Suda” Soiuza SSSR,《真理报》(1946年8月2日),4。弗拉索夫和他的审讯协议同事现已发表在弗拉索夫将军:Istoriia predatel'stva,卷.2.1: 伊兹 AA Vlasova 的雪橇。
⁸⁰ 1947年1月7日,VS Abakumov 请求审判 PN Krasnov 和1947年1月15日起,在闭门法庭上对其他人进行审判,并判处绞刑。斯大林批准了这一请求。1月17日,苏联公众从《消息报》获悉,《真理报》称通敌者已被绞死。卢比扬卡:斯大林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1946年3月至今1953年3月,40-1,592; Soobshchenie Voennoi Kollegii Verkhovnogo Suda Soiuza SSR,《真理报》(1947年1月17日),第4页。

遣返本身就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最著名的案例涉及的是像科诺诺夫在战争末期指挥的那些哥萨克人。他们向英国投降后,遭到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和强烈抵抗,最终被遣返。美国人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最著名的是在风景如画的南巴伐利亚小镇肯普滕的一个难民营里引发了一场骚乱。这类事件最终促使盟军放弃了强制遣返,但这种政策的改变对那些已经被“遣送回国”的通告者及其家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安慰。⁸¹然而,遣返通常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党卫军辅助人员布克列耶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一直为纳粹服务到1945年5月7日。

当战线逼近,他感到不安时,他脱下制服,换上便装,在德国北部的一个苏联流离失所者集合点表明自己是苏联公民。

之后,他被转移到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一个特殊营地进行所谓的“过滤”:这是斯大林安全部队试图将回国的公民分为好人和坏人。他的掩饰故事尽可能接近事实:他曾在红军第146步兵师服役,并于1941年成为战俘。当然,他没有公开自己曾是党卫军辅助人员的事实,而是声称在海乌姆和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度过了战争时期。与绝大多数接受过滤的人一样,布克瑞耶夫被证明没有犯罪行为。1945年8月,作为一名前军官,他被派往古比雪夫军区,然后被送往马里自治共和国的一个营地接受补充训练。12月,他复员并返回顿河畔罗斯托夫与家人团聚。这位已婚、育有三个孩子的人在工厂工作。1950年10月25日,他因涉嫌战犯被捕。经过近一年的多次审讯,以及军事法庭为期三天的闭门审判,布克瑞耶夫于1951年11月5日被判处“最高刑罚”:枪决,并没收所有财产。

这个例子证实了最近能接触到苏联档案的历史学家们所提出的观点:事实上,大多数遣返者都通过了筛选,要么被释放,过上平民生活,要么被重新征召入伍,尽管他们经常被关进高度致命的惩戒单位(如果他们是军官的话)或劳动营(如果他们不是的话),那里的条件在很多方面都与古拉格相似。⁸²以叛国罪威胁所有战俘

⁸¹ 帕维尔·波利安, *Deportiert nach Hause: 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 im Dritten Reich und ihre Repatriierung* (慕尼黑和维也纳: 奥尔登堡, 2001), 103-26。

⁸² Katrin Boeckh, 《乌克兰的斯大林主义: Die Rekonstruktion des sowjetischen Systems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威斯巴登: Harrassowitz Verlag, 2007), 291-327; 凡妮莎

战争开始时,当局就提出了指控,但战争结束时,当局意识到,落入德国人手中的大多数苏联公民并非自愿与敌人合作。⁸³“在那些被释放的人中,”一位高级政治官员在1945年3月写道,“只有极少数人背叛了祖国,把自己卖给了德国人。”

⁸⁴因此,过滤可能是一种真正孤立这一少数人的尝试。然而,这一过程在根除真正的叛徒方面效率极低。在我为本书做研究时阅读的众多苏联通敌者审判记录中,没有一个是过滤过程中被发现的。相反,是后来的警方工作让苏联人找到了线索。

并非所有返回苏联的叛逃者都是通过遣返程序返回的。在战争迷雾中,他们往往有可能获得新的身份。一位名叫米申的叛逃者出现在他原来部队的总部,自称是某个他确信已在战俘营中死亡的人,并取得了他的证件。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明显,当局在战后初期非常担心这种普遍存在的身份欺诈行为。⁸⁵许多在战争期间与德国人合作的叛逃者最终被追踪到。他们的总数仍然不清楚,因为现有的统计数据(总结于表 7.1)既不完整,又充满了重叠的类别。一位历史学家利用这些统计数据计算出,苏联有超过 32 万名前通敌者(包括军人和平民)被逮捕和起诉。⁸⁶目前尚不清楚表

7.1 中的哪些类别是加起来得出这一数字的,这也是另一位历史学家只统计了

Voisin,《报复还是重新融入?苏联对遣返人员政策的模糊性:以加里宁省为例,1943-1950》,《东欧历史年鉴》55,第1期(2007年):34-55;以及Mark Ede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老兵:威权社会中的民众运动,1941-1991》(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章。

⁸³ 例如: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政治管理部门关于苏联战俘和盟军战俘在德国战俘营生活情况的报告(1945年3月21日)。RGASPI卷17,上文第125卷,第323页,第37-42行,此处:第38行;布尔采夫致季米特洛夫,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抵抗情况的报告,1945年6月12日,同上,第96-103行。

⁸⁴ 亚谢奇金少将致 AS 谢尔巴科夫,关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解放的苏联公民的报告(1945年3月9日),RGASPI f. 17,op. 125,d. 314,il. 30-3,此处:il. 33。

⁸⁵ A. Drabkin, Nikolai Timofeevich Smol'skii 访谈(2008年11月21日) <http://iremember.ru/memoirs/letchiki-bombardirov/smol'skiy-nikolay-timofeevich/> (2015年8月21日访问)。Edele,《苏联老兵》,50-2页。

⁸⁶ Tanja Penner,《审判中的通敌:关于苏联战后针对通敌者审判的新资料》,《斯拉夫评论》第64卷,第4期(2005年):782-90页,此处:783页。另请比较 Franziska Exeler,《矛盾的国家:二战后苏联的罪责认定》,《斯拉夫评论》第75卷,第3期(2016年):606-29页,此处:607页。

表 7.1. 1943-53 年因叛逃、通敌及相关问题而被捕的人数

投敌	40,424
叛国罪和与德国占领者的合作	257,178
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帮凶	151,769
德国资助的反苏组织的参与者,包括 “国家军团”	29,928
德国资助的警察和其他“惩罚机构”	62,558
民间合作者(管理员)	21,796
向德国占领者提供其他帮助	28,133
战争罪和参与德国占领者的暴行	4,104
被逮捕的遣返公民	42,620

注意:这些数字并不完整,因为来源并未提供每个类别每年的数据。

还要注意,其中许多类别是重叠的,因此无法给出总数。

资料来源:OB Mozokhin, "Statistika repressivnoi deiatel'nosti Organov bezopasnosti SSSR (1921-1953)",可在"istoricheskii materialy"网站上获取:<http://istmat.info/node/255> (访问次数:20 2015年8月)。这些数据的一部分也发表在OB Mozokhin的《Pravo na repressii》中: Vnesudebnye polnomochiia Organov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1918-1953) (莫斯科:库奇科夫 pole,2006) ,350-465。

仔细列出因

表格翻译为“叛国和与德国合作

占领者 (predatel'stvo i posobnichestvo nemetskim okkupantam)。⁸⁷ 虽然这些统计数据无法用来计算被起诉的通敌者总数,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

例如,

41,000 人因叛逃 (perekhod na storonu vruga) 而被起诉,而我们知道,仅 1942 年至 1945 年,就有超过 116,000 人叛逃(表 2.1)。

同样,在

表格 7.1 的数据与为德国效力的 160 万军警通敌者人数相去甚远。最后,我们知道

240 万遣返公民经过筛选后就被遣送回国,88

但后来最多有 63.8 万人再次被捕。这些

数字意味着许多人,实际上是大多数人,逃脱了起诉。

大多数被遣返的公民都被单独留下,而许多脱北者以及

合作者要么死亡,要么移居国外,要么成功掩盖了自己的踪迹。⁸⁹

⁸⁷ 爱德华·科恩,《共产党员的崇高头衔:战后党的纪律和价值观》苏维埃政权》(迪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5年),55。

⁸⁸ V. Zemskov, "K voprosu o repatriatsii sovetskikh grazhdan 1944-1951 gg", 伊斯托利亚 SSSR 4 (1990): 26-41, 此处:36。

⁸⁹ 最终抓获的通敌者人数因地区而异。本地案例研究

发现的概率从 1/3 到 1/5, 甚至 1/800。参见 Dieter Pohl 的《Sowjetische Strafverfahren gegen Kollaborateure》, 在 Bewachung und Ausführung: Alltag der Täter in Nationalsozialismus, 编辑: Angelika Benz 和 Marija Vulesica (柏林:Metropol-Verlag, 2011年):101-10; 这里:106,109。

他们试图这样做是合乎逻辑的。原则上,所有脱北者和所有通敌者都可能被枪毙,因为他们犯了叛国罪,死罪。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原因有二。因为第一,1947年至1950年间,苏联废除了死刑,这意味着最高刑罚现在变成了二十五。那些设法通过筛选的人,掩盖其踪迹直至1947年,因此逃脱了死刑。其次,苏联并没有对所有士兵实行同样的标准。战争期间,军官因成为战俘而受到更严厉的审判,过滤也是如此。⁹¹有点令人惊讶的是,同样的这一原则甚至适用于军事合作者。1943年4月19日,最高苏维埃将他们划分为“叛徒”(izmenniki)以及“同谋”(posobniki)。叛逃者和逃兵,指挥官通敌的军事或警察组织,以及普通成员其中,只要他们犯了罪,就被计入前军方和警察的普通通敌者无罪属于后者。⁹²因此,除非他们进一步犯下犯罪,弗拉索夫斯基的普通士兵被流放到苏联腹地。1944年12月至1945年12月遣返的283,000名军事合作者1945年至1951年间,共有178,889人抵达偏远地区。苏联地区。⁹⁴

这种惩罚被称为“特别解决”,是一种强制避免铁丝网的劳动和在护送条件下的工作,就像古拉格集中营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集中营的生活很艰难定居点,以及因疾病、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而死亡高。到1951年6月,在1946-51年间被驱逐的173,904名移民中,只有仍有121,630人留在那里,流失率为30%。⁹⁵尽管如此,内部流放是针对叛徒的一种非常温和的惩罚方式20世纪30年代,该政权无缘无故枪杀了数十万人。

⁹⁰ Harold Berman,《苏联的司法:对苏联法律的解读》,第二版修订版。(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68-9,418-19;同上,《苏联刑法》和程序:RSFSR法规(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44。

⁹¹ 埃德勒,《苏联退伍军人》,第5章。

⁹² Igor Vasil evich Govorov, Fil tratsiia sovetskikh repatriantov v 40-e gg. xx. Tseli, metody i itogi ,Cahiers du Monde Russe 49,no. 2 (2008): 365-82;这里:372。

⁹³ NL Pobol 和 PM Polian (编辑),Stalinskii deportatsii 1928-1953 (莫斯科:Demokratia,2005),796。

⁹⁴ “Spravka o pribytii “vlasovtsev” v mestoposeneniia po godam”(国家安全部秘密报告,24 1951年10月),转载自AN Dugin的《Neizvestnyi Gulag. Dokumenty i fakty》(莫斯科:Nauka,1999),96。

⁹⁵ 同上。1945年的4,985名特殊定居者可能已被释放,因为他们的六名一年任期结束。如果把他们也算上,流失率将上升到32%。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威胁战俘将在战争中被处决
战后,轻罪案件导致数百万人被关进监狱
盗窃。其他人则被关进了古拉格,甚至更糟,
像弗拉索夫和其他高级官员一样,被当作“叛徒”枪毙或绞死
指挥官。

特拉夫尼基通常被判处 10 至 25 年的劳役
96 集中营,对 vlasovtsy 的典型期限是六年的“特殊安置”。97
因此,1946 年至 1951 年间流亡的后者成为

1952 年起开始释放。总计有
105,279.98 其余部分将于 1955 年根据一项法令予以赦免

9 月 17 日最高苏维埃将合作者从
监狱和特殊安置。被排除在外的是那些因谋杀和“虐待苏联公民”而被判刑的人 比如
布克瑞耶夫,

他在 1947 年至 1950 年之间被判刑。99 战时记录
当然,那些被释放的人的人生履历上仍会留下污点。

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在苏联生活。许多人逃离了

起诉共计 100 人,其他人不接受官方认定
其中一些人被指控为叛徒。20 世纪 80 年代,其中一人申请获得
所有退伍军人在四十周年之际获得的勋章

胜利纪念日。他因服役而被判处六年徒刑

1951 年获释,现在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所房子里,有电话、私家车和车库 所有这些
都表明

苏联的繁荣。他的逻辑是,他已经为他的

合作,但他之前两个月在

红军!他的努力没有成功。101

⁹⁶ 奔驰,Handlanger,99,257。

⁹⁷ 特里·马丁,《斯大林强制迁移政策:模式、原因、后果》

《人口统计学与国家安全》,Myron Weiner 和 Sharon Stanton Russell 编辑(新
约克:Berghahn Books,2001 年),305-37;此处:330。

⁹⁸ MGB 报告,1951 年 10 月 24 日,重印:Dugin,Neizvestnyi GULAG,97。

⁹⁹ Ukaz Prezidiuma Verkhovnogo 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Ob amnistii sovetskikh grazhdan,
sotrudnichavshikh s okkupantami v period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1941-1945 gg
(1955 年 9 月 17 日),重印于 Reabilitatsiia:Kak eto bylo.文献 Prezidiuma TSK
KPSS i 药物物质。Mart 1953-fevral 1956,编辑。A.阿蒂佐夫,Iu.西加乔夫,I.舍甫丘克,
和 V. Khlopov (莫斯科:Demokratiia,2000),卷。1:259-60。

¹⁰⁰ 例如,看看德国通敌者转为红军的惊人人生故事
一名士兵完全逃脱了起诉,并在 2013 年自由地谈论了他的战争生活:
I. Vershinin,接受 Ivan Petrovich Lupanov 采访(2013 年 7 月 12 日) <http://iremember.ru/memoirs/pekhotintsi/lupanov-ivan-petrovich/> (2015 年 10 月 20 日访问)。

¹⁰¹ S.卡济米尔,“Bylo,da ne splylo”。。。。”,退伍军人 9 (1988),11。

五

斯大林的政策虽然严厉,但出人意料地具有区别性。向在德国占领下获救的公民德国囚禁,或者说帝国境内的奴隶劳工,是档案中披露的惊人秘密。¹⁰²与此同时,那些被遣返的人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未来

情况比民主党阵营传言的要好一些。合作者与德国人最害怕的是,但没有否则敌人也会犯下叛国罪,并且可以预料死刑。即使是普通战俘或前“东德工人党”成员,只是运气不好,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回来。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试图避免这种命运。到1946年,120万不归者仍留在西方,新成立的国际难民组织(IRO)试图为他们寻找地方战争结束后仍能生存。¹⁰³就苏联裔流离失所者而言,超过451,000人。其中,留在德国的人数最多1952年(23%),其次是移民到美国的人英国(22%)。澳大利亚位居第三,为11%。加拿大(9%)和美国(8%)。¹⁰⁴

科诺诺夫将与大约5万名前苏联公民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定居在澳大利亚。¹⁰⁵

他到那儿了吗?我们把他留在慕尼黑地区,写信1948年,他向尼古拉耶夫斯基讲述了自己的一生。同年,他开始试图在德国建立一个军事政治组织,继续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¹⁰⁶7月,他写了一篇激烈的谴责文章,谴责据称是苏联特工,曾发表过诽谤言论我”。¹⁰⁷然而,他很快就利用了国际难民

¹⁰² 关于未被判叛国罪的遣返者的苦难

20世纪40年代末,以及理事会下属遣返事务委员会的尝试部长来帮助他们,例如参阅GARF f. R-9526, op. 1, d. 617 (1948-1949)。

¹⁰³ 杰拉德·丹尼尔·科恩,《战争的后果:战后欧洲的流离失所者》秩序(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5。

¹⁰⁴ VN Zemskov, “Rozhdenie “vtoroi emgratsii” 1944-1952”, *Sotsiologicheskie issledovaniia* 4 (1991):3-24, 此处:21。

¹⁰⁵ 马克·埃德尔(Mark Edele)和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流离失所者:从苏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历史》第12卷,第2期(2015年):7-16, 这里:9。

¹⁰⁶ 亚历山德罗夫,“科诺诺夫·伊万·尼基蒂奇”,499。

¹⁰⁷ 科诺诺夫致沃耶夫,1948年7月26日,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记录组319,条目134A:安全机密情报和调查档案 非个人文件,XE182853,270/84/20/02,盒23,第2卷,文件夹2。

该组织的“大规模重新安置计划”。1949年8月,他被转移到位于奥格斯堡的移民局处理中心。10月,他持着崭新的护照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准备启程前往澳大利亚。1950年1月11日,他乘坐“希腊王子号”离开意大利,并于1950年2月14日抵达他阳光明媚的新祖国。他自称是一名波兰公民,名叫“伊万·戈尔斯基”,职业是“农民;畜牧业者;细木工”。他的妻子玛丽亚·戈尔斯基和他们的孩子塔蒂亚娜(1944年出生于波兰)和阿列克谢(1945年11月出生于德国)也随他一同前往。与许多前苏联非归国人员一样,科诺诺夫-戈尔斯基也因此改变了国籍,但与许多其他人不同,他并没有声称拥有其他国籍。相反,他编造的故事是,他出生于塔甘罗格,是俄罗斯人,但于1937年移民到波兰,并于1938年与玛丽亚结婚。由于1939年他是波兰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因此根据雅尔塔协定,他没有被强制遣返。据称,他后来的战时路线是于1942年将他带到了德国,并一直待到移民。因此,通敌者科诺诺夫变成了波兰流亡者和“新澳大利亚人”戈尔斯基,他在一系列临时住所之后,于1950年8月定居在阿德莱德。在做过短暂的水果采摘工之后,戈尔斯基从1950年起做过几份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工作。起初,他与家人分开居住。第三个孩子玛丽亚于1950年11月出生在南澳大利亚移民部的一个拘留中心,而当时科诺诺夫已经住在该州的其他地方。

不久之后,1950年12月4日,老玛丽亚和她的三个孩子离开了中心,正如中心主任写给移民部的信中所说,“没有办理必要的手续”。他们搬到了戈尔斯基在阿德莱德的新家。¹⁰⁸

科诺诺夫并未放弃政治军事野心。早在1950年9月,他就通过中间人与澳大利亚政府接洽,寻求在总参谋部任职。¹⁰⁹尽管科诺诺夫极力自我吹捧,称自己是一位“完美的绅士”,拥有“最高级别的军事教育”,在战斗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且凭借其“一流的演说家和对群众的影响力”,但这一请求最终未能成功。

¹⁰⁸ 远征军DP登记记录“戈尔斯基·伊万”(1949年3月24日);远征军集结中心登记卡“戈尔斯基·伊万”(1949年3月26日);登记卡“戈尔斯基·伊万”(1949年10月27日;1950年1月26日),均存于国际寻人服务档案馆(德国巴特阿罗尔森),可通过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访问。“戈尔斯基·伊万 潜逃-释放-意向声明-入籍申请”,美国国家航空局,D400,SA1956/8909。

¹⁰⁹ 杜尔舍尔致孟席斯,1950年9月15日,NAA,MP742/1,115/1/437;陆军部。会议记录。“主题:科诺诺夫将军 申请总参谋部任命”(1951年6月26日),NAA MP742/1,115/1/437。

“煽动性的反共演讲”。 110看来,他成功召集了志同道合的反共人士,其中包括他之前的下属康斯坦丁·切尔卡索夫,后者后来成为了他的传记作者,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再次见到他。然而,由于滞留在澳大利亚各省,他的政治活动逐渐减少。1964年,他加入了俄罗斯人民解放斗争联盟(SBONR),这是第二次俄罗斯移民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而非第一次革命和内战期间及之后)中一个重要的反共组织。据一些消息来源称,他于1967年死于一场车祸,通常被认为是克格勃暗杀,而另一些消息来源则称他死于自然原因。¹¹¹

¹¹⁰ “科诺诺夫将军是谁,他的能力是什么”,NAA MP742/1,115/1/437.

¹¹¹ 亚历山德罗夫,《科诺夫·伊万·尼基蒂奇》,500;亚历山德罗夫和努日丁,《Novye》科诺诺瓦将军马伊奥拉传记文献,261。

8

来世

我

伊万·科诺诺夫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战争中失败后,确保自己免于起诉,便开始为自己的遗产而战。起初,他被载入史册的机会似乎渺茫。战败后,他以假名在巴伐利亚流亡,过着赤贫的生活。1948年,他在那里读到了在美国出版的流亡刊物《社会主义信使》(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老孟什维克流亡者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斯基(1887-1966)的一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¹这篇题为《论新旧流亡》的文章阐述了当时的流亡政治格局。文章还作为题外话,深入探讨了“弗拉索夫运动”的历史,尼古拉耶夫斯基认为该运动是当前某个派系的前身。他将其描述为“组织军队以对斯大林独裁进行武装斗争”的尝试之一:

战争期间,类似的尝试屡见不鲜。从由南斯拉夫移民组成的俄罗斯军团,到克拉斯诺夫将军和科诺诺夫少校的哥萨克部队,再到在罗森堡和希姆莱领导下组建的各种分遣队。²

尼古拉耶夫斯基写道,弗拉索夫运动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民主纲领”。就像1917年他所在的孟什维克一样,这些人或许已经输掉了内战。但和尼古拉耶夫斯基一样,他们输掉了这场战争,却秉持着正确的精神。他们不是纳粹的合作者。他们是反抗斯大林的民主抵抗战士。³

¹ 关于美国孟什维克流亡者的情况及其在战后话语中的作用,请参阅安德烈·利比希(Andre Liebich)的《孟什维克发动冷战》,《当代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95年):第247-264页。

² B. Nikolaevskii, "O "staroi"i "novoi" emigratsii (stat'ia vtoraia)",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28, 第28期。1 (1948年1月26日):31-6;这里:33。

³ 关于尼古拉耶夫斯基与新流亡者的联系和积极参与,请参阅菲利普·E·莫斯利(Philip E. Mosely)的《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美国岁月》(Boris Nicolaevsky: The American Years),载于《俄国革命与政治:纪念BI·尼古拉耶夫斯基的散文集》(Revolution and Politics in Russia: Essays in Memory of BI Nicolaevsky),由亚历山大和珍妮特·拉比诺维奇(Janet Rabinowitch)与拉迪斯·K·D·克里斯托夫(Ladis KD Kristof)合编(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33-8页;此处:第36-7页;以及

科诺诺夫是1941年至1945年苏联内战的失败者,曾是德国人的军事合作者,他躲藏在巴伐利亚,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却用假名苦苦挣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对他对历史的贡献的简短提及,无疑是一线希望。4月26日,他写信给尼古拉耶夫斯基,表达了他对所写内容的“欣喜和感激”,并介绍自己是俄罗斯解放运动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随后,他开始澄清事实。尼古拉耶夫斯基曾将他描述为一个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小人物(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哥萨克分离主义者)。

相反,科诺诺夫将自己的叛逃归咎于尼古拉耶夫斯基在弗拉索夫运动中发现的民主反斯大林主义。他特意指出,在他开始组织“未来解放军的基础”时,该军后来的领导人、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英雄弗拉索夫将军仍然忠诚地站在苏联一边作战。

他随后讲述了弗拉索夫如何亲自拜访他以及他后来如何成为“弗拉索夫将军身边的指挥官之一”的经过。

他强调自己非常了解这位将军,并与其他反对他对流亡影响的人进行了辩论。他还强调了哥萨克人在反斯大林斗争中的核心作用。

对于后来的叛逃史学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声称 1941 年的事件表明了反对斯大林的势力有多么广泛,而由于希特勒的愚蠢,这种潜力并没有实现:

必须清楚、明确、真实地说,数百万苏联人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接1941年的战争,并希望德国能帮助他们最终摆脱共产主义的枷锁。然而,由于纳粹政策的愚昧无知和无比愚蠢,苏联人民最终未能摆脱共产主义的束缚。⁴

这种有些绝望的干预 科诺诺夫也乞求物质援助,他显然在政治和个人上感到孤立似乎对尼古拉耶夫斯基产生了一些影响。⁵同年年底,在

本杰明·特罗姆利,《重塑合作:战后俄罗斯移民中的弗拉索夫运动》,未发表手稿。关于俄罗斯新移民群体的新兴政治,另见安娜·霍利安,《国家社会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之间:战后德国的流离失所者》(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章。

⁴ 科诺诺夫致尼古拉耶夫斯基,1948年4月26日,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鲍里斯·I·尼古拉耶夫斯基收藏,盒子 259,文件夹 4,卷轴 220。

⁵ 1947年,尼古拉耶夫斯基曾在德国与DPs会面两个月,他可能在那里了解了科诺诺夫,但并未与他见面。参见特罗姆利,《重塑合作》。

这位老孟什维克在纽约杂志上写道,这后来成为苏联叛逃者史学中一个有影响力的路标
新杂志:

我们已经知道,苏联前线战争初期以大规模投降为标志……事实上,到(这场战争的)第一个冬天,战俘总数估计接近600万。这样的数字,即使是近似值,在人类历史上所有战争中也从未达到过。人们不得不将这个数字视为苏联军队对这场战争以及发动这场战争的政府进行某种全民公决的结果。

这一说法不仅夸大了德军本已庞大的战俘人数 到1941年底,战俘人数接近340万,而非尼古拉耶夫斯基所说的600万。⁶对尼古拉耶夫斯基来说,所有这些战俘都是叛逃者。此外,叛逃表明了他们反抗斯大林政权的意愿。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和第六章中看到的那样,这两种说法都需要认真考证。它们表明,科诺诺夫的经历是一个罕见的极端。相比之下,在尼古拉耶夫斯基的描述中,科诺诺夫的故事至少成为很大一部分投降者的经历: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对于理解民众 (narodnye nastroeniia)的情绪同样重要:许多投降者立即宣布他们想要将武器转向苏维埃政府。通常情况下,这些声明都是个人声明或小团体的声明,无人问津。但我们也知道一些具有政治示威性质的大型集会。⁷

尼古拉耶夫斯基一厢情愿地运用统计学思维,将1941年本已高企的苏军俘虏人数夸大到远超合理的投降与叛逃标准,并暗示大多数叛逃者是出于政治动机。综合起来,这些论断让他将1941年视为一场反对苏军政权的“全民公投” 而科诺诺夫正处于这场公投的中心:“被俘的红军少校科诺诺夫,”尼古拉耶夫斯基写道,“被任命为第一批部队的指挥官,隶属于德国将军申多夫(原文如此!)。”

8

尽管语气被动,但这次提及他的名字在记忆之战中仍是一次重大胜利。这似乎确保了科诺诺夫在史书中的地位,而不是纳粹的合作者。

⁶ 参见第2章表2.2。

⁷ B. Nikolaevskii, Porazhencheskoe dvizhenie 1941–1945 godov i gen. AA 弗拉索夫(第1部分),《Novyi zhurnal XVIII》(1948):209–34,此处:212。
⁸ 同上,214–15。

而是作为一名反对斯大林的自由战士。他并没有错误的选择,但愚蠢的德国人没有听取他的建议。尽管如此,他在整个运动中的作用仍然远非核心在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记述中。像布罗尼斯斯拉夫·卡明斯基(1899-1944)或安德烈·弗拉索夫(1901-46)显得更加重要。正如他们在后来军事合作的记述,并且出现在更为活跃的比科诺诺夫扮演的角色更多。⁹

此外,尼古拉耶夫斯基和科诺诺夫关于叛逃和合作的立场也受到了挑战。另一位孟什维克鲍里斯·列沃维奇·古尔耶维奇(Boris Lvovich Gur-evich,1886-1968)于1950年撰写了一篇关于弗拉索夫运动的里程碑式研究报告。用他惯用的笔名“B. Dvinov”。他称“红色军队因为士兵的失败主义情绪而崩溃,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随后又很快补充道,这些情绪确实存在。“没有怀疑军队和更普遍的人口。当然,他们确实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军队和一小部分民众。’对大多数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他断言,是军事因素。¹⁰这种推理被推前红军上尉 P. Smolin 在 1952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 1948 年叛逃到西德。他反对所有观点反斯大林主义与大规模投降有什么关系。动员他的作为一名参加过整个战争的老兵,他指出:

我还没听说过有军团故意投降的事,军队什么也没有。所有大规模俘虏的案例都可以用情况的绝望。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对苏联政权[发挥了作用],在人们受到过去的压制。

1941 年红军的灾难性处境是最不军队或民间的失败主义情绪解释为整体而言。撤退的根源仅仅是军事原因,而非道德政治原因。红军缺乏足够的经验,必要的训练,却被敌人,一旦被德国人包围,它就无法恢复理智。¹¹

⁹ 文章的第二部分专门讨论了弗拉索夫集团及其政治立场。zhurnal XIX (1948):211-47。

¹⁰ B. Dvinov [=Boris Lvovich Gurevich], Vlasovskoe dvizhenie v svete dokumentov. (S prilozheniem sekretnykh dokumentov) (纽约:[无出版商],1950), 22-3; 引文:22。

¹¹ 卡普。P. Smolin, “O porazhenchestve io vlasovtsakh”, Protiv Techeniia. 斯博尼克(纽约:沃尔登出版社,1952年),90-2,此处:90,参考巴赫梅特夫档案,哥伦比亚大学,Michael Shatoff 论文,第 34 盒。

将 1941 年的投降完全解读为军事需要所致,其必然结果是,那些最终支持德国战争努力的人并不是 正如他们喜欢声称的那样 纳粹在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的临时盟友,而只是试图自保的简单合作者。

科诺诺夫最终抓住机会,对这些事件的解读作出了回应。他的一位前下属切尔卡索夫开始为他撰写传记,这为他平反提供了佐证。这部传记分两期出版于1963年和1965年,其明确目的是“回应历史,回应一次反抗的尝试”(Otvét pered istoriei za odnu popytku)。切尔卡索夫提供了科诺诺夫(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见,常常具有误导性)关于他叛逃以及之后战争经历的叙述。他还讲述了反斯大林主义失败主义如何转化为对希特勒主义的抵抗的基本故事。他写道,1941年德国人入侵时,民众用面包和盐迎接他们,视他们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解放者;前线士兵投降;许多人自愿越过前线与斯大林作战。但随后,平民面临大规模枪击和普遍的恐怖与剥削统治;战俘在集中营里饿死;那些逃到平民家中与平民生活在一起的人被德军围捕,并被赶回铁丝网后。结果,平民反抗德军,士兵们躲进森林,成为游击队员。那些逃过前线的人在苏联控制区传播纳粹新秩序的消息。“正是这些事实,也正是这些事实,迫使苏联人民拿起武器。”¹²

二

自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流亡者就投降、叛逃和通敌的含义展开了一场持续不断的记忆之战。他们所形成的立场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圈子,至今仍余波不息。切尔卡索夫对科诺诺夫“企图”的记述,就成为了了解科诺诺夫叛逃及其后续人生轨迹的标准资料,甚至对那些担心这类书籍带有圣徒传记性质的作者来说也是如此。¹³尽管我努力运用补充资料进行批判,但我自己的叙述也离不开这些资料。

¹² 康斯坦丁·切尔卡索夫,科诺诺夫将军(Otvét pered istoriei za odnu popytku)。汤姆 1。(墨尔本:Edinienie,1963),140-3;引文 143。

¹³ 这一趋势是由尼古拉·托尔斯泰在《雅尔塔的受害者》(伦敦:霍德和 Stoughton,1977),40,439注29,459注29。

流亡者叙述对新兴的苏联和二战学术研究影响巨大,即便有时难以追溯。其中很大一部分,可以说是潜伏的。战后不久,流亡者的亚文化圈与研究苏联的美国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世界出现了显著的重叠。在战争期间或战后离开的“新流亡者”成为研究苏联的学者的主要来源。¹⁴这种方法以其最精细的形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苏联社会的里程碑,并构成了本书的资料基础之一;对苏联15名流亡者的大规模访谈项目,既包括旧社会制度,也包括新流亡者,他们自己也参与了这场辩论。例如,尼古拉耶夫斯基就参加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利奥波德·海姆森(Leopold Haimson)的研讨会,该研讨会是俄罗斯史这一新兴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讨会之一。无论在研讨会内外,他都是整整一代专家的导师。

他与另一位孟什维克大卫·达林(David Dallin,1889-1962)合著了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苏俄强迫劳动》(Forced Labor in Soviet Russia,1947)。他的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1924-2000)后来撰写了两部关于外国占领下的苏联领土的里程碑式研究:《德国统治下的俄罗斯》和《敖德萨,1941-1944》(均于1957年出版)。¹⁶在此之前,达林小曾在哈佛大学访谈项目中担任采访员,因此花

费了大量时间与像科诺诺夫或斯莫林这样的新移民交谈。¹⁷这种与曾在战争期间身处战场并做出选择的人们的接触,或许帮助他形成了比新移民本人或其孟什维克解读更为细致入微的观点:

¹⁴ 乔治·菲舍尔,《新的苏联移民》,《俄罗斯评论》第8卷,第1期(1949年):6-19。

¹⁵ 对本项目工作的重新评估,请参阅 Mark Edele 的《苏联社会、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对主要框架的重新思考》,《批判:俄罗斯和欧亚历史探索》第8卷,第2期(2007年):第349-373页;有关历史背景,请参阅 David C. Engerman 的《了解你的敌人:美国苏联专家的崛起和衰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章。

¹⁶ Samuel A. Oppenheim,《尼古拉耶夫斯基,鲍里斯·伊万诺维奇(1887-1966)》,《现代俄罗斯和苏联历史百科全书》,Joseph L. Wiedzyński 编(Gulf Breeze: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1981年),第24卷:207-10页;David J. Dallin 和 Boris I. Nicolaevsky,《苏维埃俄国的强迫劳动》(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7年);Alexander Dallin,《德国在俄罗斯的统治 1941-1945:占领政策研究》(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57年);同上,《敖德萨,1941-1944:外国统治下的苏联领土案例研究》(圣莫尼卡:兰德公司,1957年)。

¹⁷ Ronald Grigor Suny 和 Gail W. Lapidus,《亚历山大·达林:一个独特的声音》,载亚历山大·达林著《历史的用途:理解苏联和俄罗斯》,Gail W. Lapidus 编(兰纳姆:Rowman & Littlefield 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关于达林在哈佛访谈项目中的表现以及他的著作对该项目的影响,另见 Engerman 著《了解你的敌人》,第66,69页。

在某些战区,俄军士兵迎战推进的德军,毫不犹豫地投降;而在另一些战区,俄军顽强的抵抗让德军指挥部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对手。虽然苏联战时士气的详细分析仍有待历史学家深入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苏军中既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也有失败主义的倾向。¹⁸

另一位对近代流亡者有深入了解的年轻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微妙观点。乔治·菲舍尔在慕尼黑的流亡者世界中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担任哈佛大学采访工作的先锋”。¹⁹通过他的父亲——备受争议的记者路易斯,小菲舍尔也认识了像尼古拉耶夫斯基这样的“老流亡者”。他的父亲曾聘请尼古拉耶夫斯基担任顾问,²⁰而尼古拉耶夫斯基也成为了小菲舍尔的导师。他与第二次流亡中他所谓的“解放主义者”(osvobodhentsy)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他自身相互冲突的忠诚和复杂的个人政治立场。

菲舍尔在乌克兰、莫斯科和柏林长大,父亲是美国记者,母亲是苏联翻译,他在1997年出版的自传中强调,“他们都是犹太人”。他和父母一样是左翼人士,希特勒上台后逃离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首都。作为一名热情的共青团员,他在大清洗中失去了朋友和熟人,由于高层干预和持有美国护照,他勉强与家人逃往纽约。流亡美国期间,他与斯大林决裂,离开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试图重塑自己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他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之后在二战期间加入美国陆军,并在乌克兰的一个轰炸基地担任苏联联络员。战后,他在威斯康星大学完成学业,并于1948年成为哈佛大学博士生,其研究成果成为他撰写有关二战期间反抗斯大林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的基础。

他的田野调查工作在慕尼黑的民主政治圈内进行。在慕尼黑期间,他参与了国家社会主义研究委员会(SBONR)以及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慕尼黑苏联研究所的成立,同时还为哈佛大学与民主政治家的访谈项目建立了联系。他与前苏联民主政治家的互动,使他在即将到来的冷战中寻找政治立场的努力,与这些合作者的过去纠缠在一起。菲舍尔

¹⁸ 达林,《德国在俄罗斯的统治》,63-4。

¹⁹ Engerman,《了解你的敌人》,52-3.61(引文:53)。

²⁰ 路易斯描述了自己坐在尼古拉耶夫斯基位于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两居室公寓里,与这位老孟什维克交谈,并仔细阅读他的藏书。路易斯·菲舍尔,《深入内部》,《纽约时报》,1965年11月21日,第3页。

通过自己的视角来解读这场运动与纳粹的互动
与美国空军资助的哈佛项目和
中情局资助的慕尼黑研究所:这是与
试图推进他自己的事业 解放

拯救祖国,使其免受斯大林的压迫,这本身就是他童年时期所怀抱的人类解放梦想的变形。

和青春。因为他只成功摆脱过斯大林的魔咒一次
当他被驱逐出苏联时,他想象着同样的
其他苏联公民也一定如此。因此,尼古拉耶夫斯基
充满希望地渲染大规模的反对和大规模的叛逃并没有使
菲舍尔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因此他开始推翻导师的解释。²¹

菲舍尔在 1952 年出版的《苏联反对斯大林》一书中并没有攻击
尼古拉耶夫斯基直接指出了这一点,尽管1948年的论文被列入了参
考书目。然而,他所做的,是极力反驳他的
导师的主要论点:投降表明民众对

苏联政权。²²他没有直接发起攻击,而是找到了代理人:美国
他后来称之为“反抗”思想流派的倡导者。菲舍尔
承认“1941年,许多苏联公民很可能感到
对政府只有冷淡的忠诚,而且确实存在
相当大的潜在叛乱”。然而,大多数人既没有积极抵抗,也没有在意识
形态上拥护斯大林的

政权。相反,他们是非政治性的,“一种精神和情感状态”,他
被称为“惰性”。这是由于在政治立场上采取某种危险造成的。
极权主义政权不断改变“党派路线”,惰性
“将个人主动性降至最低”。当来自

由于德军出乎意料的快速推进,上述计划失败了
1941年,人们干脆放弃了,因为他们无法组建独立的
不再有主动性。“因此,在1941年,”他总结道,“
苏联多数派的行为并不是政治信念,无论
支持斯大林还是反对斯大林,甚至没有客观的军事因素。相反,
惰性。”²³

²¹ 乔治·费舍尔 (George Fischer), “Dve strasti: Pominite sei den” in V poiskakh istiny. Puti i sud by vtoroj emigratsii: Sbornik statej i dokumentov, ed. VS 卡尔波夫 (莫斯科: RGGU, 1997), 177-21。
关于菲舍尔在慕尼黑的经历以及他在该研究所的建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见

Charles O. Connell, 《慕尼黑苏联研究所》, Carl Beck 论文集
俄罗斯和东欧研究 808 (1990 年)。

²² 尼古拉耶夫斯基 1948 年的论文也被提及为 1952 年出版的书籍的预研究的主要来源之一: 乔治·菲舍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叛逃》, 未发表
油印本 (打字稿, 1950 年 11 月), 4-5 页。现有两份副本: Bakhmeteff
档案馆, Shatoff 论文, 盒子 33; 以及哈佛研究所档案馆, 乔治·菲舍尔收藏, 盒子 1。

²³ 乔治·菲舍尔, 《苏联反对斯大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案例研究》(剑桥,
马萨诸塞州: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2 年), 4-7。

菲舍尔的论点直指那些认为俄罗斯人民是“我们的秘密盟友”、一旦冷战升温便会与西方结盟的人。前联合通讯社驻莫斯科记者尤金·莱昂斯认为，“战争的严峻考验”表明，斯大林体制在其民众中缺乏支持：

大概是共产主义时代手工打造的新型“苏联人”取代了历史上的俄罗斯人。这种假设在国外广为流传，尤其是在西方那些轻信的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撰写了严肃的论文，论述布尔什维克灵魂设计师所塑造的全新人类。

然后，1941年6月22日早上，这个不祥的杰作。²⁴

“新苏联人”在这场考验中惨败，成群结队地投奔了德国侵略者。“大批红军士兵‘撤退’，一波波地开小差，有时甚至溃败后退。”²⁵国防军

无法快速修建铁丝网围栏来关押大批战俘和逃兵 由于防守不严密，自愿投降和非自愿投降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很难分辨谁是谁。²⁶

正是反对这种对“历史上的俄罗斯人”未来将在反共产主义斗争中结成联盟的乐观描述，菲舍尔在20世纪50年代初试图在“斯大林”和“山姆大叔”之间划出一条界线。²⁷

三

因此，菲舍尔和达林的论点诞生于冷战初期这一特殊而极其复杂的背景。尽管如此，它们仍然理所当然地激励着学者们。最近，几位研究这场战争的历史学家重新提起了这些论点，他们身处截然不同的历史和政治境遇，所使用的资料也大相径庭。

²⁴ 尤金·莱昂斯，《我们的秘密盟友：俄罗斯人民》（伦敦：Arco Publications，1954年），第196页。“战争的严峻考验”是第十二章的标题。

²⁵ 同上，221。

²⁶ 同上，第192页。

²⁷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这一论点的反对确实愈演愈烈。1950年11月，他仍然强调苏联内部存在着高度的不满情绪；到1952年出版时，他的论点已更加强烈地转向反对那些充满希望的论述，转而强调反对派的软弱及其在意识形态上对俄国革命的依赖。比较菲舍尔，《二战中的苏联叛逃》，第94-9页；以及同上，《苏联反对斯大林》，第155-63页。关于他同时对抗斯大林和“山姆大叔”的思想两线作战，请参阅同上，《Dve strasti》。

然而,与20世纪50年代的先驱者一样,他们也像达林一样强调失败主义与坚决斗争的并行性,或者像菲舍尔一样,强调多数人试图逃避政治选择。²⁸本书也秉承了这一传统。诚然,我们所遇到的叛逃者并非惰性,而是积极的行动者。然而,他们的选择 在很多情况下 与其说是狭义的政治选择,不如说是深刻的个人选择。在战争和种族灭绝的灾难性条件下,生存下去并继续生活的愿望至少与政治信念一样重要。这种立场并非“惰性”,但也并非有意识地具有政治性,除非我们将拒绝政治本身也算作政治。然而,与此同时,本书并没有完全抛弃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论点。毕竟,第二大群体 我数据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叛逃者 给出了他们叛逃的政治原因。因此,尽管对于 1941 年的绝大多数战俘来说,惰性可能是决定性因素(正如菲舍尔所说),但对于许多积极寻求投降的人来说,政治仍然是关键。

自菲舍尔和达林以来,不同的学者对这一图景提供了不同的解读。德国军事史学家约阿希姆·霍夫曼于1983年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论述了苏联在与德国的斗争中的表现,暗示了1941年战俘的强大能动性。²⁹霍夫曼的论述更像斯莫林而非尼古拉耶夫斯基,他强调军事原因而非意识形态:“苏联军事人员被卷入了不可能的境地,随后又被卷入了无组织撤退的漩涡,并在围剿战中被彻底击败”,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再考虑抵抗”。相反,斯大林的士兵“集体投降,沦为俘虏”。³⁰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论述也继续吸引着那些强调苏联政权不受欢迎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的历史学家,这些原因要么是军事因素的补充,要么是军事因素的替代。1987年,一位研究俄罗斯与德国合作的历史学家写道,“大量

²⁸

参见Mark Edele,《“我们为何而战?” 1941-1945年苏联战争努力中的道德》,载《国际劳工与工人阶级史》第84卷,秋季刊(2013年):248-268页;以及同上,《走向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文化史》,载《批判:俄罗斯和欧亚历史探索》第15卷,第4期(2014年):829-835页;Leonid Rein明瞭借鉴了Fischer的“惰性”概念:《国王与卒子:二战期间白俄罗斯的合作》(纽约和牛津:Berghahn出版社,2011年),第68页,第285-286页。²⁹

我在其他地方也批评过他的做法。参见马克·埃德尔(Mark Edele)的《接受(不)》,载《囚犯:红军和德国战俘,1941-1943年》,《现代史杂志》,88(2016年):342-79。

³⁰

约阿希姆·霍夫曼(Joachim Hoffmann),《德意志帝国与两军战争》中的“战争联盟”。Band 4:Der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编辑。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斯图加特: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3),713-809,此处:721。

战俘人数众多不仅是因为红军遭到突然袭击,还因为一些部队自愿投奔德国,拒绝为苏维埃政权而战”。

31 1994年,马丁·马利亚声称,苏联公民“如果具有强烈的战斗动机,就不可能被俘虏如此多的士兵”。

32年后,卡雷尔·贝尔霍夫

夫(Karel Berkhoff)在他2004年关于苏联占领下的乌克兰的开创性研究中写道,1941年“红军士兵不想打仗”,这一事实解释了他们“自愿投降”的原因。他引用一位回忆录作者的话,得出结论:“当时唯一想打仗的苏联公民是学童”。³³研究最近一波移民潮(这次移民潮来自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的俄罗斯学者有时也加入了这一合唱。“1918年至1920年间,250万前战俘返回家园,告诉他们的亲戚和村民,你们可能会死在前线,但你们将生活在德国的囚禁中”,亚历山大·戈贡(Aleksander Gogun)在他2012年关于游击运动的优秀研究中写道。“人们对为集体农庄和古拉格流血牺牲的必要性毫无热情”,他继续说道,只是将大规模囚禁和逃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41年,德国国防军俘虏了350万名战俘。此外,在战争的前半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拘留了781.1万名红军逃兵和7.2万名逃避兵役者。”³⁴

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学者,在处理军事或意识形态因素时,都持不可知论立场。35 克里斯蒂安·哈特曼(Christian Hartmann)在其2010年发表的关于1941-1942年德国军队的权威著作中,引用了德国关于“成千上万”自愿投降的普遍报道。红军士兵“面带微笑地从灌木丛中走出来”投降。他列举了“一系列动机”,包括

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或苏联帝国主义;军事领导层以如此残酷的方式牺牲自己的人民;

³¹ 凯瑟琳·安德烈耶夫·弗拉索夫和俄罗斯解放运动:苏联现实和移民理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³² 马丁·马利亚,《苏联悲剧:1917-1991年俄罗斯社会主义史》(纽约:自由出版社,1994年),第283-4页。

³³ 卡雷尔·伯克霍夫(Karel Berkhoff),《绝望的收获:纳粹统治下的乌克兰人的生活与死亡》(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出版社,2004年),第12-13页。“红军士兵”之前的权威文章是伯克霍夫的。

³⁴ 亚历山大·戈贡(Aleksandr Gogun),《斯大林突击队:乌克兰游击队1941-1944》,第2版。edn。(莫斯科:Rosspen,2012),125。350万是sic(应该是340万)。

³⁵ 马克·埃德尔(Mark Edele)和迈克尔·盖耶(Michael Geyer),《例外国家:1939-1945年纳粹-苏联战争作为一种暴力体系》,载《超越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比较》,迈克尔·盖耶和希拉·菲茨帕特里克编(剑桥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5-95页,此处:第383-5页。

战争的混乱,尤其是在1941年那几个月的动荡时期;对纳粹德国国防军看似不可战胜的最初印象;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对在德国统治下生活或许有一天会更好的模糊希望。³⁶近期,德国斯大林主义研究的领军人物约尔格·巴贝罗夫斯基也将集体农庄的不得

人心、征服者在村庄中有时受到的积极接待以及军事因素联系起来,以解释1941年的投降,并认为投降是自愿的,而非被迫的。他在关于斯大林恐怖政权的历史中坚称,在红军中服役的农民士兵认为被俘比战斗更好。由于领导不力、补给不足,这些部队士气低落,以至于“成千上万的人投降”³⁷

2005年,拉脱维亚裔以色列学者阿隆·施内尔(Aron Shner)对导致苏联战俘大批涌入的原因进行了最全面的分析。他列举了三个主要因素:军事组织动机、社会政治动机以及主观心理动机。

军事原因包括1941年德军出乎意料地有效且威力巨大的进攻、战争初期德国军官在作战方面的优势、德国空军的绝对空中优势、苏联方面武器弹药的匮乏、德国前线后方的牵制部队的行动以及侦察兵的积极抓捕。许多战俘在被俘时受伤,通常缺乏弹药,并且长期缺粮。除了这些客观的军事因素外,还有一些“主观心理”因素,例如谣言、恐慌和胆怯,以及简单的心理疲惫。所有这些都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战俘问题的规模。然而,施内尔指出,这些因素并不能解释自愿投降的情况。对于这些因素 本书的主题 我们需要考虑他所谓的“社会政治因素”。

施内尔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的镇压、1930年代初的集体化和饥荒,以及对宗教活动的压制。他指出,1941年,村庄里公开表达的反苏情绪,以及新占领的西部领土上许多人不愿参战。

最后,他特别强调了民族问题:他假设,通常是非俄罗斯族的少数民族,他们在战前遭受压迫,放下武器,选择前线的另一边。乌克兰人,无论是来自新

³⁶ 克里斯蒂安·哈特曼,《东线国防军:前线和军事腹地》,1941/42,第二版。(慕尼黑:R. Oldenbourg Verlag,2010),549-53,引文:548。

³⁷ Jörg Baberowski,《Verbrannte Erde:Stalins Herrschaft der Gewalt》,第二版。(慕尼黑:CH Beck,2012),410-11,引文:411。

来自边境地区和旧苏联中心地带的士兵,由于遭受了集体化和饥荒,特别不愿意参战,来自中亚、克里米亚或高加索地区的士兵也是如此。

通过调动定性和定量证据,他得出了本书所依据的结论:“尽管迄今为止,俄罗斯历史学家不承认有组织的自愿投降的事实,但这种情况即使只有少数,在战争初期几乎在每条战线上都发生过。”³⁸与1948年的尼古拉耶夫斯基一样,许多当代学者也认为那一年的许多投降是自愿的;然而,大多数学者也引用了斯莫林在1952年强调

的军事原因。只有少数人完全否定后者。总的来说,我们处理的是与菲舍尔和达林的形象略有不同的原因复杂性以及普遍缺乏对苏联方面的明确意识形态承诺。正如我们所见,确实有压倒性的证据支持一种超越单纯的军事投降原因的观点。即使苏联的命运急剧好转,德国的战俘努力看起来越来越渺茫,叛逃现象仍然持续到战争结束,其比例高达战俘总数的6%左右,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³⁹如果我们不超越斯莫林的论点,那么单是这个时间点就难以解释。然而,尼古拉耶夫斯基的“全民公决”概念也仅限于此。在苏联战俘中,叛逃者始终是少数,尽管人数不菲。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确实对苏联生活感到不满,但很少有人愿意积极对抗斯大林主义。因此,最大的群体并非潜在的抵抗战士。相反,正如本书所论证的那样,他们是难民。

四

因此,本书的谱系可以追溯到两种传统:一种是流亡者,一种是(后)苏联。就其批判斯莫林上尉狭隘的军事解释以及尼古拉耶夫斯基将俘虏与叛逃混为一谈的传统而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后流亡者之间的争论,以及他们对新兴的西方学术研究关于苏联战争、德国占领以及合作与抵抗问题的影响。但本书同时也是对苏联及俄罗斯关于投降的史学研究的评论。

³⁸ Aron Shneer, *Plen: Sovetskie voennoplennyye v Germanii, 1941-1945* (莫斯科和耶路撒冷: Mosty kultury, Gesharim, 2005), 112-58. 引用: 143.

³⁹ 第2章,表2.1。

以及叛国罪。此处,俘虏与叛逃之间界限的模糊是二战历史记忆的核心。苏联政府在战争初期就将俘虏,尤其是对军官的俘虏定为犯罪,这一点已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讨论过。当然,在实践中,主动投降者 (sdalis v plen)和被俘者 (popali v plen)之间存在区别。这种区别对于“过滤”获救战俘的过程以及后来对通敌者的战争罪审判调查都至关重要。为了再次证明叛国罪,调查人员试图证明被告是自愿投降的。他们的解释通常相当宽泛,正如我们在阿尔卡季·瓦西里耶维奇·布克列耶夫一案中所看到的那样,但如果找不到叛逃的证据,这部分指控通常会被撤销。毕竟,大多数人都面临更为严重的指控,而且这些指控往往都有相当充分的证据。

尽管在实践中做出了区分,但苏联官员仍然怀疑大多数战俘确实是叛逃者。前战俘仍然笼罩在怀疑的阴云之下。他们经常被卷入战后针对任何与腐朽的西方有联系的人的政治迫害,即所谓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斯大林死后对前战俘的秘密大赦也批评并重申了战俘和叛逃者之间的联系。一方面,1956年,由战时最杰出的军事领导人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主持的一个委员会谴责“公然违反法律”,并强调苏联士兵由于绝望的军事环境和对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而“发现自己被俘”(okazat sia v plenu);另一方面,最终的大赦(而非平反!)却沿用了“投降敌人”(sdat sia v plen)这一古老说法。此外,它还将先前对通敌者的大赦延伸至战俘,实际上将战俘视为前者的子集。因此,不安感依然存在,战俘与叛徒之间的概念联系也从未完全断绝。

直到苏联改革时期,情况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87年和1988年,苏联媒体就二战期间战俘的历史以及前战俘是否应享有与其他卫国战争老兵同等待遇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公众的争论愈演愈烈,焦点再次集中在战俘究竟是俘虏还是叛逃者的问题上。最终,反对将两者混为一谈的人获得了胜利,但这是在苏联解体之后。1992年,询问是否曾被俘的条款从标准记录中删除。

问卷调查,并于1995年将前战俘完全认定为“战争参与者”。⁴⁰

与此同时,关于实际叛逃的记忆主要局限于与纳粹合作的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史学作为探索“黑暗”和“秘密”的家庭手工业的一部分而蓬勃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双方。⁴¹然而,即使在那时,学者们也常常认为出于政治原因,叛逃需要谨慎处理。1996年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政治迫害受害者康复委员会主席 VP Naumov 煞费苦心地减少苏联战俘中“叛徒”的比例。“没有超过1.4-1.5%”。⁴²从历史上看,整个争论都是一场闹剧,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1.4%的计算是基于基于对德国政策的错误假设;它仍然会比较语境中较高;德语基础的很大一部分德国出版物早已提供了统计数据;而且这些数字当时甚至在俄罗斯公共领域流传,诺莫夫认为,这种算计是不必要的。但诺莫夫的观点与其说是历史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整个战俘的康复过程依赖于清除战俘类别与叛逃和叛国行为有关。因此,叛徒的数量尽可能低。权威历史学家也持类似观点。伟大胜利,俄罗斯国家军事史的一部分,2005年出版,纪念胜利六十周年反对纳粹主义。它强调,大多数部队在1941年英勇作战正是军事因素迫使苏联士兵投降。甚至没有提到叛逃。相反,该报道突出了战俘营内的抵抗以及大规模逃亡。作者们提到军事合作,但煞费苦心地强调其非政治性动机。苏联政权的敌人数量“很少”。⁴³

⁴⁰ Edele,《苏联老兵》,第120-8页。朱可夫委员会的报告(1956年6月4日)转载于《Reabilitatsiia:Kak eto bylo》。Fevral 1956 nachalo 80-kh godov,编辑。阿蒂佐夫,尤。Sigachev,I. Shevchuk,V. Khlopov(莫斯科:Demokratiia,2003年),114-18。20号1956年9月,一项决议将通过者大赦范围扩大到前战俘首次发表于Vedomosti Verkhovnogo Soveta SSSR 19(1956)。

⁴¹ 例如,BV Sokolov,“Russkie kollaboratsionisty”,在他的Tainy Vtoroi mirovoi(莫斯科:Veche,2001年),第310-23页,关于叛逃者:第311页。本文分两部分发表在Nezavisimaia报,1991年10月29日和1992年2月20日。

⁴² 副总统 Naumov,“Sud ba voennoplennykh i deportirovannykh grazhdan SSSR: Mate-rialy komissii po reabilitatsii zhertv politicheskikh repressii”,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2(1996): 91-112,此处:92。

⁴³ Velikaia Otechestvennaia: Istorii Velikoi Pobedy 1941-1945 gg,编辑。佐洛塔列夫(莫斯科:Animi Fortitudo,2005),605-14。

同一论点的激进版本承认失败主义的存在,但重新采用了斯莫林上尉的论点来解释它。⁴⁴

到了21世纪初,俘虏与叛逃之间的联系被打破了,民族主义史学将战俘从叛国罪指控中解放出来,淡化或完全忽略了主动投降,甚至将军事合作解释为非政治性。这种精妙的策略使得1941年只需略加修饰事实,就能被重新铭刻成一个英雄主义的民族救赎叙事。大规模叛逃在民族意识中留下的污点,被通过适量的遗忘术抹去。

然而,还有另一种处理这段历史的可能方式,而且更为激进。与其尽量减少叛逃的程度,不如为这种现象洗脱叛国罪的指控。两位前战俘就持这种立场,他们于2003年开始撰写一部“完整客观的苏联战俘历史”。⁴⁵他们假设这场战争并非双方之间,而是三方之间:“纳粹德国、‘列宁-斯大林党’和俄罗斯人民”,前两者既与后者作战,也相互交战。

大规模投降现象是这场斗争的一部分,1941年发生了一场“反苏革命”,随后又爆发了一场“内战”。在这种情况下,“自愿或半自愿投降”并不构成叛国罪。脱离斯大林的人并非祖国的叛徒,这不仅因为政权与人民不同,还因为叛逃者出于一个崇高的事业:他们“拒绝保卫共产主义政权”。

46作者用整整一章

来论述叛逃 (sdacha v plen),即“不仅在绝望的情况下,而且是自愿的”投降。他们断言叛逃“规模庞大,甚至大规模”,⁴⁷却并未宣称所有投降都是自愿的。相反,他们描述了理想型叛逃者与理想型俘虏之间的巨大灰色地带。⁴⁸

我们在此看到了源自战后流亡者讨论的西方史学流派与新兴俄罗斯学术的融合。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2003年,这种立场也相当激进。在2010年代中期普京执政的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多次内战的记忆依然存在。

⁴⁴ MI Mel tiukhov 根据新获得的 NKVD 数据得出结论,军事原因是他所认为的 1941 年投降的普遍“情绪”(nastroeniia)的核心。MI Mel tiukhov, “9 dnei boevogo puti krasnoarmeitsa Bunina i ego razmysleniia o poriadkakh v armii (1941 年上帝)”, Voенno-istoricheskaiа antropologiia (2005/2006): 142-51。

⁴⁵ IA Dugas 和 F. Ia. Cheron, Sovetskie voennoplennye v nemetskikh kontslageriakh (1941-1945) (莫斯科: Avuar konsulting, 2003), 3。

⁴⁶ 同上。10。

⁴⁷ 同上, 109。

⁴⁸ 同上, 109-16。

第四十九次世界大战中德苏战线的局势日益紧张
 当代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激情
 该地区的斗争中,叛逃可能会以黑白分明的方式出现
 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历史一样。⁵⁰
 当时和现在情况的复杂性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
 在这场斗争中。⁵¹

⁴⁹ Alfred J. Rieber, 《苏联内战》, 《批判:俄罗斯和
 《欧亚历史》4 (2003): 129-62; 现为他的《斯大林与至高无上的斗争》的一部分
 在欧亚大陆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

⁵⁰ 看到对 KM Aleksandrov 作品的愤怒谴责 对我而言至关重要的研究
 关于科诺诺夫的论文 发表在一份受人尊敬的同行评议研究期刊上:A. Iu. Plotnikov
 和 VV Vasilik, “Vlasovkoe dvizhenie” ili eshche raz ob istorii predatel’stva (Na osnovе
 analiza doktorskoj dissertatsii KM Aleksandrova) , Klio 1/109 (2016): 196-202。

⁵¹ 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这个观点:马克·埃德尔,《总统历史:弗拉基米尔·普京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研讨会“有争议的政治”上发表的论文
 历史记忆:应对欧洲和世界范围内暴力历史的当代回响
 亚洲,迪肯大学吉朗校区阿尔弗雷德·迪肯研究所,2月27日
 2015年修订为《对抗俄罗斯的历史战争:弗拉基米尔·普京与法典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冷战后普京的俄罗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2016年8月24日至26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研究中心,
 堪培拉。

9

启示

我

叛逃的历史及其各种解读,对于目前关于苏联历史的争论有何影响?在俄罗斯,对1941年大规模投降事件进行狭隘的军事解释,可以服务于明显的民族主义目的,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见。与此同时,在俄罗斯以外,斯莫林上尉的路线也并未消亡,即使它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立场。

1996年,罗伯特·W·瑟斯顿在其备受争议的著作中指出,1937-1938年的大恐怖并不是一个群体现象。斯大林政权的维系并非如“极权主义”学派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依靠恐怖和恐惧,而是依靠群众的同意。瑟斯顿声称,斯大林主义深得民心。然而,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德苏战争的爆发就成了一个谜:为什么1941年有这么多人投降?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以及后来一篇独立文章中更强硬的形式,瑟斯顿基本上重复了斯莫林上尉的推理,只强调军事因素。他还重述了莱昂斯关于“战争的严峻考验”的概念,但结论相反。正如苏联历史的主流所声称的那样,许多人对苏联政权的不满并不能解释德国人能够俘虏大量囚犯;是军事因素。1941年,苏联士兵经常领导不力,装备不足,完全被德国战争机器击溃。

被包围在所谓的“熔炉”中,面对坦克和摩托化步兵,要想继续战斗,需要果断的领导力、高度的纪律性和军事技能。战争初期,这两点都十分匮乏。然而,鉴于这种情况,大规模投降并不能被视为自愿行为,因此完全符合斯大林主义广受民众欢迎的假设。¹

¹ 罗伯特·W·瑟斯顿,《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的生活与恐怖:1934-1941》(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同上,《忠诚与背叛的熔炉:1941年和1945年的苏联士兵行为》,摘自《人民战争: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应》

瑟斯顿的军事史论证与其前辈斯莫林一样坚实可靠。即使对这些包围战略知一二,也足以理解,对斯大林主义的忠诚与否,至多只能对投降的决定产生些许影响。正如斯大林军队的首席历史学家罗杰·里斯所说,正是“显而易见且普遍的战争真理”解释了1941年大战中发生的大规模俘虏事件:

训练不足、领导不力、经验不足的士兵组成的部队,在面对领导更出色、组织更完善的部队时,很容易遭受重创、溃败甚至被俘。如果没有适当的训练和有效的领导,士气和勇气在军事表现中只会起到次要的作用,而政治上的可靠性和忠诚度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在同样的情况下,政治上可靠且忠诚的士兵,如果训练不足、领导不力,与政治上存疑且忠诚度不高的士兵一样,必然会失败。²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那样,军事原因也阻止了愿意越过前线的士兵这样做。因此,虽然将1941年大战中的每一名战俘都视为叛逃者是荒谬的,但断言所有没有投奔德国的人都没有考虑过这样的行动方针也是同样错误的。

熔炉之战使持续抵抗变得极其艰难,这一点需要补充说明,它同时也消除了许多通常阻碍投敌的障碍。即使在最绝望的条件下,也总有少数人坚持战斗;但也总有少数人想方设法跨越前线,向德军投降,即使在这种行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

二

对瑟斯顿来说,1941年投降完全出于军事原因这一论点,对于支持他关于斯大林主义是民粹政权、二战胜利证实了这一点的论断,是必要的。这一论点的推动者是“极权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之间关于苏联历史的论战。³这场辩论目前已持续

苏联, Robert W. Thurston 和 Bernd Bonwetsch 编辑 (厄巴纳和芝加哥: 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235-57页。

² 罗杰·里斯,《斯大林的士兵为何战斗: 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效力》(劳伦斯: 堪萨斯大学出版社, 2011年), 100。

³ 有关瑟斯顿论文的最新阐述以及更多战争年代的证据, 请参阅罗杰·D·马克威克 (Roger D. Markwick) 和尤丽迪丝·卡多纳 (Euridice Cardona) 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线的苏联妇女》(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当然,但瑟斯顿的论文在

“后修正主义”文化历史学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

范式⁴。这一广泛框架内的近期研究集中于

可能体现亲苏联立场的来源。女兵

成为这项奖学金的热门人选,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很年轻,

共青团员,相对较好

受过教育、居住在城市 所有这些都是支持政权态度的预测因素,正如我们

参见第 6.5 章儿童和最年轻的士兵队伍也屈服了

大量关于广泛忠诚的材料,⁶以及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后不久对参加者进行的采访记录。

负责撰写这场战斗历史的国家委员会

苏联的战争努力。⁷

毫无疑问,在

红军。与尼古拉耶夫斯基一厢情愿的统计数据相反,

然而,一些学者高估了它们的影响。假设

红军主要由年轻人组成,这一说法广为流传

因为它是错误的。⁸同样,声称女性占 “

70% 的共青团士兵即将复员

严重高估了它们的重要性。⁹在另一个例子中,Jochen

赫尔贝克在其关于斯大林格勒的德文原版著作中声称

“超过四分之一的红军士兵”是

共产党。把他们加到“超过 50%”的人中

共青团员们“展现出一支坚定的共产主义军队的形象”。

事实上,他的消息来源称,只有 26.2% 的人口是共产党员,¹⁰21.1%

百分之十的共青团员,战争结束时士兵总数不到一半。

⁴ 关于这一争论,请参阅 Mark Edele 的《斯大林主义社会:1928-1953》(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236-41 页;另见同上,“我们为何而战?”。

⁵ 安娜·克雷洛娃,《苏联女性的战斗:东线暴力史》(剑桥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

⁶ ES Seniavskaia,1941-1945:Frontovoe pokolenie. Istoriko-psikhologicheskoe issledo-vanie (莫斯科:РАН,1995);奥尔加·库切连科《小士兵:苏联儿童的成长之路》1941-1945 年战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Julie K. deGraffenried, 牺牲童年:卫国战争中的儿童与苏维埃国家(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14年)。

⁷ 首次出版为 Jochen Hellbeck, Die Stalingrad Protokolle: Sowjetische Augenzeugen berichten aus der Schlacht (美国河畔法兰克福:S. Fischer,2012年)。

⁸ 关于苏联军队的年龄结构,请参阅 Mark Edele 的《苏联老兵作为权利团体,1945-1955》,斯拉夫评论 65,第 1 期(2006年):111-37,此处:113-16;以及同上,“我们为何而战?”,255-8。

⁹ Krylova,《战斗中的苏联女性》,第 3 页。数据来源:Krylova 引用:

到 1945 年 6 月 1 日,女性在共青团员中所占比例略高于 13%。

军队。这些女性中,超过 70% 在前线服役,而不是在

腹地,这似乎是 Krylova 引用的百分比的来源。BG Eremin 和

PF Isakov, Molodezh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莫斯科:Mysl ,1977) .91。

¹⁰ 海尔贝克,《斯大林格勒协议》,47。

当时正值党员招募高峰期，在当时的条件下，军事实力比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更为重要。¹¹此外，构成 Hellbeck 大部分内容的采访协议书中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是斯大林格勒战壕里的少数民族。¹²

当这些问题引起 Hellbeck 的注意时，他调整了这本书英文修订版中的数字。值得注意的是，他现在强调绝对数字而不是百分比：

随着战争的进展，红军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到 1945 年 7 月，党员总数已达 2,984,750 人，四分之一，高于战争开始时的 65.4 万人。¹³1941 年至 1945 年间共青团员人数增加了两倍，达到 2,393,345 名士兵，这些人都是共青团员。这些数字加在一起，相当于战争结束时，军队已经是一支强大的共产主义军队。¹³

正确：战争结束后，经过持续不断的招募活动，对于那些已经证明参加战斗的人数中，超过四分之一是共产党员，还有第五届共青团员。他们的人数增长速度比

军队本身也扩大了：如果共青团员人数增加三倍，党会员人数增加了四倍，而整个战争期间军队人员只增加了一倍。¹⁴然而，即使在入学人数达到顶峰的时候，大多数的军事人员（53%）仍未加入这些组织。此外，新共产党员是一个精英群体。首先，他们倾向于成为城市人。42% 的人在战争和另外 35% 的蓝领工人，而两者中的大多数民众和军队的普通士兵 集体化的农民仍然严重缺乏代表性。¹⁵

这些统计数据的目的并不是要淡化共产党的作用，无论他们的意识形态多么纯粹。如果没有在这些“国家战士的核心”（里斯）看来，很难看出红军

¹¹ 蒂莫西·科尔顿，《政委、指挥官和民事当局》（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17、21。

¹² 马克·埃德勒（Mark Edele），《现代杂志》上对赫尔贝克的评论，《斯大林格勒原型》历史 86，第 3 期（2014 年）：739-40。

¹³ 约亨·赫尔贝克，《斯大林格勒：击败第三帝国的城市》（纽约：公共事务，2015 年），42-3。

¹⁴ 每月平均列出的作战方面军和独立军队的兵力从 1941 年第三季度的 330 万增加到 1945 年第一季度的 640 万，系数为 1.9。参见 GF Krivosheev，《二十世纪苏联伤亡和战斗损失》世纪（伦敦：Greenhill Books，1997 年），101。

¹⁵ 马克·埃德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老兵：一场人民运动》《威权社会，1941-1991》（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 年），135-8。

陆军本可以像 1941 年那样进行战斗。然而,这种洞察力需要与严重不满的证据相平衡,有时会导致大规模叛国行为,以及有明显迹象表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政治情绪有很大的差异。

三

赫尔贝克如此推崇共产主义军队的概念积极地进行史学研究。他是最突出的例子之一专注于“斯大林主义主观性”的学术研究,并希望建立这种方法是理解苏联历史的主要范式。最初的动机是对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政权进行新的解读受到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信念的支持,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是由官方话语塑造的。¹⁶

自从 Hellbeck 二十年前首次发表此类文章以来,他的假设和结论都受到了持续的批评。有人指出,大众对斯大林主义存在不满,并非所有人都接受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存在着相互竞争的言论。¹⁷这些批评并非无人听闻。

赫尔贝克出版了他的开创性著作,讲述了在斯大林统治下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承认他的演员“不代表整个苏联社会”。他发现的主观性最有趣的并非当时唯一现存的。¹⁸这种对他的批评者的让步在斯大林格勒的史学战壕中消失了。他被他的资料所诱惑,有时甚至不顾资料本身的说法,

赫尔贝克撤退到他之前的位置,只是及时将其向上移动。现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是 20 世纪 30 年代,用另一位历史学家的术语“农民”被转化为“苏维埃”。¹⁹

¹⁶ 约亨·赫尔贝克,《塑造斯大林主义灵魂:斯捷潘·波德鲁布尼的日记》(1931-1939),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4 (1996):344-75;伊加尔·哈芬和 Jochen Hellbeck,“重新思考斯大林主义主题:斯蒂芬·科特金的“磁山”和苏联历史研究的状况”,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4, no. 3 (1996):456-63。

¹⁷ 对于此类经验性反对意见的总结,请参阅 Edele 的《斯大林主义社会》第 6 章。

¹⁸ 约亨·赫尔贝克,《我心中的革命:在斯大林统治下写的日记》(剑桥,MA 和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xi 页。我记录了 Hellbeck 的其他思想:Mark Edele,《苏联社会、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重新考虑主要框架》,《批判:俄罗斯和欧亚探索》

History 8, no. 2 (2007), 349-73, 这里:366-7;以及我对 Hellbeck 的《革命》的评论我的思想,载于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58, 第 1 期。2 (2010):302-3。

¹⁹ 希拉·菲茨帕特里克,《斯大林时代的农民:斯大林时代之后俄罗斯乡村的抵抗与生存》集体化(纽约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年),314; Hellbeck,《斯大林格勒协议》,29。

正是政权话语的深度内化,而不是暴力,让苏联士兵战斗。“任何人……描绘苏联人民赫尔贝克断然宣称,“被体制奴役”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数百万人一直与德国人作战,直到他们真的崩溃了。’历史学家不应该关注胁迫,而应该关注说服:“政府如何说服大部分民众参加战争,以及智力和心理储备它会在在这个过程中释放什么?’ 20 Hellbeck 是对的:正如 Reese 之前所言他,我们需要了解“核心”的意识形态动机民族的战士”。21但需要指出两点。首先,为了减少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的忽视,在于忽视爱国主义、家庭、性、宗教和社会主义意象苏联战时宣传用来激励其战士。22第二,如果苏联国家如此成功地激励了公民,为什么它如此依赖迫害?为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需要拘留657,364名士兵仅仅1941年10月10日?为什么需要强迫他们回到他们的如果他们这么积极,那又如何呢?为什么斯大林的警察在人力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逮捕了25,878人,而不是把他们送回前线?为什么要枪毙这10201个不幸的人?23用赫尔贝克的话来说:任何描绘苏联民众对斯大林政权的忠诚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至少有117,000名苏联公民自愿跨越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在绝望中试图逃往德国。他既不能理解

²⁰ 赫尔贝克,斯大林格勒,26岁。

²¹ 里斯(Reese),《斯大林的士兵为何战斗》(“国家战士的核心”在第312页)。

²² 马克·埃德尔,《纸兵:苏联士兵英雄的世界》

战时海报,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7, no. 1 (1999): 89-108; 丽莎 A. Kirschenbaum,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家庭》地方忠诚和私人

在苏联二战宣传中的生活》,《斯拉夫评论》59,第4期(2000年): 825-47; 卡雷尔

C. Berkhoff, 《祖国危在旦夕:二战期间的苏联宣传》(剑桥,

MA: 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官方的宣传路线已经调整

战前,人们意识到社会主义形象无法发挥作用

动员工具。参见戴维·布兰登伯格(David Brandenberger),《国家布尔什维主义:斯大林主义大众文化》

以及1931年至1956年现代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形成(马萨诸塞州剑桥和

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年);同上,《宣传国家危机:苏联

斯大林统治下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恐怖,1927-1941》(纽黑文和伦敦:

耶鲁大学出版社,2011年)。

²³ 给贝利亚的秘密报告,1941年10月,《卢比安卡》重印;内务人民委员部-NKGB-GUKR

Smersh 1939-mart 1946 中的斯大林,编辑。VN Khaustov、VP Naumov 和 NS Plotnikova

(莫斯科:民主出版社,2006年),第317-18页。事实上,赫尔贝克本人的资料中充满了枪击事件以及威胁枪击事件的描述,正如他现在承认的那样。比较一下他所著的《斯大林格勒》

Protokolle, 24, 英文版中有相同章节:Stalingrad, 24。另见新

关于阻拦分遣队和前线处决的部分,未包含在原文中

德文版本:斯大林格勒,64-6。

苏联战俘中叛逃者的比例高达5%至6%;他也无法理解为何有160万苏联公民成为法西斯的军事合作者。

四

换句话说,要证明苏联民众在苏联意识形态的鼓舞下全心全意地与德国人作战,就必须故意忽略大量的历史数据。²⁴部分证据来自流亡者,这使得驳斥这一论点相对容易。历史学家理所当然地怀疑那些曾为德国人服务、最终在冷战时期西方流离失所的人的言论。然而,回忆录作者在不同情况下对这个本质上相同的故事千篇一律,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仅仅因为目击者对某个历史事件的某个版本有个人认同,并不意味着他或她撒谎。正如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科诺诺夫肯定篡改了事实,但他的故事并非完全杜撰。

此外,其他材料也证实,战争开始时,失败主义在苏联社会盛行,而正是经过与种族灭绝敌人的长期斗争,才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坚定地支持政治领导层。想想列宁格勒地区的一位男子,他在战争开始后第二天收到动员令后,用手枪威胁一名官员,大喊:“我不会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我要为希特勒而战!”²⁵或者想想那些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即将覆灭感到欣喜若狂的莫斯科人,他们相信“法西斯分子杀害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但不会动俄罗斯人”。²⁶后来,在十月的莫斯科恐慌中,他们自行其是,将试图逃离城市的官员从车里拉出来,高喊“殴打犹太人!”殴打他们 无论受害者是否真的属于犹太人或信仰犹太人。²⁷反集体农庄

²⁴ 事实上,赫尔贝克现在已经找到了这样的证据 只不过是為了讨论而忽略了它。参见斯大林格勒,72-5,此部分未包含在德文原版中。

²⁵ 1941年6月的警方报告。重印于《Iz raionov oblasti soobshchait》。。。1941-1945年,列宁格勒州自由州和大区自治州。

斯博尼克·文献托夫,编辑。AR Dzeniskevich (圣彼得堡,2006年),13-16,此处:15。

²⁶ 约翰·巴伯,《莫斯科民众对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的反应》,《苏联/联盟苏维埃》第18卷(1991年):5-18,此处:14。关于村里的反应,另见凯瑟琳·梅里代尔的《伊凡的战争:红军的生与死,1939-1945》(纽约:大都会图书,2006年),第98页。

²⁷ A.I. Shakhurin回忆录,载于K.I. Bukov编,《莫斯科铁路1941-1945:回忆录和铁路文献》(莫斯科:Mosgorarkhiv,1995年):第108-15页,此处:第111-12页。丽贝卡·曼利(Rebecca Manley)在《前往塔什干车站:疏散与生存》(To the Tashkent Station: Evacuation and Survival in Tashkent Station: Evacuation and Survival in Tashkent Station)中讨论了这一事件。

许多脱北者在之前、期间表现出的情绪非常普遍，战后，德国人解放的希望也破灭了。

意味着局限于新获得的西部边境地区。29 6 月 22 日

例如，1941 年，列宁格勒附近一个小镇的居民在她的日记里记载着战争的消息。“我们的解放快到了吗？”她心想。

“不管德国人怎么样，他们都不会比我们更坏。”³⁰即使在遥远的塔什干，当地人也在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他们的条顿解放者，正如一位疏散到那里的列宁格勒犹太人几十年后回忆的那样：

现在，我记得在塔什干撤离期间的下一件事是当我们遇到一位乌兹别克老人时。一位乌兹别克老人对我们说：“可怜的人……可怜的犹太人，你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告诉他，因为我们想救我们的命，他说，“好吧，但不幸的是，情况太糟糕了，希特勒会来这里，无论如何他都会杀了你们。”大多数乌兹别克人都完全相信希特勒上台后他们会获得自由；共产主义……可惜的是，这些善良的（犹太人）人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被杀。³¹

在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反对苏联政权和

人们对其崩溃的预期如此强烈，以至于 1942 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起义爆发了冲突，不得不用军事力量镇压。这是“事实”，

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战争开始时，许多农村

吉尔吉斯斯坦并不认同共同的战争努力，或者说，苏联国家”。大多数吉尔吉斯人参加战争只是因为他们

通过暴力和恐吓手段强迫。战争经验

动员男性参军，通过宣传来解释这一过程，

与被疏散者和被驱逐者不同的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

共和国建立对苏维埃国家的认同感。采取

非自愿人口流动的核心作用，这种变化

从失败主义和反对注定失败的苏联到

战争中的苏联（伊萨卡和伦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11-12 页。

战争开始时的反犹太主义，另见 Oleg Budnitskii，《伟大的卫国战争和

《苏联社会：失败主义，1941-42》，《批判：俄罗斯和欧亚历史探索》

15，第 4 期（2014）：767-97，此处：782-3。

³⁰ 文献：Edele，《我们为何而战？》，254-5。

³¹ 参见 Theo J. Schulte 的《德国军队和纳粹在占领俄罗斯的政策》（纽约：伯格，1989），121；Lubianka v dni bitvy za Moskvu: Po rassekrechennym dokumentam FSB RF，编辑。VK 维诺格拉多夫（莫斯科：Zvonnitsa，2001 年），153、168、176；布德尼茨基，“伟大的卫国战争和苏联社会”。

³² OV Budnitskii（编辑），“Svershilos”。Prishli nemtsy! Ideinyi kollaboratsionizm v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时期（莫斯科：Rosspen，2012 年），65。

³³ Alexander Meystel，《采访记录》（1979 年 12 月 24 日），William E. Wiener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口述历史图书馆：近代苏联口述历史

美国移民多洛特犹太分部，纽约公共图书馆，7。

对斯大林胜利帝国的认同感与许多乌克兰人,甚至俄罗斯人经历的过程并无二致。³²相比之下,战争开始时,苏联公民甚至将德国人造成

的大规模死亡归咎于斯大林政权。例如,就像第六章讨论过的一位脱北者一样,苏联腹地的集体农民将列宁格勒封锁的受害者视为苏联而非纳粹政权的罪行之一:“你们为什么要为你们该死的布尔什维克挺身而出?”哥萨克妇女会搭讪疏散到她们村庄的半死不活的列宁格勒人。“你看,他们把你们整座城市都饿死了,你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被像牲畜一样扔进火车车厢,驱赶了几个月,让饥饿在途中吞噬你们。”

33

五

然而,这些证据不应诱使我们将叛逃者视为苏联社会更普遍的“案例研究”。对于每一个被引用的失败主义例子,我们都可以找到忠诚的表现。投降与坚决的战斗在1941年并肩发生。³⁴我们根本无法从一个自我选择的群体推断出整个群体的普遍性。虽然叛逃者比年轻的共产主义女战士或历史委员会采访的教授和将军更“典型”,但他们既不“具有代表性”,也不是“随机样本”。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促使叛逃者犯下罪行的情绪究竟有多典型?

叛国罪。

正如亚历山大·达林 (Alexander Dallin) 在1957年所写,“对苏联战时士气的详细分析仍有待历史学家完成”,但如今我们掌握的数据远多于他当时掌握的数据。然而,达林的诊断基本框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大多数士兵一旦进入战斗状态,就会战斗,而且往往打得很好;即使是红军中的非共产党员也经常服从他们的

³² Moritz Florin,《通过战争成为苏联人:吉尔吉斯斯坦与伟大的祖国战争》,《批判:俄罗斯与欧亚历史探索》第17卷,第3期(2016年):495-516;引文:495。关于俄罗斯人经历的类似过程,请参阅Budnitskii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与苏联社会》和Mark Edele的《走向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文化史》,《批判:俄罗斯与欧亚历史探索》第15卷,第4期(2014年):829-835。

³³ 叶莲娜·科日娜,《穿越燃烧的草原:1942-1943年俄罗斯战时回忆录》(纽约:Riverhead Books,2001年),第11页。

³⁴ 我在埃德勒的《我们为何而战?》(第248-250页)中勾勒出了战争的开端。另请参阅约翰内斯·杜伊·恩斯塔德的《德国占领下的苏联公民:1941-1944年俄罗斯西北部的生活、死亡与权力》(博士论文,奥斯陆大学,2013年)中关于战争爆发的精彩第三章。

不满情绪转化为驱逐“外敌”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德国人俘虏了大批战俘，证明了苏联忠诚度存在裂痕。无论投降是否由于先前对苏联政权的不满、军事情况，或寻求一条摆脱战争的捷径。³⁵

苏联社会确实存在两个极端群体，研究表明：那些在 1941 年奋力战斗的人和那些自愿投降的人。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居住在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许多人认为，正如一位前苏联公民在战后总结的那样，“德国人做了坏事，苏联人做了坏事，他们宁愿独自一人。³⁶关于德国控制的领土，可能有 160 万与德国合作的军事人员以及多达 160 万反苏（通常也反德）民族主义者游击队面对的是 110 万游击队员和另外 150 万注册支持者，而大多数民众试图避开双方。在前线的另一边，大约有四百万公民自愿参军，而另一群人数量差不多的人则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服役。¹⁹³⁻⁴ 百万苏联公民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³⁷他们既不支持或抵抗苏联政权，他们只是勉强过关”，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已经把它放了。³⁸

不置可否的多数派只是为了在武装意识形态战士的世界现在得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支持大量的研究。³⁹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被占领土、包括 Christian Hartmann 关于德国战争的著作东部，⁴⁰杰弗里·斯温 (Geoffrey Swain) 论述拉脱维亚东部的种族战争和阶级战争，⁴¹卡雷尔 Berkhoff、Wendy Lower 和 George Liber 谈民众的反应

³⁵ 达林，《德国统治下的俄罗斯：1941-1945。占领政策研究》（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57 年），63-4。

³⁶ 哈佛大学苏联社会制度项目，附表 B，第 4 卷，案例 188，第 6 页。

³⁷ Edele，《我们为何而战？》，第 259-60 页；关于 1941 年人口的不同估计，请参见同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流离失所的历史：苏联案例》，历史澳大利亚 12，第 2 期（2015 年）：17-40，此处：18 n. 3。

³⁸ 蒂莫西·约翰斯顿，《身为苏联人：身份、谣言和斯大林统治下的日常生活》1939-1953（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xxiv 页。

³⁹ 有关德国历史上的类似讨论，请参阅 Dick Geary 的《强制、同意、以及在第三帝国的适应》，载于《极权独裁：新历史》Daniela Baratieri、Mark Edele 和 Giuseppe Finaldi（纽约和伦敦：Routledge，2014），157-71。

⁴⁰ 克里斯蒂安·哈特曼，《巴巴罗萨：奥斯滕德意志战争》1941-1945（慕尼黑：CH Beck，2011 年），57。

⁴¹ 杰弗里·斯温，《斯大林与希特勒之间：德维纳河上的阶级战争与种族战争》1940-46（伦敦和纽约：RoutledgeCurzon，2004 年）。

占领乌克兰,42杜鲁门·安德森关于乌克兰游击队运动和德国的报复,43亚历山大·斯塔蒂耶夫(Alexander Statiev)谈苏联的反叛乱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缺乏民众支持,44
 约翰内斯·杜伊·恩斯塔德谈苏联公民的“精打细算的实用主义”
 在被占领的俄罗斯西北部,45劳里·科恩讲述被占领下的生活在斯摩棱斯克,46塞思·伯恩斯坦(Seth Bernstein)谈论1941年平民的行为梁赞》47伊戈尔·叶尔莫洛夫关于“纳粹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生活,48和伊扎克·阿拉德(Yitzhak Arad)就抵抗者、合作者和苏联领土上大屠杀的旁观者,49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前线的另一边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包括罗杰·里斯(Roger Reese)关于红军士兵战斗动机的文章,50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Oleg Khlevniuk)阐述斯大林对苏联政策转变的原因战争期间的教会,51以及奥列格·布德尼茨基关于少数民族的失败主义1941年的俄国人 2.52

那么,叛逃者既是普通人,又是非凡之人。他们他们是非典型的,因为他们采取了叛逃到德国的激进举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做的原因很普遍(但并非在一个少数支持者和少数支持者之间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另一个是执政政权的直接反对者,大多数人

⁴² Berkhoff,《绝望的收获》,231;Wendy Lower,《纳粹帝国的建立与《乌克兰大屠杀》(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5年)尤其是第90-6页;乔治·O·利伯(George O. Liber)著《全面战争与现代乌克兰的形成,1914-1954》(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章。

⁴³ 杜鲁门·安德森,《巴拉尼夫卡事件:德国的报复和苏联游击队》1941年10月至12月的乌克兰运动》,《现代史杂志》71(1999):585-623。

⁴⁴ 亚历山大·斯塔蒂耶夫,《苏联在西部边境的反叛乱》(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尤其是111.126-7.138。

⁴⁵ Enstad,《德国占领下的苏联公民》,特别是第8章,引文:266,摘要:298-300。

⁴⁶ 劳里·R·科恩(Laurie R. Cohen),《纳粹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被占领的俄罗斯的日常生活在罗切斯特大学出版社,2013年)。

⁴⁷ 塞思·伯恩斯坦,《权力边缘的俄罗斯农村:战时的贝兹维拉斯蒂》《梁赞,1941年11月-12月》,《斯拉夫评论》75,第3期(2016年):560-82。

⁴⁸ 伊戈尔·叶尔莫洛夫,《三神》斯大林娜。Okkupatsiia: Sovetskie grazhdane mezhdru natsis-tami i bol'shevikami 1941-1944 (莫斯科:Tsentrpoligraf,2010)。

⁴⁹ 伊扎克·阿拉德,《苏联大屠杀》(耶路撒冷:亚德瓦谢姆,2009年),428-9,430。

⁵⁰ 里斯,《斯大林的士兵为何战斗》。

⁵¹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斯大林:一个独裁者的新传记》(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2015),第232页,第242-243页;另见他对民众对政治反应的总结斯大林统治下:317-25。

⁵² 布德尼茨基,《伟大的卫国战争和苏联社会》。另请参见回忆录作者对战前情绪的评价:V. Samarina,“Grazhdanskaia zhizn' pod nemetskoii okku-patsiei,1942-1944”,载于“Svershilos”。Prishli nemtsy! Ideinyi kollaboratsionizm v SSSR v 时期 Velikoi Otechestvennoii voiny,编辑:奥列格·布德尼茨基(Oleg Budnitskii)(莫斯科:Rosspen,2012)228-319,这里:230-1。

被夹在中间。曾经从苏联“解放”出来,却被纳粹占领,这种模式不断重复,激进的少数派为争取一个或另一方,或者实际上双方都反对。与此同时,大多数人试图生存下去,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

六

归根结底,意识形态对苏联军队来说并不那么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有效性比继续通过各种主要强制性的手段动员民众。这苏联作为战争国家的动员和组织足以解释苏联的胜利。它允许斯大林的军队超越希特勒的国防军,在生产、武器和人员上都超过他。⁵³快速运动(由于涉及广阔的空间,这不太可能,糟糕的道路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后勤噩梦),或者对手的革命性崩溃(考虑到极权主义的在苏联执政时期,德国人从来没有机会。⁵⁴此外,考虑到德国的战争目标,一个侧重于建立合作主义政权始终是一个白日梦。⁵⁵然而,该政权能够阻止1941年的垮台,并且尽管面临军事灾难,但仍继续战斗,部分是意识形态的原因。⁵⁶斯大林不仅可以依靠他的直属下属中久经沙场的团队的承诺,⁵⁷而且在苏联各地拥有大量忠诚的斯大林主义核心民众,

⁵³ 约翰·巴伯和马克·哈里森,《苏联后方,1941-1945:社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经济史》(伦敦和纽约:朗文,1991年);理查德·奥弗里,《盟军为何获胜》(纽约:WW Norton,1997年);马克·哈里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学:六大国的国际比较》(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戴维·斯塔赫尔,《巴巴罗萨行动与德国的《东方的失败》》(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大卫·斯塔赫尔,基辅1941:希特勒的东方霸权之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埃文·莫德斯利,《东方雷霆:1941-1945年纳粹-苏联战争》,第二版。编辑(伦敦:布卢姆斯伯里,2015年)。

⁵⁴ 亚当·图兹,《毁灭的代价:纳粹经济的建立与瓦解》

(纽约:维京出版社,2006年)。

⁵⁵ 马克·马佐尔,《希特勒的帝国:纳粹如何统治欧洲》(纽约:企鹅出版社)组,2008年)。

⁵⁶ 马克·哈里森,《苏联与全面战争:苏联经济为何没有崩溃》

1942年? ,《全面战争的世界:全球冲突与毁灭政治》,1937-1945年,Roger Chickering,Stig Förster 和 Bernd Greiner 编辑(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137-56。

⁵⁷ 希拉·菲茨帕特里克,《论斯大林的团队:苏联政治中的危险岁月》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章;Khlevniuk,Stalin,198-249。

无论是否被占领。正是这些“国家战士的核心”欺凌、哄骗、威胁、煽动或说服大多数人。德语其余的则以残酷手段确保苏联公民继续战斗。⁵⁸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场战争期间的普通苏联人与他们的许多同时代人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无论我们在哪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西边的法国到东边的中国

我们在占领区也发现了同样的行为模式。就像在苏联联盟,总有少数族裔会反抗,总有少数族裔会合作。苏联和其他地方一样,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做。

普通人忙于生存、保护家人,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继续生活。⁵⁹

区别在于这三个粗略群体的规模。在法国,也许1%的人选择合作或抵抗,而98%的人则两者都没有做。⁶⁰在苏联时期,这些比例截然不同。亲苏、反苏和独立民族主义武装团体的人数高达

占苏联占领区人口的8%。⁶¹与

在讨论叛逃者比例的重要性时

战俘,这个比例相对于大多数来说很小,但这是一个巨大的相比之下:比法国高出四倍。这一差异

如果我们考虑到德国控制的

领土倾向于妇女、儿童和老人。⁶²

因为意识形态,尽管美国适龄男性数量稀缺在被占领土,武装分子的比例比其他地方要大。

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苏联民众的灌输多年来,战争期间的持续努力确实取得了成果;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驱动的德国灭绝战争许多人陷入反抗。因此,历史学家们并没有错

⁵⁸ Reese,《斯大林士兵为何战斗》(“国家战士的核心”在第312页);详细探究共产党在前线动员的方式

参见 Hellbeck 的《斯大林格勒》第1章。

⁵⁹ 菲利普·伯林,《德国统治下的法国:合作与妥协》(纽约:新出版社,1996年);朱利安·杰克逊,《法国:黑暗岁月,1940-1944》(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罗伯特·吉尔迪,《锁链中的玛丽安:心灵的日常生活》(德国占领期间的法国)(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2002年);蒂莫西·布鲁克,《合作:战时中国的日本特工与地方精英》(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大学出版社,2005年);伊斯特万·迪克,《欧洲的审判:合作、抵抗的故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报复》(费城:Westview Press,2015年)。

⁶⁰ 道格拉斯·博伊德,《黑暗岁月的声音:法国沦陷的真相》

1940-1945 (纽约:历史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⁶¹ Edele,《我们为何而战?》,259-60。

⁶² Dieter Pohl,《国防军领导:1941-1944年德国军事联盟中的德国军队和 einheimische Bevölkerung》(法兰克福:Fischer,2011年),124;科恩,纳粹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221。

那些坚定的意识形态人士。有些人的错误在于,他们把自己的经历普遍化,并讨论大量相反的证据。

七

因此,叛逃是极权主义和战争所定义的极端主义情境下的一种极端行为。它处于行为者试图在危险且政治过热的环境中寻求妥协的行为范围的一端。叛逃的动机复杂,后果也各异,从死亡到生存,从退出战争到与德国政策中最糟糕的方面合作,包括大屠杀。它在苏联及其继承者以及国外都经历了复杂的后续影响。它对我们看待战争时期的苏联社会有着微妙的影响。

引用来源列表

1. 档案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赫梅特夫档案馆, Bukhantsov, G. 无标题回忆录, 打字稿, 约 1953 年。

巴特勒, 伊娜·康斯坦丁诺夫娜。 “Dvadtsat” 让 nazad. Vospominaniia obyvatel - nitsy , 未出版的打字稿, 1970 年。

沙托夫, 迈克尔。 论文。

Valentinov, V. “Wie ich “Kollaborateur” wurde” 。 未发表的打字稿记忆 - oirs, 约 1952 年。

“V boiakh za Rodinu i za Stalina” , 未出版的回忆录, 作者不详, 打字稿 (1951 年) 。

德国柏林联邦档案馆 (BArch)

R70 Sowjetunion: Polizeidienststellen in den eingegliederten und besetzten 协会 Sowjetunion

德国联邦档案-军事档案 (BA-MA)

RH 2: Fremde Heere Ost RH 19 II:

Heeresgruppe Mitte RH 19 III:

Heeresgruppe C-Nord-Kurland RH 20-4:

Armeoberkommando 4 RH 21-3:

Panzerarmeeoberkommando 3 RH 22: Befehlshaber

rückwärtiger Heeresgebiete RH 24-17: 第十七总司令部。 RH

24-23 军团: 第 23 总指挥部。 RH 24-26 军团: 第 26 总指挥部。 陆军军

团 RH 26-18: 18. 步兵师 RH 26-21: 21. 步兵师 RH 26-221: 221. 步兵

师 RH 26-296: 296. 步兵师 RH 27-3: 3. 装甲师 RW 4: 国防军总司令

RW 6: 国防军总司令。 包括。 Chef des

Kriegsgefangenenwesens RW 49:

Nachgeordnete Dienststellen und Einheiten

des Amtes Ausland/Abwehr FC-35-16-P = NARA

Record Group 242/1048

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鲍里斯·尼古拉耶

夫斯基藏品 斯坦尼斯拉夫·奥斯基藏品

乔治·菲舍尔藏品

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手稿部
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论文

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堪培拉 (NAA)
D400:南澳大利亚州移民局分支机构
MP742/1:陆军部中央办公室

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NARA), 马里兰州学院公园市
记录组 319:安全机密情报和调查档案

Pamiat Naroda 1941–1945 阵亡
和失踪士兵档案在线存储库,复制自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 (TsAMO RF) <https://pamyat-naroda.ru/>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莫斯科 (GARF)
Fond A-461: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院。
基金 R-9526:遣返事务委员会。

莫斯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RGASPI)
Fond 17, opis 125:中央委员会装置, Propa-管理局
甘达和激动
88 号基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 (1901–1945)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博物馆,华盛顿特区 (USHMM)
RG-06.025: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中央档案馆。1939年至1992年苏联战争罪审判相关记录

RG-31.018:乌克兰安全局 (SBU)档案。战后罪行
与大屠杀相关的审判
RG-74.001: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前克格勃档案。精选战争记录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审判的纳粹合作者罪行案件
RG-75.001: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局 (SNB)档案中的战争罪调查和审判记录,国际追踪服
务档案数据库 (德国巴特阿罗森)

2. 口述历史

哈佛大学苏联社会制度项目 (又名“哈佛访谈项目”) <http://hcl.harvard.edu/collections/hpsss/index.html>

Vospominaniia senioro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http://iremember.ru> William E. Wiener.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口述历史图书馆:美国近期苏联移民的口述历史。纽约公共图书馆多洛特犹太分部。

3. 已出版的主要资料

- 亚历山德罗夫, KM 和 OI Nuzhdin. *Novye dokumenty k biografii General-maiora IN Kononova*, *Russkoe proshloe* 12 (2012):259-79。
- Alliluyeva, Svetlana. 《给朋友的 20 封信》(伦敦:哈钦森,1967 年)。
- Artizov, AN 和 VS Khristoforov (编辑)。弗拉索夫将军:istoriia 弗拉索夫将军:istoriia predatel stva, 2 卷,3 本书(莫斯科:Rosspen,2015 年)。
- 阿蒂佐夫, AN, Iu. Sigachev, I. Shevchuk 和 V. Khlopov (编辑)。重新启动。
Kak eto bylo. 文件 Prezidiuma TsK KPSS i 药物材料。 Mart 1953-fevral 1956, 第 2 卷。(莫斯科:Demokratiia,2000-3)。
- 巴特舍夫, 弗拉基米尔·弗拉索夫。 *Opyt literaturnogo issledovaniia*. Chasti 1-3, 第 2, 转。
edn. (法兰克福:Literaturny evropeets,2005 年)。
- 贝京, 梅纳赫姆。《白夜:一个俄罗斯囚犯的故事》(伦敦:麦克唐纳,1957 年)。
- Bezverkhnii, AG SMERSh. *Istoricheskie ocherki i arkhivnye dokumenty* (莫斯科:
Izdatel stvo Glavarkhiva 莫斯科,2003)。
- 布罗纳, 亚当。《我的反纳粹战争:红军中的一名犹太士兵》
(塔斯卡卢萨:阿拉巴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 布德尼茨基, OV (编辑)。斯维尔希洛斯。普里什利 nemtsy! Ideinyi 合作 v SSSR
v 时期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莫斯科:Rosspen,2012 年)。
- 布科夫, KI (编辑)。莫斯科沃纳尼亚 1941-1945. *Memuary i arkhivnye dokumenty* (莫斯科:
Mosgorarkhiv,1995)。
- 切尔卡索夫, 康斯坦丁。科诺诺夫将军 (Otvét pered istoriei za odnu popytku)。 2 卷。(第一卷:墨
尔本:Edinienie,1963 年;第二卷:慕尼黑:Tipografiia I. Bashkirtseva,1965 年)。
- “文献和材料:staroe, no groznoe oruzhie”,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9 (1988):26-8。
- 杜金, AN Neizvestnyi 古拉格。 *Dokumenty i fakty* (莫斯科:Nauka,1999)。
- Dvinov, B. *Vlasovskoe dvizhenie v svete dokumentov*. (S prilozheniem sekretnykh
dokumentov) (纽约:[无出版商],1950)。
- Dzeniskevich, AR (编辑)。 *Iz Raionov 州 soobshchait*。。。 *Svobodnye ot okkupatsii
raionov Leningradskoi oblasti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1941-1945*.
Sbornik dokumentov (圣彼得堡,2006 年)。
- 乔治·菲舍尔 (编辑)。“Bresprechung des Führers mit Generalfeldmarschall Keitel und General
Zeitler am 8.6.1943 auf dem Berghof”, 《现代史杂志》23, 第 1 期。 1 (1951) :58-71。
- 费舍尔, 乔治。 *Dve strati*. *Pomnite sei den*, 位于 V poiskakh istiny. Puti i sud by vtoroi
emigratsii: *Sbornik statei i dokumentov*, 编辑。 VS 卡尔波夫 (莫斯科:RGU,1997) ,177-21。
- 菲舍尔, 路易斯。《深入洞察》, 《纽约时报》, 11月21日
1965年,3。
- 格尔凡德, 弗拉基米尔。 *Deutschland-Tagebuch 1945-1946* (柏林:Aufbau Taschen-
(2008 年,第 159-165 页)。
- 格莱纳, 赫尔穆特, 珀西·恩斯特·施拉姆和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 (编)。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Wehrmachtführungsstab) 1940-1945*, 4 卷。(美因河畔法
兰克福:Bernhard 和 Graefe,1961-5)。

- Hürter, Johannes (编)。《东线的德国将军:哥特哈德·海因里希的信件和日记,1941-1942》,Christine Brocks 译(巴恩斯利:Pen & Sword 出版社,2014年)。
- 亚加诺夫,亚历山大。 V pervoi kazach ei.奥彻克·沃托罗伊。 U Kononovtsev ,Na Kazach em postu. Dvukhnedel nyi obshchekazachii zhurnal 37 (1944年11月1日):11-12。
- 亚加诺夫,亚历山大。 V pervoi kazach ei.藉石色。 Polkovnik Kononov ,Na Kazach em postu. Drukhnedel nyi obshchekazachii zhurnal 38 (1944年11月15日):11-12。
- 康拉德·H·雅劳什(Jarusch)和克劳斯·约亨·阿诺德(Klaus Jochen Arnold)(编辑)。 Das stille Sterben。 . . Feldpostbrief von Konrad Jarusch aus Polen und Russland 1939-1942 (帕德出生:Ferdinand Schöningh,2008)。
- 卡济米尔,S. Bylo,da ne splylo。 . . ”,退伍军人9 (1988):11。
- Khaustov, VN.VP Naumov 和 NS Plotnikova (编辑)。卢比安卡。斯大林是 NKVD-NKGB-GUKR SMERSH 。 1939年至1946年3月(莫斯科:Demokratiia,2006年)。
- Khaustov, VN.VP Naumov 和 NS Plotnikova (编辑)。卢比安卡。斯大林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1946年至1953年市场(莫斯科:Demokratiia,2007)。
- 克尼舍夫斯基,PN (编辑)。 Skrytaia pravda voiny. Neizvestnye dokumenty (莫斯科:Russkaia Kniga,1992)。
- 科日娜·埃琳娜(Kozhina, Elena)。《穿越燃烧的草原:1942-1943年俄罗斯战时回忆录》(纽约:Riverhead Books,2001年)。
- 库比·埃里希。我的克里格。 Aufzeichnungen aus 2129 Tagen.第三版。(柏林:(Aufbau,2010年)。
- Lochner, LP (ed.)。《戈培尔日记》(伦敦:Hamish Hamilton,1948年)。
- Lyons, Eugene. 我们的秘密盟友:俄罗斯人民(伦敦:Arco Publications,1954年)。
- Mozokhin,OB Statistika repressivnoi deiatel nosti Organov bezopasnosti SSSR (1943 gg.) ,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 9 (2005):184-91。
- Mozokhin,OB “Statistika repressivnoi deiatel nosti Organov bezopasnosti SSSR (1921-1953)” ,可在“istoricheskiamaterialy”网站上获取: <http://istmat.info/node/255> (2015年8月20日访问)。
- 瑙莫夫,副总裁(编辑)。 1941年神。 2卷。(莫斯科:Demokratiia,1998)。
- Nikolaevskii, B. O “staroi” i “novoi” emigratsii (stat ia vtoraiia) ,Sotsialisticheskii Vostok 28号1 (1948年1月26日):31-6。
- Nikolaevskii, B. Porazhencheskoe dvizhenie 1941-1945 戈多夫一世 AA Vlasov (第1部分:《新杂志》第 XVIII (1948):209-34;第2部分:《新杂志》第 XIX (1948):211-47。
- 国防军上级部队,国防军档案 1939-1945,第3卷。(慕尼黑:dtv,1985年)。
- 奥西波夫,谢尔盖。“Smersh otrkvaet tainy” ,Argumenty i fakty 26 (1131) (六月2002),9。
- Pobol ,NL 和 PM Polian (编辑)。斯大林驱逐出境 1928-1953 (莫斯科:民主,2005年)。

- “Rassekrechennye dokumenty TsAMO ob osvobozhdenii kontslageria Osvent-sim” ,Fishki Net (2015年1月27日) , http://cdn.fishki.net/upload/post/201501/27/1404604/7_18.jpg (2016年7月27日访问)。
- 雷辛,列昂尼德。’ “Kazaki”如此 svastikoi’ 。罗迪纳 2 (1993): 70-9。
- 列辛,列昂尼德和 VS 斯捷潘诺夫。 Iz foldov voennykh arkhivov:Sud by general skie , Voeno-istoricheskii zhurnal 8 (1993):20-7。
- Samarin, V. Grazhdanskaia zhizn pod nemetskoj okkupatsiei, 1942-1944 , 斯韦尔希洛斯 。普里什利 nemtsy! Ideinyi kollaboratsionizm v SSSR v period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编辑。 OV Budnitskii (莫斯科:Rosspen,2012) ,229-319。
- Shinel ,AD (编辑)。 Po obe 故事性的正面。 Auf beiden Seiten der Front. Pis ma sovetskikh i nemetskikh sellat 1941-1945 gg (莫斯科:Sol ,1995)。
- Smolin, P. “O porazhenchestve io vlasovtsakh” ,Protiv Techeniia.斯博尼克 (纽约:沃尔登出版社,1952年)。
- 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阿尔希佩拉格古拉格 1918-1956。 Opyt khudozhestvennogo issledovaniia, V-VI-VII (巴黎:YMCA Press,1975)。
- Stepashin,SV and Iampol skii,VP (编辑)。 SSSR 与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的有机合作。 斯博尼克文献。 5卷,多本书 (莫斯科:Izdatel stvo Rus ,1995-2014)。
- 斯特里克-斯特里克费尔特,威尔弗里德。 Gegen Stalin und Hitler: General Wlassow und die russische Freiheitsbewegung (美因茨: Hase & Koehler Verlag, 1970)。
- 特雷弗-罗珀 (Trevor-Roper) , 《HR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44年的私人谈话》,第二版 (伦敦: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1973年)。
- 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进行审判。
纽伦堡 1945年11月14日 - 1946年10月1日,14卷 (纽伦堡:IMT,1949年)。
- Vinogradov, VK Lubianka v dni bitvy za Moskvu: Po rassekrechennym dokumentam FSB RF (莫斯科:Zvonitsa,2002年)。
- Vsesoiuznaia perepis naseleniia 1939 goda:Osnovnye itogi (莫斯科:Nauka,1992)。
- Vsesoiuznaia perepis naseleniia 1939 goda,塔布利察 f. 11. Vozrastnoi sostav naseleniia.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RGAE),f. 1562,同前。 336.d. 604,转载于: http://demscope.ru/weekly/ssp/sng_age_39.php?reg=0&gor=3&Submit=OK。
- Ziromskaia,VB and Iu. A.波利亚科夫 (编辑)。 Vsesoiuznaia perepis naseleniia 1937 goda: Obshchie itogi. 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 (莫斯科:Rosspen,2007年)。
- Zubkova,E. Iu,LP Kozheleva,GA Kuznetsova,Al Miniuk 和 LA Rogovaia (编辑)。 Sovetskaia zhizn 1945-1953 (莫斯科:Rosspen,2003)。
- Werth, Alexander. 《1941-1945年的俄罗斯战争》,第二版。(纽约:卡罗尔出版社) Graf,2000)。
- Werth, N. 和 SV Mironenko (编辑)。 斯大林古拉加伊斯托里亚。 Konets 1920-khpervaia polovina 1950-kh godov. Tom 1:Massovyie repressii v SSSR,7卷。(莫斯科:罗斯彭,2004年)。
- Z arkhiviv VUChK-GPU-NKVD-KGB 1 (42) (2014)。

Zhadobin, AT, VV Markovchich and VS Khristoforov (编辑)。 “Ognennaia duga” : Kurskaia bitva glazami Lubiianki (莫斯科: Moskovskie Uchebniki, 2003)。

佐洛塔列夫, 弗吉尼亚州 (编辑)。 Russkii Arkhiv/Velikaia Otechestvennaia, 多卷 (莫斯科: Terra, 1993-2001) (=RA/VO)。

4. 二手资料: 书籍和文章

Aarons, Mark. 《庇护所: 澳大利亚的纳粹逃犯》(墨尔本港: 威廉 Heinemann 澳大利亚, 1989 年)。

Aarons, Mark. 《欢迎战犯: 澳大利亚, 自 1945 年以来逃犯战犯的避难所》(墨尔本: Black Inc, 2001 年)。

亚历山德罗夫, KM 俄罗斯士兵维尔马赫塔。 Geroi ili predатели (莫斯科: Eksmo, 2005 年)。

Aleksandrov, KM Kononov Ivan Nikitich, 在他的 Ofitserskii korpus armii General-leitenanta AA Vlasova 1944-1945: Biograficheskii spravochnik, 第 2 期, 修订版中。 edn. (莫斯科: 波塞夫, 2009), 481-510。

Aleksandrov, KM Ofitserskii korpus armii General-leitenanta AA Vlasova 1944-1945: Biograficheskii spravochnik, 第 2 期, 修订版。 edn. (莫斯科: Posev, 2009)。

阿列克谢耶维奇, 斯维特兰娜。《战争的非女性面孔》, Keith Hammond 和 Lyud-译 mila Lezhneva (莫斯科: 进步出版社, 1988 年)。

安德森, 杜鲁门。《巴拉尼夫卡事件: 1941 年 10 月至 12 月德国的报复与乌克兰的苏联游击运动》, 《现代史杂志》71 (1999 年): 585-623。

安德烈耶夫, 凯瑟琳。《弗拉索夫与俄罗斯解放运动: 苏联现实与流亡者理论》(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Arad, Yitzhak. 《苏联的大屠杀》(耶路撒冷: 亚德瓦谢姆, 2009 年)。

阿诺德, 克劳斯·约亨。国防军和政治政策正在受到苏联联盟的围攻。 Kriegführung und Radikalisierung im Unternehmen Barbarossa (柏林: Dunker & Humblot, 2005)。

巴贝罗夫斯基, 约尔格。 Verbrannte Erde: 斯大林의 Herrschaft der Gewalt, 第二版。(慕尼黑: CH Beck, 2012)。

巴伯, 约翰。《莫斯科民众对 6 月 22 日德国入侵的反应》, 1941' , 苏联/联盟苏维埃杂志 18 (1991): 5-18。

巴伯, 约翰和马克·哈里森, 《苏联本土战线, 1941-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史》(伦敦和纽约: 朗文, 1991 年)。

安东尼·比弗 (Antony Beevor), 《斯大林格勒》(伦敦: 企鹅出版社, 1998 年)。

奔驰, 安吉丽卡。党卫军汉兰格。 Die Rolle der Trawniki-Männer im Holocaust (柏林: Metropol Verlag, 2015)。

Berkhoff, Karel C. 《绝望的收获: 纳粹统治下的乌克兰的生活与死亡》(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 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出版社, 2004 年)。

Berkhoff, Karel C. 《祖国处于危险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宣传》(马萨诸塞州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 Berman, Harold. 《苏联的司法:对苏联法律的解读》,第二版修订版。(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
- Berman, Harold. 苏联刑法与诉讼程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典 (Cambridge, 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
- 伯恩斯坦,塞思。《铭记战争,留住苏联: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二战数字纪念》,《记忆研究》第9卷,第4期(2016年):422-36页。
- 伯恩斯坦,塞思。《权力边缘的俄罗斯乡村:战时梁赞的贝兹维拉斯提,1941年11-12月》,《斯拉夫评论》75卷,第3期(2016年):560-582页。
- Beyda, Oleg. 《“弗兰格尔军队的铁十字勋章”:俄罗斯移民作为德国国防军中的翻译》,《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第27卷(2014年):430-448页。
- 别祖古尔尼,阿列克谢。“Kavkazskie natsionalnye formirovaniia Krasnoi Armii v period oborony Kavkaza v 1942 g.”,后苏联社会权力机构杂志 10 (2009),自2009年12月7日起上线, <http://pipss.revues.org/3724>。
- Bidlack, Richard. 《列宁格勒建国第一年的政治气氛》
苏德战争》,《俄罗斯评论》59 (2000):96-113。
- 宾纳,罗尔夫·贝恩德·邦韦奇和马克·荣格。Massenmord und Lagerhaft:Die ander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Terrors (柏林:Akademie,2009)。
- 彼得·布莱克,《最终解决方案的步兵:特拉夫尼基训练营与莱因哈德行动》,《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第25卷,第1期(2011年):1-99页。
- 博克·卡特琳。《乌克兰的斯大林主义:Zweiten Weltkrieg 中的 sowjetischen Systems Rekonstruktion》(威斯巴登:Harrassowitz Verlag,2007年)。
- Bonnell, Victoria E. 和 Lynn Hunt 编。《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新方向》(伯克利、洛杉矶和伦敦: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 Bordiugov, Gennadi. 《未被占领的苏联的民众情绪:战争期间的延续与变化》,载《人民战争:苏联对二战的反应》,罗伯特·W·瑟斯顿和伯恩德·邦韦奇编(厄巴纳和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4-70页。
- 博伊德,道格拉斯。《黑暗岁月的声音:1940-1945年法国被占领时期的真相》(纽约:历史出版社,2015年)。
- 布兰登伯格,大卫。《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斯大林主义大众文化与现代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形成,1931-1956》(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年)。
- 布兰登伯格,大卫。《宣传国家危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意识形态、灌输与恐怖,1927-1941》(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2011年)。
- 布鲁克,蒂莫西。合作。战时中国的日本特工和地方精英(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
- 布赫本德,奥特温。贝尔万岁!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飞行宣传。记录和分析(斯图加特:Seewald Verlag,1974年)。
- 布赫本德,奥特温。Das tönende Erz.德国军队宣传部
《Zweiten Weltkrieg》(斯图加特:Seewald Verlag,1978)。

- 布赫本德、奥特温和霍斯特·舒。Die Waffe, die auf die Seele zielt. Psycho-logische Kriegführung 1939–1945 (斯图加特:Motorbuch Verlag,1983)。
- Budnitskii, Oleg. 《伟大的卫国战争与苏联社会:失败主义,1941-42》,《批判:俄罗斯与欧亚历史探索》第15卷,第4期(2014年):767-797页。
- Burrin, Philippe.《德国统治下的法国:合作与妥协》(纽约:新出版社,1996年)。
- 切列帕诺夫,维克托。最后我说。Stalinskii mekhanizm gosudarstvennogo upravleniia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莫斯科:Izvestiia,2006)。
- 克拉克,卡特琳娜。《莫斯科:第四罗马。斯大林主义、世界主义与苏联文化的演变 1931–1941》(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
- 科恩,杰拉德·丹尼尔。《战争的余波:战后欧洲的流离失所者》秩序(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
- 科恩,劳里 R.《纳粹统治下的斯摩棱斯克:被占领的俄罗斯的日常生活》(罗切斯特:罗切斯特大学出版社,2013年)。
- 科恩,爱德华。《共产党员的崇高头衔:战后党的纪律与苏联政权的价值观》(迪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5年)。
- 科尔顿,蒂莫西。《政委、指挥官与文职当局》(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
- Corner, Paul (ed.). 极权主义政权下的大众观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 戴恩斯,弗拉基米尔。Shtrafbaty i zagradotriady Krasnoi Armii (莫斯科:Eksmo, 2008年)。
- 戴尔·罗伯特(Dale, Robert),《斯大林时代末期列宁格勒的复员老兵:从士兵到平民》(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学术出版社,2015年)。
- 达林,亚历山大。《德国在俄罗斯的统治:1941-1945》。占领研究政策(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57年)。
- Dallin, David J. 和 Boris I. Nicolaevsky.《苏维埃俄国的强迫劳动》(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7年)。
- 戴维斯,莎拉。《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的民意:恐怖、宣传与异议,1934-1941》(剑桥:纽约和墨尔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
- 露西·达维多维奇(Lucy Dawidowicz)。《反犹战争:1933–1945》,第10版(纽约:矮脚鸡出版社,1986年)。
- Deak, Istvan.《欧洲的审判:二战期间的合作、抵抗与报复的故事》(费城:Westview Press,2015年)。
- 迪恩·马丁,《大屠杀中的合作:1941-1944年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方警察的罪行》(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00年)。德格拉芬里德,朱莉·K,《牺牲童年: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儿童与苏维埃国家》(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14年)。
- Drobiazko, SI Pod znamenami vraga. Antisovetskie formirovaniia v sostave germamsnikh vooruzhennykh sil 1941–1945 (莫斯科:Eksmo,2005)。
- Drobiazko, SI, EN Evseeva, D. Zhdanov, LA Mozhaeva, AV Okorokov, Ia. L. Pisaevskaia, DV Tiurin, Iu. S. Tsurganov, EA Shirokova 和

- AE 亚什拉夫斯基。Russkie bez otechestvo. Mezhdru Rossiei 和斯大林。Rossiiskaia emgratsiia i Vtoraia Mirovaia voina (莫斯科:RGGU,2004年)。
- Drozdv, F. “Obshchestvennye nastroyeniia v Krasnoi Armii v nachal'nyi period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博士论文, 下诺夫哥罗德罗巴切夫斯基州立大学, 2004年。
- 杜加斯 (Dugas), JA 和 F. Ia. 凯龙。苏联 voennoplennyye v nemetskiikh kontslager-iakh (1941-1945) (莫斯科:Avuar konsulting,2003)。
- 杜米特鲁,戴安娜。《苏联战后调查与审判文件分析及其与大屠杀研究的相关性》,载《东方大屠杀:当地肇事者与苏联回应》,迈克尔·戴维·福克斯·彼得·霍尔奎斯特和亚历山大·M·马丁编 (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2-57页。
- 埃德勒,马克。“纸士兵:苏联战时海报上的士兵英雄世界”,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7,第1期。1 (1999):89-108。
- 埃德勒,马克。“斯大林莫斯科的奇怪年轻人:斯蒂利亚吉人的诞生和生活,1945-1953”,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50,第1期。1 (2002):37-61。
- Edele, Mark. 《不仅仅是斯大林主义者:1945-1953年胜利者的政治情绪》,载《晚期斯大林主义俄罗斯:重建与再造之间的社会》,Juliane Fürst编 (伦敦和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第167-91页。
- Edele, Mark. 《1945-1955年苏联老兵作为权利群体》,《斯拉夫评论》65卷,第1期 (2006年):111-137页。
- Edele, Mark. 《苏联社会、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主要框架的再思考》,《批判:俄罗斯与欧亚历史探索》第8卷,第2期 (2007年):349-73页。
- Edele, Mark.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老兵:威权社会中的民众运动,1941-1991》(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 Edele, Mark. 《斯大林主义社会1928-1953》(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 Edele, Mark. “我们为何而战?” 苏联战争努力中的忠诚,1941-1945年,国际劳工与工人阶级历史,第84卷,秋季 (2013年):248-68页。
- Edele, Mark. 《向敌人学习?1941-1945年德苏战争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载《极权主义独裁:新历史》,Dan-iel Baratiieri,Mark Edede和Giuseppe Finaldi编 (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4年),第190-211页。
- Edele, Mark. 《作为“吉普赛人”的新苏联人:斯大林时代的游牧、战争和边缘性》,《地区: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区域研究》第3卷,第2期 (2014年):285-307页。
- Edele, Mark. 《走向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文化史》,《批判:俄罗斯与欧亚历史探索》15,第4期 (2014):829-35。
- Edele, Mark.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流离失所的历史:以苏联为例》,澳大利亚历史 12,第2期 (2015年):17-40。

- Edele, Mark. 《不抓俘虏 红军与德国战俘,1941-1943》,《现代史杂志》第88卷(2016年):342-79页。
- 埃德勒·马克。“不是一个普通人:伊万·尼基季奇·科诺诺夫和红军前线叛逃问题,1941-1945”,《澳大利亚政治与历史杂志》62,第1期。4(2016):546-60。
- Edele, Mark 和 Sheila Fitzpatrick,《流离失所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苏联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历史》第12卷,第2期(2015年):7-16页。
- Edele, Mark 和 Michael Geyer,《例外国家:1939-1945年纳粹-苏联战争作为一种暴力体系》,载于《超越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比较》,Michael Geyer 和 Sheila Fitzpatrick 编(剑桥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5-95页。
- Edele, Mark 和 Filip Slaveski,《自下而上的暴力:解释1943-1947年苏联境内针对平民的犯罪》,《欧亚研究》68卷,第6期(2016年):1020-1035页。
- Engerman, David C.《了解你的敌人:美国苏联专家的兴衰》(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 恩斯塔德,约翰内斯·杜伊。《德国占领下的苏联公民:1941-1944年俄罗斯西北部的生活、死亡与权力》,博士论文,奥斯陆大学,2013年。
- Eremin, BG 和 PF 伊萨科夫。Molodezh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莫斯科:Mysl, 1977)。
- 叶尔莫洛夫,伊戈尔。三神是斯大丽娜。Okkupatsiia:Sovetskie grazhdane mezhdu natsistami i bol shevikami 1941-1944 (莫斯科:Tsentropoligraf,2010)。
- Exeler, Franziska.《矛盾的国家:二战后苏联的罪责认定》,《斯拉夫评论》75卷,第3期(2016年):606-29页,此处:607页。
- Feferman, Kiril.《“犹太人的战争”:1940-41年苏联犹太士兵和军官对苏联的态度》,《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第27卷,第4期(2014年):574-590页。
- 费斯特,约阿希姆·C·希特勒,理查德和克拉拉·温斯顿译(伦敦: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1974年)。
- 费格斯,奥兰多。《耳语者: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的私生活》(纽约:大都会图书,2007年)。
- 菲尔策,唐纳德。《苏联工人与斯大林主义工业化:1928-1941年现代苏联生产关系的形成》(纽约州阿蒙克:ME Sharpe,1986年)。
- 菲尔策,唐纳德。《原子化、“分子化”和减弱的团结:工人对斯大林统治下国家镇压的反应》,载《斯大林主义主体:1929-1953年苏联和共产国际中的个人与制度》
- Brigitte Studer (苏黎世:Chronos,2006),99-116。
- 乔治·菲舍尔,《新苏联移民》,《俄罗斯评论》第8卷,第1期(1949年):6-19。
- 乔治·菲舍尔。《苏联反对斯大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案例研究》(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

- 菲茨帕特里克,希拉。《斯大林时代的农民:集体化后俄罗斯农村的抵抗与生存》(纽约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 菲茨帕特里克,希拉。《日常的斯大林主义。非常时期的平凡生活: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俄国》(纽约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
- 菲茨帕特里克,希拉。《撕下面具!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身份与冒名顶替》(普林斯顿和牛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
- 菲茨帕特里克,希拉。《重新审视20世纪40年代苏联的“犹太问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外后果》,论文发表于“扬·兰达博士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后果研讨会”(主题:大屠杀与苏联),犹太大屠杀中心,埃尔斯特维克(墨尔本),2015年5月27日至28日。
- 希拉·菲茨帕特里克,《论斯大林的团队:苏联危险的岁月》
政治(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弗里德兰德,索尔。《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外敌入侵的岁月》
mination(纽约:HarperPerennial,2007年)。
- 弗里德里希,约尔格。Das Gesetz des Krieges:Das deutsche Heer in Rußland 1941 bis 1945。Der Prozeß gegen das 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慕尼黑和苏黎世:Piper,1993)。
- 加拉德,约翰。《苏联纳粹大屠杀:解读新开放的俄罗斯档案》,《东欧犹太事务》第25卷第2期(1995年):第3-40页。
- Gatrell, Peter. 《俄罗斯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与经济史》(Harlow:培生朗文出版社,2005年)。
- Geary, Dick. 《第三帝国的强制、同意与迁就》,载《极权主义独裁。新历史》,Daniela Baratieri,Mark Edele和Giuseppe Finaldi编(纽约和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4年),第157-71页。
- 格拉赫,克里斯蒂安。Die Verantwortung der Wehrmachtführung: Vergleichende Betrachtungen am Beispiel der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genen, 载于 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Bilanz einer Debatte, 编辑。克里斯蒂安·哈特曼等人。(慕尼黑:CH Beck,2005),40-9。
- 吉尔迪亚,罗伯特。《锁链中的玛丽安:德国占领期间法国中心地带的日常生活》(纽约:亨利霍尔特,2002年)。
- 格兰兹,大卫 M. 《巨像重生:1941-1943 年战争中的红军》(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05年)。
- 查尔斯·格拉斯。《逃兵:二战隐秘史》(伦敦:威廉·柯林斯,2014年)。
- 戈肯-海德尔,乌里克。Der Weg zurück:Die Repatriierung sowjetischer Zwangsarbeiter und Kriegsgefangener während u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埃森:Klartext Verlag,2006)。
- 戈贡,亚历山大。斯大林突击队:乌克兰游击队
1941-1944,第2版,修订版(莫斯科:Rosspen,2012年)。
- Goldman, Wendy Z. 和 Donald Filtzer(编)。《饥饿与战争:二战期间苏联的粮食供应》(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15年)。

- 戈沃罗夫,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 Fil tratsiia sovetskikh repatriantov v 40-e gg. xx v. Tseli, metody i itogi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49, no. 2 (2008) :365-82。
- 哈尔芬,伊加尔和约亨·赫尔贝克。“重新思考斯大林主义主题:斯蒂芬·科特金的“磁山”和苏联历史研究的状况”,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4, no. 3 (1996) :456-63。
- 哈里森,马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学:国际上的六大强国》比较(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
- 哈里森,马克。《苏联与全面战争:苏联经济为何没有在1942年崩溃?》,载《全面战争的世界:全球冲突与毁灭政治,1937-1945》,罗杰·奇克林、斯蒂格·福斯特和伯恩德·格雷纳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7-156页。
- 哈特曼,克里斯蒂安。“Massensterben der Massenvernichtung”? 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 im “Unternehmen Barbarossa”。 Aus dem Tagebuch eines deutschen Lagerkommandanten , in Der deutsche Krieg im Osten 1941-1944: Facetten einer Grenzüberschreitung, ed. Christian Hartmann, Johannes Hürter, Peter Lieb 和 Dieter Pohl (慕尼黑:R. Oldenbourg Verlag, 2009) , 307-67。
- 哈特曼,克里斯蒂安。东战国防军:前线 and 军事腹地 1941/42, 第二版。(慕尼黑:R. Oldenbourg Verlag, 2010)。
- 哈特曼,克里斯蒂安。巴巴罗萨:奥斯滕德意志战争 1941-1945年(慕尼黑:CH Beck, 2011年)。
- 克里斯蒂安·哈特曼等人。(编辑)。国防军之战:双方辩论(慕尼黑:CH Beck, 2005年)。
- 哈森克萊弗,约恩。Wehrmacht und Besatzungspolitik in der Sowjetunion: Die Befehlshaber der rückwärtigen Heeresgebiete 1941-1943 (帕德博恩:Schöningh, 2010)。
- 赫尔贝克,约亨。“塑造斯大林主义灵魂:斯捷潘·波德鲁布尼(Stepan Podlubnyi)的日记(1931-1939)”,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44 (1996) :344-75。
- Hellbeck, Jochen。《我心中的革命:在斯大林统治下写的日记》(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
- 约亨·赫尔贝克(编)。Die Stalingrad Protokolle: Sowjetische Augenzeugen berichten aus der Schlacht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S. Fischer, 2012)。
- Hellbeck, Jochen。《斯大林格勒:击败第三帝国的城市》(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15年)。
- 朱莉·赫斯勒。《苏联贸易社会史:1917-1953年的贸易政策、零售实践和消费》(普林斯顿和牛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希尔格·安德烈亚斯。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in der Sowjetunion, 1941-1956: Kriegsgefangenenpolitik, Lageralltag und Erinnerung (埃森:Klartext Verlag, 2000)。
- 辛兹,乌塔。大战争中的格凡根。德国 Kriegsgefangenschaft 1914-1921 (埃森:Klartext Verlag, 2006)。
- 霍夫曼,约阿希姆。Die Kriegführung aus der Sicht der Sowjetunion , 载于《德意志帝国与两极世界战争》。乐队 4: Der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编辑。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斯图加特: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3) , 713-809。

- 霍夫曼,约阿希姆。Die Geschichte der Wlassow-Armee (弗莱堡:Verlag Rom-巴赫,1984年)。
- 霍夫曼,约阿希姆。Kaukasien 1942/43:Das deutsche Heer und die Orientvölker der Sowjetunion (弗莱堡:Rombach Verlag,1991)。
- Holian, Anna。《国家社会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之间:战后德国的流离失所者》(密歇根州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11年)。
- 哈德森,帕特。《数字历史:定量方法简介》(纽约和伦敦:阿诺德,2000年)。
- Inkeles, Alex 和 Raymond Bauer。《苏联公民:极权社会中的日常生活》(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
- 伊万诺夫 VA 和 NV Koloshinskaia。 “Vaktsinatsiia podozritel nosti i ee po-sledstviia (苏联变体 fil tratsii byvshikh voennoplennykh na territorii Leningrada i oblasti vesnoi-letom 1945g” ,Klio 1/109 (2016): 106-14。
- 伊瓦绍夫.LG 和 AS Emelin。 “Nravstvennye i pravovye Problemy plena v Otechestvennoi istori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1 (1992):44-9。
- 杰克逊,朱利安。《法国:黑暗岁月,1940-1944》(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 杰克逊,罗伯特。《囚徒,1914-18》(伦敦和纽约:劳特利奇,1989年)。
- Janco, Andrew Paul。 “不情愿” :1940-1951年难民身份的“单词革命”。《当代欧洲史》23 (2014): 429-446。
- 约翰斯顿,蒂莫西。《身为苏联人:身份认同、谣言与斯大林统治下的日常生活》1939-1953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 琼斯,希瑟。《缺失的范式?1914-18年的军事囚禁与战俘》,《移民与少数民族》第26卷,第1/2期(2008年):19-48页。
- Judt, Tony。 《身着帝王紫衣的小丑:社会史与历史学家》,《历史研讨会期刊》7 (1979): 66-94。
- Khlevniuk, Oleg。 《古拉格的历史:从集体化到大恐怖》(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年)。
- 赫列夫纽克,奥列格·斯大林:独裁者的新传记(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2015年)。
- 赫鲁晓娃,尼娜·L。《迷失的赫鲁晓夫:俄国古拉格之旅》(心灵(野马:泰特出版社,2014年)。
- 基尔申鲍姆,丽莎 A。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家庭” :苏联二战宣传中的当地忠诚度和私人生活” ,《斯拉夫评论》59,第4期(2000年):825-47。
- Kostyrchenko,GV V plenu u krasnogo faraona (莫斯科: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1994)。
- Kostyrchenko,GV Tainaia politika Stalina:Vlast i antisemitizm (莫斯科: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2001)。
- Kotkin, Stephen。 《磁力山:作为一种文明的斯大林主义》(伯克利,洛杉矶)洛杉矶和伦敦: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 Krivosheev,GF “Poteri vooruzhennykh sil SSSR” ,Liudskie poteri SSSR v period Vtoroi morovoi voiny。 Sbornik statei (圣彼得堡,1995年)。

- Krivosheev, GF, 《二十世纪苏联的伤亡和战斗损失》(伦敦:Greenhill Books,1997年)。
- Krivosheev,GF “O dezertirstve v Krasnoi Armi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6 (2001):94。
- Krivosheev,GF Rossiia i SSSR v voinakh xx veka. Poteri vooruzhennykh sil. Statisticheskoe issledovanie (莫斯科:Olma-Press,2001年)。
- Krivosheev,GF 和 MF Filimoshin. “Poteri vooruzhennykh sil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在 Naselenie Rossii v XX veke 中。 Istoricheskie ocherki, 汤姆 2。1940-1959 (莫斯科:罗斯彭,2001) ,19-39。
- Krylova, Anna. 《战斗中的苏联女性:东线暴力史》(剑桥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
- 奥尔加·库切连科,《小士兵:苏联儿童如何参战(1941-19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 库尔德里亚绍夫,谢尔盖。《普通合作者:特拉夫尼基卫队案例》,载《俄罗斯:战争、和平与外交》,柳比卡·埃里克森和马克·埃里克森编(伦敦:魏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2005年),第226-39页。
- 奎特,康拉德。“特拉夫尼基”,大屠杀词典,编辑。沃尔夫冈·本茨(慕尼黑:CH贝克,2002),235-6。
- Liber, George O. 《全面战争与现代乌克兰的形成,1914-1954》(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16年)。
- 利比希·安德烈。“孟什维克发动冷战”,《当代历史杂志》,第30期,第1期。2(1995):247-64。
- 洛马金,尼基塔。《战争中的士兵:1941-44年列宁格勒战役期间的德国宣传与苏联军队士气》,《卡尔·贝克福罗斯与东欧研究论文集》第1306页(1998年)。
- 洛弗尔,斯蒂芬。《战争的阴影:1941年至今的俄罗斯和苏联》(牛津:Wiley-Blackwell,2010年)。
- Lower,Wendy。《纳粹帝国的建立与乌克兰的大屠杀》(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5年)。
- 马多克斯·史蒂文。“Prestupleniia i nakazanie:karatel nye otriady v Leningradskoi oblasti, 1941-1944 gg” ,见SSSR vo Vtoroi Mirovoi voine. Okkupatsiia,kholo-kost,斯大林主义,编辑。奥列格·布德尼茨基(Oleg Budnitskii)(莫斯科:Rosspen,2014),26-48。
- 玛丽亚·马丁。《苏联悲剧:1917-1991年俄国社会主义史》(纽约:自由出版社,1994年)。
- Markwick, Roger D. 和 Euridice Cardona. 《前线的苏联妇女》第二次世界大战(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an,2012年)。
- 马鲁斯,迈克尔·R.《不受欢迎的人:二十世纪的欧洲难民》(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
- 马丁,特里。《斯大林主义强制迁移政策:模式、原因与后果》,载《人口与国家安全》,迈伦·韦纳和莎伦·斯坦顿·罗素编(纽约:伯格汉出版社,2001年),第305-37页。
- 马斯洛夫,亚历山大 A. ,《苏联阻击分队是如何部署的?》,《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第9卷,第2期(1996年):第427-35页。
- 马斯洛夫,亚历山大 A. 《阵亡的苏联将军:1941-1945年战斗中阵亡的苏联将领》(伦敦:弗兰坎克斯,1998年)。

- 埃文·莫德斯利。《东方雷霆:1941-1945年纳粹-苏联战争》第二版修订版。(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15年)。
- Mazower,Mark。《希特勒的帝国:纳粹如何统治欧洲》(纽约:企鹅集团,2008年)。
- Mel tiukhov,Ml 9 dnei boevogo puti krasnoarmeitsa Bunina i ego razmyshle-niia o poriadkakh v armii (1941 god) ,Voенno-istoricheskaiа antropologiia (2005/2006): 142-51。
- 梅里代尔,凯瑟琳。《伊凡战争:红军的生与死,1939-1945》(纽约:大都会图书,2006年)。
- 迈耶-杜廷多夫,埃克哈德。 General der Infanterie Max von Schencendorff ,希特勒军事精英:68 Lebensläufe,2nd,rev.编辑,编辑。 Gerd R. Ueberschär (达姆施塔特:WBG, 2011) ,481-8。
- 蒙蒂菲奥里,西蒙·塞巴格。《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纽约:Vintage出版社) 图书,2003年)。
- Mosely, Philip E.,《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美国岁月》,载《俄国的革命与政治:纪念B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论文集》,Alexander 和 Janet Rabinowitch 与 Ladis KD Kristof 合编(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33-8页。
- 莫斯科夫,威廉。《苦难的面包:二战期间苏联的粮食供应》(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 穆勒,罗尔夫·迪特。 An der Seite der Wehrmach: Hitlers ausländische Helfer beim Kreuzzug gegen den Bolschewismus 1941-1945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ischer, 2010)。
- Mulligan, Timothy P.《间谍、密码和“Zitadelle”:情报与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当代史杂志》22,第2期(1987年):235-60页。
- Mulligan, Timothy P.,《逃离斯大林格勒:苏联国民与德国第六集团军》,《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第20卷,第4期(2007年):739-48页。
- Nagornaia,OS Drugoi voennyi opyt. Rossiiskie voennoplennnye Pervoi mirovoi voiny v Germanii (1914-1922)(莫斯科:Novyi khronograf,2010)。
- 诺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俄罗斯人在德国:1945-1949年苏联占领区史》(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出版社,1995年)。
- 瑙莫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共和国副总统。
Materialy komissii po reabilitatsii zhertv politicheskikh repressii , Nова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2 (1996): 91-112。
- 诺伊曼,克劳斯。《跨越海洋:澳大利亚对难民的回应。历史(彩色)》(Blackwood:Black Inc.,2015年)。
- 查尔斯·奥康奈尔。《慕尼黑苏联研究所》,卡尔·贝克著
俄罗斯和东欧研究论文 808 (1990)。
- 奥基夫,布里吉德。《新苏联吉普赛人:苏联早期的国籍、表现和自我》(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 2013年)。
- 奥本海姆,塞缪尔·A·“尼古拉耶夫斯基,鲍里斯·伊万诺维奇(1887-1966)”,《俄罗斯和苏联历史现代百科全书》,约瑟夫·L·维津斯基编(海湾微风:学术国际出版社,1981年),第24卷: 207-10。

- 奥斯特洛,约尔格。《明镜周刊》的《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 1941–1945》是国民和国际的《Untersuchungen》。Forschungsüberblick und Bibliographie.第二,修订版。edn。(德累斯顿:Hannah-Arendt-Institut für Totalitarismusforschung eV und der TU Dresden, 1996)。
- 奥弗曼斯,吕迪格。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 (慕尼黑:R. Oldenbourg,1999)。
- Overmans,Rüdiger,Andreas Hilger 和 Pavel Polian (编辑)。德国手下的 Rotarmisten: Dokumente zu Gefangenschaft, Repatriierung und Rehabilitierung sowjetischer Soldat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帕德博恩:Ferdinand Schöningh,2012年)。
- Overy, Richard.《盟军为何获胜》(纽约:WW Norton,1997年)。
- Penter, Tanja.《审判通敌者:苏联战后针对通敌者审判的新资料》,《斯拉夫评论》第64卷,第4期(2005年):782–90页。
- 伊戈尔·彼得罗夫和奥列格·贝达。《苏联》,摘自《加入希特勒的十字军东征:欧洲国家与1941年苏联入侵》,大卫·斯塔赫尔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即将于2017年出版)。
- 普列沙科夫,康斯坦丁。《斯大林愚蠢:二战东线悲惨的头十天》(波士顿和纽约:霍顿·米夫林公司,2005年)。
- Plokhly, Serhii.《血的呼唤:政府宣传与公众对苏联加入二战的反应》,《俄罗斯世界报》52,第2-3期(2011年):293-319页。
- Plotnikov, A. lu. 和 V Vasilik, “Vlasovskoe dvizhenie” ili eshche raz ob istorii predatel stva (Na osnove analiza doktorskoj dissertatsii KM Aleksandrova) ,Klio 1/109 (2016):197–202。
- 波尔·迪特。Die Herrschaft der Wehrmacht: Deutsche Militärbesatzung und einheimische Bevölkerung in der Sowjetunion 1941–1944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ischer,2011)。
- 波尔·迪特。“Sowjetische Strafverfahren gegen Kollaborateure”,载于 Bewachung und Ausführung:Alltag der Täter in nationsozialistischen Lagern,编辑。Angelika Benz 和 Marija Vulesica (柏林:Metropol-Verlag,2011):101-10。
- 波利安·帕维尔。Zhertyv dvukh diktatur:Ostarbaitery i voennoplennyye v tret em reikhe ikh repatriatsiia (莫斯科:Vash Vybor TslPZ,1996)。
- 波利安·帕维尔。Deportiert nach Hause: 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 im Dritten Reich und ihre Repatriierung (慕尼黑和维也纳:奥尔登堡,2001)。
- 普鲁辛,亚历山大。“将法西斯罪犯送上绞刑架!” :大屠杀和苏联战争罪审判,1945年12月至1946年2月”,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 17,第1期(2003年):1-30。
- 普鲁辛,亚历山大。Ukrainiskaia politsiia i kholokost v General nom okruge Kiev, 1941–1943: deistviia i motivatsii , Kholokost i suchastnist : Studii v Ukrainii i sviti 1 (2007): 31-59。
- 里斯,罗杰。《红色指挥官:1918-1991年苏联陆军军官团社会史》(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05年)。
- Reese, Roger.《服役动机:二战中的苏联士兵》,《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第20卷(2007年):263–82页。

- 里斯·罗杰。《斯大林士兵为何战斗：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11年）。
- 里斯·罗杰。《十位卫国战争犹太红军老兵：追寻神话中的代表士兵的故事》，《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第27卷，第3期（2014年）：420-429页。
- 列昂尼德·雷因（Leonid Rein）。《国王与棋子：二战期间白俄罗斯的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纽约：Berghahn Books,2011））。
- Rich, David Alan. 《莱因哈德的步兵：苏联战利品文件和调查记录作为资料来源》，载《铭记未来：种族灭绝时代的大屠杀》，V. John Roth 和 Elisabeth Maxwell 编（贝辛斯托克·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1年），第688-701页。
- Rieber, Alfred J. 《苏联内战》，《批判：俄罗斯探索》和《欧亚历史》4（2003）：129-62。
- 里伯尔，阿尔弗雷德·J·斯大林与欧亚霸权之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
- Rimmel, Lesley A. 《斯大林主义列宁格勒的斯沃德基与民意》，《手册》俄罗斯世界40，编号。1-2（1999）：217-34。
- 罗斯曼，杰弗里·J. 《斯大林统治下的工人抵抗：车间的阶级与革命》（马萨诸塞州剑桥和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
- 鲁布佐夫，尤里。另一个自我斯达琳娜。Kniga sozdana na osnove rassekrechennykh dokumentov iz arkhivnykh foldov（莫斯科：Zvonnitsa-MG,1999）。
- 鲁达科娃，达里亚。《二战期间苏联平民与德国占领区乌克兰的合作》，西澳大利亚大学博士论文，正在撰写中。
- 卢瑟福，杰夫。《东线的战斗与种族灭绝：1941-1944年的德国步兵战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
- 桑伯恩，约书亚 A. 《帝国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罗斯帝国的毁灭》（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
- Schechter, Brandon. “人民的指示”：在“非俄罗斯人”中本土化卫国战争，Ab Imperio 3（2012）：109-33。
- 布兰登·谢克特。《国家的锅和士兵的勺：红军的口粮》，摘自《饥饿与战争：二战期间苏联的粮食供应》，温迪·戈德曼和唐纳德·菲尔策编（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15年）。
- 谢克特，布兰登。《政府问题：1941-1945年红军的物质文化》（未发表的手稿）。
- 施洛格尔，卡尔·恐怖与创伤：Moskau 1937（慕尼黑：Carl Hanser Verlag，2008年）。
- Schulte, Theo J. 《德国军队与纳粹在占领俄罗斯的政策》（牛津和纽约：Berg,1989年）。
- 弗朗兹·W·法南弗洛希特·塞德勒：Der Soldat zwischen Eid und Gewissen（慕尼黑：Herbig,1993）。
- 塞德勒，弗朗兹·W·“Kononow,Iwan Nikitisch”，在他的 Die Kollaboration 中 1939-1945（慕尼黑：赫比格，1995），290-2。

- 密歇根州塞米里亚加 协作:Priroda.tipologija i proiavlennia v gody Vtoroi Mirovoi voiny (莫斯科:Rosspen,2000)。
- Seniavskaia,ES 1941-1945:Frontovoe pokolenie:istoriko-psikhologicheskoe issledovanie (莫斯科:RAN institut Rossiiskoi istorii,1995)。
- Sewell, William H.《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5年)。
- 施奈尔,阿伦。Plen:Sovetskie voennoplennye v Germanii,1941-1945 (莫斯科和耶路撒冷:Mosty kultury,Gesharim,2005)。
- 斯拉韦斯基,菲利普。《苏联对德国的占领:饥饿、大规模暴力与和平斗争,1945-1947》(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
- Sokolov,BV “Russkie kollaboratsionisty”,载于他的 Tainy Vtoroi Mirovoi (莫斯科:Veche, 2001年),310-23。
- 索科洛夫,BV Tainy Vtoroi Mirovoi (莫斯科:Veche,2001)。
- Stahel, David.《巴巴罗萨行动与德国在东方的失败》(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
- 斯塔赫尔,大卫。《基辅1941:希特勒在东方的霸权之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
- Statiev, Alexander.《红军中的惩戒部队》,《欧亚研究》62,第5期(2010年):721-47。
- Statiev, Alexander.《苏联在西部边境的反叛乱》(剑桥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
- 施特茨-马克思,芭芭拉。斯大林士兵在奥地利:Die Innensicht der sowjetischen Besatzung 1945-1955 (维也纳和慕尼黑:Böhlau Verlag 和 Oldenbourg Verlag,2012)。
- 斯特雷特,克里斯蒂安·凯恩-卡梅拉登。Die Wehrmacht und die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genen 1941-1945,新版。(波恩:迪茨,1997)。
- Suny, Ronald Grigor 和 Gail W. Lapidus.《亚历山大·达林:一个独特的声音》,摘自亚历山大·达林著《历史的用途:理解苏联和俄罗斯》,Gail W. Lapidus 主编(拉纳姆:Rowman & Littlefield 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 斯温,杰弗里。《斯大林与希特勒之间:德维纳河上的阶级战争与种族战争》1940-46 (伦敦和纽约:RoutledgeCurzon,2004年)。
- 陶布曼,威廉。《赫鲁晓夫:他的人和时代》(纽约:WW Norton,2003年)。
- 泰辛·格奥尔格。德国国防军和武装党卫队在1939年至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联盟和特鲁彭,第17卷。共20本书(奥斯纳布吕克:Biblio Verlag,1974年)。
- 瑟斯顿,罗伯特·W.《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的生活和恐怖:1934-1941》(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
- 瑟斯顿,罗伯特·W.《忠诚与背叛的大熔炉:1941年和1945年的苏联士兵行为》,载《人民战争: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应》,罗伯特·W·瑟斯顿和伯恩德·邦韦奇编(厄巴纳和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5-57页。

- 瑟斯顿,罗伯特·W.和伯恩德·邦韦奇(编)。《人民战争:苏联对二战的回应》(厄巴纳和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0年)。
- 托尔斯泰,尼古拉。《雅尔塔的受害者》(伦敦:霍德,1977年)。
- Torchinov,VA 和 AM Leontiuk。Vokrug Stalina:istoriko-biograficheskii spravocnik (圣彼得堡:Filologicheskii fakul tet Sankt-Peterburgskogo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2000)。
- 特罗姆利,本杰明。《重塑合作:战后俄罗斯移民中的弗拉索夫运动》,未发表手稿。
- Tzabar, Shimon。《白旗原则:如何输掉一场战争(以及原因)》,第二版编辑(纽约:Four Walls Eight Windows,2002年)。
- 维奥拉,林恩。《斯大林统治下的农民造反派:集体化与农民反抗文化》(纽约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 瓦赞,瓦妮莎。报应还是重新整合?苏联遣返政策的模糊性:加里宁省案例,1943-1950 ,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55,no. 1 (2007) :34-55。
- 瓦赞,瓦妮莎。L URSS contre ses traîtres: L Épuration soviétique (1941-1955) (巴黎:索邦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冯·哈根,马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士兵:红军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1917-1930》(伊萨卡和伦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年)。
- 韦纳,阿米尔。《理解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命运》(普林斯顿和牛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
- 沃尔夫拉姆·韦特(编辑)。小曼内斯之战:一场军事战争 Unten (慕尼黑和苏黎世:Piper,1995)。
- 怀曼,马克。《DPs:1945-1951年欧洲的流离失所者》(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0年)。
- Zemskov,VN K voprosu o repatriatsii sovetskikh grazhdan 1944-1951 gg , Istoriiia SSSR 4 (1990): 26-41。
- Zemskov,VN “Rozhdenie “vtoroi emgratsii”1944-1952” ,社会学 issledovaniia 4 (1991): 3-24。
- 佐洛塔列夫,弗吉尼亚州(编辑)。Velikaia Otechestvennaia. Istoriiia Velikoi Pobedy 1941-1945 gg (莫斯科:Animi Fortitudo,2005)。
- 祖布科娃,埃琳娜。Pribaltika i Kreml :1940-1953 (莫斯科:Rosspen,2008)。

指数

- 阿巴库莫夫 (Abakumov) 50,138 n.80
同谋 10,141-2 酸性测试 参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 阿德莱德
(Adelaide)
145 农业工人 80,87 n.25,88,114-15,117-18 另
见集体农民 阿基姆科 (Akimenko)将军 AZ
45 阿克谢
涅夫 (Aksenev)少校 101 联盟 18,93、
130,155 盟友 6,9,18,36、
129-30,139,151 安德森
(Anderson)杜鲁门 (Truman) 175 反布尔什维
主义 104,119,157 “反世界主
义”运动 160 反游击行动 参见合作 反犹太
主义 107,119,171 另见大屠杀 反斯大林主义 4、
107、 111-12, 116, 148, 150 另请参阅俄罗斯解放运
动.动机 Arad, Yitzhak 175 亚美尼亚人 80, 86,
112-13, 115,
134 革命电影制片人协会 109 Ataman 1, 3, 18, 90,
132, 137 奥格斯堡 145 奥斯维辛 参见灭
绝营 奥地利 138 澳大利亚 3,
18, 63, 144-6 阿塞拜疆
80, 86
- 约尔格·巴贝罗夫斯基 158 巴
赫梅特夫档案 15 波罗的海国家
13, 42, 79 n.6, 109, 132 巴巴罗萨行动 23-
4, 52, 59, 78, 122-4, 130 巴伐利亚 138-9, 147-8 白俄
罗斯 80, 86,
131 白俄罗斯人 61, 81, 86,
114-15, 117-18, 133 贝尔热
茨 (参见灭绝营) 别尔季切夫 67 拉夫连季·
贝利亚 25, 43 卡
雷尔·贝尔霍夫 157, 174 柏林 137-8,
153 塞斯·伯恩斯坦
坦 15, 175 背叛 3, 6, 41, 57,
61, 80, 137, 140 比亚韦斯托克 59
- 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30黑市战役36,71、
93
闪电战 78 蓝领工
人 88, 168 另见工人
博布鲁伊斯克 82
布尔什维克主义 1-2,12,59,95,107,109、
113,123,127,129-30,151,157 另见反布尔
什维主义
鲍里索夫 121, 127-8
勃兰登堡 138 布雷斯特
139 英国参见英
国 Buchbender, Ernst 12, 20-1
Budnitskii, Oleg 175 Bukhantsov, G.
122-3, 133 Bukreev, Arkadii
Vasilevich 66-8, 133-7, 139, 143, 160
- 加拿大 144 资本
家 16 俘虏 参见
战俘 俘虏 参见战俘
- 高加索 60, 78, 80, 86, 109, 121, 132, 159 釜战
21, 26, 28,
35, 57, 166
另见包围审查制度 15, 40
- 中亚 13, 86, 116, 159
中央情报局 参见 CIA
康斯坦丁·切尔卡索夫 1, 3-4, 64, 130, 138, 146, 151
104,131,145,157,167,177号儿童
中国 125, 177
楚瓦什 86-7, 114-15, 117
中央情报局 153-
4 平民 8, 22, 62, 71, 75, 89, 92-3, 121, 125, 127, 131, 134-5,
138-41, 151, 175 内战 (俄罗斯) 55, 108, 146,
147, 148,
162 计量学 参见量化 胁迫 参见酷刑
- 科恩·劳里 175 协作 1-4、
6-7,12,18,48,53,64,100,113,119,121,126,128,130-
1,138-45,147-51,153-4,156,159,161-
2、 171, 176-7 另见 Schutzmannschaften,

200

合作 (续)

和反游击战争 107, 131, 174
 班贝格, 131 行动
 鹰, 131 行动
 赫尔曼, 49 号行动
 闪电行动, 131 行动定义 10, 17, 125
 和大屠杀 13-14, 93, 126, 132-5,
 137, 160, 175, 178

冷战 3, 18, 147, 153, 155, 171 集体农场 79,
 106, 108-9, 112, 114, 157-8, 171 集体农庄 79,
 87-8, 94, 96,
 104, 113-18, 173 集体化 55, 66, 79-80, 87, 95-
 6, 113, 158-9

哥伦比亚大学参见巴赫梅特夫档案指挥官参见军官政委
 2.5, 42, 44-5, 51-2, 57, 61, 66-
 7, 76, 94, 96, 104-5, 107-8, 122, 140

政委令 67, 72, 127
 解放委员会

俄罗斯人民见 KONR
 共产党 4, 44, 65, 76, 98, 167, 177

共产主义青年团, 参见共青团集中营 13-14, 43, 69, 91,
 108, 137, 142, 另见古拉格, 战俘, 灭绝营

莫吉廖夫 123, 128

沃罗涅日 91

哥萨克 1-2, 90, 125, 128-9, 131-2, 137-9, 147-8,
 173 另见鞑靼
 哥萨克人
 第十五哥萨克军 129, 131
 第102哥萨克团 131
 600 哥萨克团 131 反叛乱 126, 131,
 175 另见反游击行动, 游击队

克里米亚 159

1926年俄罗斯刑法典第41.43条文化史8-10页

捷克人 125

琴斯托霍娃 136

亚历山大·达林 4, 21-3, 152, 155-6, 159, 173

达林, 大卫 152

但泽 (格但斯克) 90 死刑

14, 79, 91, 142, 144 另见

处决失败主义

6, 28, 79, 103-5, 111-12, 116, 119, 151, 153, 156, 162, 171-
 2, 175 另见动机

指数

叛逃 6, 90, 98, 135, 140-1

在第 1.3.59-61.64-6.76.121-2 组中, 障碍有
 11.25、

37-55.57.60.63 个, 原因有 2-4.7.17-18、
 24-5、

32, 36, 56, 62, 71, 91, 93, 97, 100-19、
 122-5, 128-31, 148, 150-1, 154, 156-
 8, 160-3, 165, 172, 177

使用飞机 75, 102 使用坦克

73-5 叛逃者 (Überläufer,
 perebezhchik) 17, 23-4, 26-8, 30-1, 33-4 定义 16-
 17, 23, 25, 160-1 和种族 77, 79-

81, 86-7, 93-4, 108-10, 112, 118, 132, 173

和性别 78, 94 和世代 81, 83-5, 87, 89, 94, 114, 116-
 18, 167-8, 177 数字 19-22, 26-36, 46,

49-50, 52, 56, 58, 61, 80,

82-5, 92, 99, 111-12, 114-18, 123, 132, 141-2,
 149, 155, 159, 166, 168, 171, 174-

5, 177 难民 100, 119, 159 社会阶层 79, 81, 88-9, 94,

109-10, 116, 168, 173, 177 逃兵 22, 24,

26, 41, 50, 54, 100, 142 定义 16 数字 36

驱逐出境 69, 91, 136, 139, 142, 172 独裁统治 6, 10, 39, 43, 51,

74, 89, 106, 119, 124, 127, 147, 174-5 叛变 105-7,

109, 111-12, 116, 119, 154-5, 165 另见动机

幻灭 6 流

离失所者 (DP) 3, 7, 15, 47, 68, 138-9, 144-5, 148, 153, 171

另见难民 DP 见流离失所者

Dolchstosslegende

见背后捅刀子 鞑靼哥萨克人

2 Dzhugashvili, Iakov Iosifovich 43 Dzhugashvili, Josif 见斯大
 林德维诺夫, B. 见古列维奇

东欧 35, 58, 137, 149, 163

东部战线 28, 32, 34, 131 另见

“伟大卫国战争”移民 145-

8, 153, 157 移民 7, 126, 147, 151-3,
 159, 171

- 包围圈 1, 3, 28, 35, 63-4, 73-4, 100, 156, 165 参见
大锅之战
- 恩斯塔德, 约翰内斯·杜伊 175
- 叶尔莫洛夫, 伊戈尔 175
- 逃脱 15, 51, 62, 68-9, 90-2, 100, 109, 123, 128,
134, 137, 141-3, 147, 151, 153, 156,
161, 170
- 爱沙尼亚人 60, 80, 121 处
- 决 5, 14, 24, 38, 41, 42-6, 50, 56, 67, 72, 76, 91, 93-
4, 101-2, 122, 127, 133, 135-8, 139, 142,
143, 170 另见死刑 刑罚用尽 5, 158 流放
见特别定居点 灭绝营 134, 136,
- 139
- 奥斯维辛 134, 136, 139
- 贝尔泽克 134
- 马伊达内克 134, 136
- 索比堡 134
- 特雷布林卡 134
- 家庭 参见亲属
- 饥荒 55, 87, 96, 102, 113, 158-9 法西斯 25,
39, 40, 44, 49, 73, 141, 160, 171 战地法庭
38 过滤
69, 91, 139-42, 160
- 参见遣返, 战俘
- 芬兰 1, 41
- 费舍尔, 乔治 153-6, 159
- 苏联俄罗斯的强迫劳动 (达林) 152
- 法国 177
- 法国35前线
6-7, 10-13, 15, 17-18, 26, 29-30, 32-3, 35,
38-9, 44, 46, 48, 51, 53-4, 59-61, 64, 66,
69-73, 75, 77-8, 80, 82, 85, 90, 94-5,
98-101, 103, 108, 112, 121-2, 124-5,
130, 151, 158, 166-7, 170, 174-5
- 家谱 159 代 56,
77, 81, 84, 89, 115, 152
- 格鲁吉亚人 80, 134
- 德国陆军 5, 19, 24, 66, 75, 99, 107, 121-2, 127, 157 另
见
德国国防军
- 第19集团军群中央, 127
- 第2装甲集团军 82
- 第三装甲集团军 11, 26-7, 30, 33, 40, 78
- 1918年德国革命 127
- 德国在俄罗斯的统治 (达林) 4, 152
- 德国社会民主党 127
- 德苏战线 参见东线大屠杀 137, 156 参见大屠杀
- 格鲁霍夫 45
- 戈培尔, 约瑟夫 24
- 亚历山大·戈贡 157
- 戈梅利 82
- 戈尔巴乔夫, 米哈伊尔 15
- Gorski, Iwan 145 参见 Kononov
- 英国 14, 35-6, 38, 52, 139
- 伟大的卫国战争 (1941-45) 110, 160 另见第二次世
界大战东部战线
- 大清洗引发大恐怖
- 大恐怖 14, 46, 55, 96, 153, 165 游击战 38, 108,
127, 174 另见游击队
- 古拉格 4.63.72.91-2.139.142-3.157 另见特殊安置
- 古拉格群岛 (亚历山大
索尔仁尼琴) 4
- Gurevich, Boris L. vovich 150
- 哈布斯堡帝国 125 圣徒传记
作者 59, 63, 128, 146
- 海姆森, 利奥波德 152
- 哈特曼, 克里斯蒂安 157, 174
- “哈佛项目” (口述历史访谈) 152-4
- 哈佛大学 153 仇恨 40, 106-
7, 109, 150
- Hellbeck, Jochen 167-71 另见后修正主
义
- 希腊王子 (TSS) 145 最高刑预见处决
- 希尔格, 安德烈亚斯 22-3
- 希特勒, 阿道夫 10, 18-20, 93, 105, 123-7,
129-33, 148, 151, 153, 171-2, 176
- 希姆莱, 海因里希 126, 147 史学 7, 35,
148-9, 159, 161-2 “后修正主义者” 166 “修正主
义者” 166 “极权主义学
者” 166
- 伟大胜利史 (俄罗斯国家军事史) 161
- 霍夫曼, 约阿希姆 36, 156
- 大屠杀 13, 61, 93, 127, 133-4, 175,
178 另见反犹太主义, 种族灭绝
- lampol 67
- 意识形态 4, 10, 53, 89, 98, 101, 103, 119, 125, 127,
136, 148, 154-7, 159, 168-71, 174, 176-
8 灌输 114, 136, 177 情
- 性 114, 154, 156

智力 11-12, 22, 27-8, 30-2, 37,
40, 42, 49, 55-6, 67-8, 78, 80, 82, 91, 99-
100, 121, 129-31 知识分子 63 另

见专业人士、白领工作者

国际难民组织
(IRO) 144 询

问 11-14, 16, 42, 49, 62, 65, 67, 69, 87, 94, 99,
101, 105, 107-8, 110-13, 121, 131,
133, 135-6, 138-9

IRO 见国际难民组织

铁十字勋章 126, 135

以色列 15, 38, 158

伊凡 70-1, 93

日本 96

日语 95, 124

犹太人 5, 32, 52, 93-4, 107-8, 119, 122, 130,
133-4, 136, 153, 171-2 另见大屠
杀

K., 维克托 101-2 卡恰

洛夫 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中将 43, 73-4 卡门斯
克 91 卡明斯基, 布罗尼斯拉

夫 150 卡尔波夫,

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 49 哈萨克斯

坦人 68, 80, 86-7, 94, 113-15, 117 肯普

顿 139 凯塞尔施拉赫特大锅战斗, 包围赫列夫纽克, 奥列

格 106, 175 赫鲁晓

夫, 列昂尼德 72 赫鲁晓夫, 尼基塔 72 基辅 (基
辅) 109, 135 亲属

138, 139, 145, 153 作为叛逃原因 2,

44, 56, 62, 66, 96, 104, 106,

107, 111, 116, 118 作为叛逃的

障碍 37, 41, 42, 43 作为信息

来源 56, 62, 153 集体农庄 参见

集体农场 集体农庄成员 参见集体农庄员 共青团

(共产主义青年团) 101-2, 153, 167-8

科诺诺夫,

伊万·尼基蒂奇 1-5, 7, 9, 18,

30, 59, 62-6, 72, 75, 77, 89-90, 93, 97,

109, 112, 119, 121, 127-32, 134,

137-9, 144-5, 147-52, 163, 171 科

诺诺夫齐 1, 121, 130

KONR 1, 132, 137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科里年科 135

克拉斯诺佩尔, 阿列克谢·约西福维奇 135

克里姆林宫 18 号

古比雪夫 139 军区

库尔斯克 45

吉尔吉斯斯坦 172

Landarbeiter 看到农业工人
拉脱维亚 174

拉脱维亚人 90, 121, 134, 158 传

单 23, 25, 27, 31, 38, 44, 49, 57, 109

莱金 94

列宁, 弗拉基米尔 1, 162

列宁格勒 31-2, 80, 90, 98, 107, 171-3

列文, 米哈伊尔 80

列兹金斯 80, 109

Liber, George 174 解

放被占领土 1, 3, 7,

18, 59, 63, 95, 109, 113, 128, 131, 154,
172

国会图书馆 16

立陶宛 122

立陶宛人 86, 114, 121, 134 清算 44,

75-6, 134 另见

处决

洛格维诺夫, 弗拉基米尔 91

洛尔·温迪 174 效忠派

63-4

卢布林 134, 136

德国空军 124, 158

里昂, 尤金 9, 155, 165

马伊达内克看到灭绝营

玛丽亚·马丁 157

马利诺夫斯基·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 61-2

满洲 95

马里自治共和国 139

梅赫利斯, 利未记 39

梅尔策, 尤利亚 43

孟什维克 147, 149-50, 152-3

孟席斯·罗伯特 3, 18 武装分

子 177

明斯克 30, 59, 138 少数

民族 6, 10, 33-4, 36-7, 58, 82, 112-13, 119,

130, 140, 159, 175

米申 140

莫斯科 70-1, 93, 108-10, 112, 153, 155, 171

祖国 2-3, 41-5, 61, 80, 137, 140, 162 动机 6,

78-9, 94-

119, 158, 175-6

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莫兹戈沃伊 135

莫斯科人 171

慕尼黑 68, 138, 144, 153-4

慕尼黑研究所

苏联 153-4 谋杀

40-1, 47, 53, 76, 106, 123, 143

凶杀5,23,53
 摩尔曼斯克 109
 误区 16, 73, 127

那不勒斯 145 国
 家社会主义 参见纳粹民族主义 107,
 175 纳乌莫夫,VP 19, 20, 161
 纳粹主义 9, 161 纳粹新秩序 151 新评
 论 (Novyi zhurnal)
 (期刊)149 纽约 149, 153 鲍
 里斯·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斯基 3, 144, 147-
 50, 152-4, 156,
 159, 167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
 会 (NKGB) 41, 43 内务人民委员会 (NKVD) 3, 41-
 3, 69, 71, 79, 92, 96, 126, 130, 157, 162,
 170 新杂志 参见新评论

职业 13, 19, 32, 60, 69, 96, 113,
 118,125,138,144,152,157,159,175,177

颂歌 20

敖德萨,1941-1944 (达林) 152 名军官 2,
 5, 31-2, 41-4, 48-9, 51-2,
 59-60, 64-7, 73-6, 78-9, 88-9, 96, 99,
 101, 112, 117, 124, 127, 130, 132-3, 138-
 9, 142-3, 148, 158, 160 军官疗养院 121

反对派见抵抗,另见游击队,
 俄罗斯解放运动

奥廖尔 82, 112

奥罗比,伊凡·亚科夫列维奇 135

东方工人 144

东哥特人 129

奥弗曼斯,吕迪格 22-3

P., Fedor 71-2 绥靖

政策 127 另见反叛乱 Pannwitz,
 Helmuth von 129, 131

游击队 1, 52, 69, 107, 113, 130-1, 135, 151,

174 另见反游击队行动 爱国主义 170 另见民族主义 农民
 80-1, 89, 95-7, 116, 168-9 另见集体

农庄主 惩戒

营 54, 71, 93 改造者 见叛逃者 改革 (重组)
 15, 160 彼得霍夫 91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佩罗夫 61
 叶夫根尼·斯捷潘诺维奇·彼得罗夫 65, 89,
 109-10, 113

Piotrków Trybunalski 136 公民投
 票 9, 37, 39, 46, 97, 99, 149, 159 另请参阅酸测试

波多利斯克 16

波兰 109, 133, 145

波利安,帕维尔 5

极数 13, 80, 125, 134, 145

政治局 72, 138 政治官员

见政委 政治犯 108 政治犯见政委

波尔特瓦地区 32, 60 后修正

主义 167 参见史学、极权主义、

修正主义

贫困 3, 106, 147, 148 另见饥饿

POW 见战俘

布拉格 138

Prelestnoe 135 一战

前 1, 86, 89, 96, 158, 175 主要群体 参见红军 另
 见叛逃战俘 7, 12, 28-9, 156 集中营

海乌姆 133, 139

哈尔科夫 52

莫吉廖夫 123, 128 比 5,

18-19, 26, 33-6, 40-1,

52,57,58,78,91,125,135,139,142-4,158-62,

177 德国死亡率 137 苏联死

亡率 52,57,68,123-4 定义 10,17,166 数

字 5,6,21-3,26-7,31,33-6,52,58,90-1,118,
 121-4,

132,149,157,159,171,177 处

理 13,17,19,24,39-41,47,50-6,68,91,116,121-2,

129,130, 133, 140, 151 专业人士 87-9,

114-15, 117-18 另见知识分子、

白领工人 宣传 12, 20-1, 23-6, 30-2, 51, 59, 72-3,

79-81, 98, 109, 111-12, 170, 172

德国传单 12,20,23,25,27,31,37-8,44,49,
 56-7,62,73,101,106,109,116-17

政治主要行政部门

红军中的宣传 39

苏联暴行宣传 39-41, 47, 50-1, 53, 55-7

普鲁士 135

弗拉基米尔·普京 15, 157, 162-3

定性证据 6.21.30.35.81-2.99.159 量化 3.5.6.8-9、
12.20-2、

24.26.28.29.30.35.37-8.43.56.77.81-92.94.110-19、
140-4.149.157.161.167-8.170-1.173-4

拉多姆 136

rasputitsa 见无路

红军2-3.5-6.8.11.18-19.22.25.32-5.39-41.46、
48.51.53.56-7.60-2.67.69.71.77-80、
85-92.99-100.102-3.105-7.111-13、
116-17.121.124-6.128.130.132.134-
5.137.139.143.149-50.156-8.167-8、
171.173.175

Reese, Roger 5, 37, 60-1, 81, 88-90, 166, 168, 170,
175 难民 3, 10,

32, 100, 119, 159 另见流离失所者

莱因哈德,134 行动遣返 5.7.16、

139-40.144-5 另见过滤阻力 4-5.9-10.28.50、
53.63.65-6.97.100、

106.109.125.132.136.139-40.147-8.151.153-7、
159-61.166.172.177 撤退 33.38.49.57.64、
67.69.75、

91-2, 100, 130, 150, 155-6, 169 修正主义
35, 166-7 参见史学_后修正主义

梁赞 175

里特伯格,汉斯 129

ROA 参见 KONR 无路

地区 105

罗迪娜看祖国

罗森伯格,阿尔弗雷德 147

罗斯托夫州 104

顿河畔罗斯托夫 66, 139

俄罗斯 1-2, 4, 7, 10-20, 31-2, 35, 37, 41, 47, 50, 52,
55, 59, 66, 68, 72, 74, 77, 79, 81-2, 86, 88-
9, 93-5, 98-9, 103-4, 107-15, 117-
18, 121-3, 126-35, 145-8, 151-62,
165, 170-1, 173, 175

俄罗斯解放军见 KONR 132

俄罗斯解放运动 1, 3, 7, 18, 59, 63, 96, 109, 113,
128, 131-2, 148, 153, 154, 172 另

见

哥萨克人、KONR.SBONR.反斯大林
主义

俄国革命 12.56.84-5.98.108.113-15.127.146.155、
169

Sagitov, TO 68, 72 SBONR

146, 153 申肯多夫将军

Max von 127-9, 149 护卫队 126, 134 “焦土”
政策 130 谢别

廖夫,彼得·米特罗法诺维奇 44 谢尔巴科

夫.A. 25, 42 申多夫将军 参见申肯多

夫 施内尔,阿隆 5, 19, 22, 158 西伯利亚 41,

61, 108, 113 辛比尔斯克 109 斯

摩梭斯克 74, 121, 175 斯莫林,P. 上尉 150, 152,

156, 159, 162, 165-6 索比堡 参见灭绝

营社会主义 96, 109, 114, 128,

170 社会主义信使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期

刊) 147 社会学概议 (叛逃者) 77, 79 索科洛夫,BV 19,

20, 161 索尔仁

尼琴,亚历山大 4, 63-4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参见社会主义信使 苏联反对斯大林 (菲

舍尔) 154-5 苏联 (USSR) 1, 3-4, 7-9, 15, 27, 43, 55,

65, 70-1, 79, 90, 93, 109,

114, 119, 127, 140, 142-3, 145, 148, 151-

5, 159-

60, 171-2, 176 西班牙内战战争 96 特

别定居点 3.41.43.63.106.142-3.147.153 党

卫队辅助部队见特拉夫尼基党卫队 (Schutzstaffel)

1.7.13.49、

127.132-4.136-7.139 ssylka 见特别定居点 “背后捅刀
子” (Dolchstoßlegende) 127 斯大林,约瑟夫 1-6.9-14、

18.25.38.41-3.55.58.63-4.71-4.77.89-90、
93.98-100.104-5.107.109-10.113.119.124

127-30, 139, 144, 147-8, 150-1, 153-6, 158,

160, 162-3, 165-6, 169-70,

173, 175 斯大林格勒 5, 46, 90, 93, 102, 131-2, 137,

167-71, 177 斯大林格

勒战役 参见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主义

2, 4-6, 10, 96, 99, 100, 107, 109, 111-13, 116,

144, 148, 158-9, 165-6,

169 饥饿 5, 11, 40, 52, 54, 57, 71-2,

79, 90, 96, 102-3, 107, 123, 128, 130, 151, 173 亚历山

大·斯塔蒂耶夫 71, 79, 175 落后者 5, 36, 66, 71, 91,

122, 130, 135-6

- Streit, Christian 5, 122 补给
26, 102, 122 投降 1, 3-5, 9-10, 12, 23-8, 31, 33-5, 40-2, 47-53, 57, 59-60, 63-8, 72-5, 80, 91, 97, 100, 104, 131, 135, 138-9, 149-51, 153-62, 165-6, 173-4
生存主义 100-1, 103, 105, 111-12, 114, 116, 119 参见动机
- 斯温,杰弗里 79,174
- T., Richard 90-1, 93 塔甘罗格 145 塔什干 71, 90, 93, 171-2 鞑靼人 80, 114, 134 第三帝国 174 Thurston, Robert W. 9, 98, 165-7 托马舒夫 136 酷刑 15, 40, 44, 50, 70, 107, 143, 170, 174 极权主义 166, 178 另见史学 叛徒 1, 6, 10, 15, 17, 19, 34, 41-5, 47, 61-3, 73, 75, 88, 94, 135, 137, 140, 142-3, 160-2 另见 叛国罪特拉夫尼基 7.13.133-6.143 特雷布林卡 参见灭绝营 叛国罪 4.6.14.40.42-3.47.62.67.77.86.91.138-9.141-2.144.160.161-2.169, 173 参见叛徒
- Überläufer 见叛逃者
- 乌克兰 7, 13, 66-7, 79-80, 86, 93, 132, 135, 153, 157, 175
乌克兰人 66, 79-80, 86-7, 104, 108-9, 113-15, 117-18, 121-2, 125, 133, 135, 140, 158, 173, 175
- 山姆大叔看美国
俄罗斯人民解放斗争联盟 (见 SBONR)
- 英国 144 另见大不列颠
美国 12, 36, 144, 147, 153-4, 155
-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博物馆 (USHMM)13.61.67-8.133.135
- 乌兹别克斯坦 143
乌兹别克人 87, 117, 172
- 维尔纳,费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 135
维亚斯马 57
- 文尼察地区 67 暴力 44, 69, 74-6, 119, 136, 170 另请参阅处决、谋杀
- 维捷布斯克 71
弗拉索夫将军安德烈 1-2, 7, 127, 130-2, 137-8, 143, 147-8, 150 vlasovtsy (弗拉索夫夫人)
137, 142-3, 153
沃尔科戈诺夫,德米特里 16
Volksdeutsche (苏联德国人) 134 “用脚投票”参见全民公投
- 战争罪 13-14, 16, 52, 61, 67-8, 141, 160 战争 10, 38, 57, 127, 156, 176
华盛顿特区 16
华沙犹太区起义 134
德国国防军 1, 5, 22, 24, 30-1, 58-9, 66, 68, 78, 90-1, 93, 110, 113, 122-4, 126, 130, 132, 135, 155, 157-8, 176
- Werth, Alexander 52 西方盟军 6, 36 西线战场 29, 58 西方学者 20, 159, 162
另见史学 白领工人 87-9, 168 另见知识分子、专业人士
- 冬季战争 (1939-40)1.41.96
威斯康星大学 153 一厢情愿的统计想法
26, 29-30, 149, 167-71 女性 5, 52, 70, 74, 77-8, 85-6, 98, 122,
131-2, 136, 166-7, 173, 177 工人 54, 80, 87-9, 95-7, 106, 114-15, 117-18, 168 另见蓝领工人
-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18)35.55-7.62.111.116.118.125.127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45)3.7-10.38.56.59.97-8.134.144.146.152-3.155.160-1.163.169.174.176-7
- 雅尔塔协议 145 青年
56, 74, 84, 109, 154 另见儿童、共青团
- 南斯拉夫人 1
南斯拉夫 131, 147
- 朱可夫,乔治二世元帅
康斯坦丁诺维奇 80, 160-1